

大师课
MASTER CLASS

施展 中国史纲50讲



如果想用kindle读精品图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号： kindle精品汇

至臻阅读 精品荟萃



导论

01|发刊词：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这门课并不是仅仅要告诉你过去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是为了和你一起思考中国的未来。但是，想要推想未来，就首先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因此，我们会通过回望过去3000年的历史，去重新理解中国。

你好，欢迎来到《中国史纲50讲》。

可能你会问，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应该更多展望未来，为什么还要读历史呢？

很简单，是为了回答门口保安会问你的那三个深刻的哲学问题：

“你是谁？你从哪来？你要到哪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你思考未来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对未来目标的设定。

这个目标要如何设定呢？

这首先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自己、如何理解世界。

而只有当你搞清楚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理解了过去，理解了历史，才能搞清楚当下自己在哪里，然后才知道该如何规划未来。

所以，越是一个需要规划未来的时代，就越是一个需要回顾过去的时代。

历史的功用，不是让你知道几个八卦，知道四爷和十四爷到底应该是谁继承皇位，司马懿和杨修到底啥关系。

历史真正的功用，是帮助你通过过去看到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关心未来的人，那你一定也是个愿意重读历史的人。

究竟什么是中国

我们要通过重读中国历史，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中国，弄清楚它从哪里来，想明白它会向哪去。

也许你会感觉奇怪，什么是中国，这还用问吗？

当然要问了，而且这个问题很值得问，我举两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一个是，你可能看到过这么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就是说宋朝灭亡后，汉族政权被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所取代，有些人就认为，宋朝之后都不能叫中国了。

咱们先不急于判断这说法对错，只追问一下，在一个几百年都不是中国的地方，成长起来的人还会是中国人吗？

如果是，那么似乎崖山之后还有中国呀。

如果不是，那我们凭什么自称中国人呢？

但是崖山之前和崖山之后，似乎确实也不一样了。

到底是什么不一样呢？这些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简单地这么一追问，你就会发现，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

另一个例子是，你可能在网上也经常看到一种说法：

说我们只要几天不买某国商品，那个国家就会遭遇到经济上的麻烦，几个月不买它的商品，它就会崩溃，所以只要大家联合起来抵制，就一定能治住它，不转不是中国人。

但问题是，你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要抵制的商品，除了品牌是那个国家的，几乎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你越抵制那个国家，实际上就越是在抵制中国自己。

中国和世界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是从历史上发展起来并不断演化的。

不搞清楚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变迁过程，同样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中國。

要回答前面的这些问题，都需要静下心来重读历史。

时间和空间的两条线索

因此，在我的这门课里，我会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为你梳理中国历史。

从时间上，我会从3000多年前的武王伐纣、周朝取代商朝开始，一直讲到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你会看到这些重大变化的真实逻辑。

在空间上，我也会带你看看在中原以外，在草原、在高原、在海洋上，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变化。

你会看到，这几个空间在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密切的联系，也给彼此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互相定义着对方。

而到了近代之后，这个空间概念进一步扩大了，你会看到，世界对

中国的改造，和中国对世界的改造。

当你听完这门课的时候，会发现：

从内部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多元成分的国家。

从外部来说，中国在近代开始成长为世界秩序当中的一个枢纽。

而内外这两个特征，又有着非常深刻的相关性。

当然，我们这门课不是学术研究，我会用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来给你呈现这些深层的、真实的历史逻辑。比如：

真实的诸葛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北宋一直不能收复幽云十六州？

明朝为什么盛产忠臣和奸臣？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的深层逻辑是什么？等等。

历史的“第一性原则”

那么，我讲述这些故事，与以往你在一般历史书上会看到的讲法有什么不同呢？

简单来说，我会搁置价值判断，不断努力进入到深层的历史运动逻辑进行分析。

历史本身是各个行为主体不断博弈的过程。

要说到博弈，就有两个事情必须纳入考量：

一个是博弈的内部动力机制，一个是博弈的外部约束条件。

内部动力机制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人们的欲望。

外部约束条件是什么呢？主要是博弈当中可用的各种资源，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用两个词来总结，就是欲望和秩序，我把这两个东西称为历史的“第一性原则”。

讲述过程中，我对任何事情的分析，都会不断地回溯到历史的第一性原则上去。

最终你会发现：

具体的历史中，并不是什么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压迫与反抗，而是各种不同的博弈主体不断地变换结盟关系，并调整他们的行为策略。

究竟和谁结盟，取决于它们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和相对力量关系，以及它们所掌握的资源类型，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策略。在博弈中，气候变化和技术变迁又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

在资源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这些群体的博弈会逐渐达成一个均衡点，社会结构就稳定下来了。

但是，如果发生气候变化，或者重大的技术变革，导致资源数量和类型又发生巨大变化，就会再一次打破原来的均衡，社会结构就得再一次重构，出现重大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大变迁和大转折，其底层的逻辑都在这里。

现在，你已经掌握这门课的分析工具了，也就是历史的第一性原则。

在未来的50讲里，你会看到，我会如何利用这些工具，给你展现一个历史上各方博弈的重要节点。

你会在这门课听到什么

这些重要节点主要分为六个模块。

古代历史部分，我们会讲述封建社会、豪族社会、古代平民社会这几个篇章。

近代之后，我们会主要讨论近代转型、现代革命、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互动，这样几个重要话题。

在每一讲里，你都会看到不同群体展开的精彩博弈，发现中国内在的发展逻辑。你可以看一下文末的课程表，会对我们这门课有更直观的印象。

最后再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现在外交学院任教，教授西方思想史、文明史等方面的课程。

对，历史并不是我的主业，而且我的本科是学习工科的，后来觉得工科不好玩，又转向文科，最后在北京大学拿到了史学博士。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一个学工科的，中途转了文科，在学校教的又是西方思想史，干嘛又来「得到」讲一门中国历史的课呢？答案是：工科能够解决日常的问题，却无法解决一直让我困惑不已的问题——中国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只有历史能解答这些问题。

而学习和教授西方思想史，是为了系统掌握分析问题的理论工具，以及，搞清楚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那么，我为什么又来「得到」讲中国历史呢？

因为学习西方的理论并不是目的，而通过这些工具，恰当地理解中

国，解答问题，才是目的。

作为一个曾经的外行，闯入史学领域，也让我会去问一些内行不会问的笨问题。

但正是通过这些笨问题，却把我引上了通常不会有人去走的一些思考路径，获得了很多让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发现。

我希望能够把这些年的思考分享给你，与你共同探讨更加有趣的话题，一起发现更加广阔的视野。

欢迎你的加入，期待课程里见！

施展•中国史纲50讲

课表

- | | |
|-----------|--|
| 导论 | 1. 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2. 究竟什么是“中国历史” |
| 封建
社会篇 | 3. 中国历史的时空坐标与商周之变
4. 封建社会是如何走向终结的
5. 诸子百家的三大流派 |
| 豪族
社会篇 | 6. 法、道、儒：皇帝到底喜欢谁
7. 汉人王朝为何统治不了长城以北
8. 草原征服型王朝为何能一统天下
9. 中国是如何走向豪族社会的
10. 为何后汉“亲小人、远贤臣”
11. 诸葛亮的士族绞杀行动
12. 司马懿时代的冤冤相报
13. 司马家族事业的断崖式下跌
14. 五胡乱华的血泪与梦想
15. 鲜卑人如何为隋唐打下基础
16. 影响隋唐历史的两个女人
17. 安史之乱终结了豪族社会 |

18. 西域，帝国命运的催化剂
19. 回鹘，草原霸主的兴与衰
20. 吐蕃，雪域霸主的聚与散
21. 大辽，首破百年的游牧帝国
22. 大宋，和平换来的高度发展
23.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争什么
24. 金太宗挨板子，促成蒙古崛起
古代平民 25. 从元朝看中国历史的正统性
26. 明朝为何盛产忠臣和奸臣
社会篇 27. 美洲白银与明朝的国运
28. 藏传佛教怎样帮助大清入关
29. 大清的局级政治智慧
30. 郑成功为何没成功
近代 31. 人口太多，技术发展不动了
32. 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33. 左宗棠借力伦敦，收复新疆
34. 南洋华人对近代中国的塑造
转型篇 35. 英国秩序下的中国角色
36. 俄国秩序下的中国角色
37. 日本秩序构想下的中国角色
38. 民国法统有两个来源
现代 39. 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刺激
40. 民族主义带来国民政府困局
革命篇 41. 国、共的两场货币战争
42. 中国：普世主义与海陆中介
43. 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
44. 中国崛起导致的世界经贸双循环
中国 45. 冷战和后冷战里的中国利益
46. 为何中国必须购买美国国债
崛起篇 47. 伊斯兰世界的困境
48. 在非洲发现中国
49. 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怎么赢
50. 中国，世界枢纽

精选留言

引用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也是在得到学习到的，“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现在不都再说还有诗和远方吗？我觉得历史也是一个诗和远方。也许小时候就想听听过去的故事，可随着人长大了，同样的事情能看出不同的味道，跟着大牛学习观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无疑是一场知识和思维的盛宴。期待施展老师接下来的讲解！

唐琪

施展老师的《中国史纲50讲》是从另外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探究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奇点，历史上的关键奇点是最能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的，“你要去哪里？”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需要无数次试错及经验的提炼，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我们会因为摸不清中国的走向而茫然不知所措，施展老师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肖海涛

只读施展老师这一篇发刊词，就能够感觉到老师逻辑性极强。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看历史主体之间的相互塑造，全局地、关联地、动态地看历史，有系统论的感觉。又用历史的第一性原则，分析茫茫历史事件中的底层逻辑，真是过瘾。这是不是理工科出身给施展老师带来的优势呢？非常期待老师接下来的课程。

02|究竟什么是“中国历史”

中国并不等同于中原，中国人也并不等同于汉族人。倘若忽视了草原、绿洲、高原和海洋上的历史，只看中原，那么讲出来的只是半部中国史。

你好，欢迎来到《中国史纲50讲》。

这一讲是这门课的导论，我们顺着第一讲的话题，再来展开聊一下，究竟什么叫“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这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中国”，一是“历史”。

这两关键词就大有说道。

什么是“中国”

我们先说第一个关键词，什么是“中国”？

咱们在发刊词中也提到过，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崖山属于之后无中国”，崖山就是灭亡宋朝的最后一场战争所在地。

这种说法想强调元朝、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政权，所以不是中国的朝代。

实际上，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流传呢？

仔细一琢磨你会发现，这说法里面实际上包含着一个预设，那就是，中国人等同于汉族人。

就已经触碰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能做这种简单的等同吗？咱们顺着“中国人”这个问题再往下思考一下，还会发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就是，古代历史上，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朝代，其实没有一个是纯汉人王朝，都是草原征服王朝。

无论是早期的北魏、中古时代的辽、金，还是后来的元、清，都是崛起于长城以北，入主中原的王朝。

也许你会说，不对啊，唐朝也统治了长城南北啊，实际上，到后面的讲解里你会看到，唐朝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汉人王朝，而是一个鲜卑、汉人的混合王朝。

你可能又会说，明朝也做到了同时统治长城南北，而且它一直统治到了黑龙江以北。

但实际上，在辽东以外的地方，明朝朝廷只是给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个封号而已，至于这个封号人家接受不接受，主动权并不都在大明这边。

你可能还会说，今天的中国也做到了啊，能够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你说的没错。但是，请注意，我说的是古代历史，今天已经不是古代历史了。

更何况，今天的中国的领土基础，是继承自清朝，而不是明朝；明朝后期的领土基本上就是长城以南的地盘。

所以，哪怕是为了了解释清楚今天的中国，我们也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古代，纯汉人王朝做不到稳定可持续地统一长城南北？或者说：草原征服王朝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真的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草原征服王朝的历史，不属于中国的历史，那么今天中国的边疆地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以及，像唐朝这样的混合王朝，又算不算中国朝代呢？如果这些问题说不清楚，还真就说不清什么是“中国”了。

说到这，你可能明白了，我们后面的课程，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通过五十讲的课程，你会看到，中国并不等同于中原，中国人也并不等同于汉族人。

倘若忽视了草原、绿洲、高原和海洋上的历史，只看中原，那么讲出来的只是半部中国史。

但这并不是说，我要把今天中国疆域内的中原、草原、绿洲、高原、海洋等各个不同地区的历史，都给你并列讲上一遍。

如果只是机械地并列讲一遍，那就跟把中国历史与俄国历史，并列起来讲一遍没区别。

在后面的课程里，你会看到：

中国内部的这些亚区域，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互渗透、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都无法有效地解释另一方。

而过去通行的历史讲述，不仅仅忽视了中原以外的地方，还忽视了这些地方与中原的相互塑造作用，因此对中原历史的解释也是非常不完整的。

今天中国疆域内的这些地区，彼此间在历史上有着一种深刻的有机

联系，它们夹在一起，互相作用，作为一个体系，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概念。

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它在不断地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一种存在形式，演化到现在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

什么是“历史”

好，说清楚了“中国”，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历史”。

什么是历史？历史是对所谓事实的探究吗？事实当然重要，但事实远远不够。《汉书》里记载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汉景帝曾主持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革命，也就是商汤、周武都推翻了前朝君主，他们是不是犯上作乱。

正方说，他们杀了自己的君主，当然是犯上作乱。

而反方说，他们杀的是无道昏君，是天命所归。

正方又说，就算是昏君，做臣子的也应该是规劝，而不是把君主杀掉了事。

反方马上疑问，照你这么说，咱们的汉高祖起兵灭秦，他也做错了呗？

主持人汉景帝听到这里，一身冷汗，赶紧打圆场说，咱们以后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再讨论汤武革命，不讨论这个问题不算你们没学问。

这个故事说明，历史上的事实，和对事实意义的解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商汤、周武杀掉了夏桀、商纣，这是公认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却被解读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且找不到一个标准说哪一个解读就是不

对的。

皇上面对两种解读也是左右为难。

承认这是犯上作乱吧，汉高祖的事情怎么算？

不承认这是犯上作乱吧？也有人这么来对付自己怎么办？

他就只好和稀泥，不争论。

说到这，也就清楚了，对历史的讨论，实际上包含着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

这种事情当然也会有争议，但还是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的。另一个部分是，历史事实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或者说，我们究竟认为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义的，我们愿意认同谁，对于同样的事实，不同的人就可能解读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打个比方来说，历史就像一座大楼，事实就是盖起大楼的砖头，意义就是规划大楼的蓝图。

蓝图画得再精美，也不能解释砖头的物理属性，而对砖头研究得再明白，也不能知道大楼会是啥样子。

对砖头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活下去。

对蓝图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想要活成个啥样子。

蓝图和砖头有着相互独立的逻辑，但又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

咱们这门课所要讲述的“中国历史”，要把历史事实和基于事实的意义，这两部分各自独立的逻辑给呈现出来。

同时，我们还要把事实和意义，相互影响的逻辑也呈现出来。

最终让你看到：

一方面，这个远远大于中原的“中国”，它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

另一方面，这一切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我们由此对未来又可以期待些什么。

你现在应该明白了。我们要讲的中国历史，和你过去看过的中国历史，不太一样。

我会给你呈现一些过去很少看到的基本事实，同时，对于过去你比较熟悉的事，我也会给你展现一个更完整的底层逻辑，展现出一幅很不一样的蓝图。

今日小结

我们过去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在“中国”和“历史”这两个关键词上，都是有欠缺的。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

今天中国疆域内的中原、草原、海洋、高原、西域，这几大空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作为一个体系，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概念。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历史”？

历史不仅包括事实，还包括基于事实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中国”是如何走过来的。另一方面，也要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解释清楚这两个关键词，对今天的中国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后面的课程要回答的终极问题。

这五十讲，就会围绕这些内容展开，给你呈现出一个从未见过的中

国历史图景。

下一讲，我们就要进入到封建社会。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转折，商周之变。

精选留言

成洁getit

隔壁吴军老师在他的第一季的专栏里讲过他看好中国和平崛起的未来，开始讲了中国的“国家”概念与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不同，是中国文明的概念，不单单以是不是汉族人来区分，而是用是否都能认同“中国文明”。我觉得今年施展老师的讲解也有这个角度的观察。“历史”的说法，我们之前听过很多，“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它们都对，却都把事实和意义混为一谈。施展老师把历史事实和历史意义分开来看，真是直击内核的精确打击！佩服、佩服！期待接下来的讲解！

小李有刀

好精彩，历史都是多方博弈妥协的演化史。

03|中国历史的时空坐标与商周之变

3000年的中国历史并不是个流水账，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套重要的时空坐标。时间坐标上，中国一共发生过四次重要的变化；空间坐标上，除了我们熟知的中原以外，草原、海洋、高原、西域这几大空间上都发生着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

这一讲开始对中国历史的具体讨论。咱们会从中国历史开端处，一直讲到当下。

这几千年的历史并不是个流水账，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一套重要的时空坐标。

四个时间坐标点

先说时间坐标，中国历史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转型，这些转型推动着中国历史向前的发展。

第一个转型，是商周之变，就是从商朝到周朝的转型。

这次转型之后，我们开始有了“中国”这个概念，中华文明当中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开始出现了。

第二个转型，周秦之变，就是从周朝到秦朝的转型。

这次转型，让中原从分封割据的局面进入到大一统的局面，中国历史也开始超越于中原之上，中原与草原的相互塑造和对抗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大脉络。

第三个转型，唐宋之变，就是从唐朝到宋朝的转型。

这次转型，让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此后中国历史再无长期的分裂，大一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

在先秦之后，中国的文化在宋朝迎来了又一次大爆发，有些西方学者甚至称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次文化爆发，不仅决定了此后将近一千年的中国文化气质，也决定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其他儒教国家的文化气质。

第四个转型，就是清朝末期开始的古今之变，中国开始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艰难转型。

这个过程带来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历史过程，转型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还未完成。

五个空间坐标点

时间和空间加在一块，才是完整的历史。所以，说完了时间坐标，再来看看空间坐标，那就是上一讲曾经提到过的草原、中原、海洋、西域、高原。

这几个大的空间，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就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所以它们加在一块构成一个体系。

所谓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

就空间坐标来说，这里面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空间的关系；副线是由西域和高原这两个空间构成，副线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过程。

主线也有个演化的逻辑：简单说，在古代历史上，我们会主要探讨草原和中原的关系，因为草原和中原之间的博弈，带来了新秩序。

你可以理解为在草原和中原之间不断生长出新帝国，所以草原和中原是一条秩序的“创生线”。

而中原和海洋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只是秩序的传播线，也就是海洋在古代只起到传播影响的作用，不负责创造；

到了近现代历史上，就反过来了，海洋和中原的关系，成为新秩序的创生线。

新的民族主义精神、组织力量都在海洋和中原的关系中展开。而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在这时候变成了新秩序的传播线。

咱们这五十讲的课程，就是要把这个时空坐标系的演化过程给你展示出来，有了这样一种时空坐标系，你再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比过去更容易找到感觉了。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在第一个大转型上，就是商周之变。下面来展开讲一下这个转型。

什么是商周之变？

商周之变，发展出了“中国”这个概念，也催生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这个得仔细解释下。

先说“中国”概念。

“中国”这个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周朝，但跟今天的意思差别很大。

周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兴建了东都洛阳城，当时有个叫

做“何”的贵族，这人铸了一件青铜器纪念这个事儿，1963年这个青铜器在陕西宝鸡被发现，今天称其为“何尊”。



何尊的底部铸了一百多个字，里面提到，周武王说要“宅兹中国”，就是说要“住在‘中国’”，这是“中国”这个词的最早来源。复旦大学葛兆光老师有一本书叫做《宅兹中国》，专门就说过这个事。

“宅兹中国”，“我要住在‘中国’”，这话啥意思呢？周天子你不就是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吗？

这就是我说的古代和现代的差别了。

在现代，咱们对于“中国”这个词的理解，它是个国家的名字，指代着具体的土地。

在古代，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

但是请注意，这个中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

什么叫文明意义上的中心呢？意思就是，文明和野蛮是不一样的，文明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方向。

而啥叫文明，得有个标准：达到了文明最高水准的地方，就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古人就管这种地方叫做“中国”。

那么，周武王说要在那住的那个“中国”，在哪呢？或者说，他认为哪里才是达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准的地方呢？就在今天的中原大地，河南一带；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地理范围逐渐扩大。

所以，在古代历史上，如果有人谈到“中国”，不仅仅是指中原大地，更重要的是指，这里是文明水准最高的地方。

既然文明水准才是定义“中国”的标准，那么依照这个逻辑，“中国”也就并不必然是指今天咱们所说的中国这片土地了。

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甲午海战之后，签署马关条约的时候，缔约双方在条约中得有称呼，大清这边自称“中国”，日本坚决不干，说你现在那么落后，哪里是什么中国，我才是中国呢。

要注意，马关条约，这是1895年的事情，马上就进入20世纪了，东

亚世界的人到了这会儿，还是从文明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啥叫“中国”呢。

从马关条约这故事里还能看到啥呢？

那就是，古代中国对于文明的理解，并不认为它是属于特定的哪一群人的，而是认为文明是属于所有人的，只不过是刚好我们中原这边的文明水准最高，所以你们别人应该向我看齐。

但是原则上来说，文明应该是所有人共同的精神财富，并不专属于中原的人群。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另一个东西，中华文明的普世主义理想。

“中国”概念是怎样生成的

解释了“中国”概念和普世主义理想，再来说一下它们是怎样在商周之变当中生成的。

这个和古人的天命观有关系了。古人非常重视天命，认为只有天命所归才能成为君主。

商朝是由“商人”这个群体建立的，这个“商人”不是指做买卖的人，而是指商族。他们认为天命降于商人。

那是啥意思呢？差不多可以理解成，商人才算是人，商人之外都不是人。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商人会经常地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祭祀当中会大量用到活人做祭品。

这些被献祭的人从哪来呢？从对外战争掠夺的羌人而来。当时所谓的羌人并不今天所说的羌族，而是生活在商王朝西部的、除了商朝人以外的所有人，包括后来推翻了商朝的周人，差不多都被称作羌人。

可以看到，商人的这种天命观，绝对不是普世主义的，它就没打算

建立一种“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秩序，而是要努力维持住自己的优势地位，在他们看来，这样岁月就静好了。

商人的这种天命观，肯定会受到羌人的抵抗。

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他们逐渐组织了很多苦不堪言的羌人群体来反抗商朝。

反抗的时候，在周人中间有过一个观念层面的争论，究竟天命是降于周人呢，还是天命降于周王？争论的结果是，天命降于周王。

这个观念变化太重要了。初看上去，这似乎是把天命的载体变得狭隘了，实际上是把它变得普世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天命是降于周人，那就和此前降于商人的路数差不多，周人的岁月要想静好，就得时刻压制住所有不是周人的群体。

这样的话，周人和商人征战，谁胜谁败就不好说了。因为，对其他羌人群体来说，打完这一仗，十有八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拿我们献祭，凭啥要跟你混啊？

而如果天命是降于周王，则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

只有这样，才能号令所有羌人，同心同德去打败商朝，甚至商朝的军队也会临阵倒戈，反商大业才得以成功。

这才是封建社会

推翻了商朝之后，周朝又是如何具体建立它的统治方式呢？那就

是，分封制。

周天子向下分封了他的大量亲戚和重臣，意图依靠他们形成的藩属诸侯国，来拱卫周王。这样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就被称作“封建”，这种社会叫做封建社会。

但是，咱们今天经常把中国从秦以后，到清朝的这段历史叫做封建社会，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封建”这个词最初出自《左传》，里面有句话叫做“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就是说分封亲信出去建立诸侯国，作为周朝王室领地的屏障。

只有这种封土建邦、分封割据的状态，才叫做封建。

西方历史中的feudal这个词，被我们译作“封建”，它所指的也是那样一种分封割据的状态。

实际上，中国从秦到清的这种帝国形态，并不是上面说的分封割据的状态，因为朝廷会在帝国内建立很多郡和县，现在学界一般称其为郡县制社会。

这种形态在西方历史上没有过，也就没法找到某种西方概念来对应地翻译过来。

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是，最高统治者是没有权力干涉诸侯国内部事务的，诸侯们确实是最高的统治者的封臣，但某种意义上也像是个合伙人，都有比较强的独立性。

周朝的时候就是这样，诸侯都承认周天子是最高权威，但周天子并不能管诸侯国内部的事情。

周天子以及各个诸侯们各自发展，时间长了，有些诸侯的力量可能会变得比周天子还要大，人们就可能不太拿周天子的权威当回事了。

周天子肯定感觉不痛快啊，要努力自救。

怎么自救呢？

周天子首先就从强化自己在直属领地内的权力做起，如果内部还搞不定，就不可能搞定外部了。

做这个事情，最典型的是西周后期的周天子，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厉王。

但是，要搞定内部，就意味着得打破过去的很多传统，那么人们就会指责周天子，你怎么能不顾传统，这么胡作非为呢？

周厉王很恼火，索性规定，任何人都不许批评，谁敢废话就收拾谁！这留下了一句成语“防民之又甚于防川”。

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你肯定知道了，周厉王被赶跑了，换了个周天子上来。

新的周天子也没办法再树立权威了，所以又过了一代，周朝首都不得不从陕西的镐京迁到河南的洛阳，中国历史进入到东周时代，周天子的影响力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今日小结

要理解中国，就得先理解中国的历史。

而理解历史，需要先勾勒清楚一个时空坐标，这是讨论其他问题的一个基本参照系。

而时空坐标的第一个坐标点，就是商周之变，从此有了“中国”这个概念，以及用这概念来表达的普世主义理想。

周朝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封建社会，但周天子又逐渐衰落了。在周天子衰落之后，历史的主角就变成了那些诸侯。诸侯们彼此不断竞争，最终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个历史过程，伴随着一系列重要的观念变化和制度变化，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变化成为可能。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精选留言

成浩getit

四个时间坐标点：商周、周秦、唐宋、古今。五个时间坐标点：中原、草原、海洋、西域和高原。好奇施展老师为什么没有算宋元，我记得在看卜正民《哈佛中国史5挣扎的帝国》时，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出明实际上继承了元，跟元之前的宋有实质不同。不知道施展老师怎么看？日韩、东南亚是归海洋理解吗？朝贡体系中的附属国，在近现代史上反过来影响中国。

封建社会篇





04|封建社会是如何走向终结的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战争逻辑变了。春秋之前的战争，礼仪性大于实用性。但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变成以杀伤性为目的了。也正是由于战争逻辑的变化，才把中国引向了大一统。

上一讲我们说到，到了西周后期，周天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差，最终被迫迁都洛阳，中国历史进入到东周。

东周又分成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这一讲咱们就来说说，封建社会是如何在春秋战国时代走上末日的。

末日之路的由来，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战争逻辑变了。

春秋之前的战争，其实不是以砍死人为目的的，战争的礼仪性大于实用性。但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争变成以砍死人为目的了。也正是由于这个战争逻辑的变化，才把中国引向了大一统。

那么，为什么战争逻辑会变化呢？原因在于，春秋末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技术发展，它带来了新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打破了过去的社会均衡，封建社会当中的贵族秩序崩塌了。

周朝贵族之间的礼仪战

为了讲清楚这个变化，咱们首先得讲一下周朝封建社会的贵族是怎么来的。

无论中外，贵族最初都是军事征服者。周朝取代商朝之后，给一群亲戚和近臣分封了领地，他们带着家人、亲兵来到封地进行军事殖民，就成为贵族。封地上的土著居民则是平民。

贵族们是征服者，觉得要把自己跟平民区分开，才能显出自己的高大上，所以他们都有特别强烈的等级、秩序意识。这种意识也延续到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他们认为战争是个很高贵的事情，《左传》里有句话，叫做“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就是说只有祭祀和战争，才是国家的大事。这么高贵的事情，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参加，平民没资格。

第二，贵族打仗，比的是谁更符合“礼”的标准，这里所谓的“礼”是“礼仪”的“礼”，但它绝不仅仅是礼仪，而是代表着一整套秩序，能够给所有人都规定出上下尊卑的恰当位置。

换句话说，贵族们打仗是有规矩的，规矩就是按照“礼”来打，而战争的目的就是恢复“礼”的秩序；如果不依照“礼”来打，赢了也没面子，因为你更加破坏了秩序。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贵族们打仗比的不是谁能砍死更多的人，比的是谁的正步踢得更好。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把正步踢好，贵族就有了个贵族的样子。平民一看，觉得贵族确实有贵族范儿，也就会接受贵族制的等级结构。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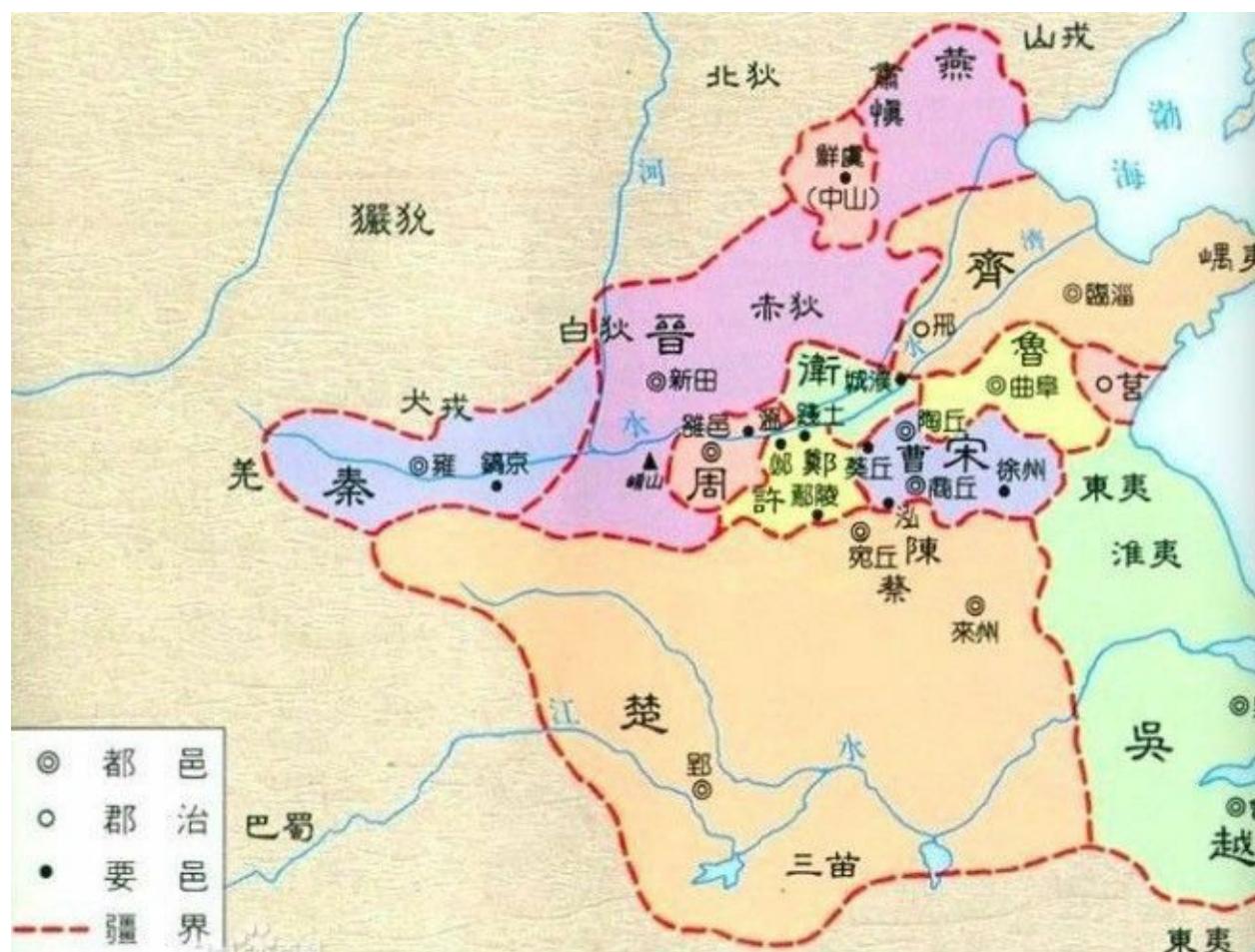
这样一来，**贵族间的战争，其礼仪性远远大于实用性**。由于只有贵族能参战，战争的规模也不会太大，相对于后世，封建社会早期的战争就是几百个大小贵族踢着正步打群架。所以，这会儿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也不大容易导致谁灭掉谁。

战争从礼仪性走向实用性

问题是，这样一种战争的打法，有个前提，就是大家都认同“礼”这套规矩很重要。万一碰上个根本不懂这套规矩、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不踢正步而是直接抡刀砍人，那战争的打法就变了。

春秋时代的楚国，就是这么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楚国人耍无赖，而是因为它就不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本来就不大懂中原的那一套。

楚国是个土生政权，崛起在今天的湖北、河南南部这一带，它的文化和中原有很大区别，也不大在乎中原的礼仪之类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原诸侯看来它就是个蛮夷之邦。



春秋时期的楚国，虽然政权面积大，但在地处中原的宋国看来，只是“蛮夷之邦”

出身中原的宋国国君宋襄公，血统高贵，是商朝王族的后裔，正步踢得非常有水准。一时间他也曾号令过一些诸侯，被列入春秋五霸。

结果他就想多了，看到楚国不大守规矩，就想去提高一下楚国的正步水平，没想到和楚王打仗的时候，楚军直接轮刀，宋襄公被打得大败。

不按套路打，这种事情是有传染力的，只要有一家改换打法，别家不改就肯定吃大亏。楚国一带头，各国的底线越降越低，战争的实用性开始超越于礼仪性之上。

贵族范儿开始丢失，所以孟子会说“春秋无义战”，没有正义的战争。

封建社会是如何终结的

虽然底线变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战争的规模还是不会特别大。为什么？因为这个时期的战争，还是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平民还没有被发动参与到战争里来。

你肯定觉得奇怪，贵族们都已经撕破脸互砍了，他们肯定是恨不得自己人越多越好，为啥不把平民拉到战争里来呢？

这就跟各个诸侯国内部的结构有关。最初周天子向下分封诸侯，诸侯到了领地上会建立一个城。随着人又膨胀，一个城可能住不下了，诸侯领地上就会建设新的城，诸侯再分封自己的一个亲戚或者近臣去管理那个城，这就有了次级诸侯，封建社会形成了多级分封的结构。

时间长了，周天子渐渐管不了手下的诸侯们，诸侯成为主角。但是时间再长一些，诸侯们也不大管得了手下的次级诸侯了，有些次级诸侯发展得比他的领主还要强大，也就不大尊重领主了，就像领主当年不尊重周天子一样。

这样，诸侯们实际上能发动起来参加战争的人，就是自己这个城里的人，别的人是动员不起来的，所以战争规模不会大。

诸侯们看着这些神气活现的次级诸侯，肯定很来气啊。上一讲说过，西周的周厉王发现管不了诸侯了，就尝试在自己能控制的地盘上进行改革，强化内部权力，然后再去对付那些诸侯。

现在诸侯发现搞不定自己封出去的次级诸侯，也像周厉王一样，琢磨着怎么样强化自己的权力，然后收拾这些次级诸侯。

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技术变迁，让诸侯力量的扩大有了可能。正是因为这两次技术变革，打破了君主和封臣之间的力量均衡，周厉王当初搞不定自己下级的事，现在诸侯可以做到了，也就是诸侯能够搞定这些次级诸侯了。

这两个技术变迁，一个是铁器和牛耕的农业生产技术，一个是竹简这种知识传播技术。

铁器与牛耕的出现，提升了平民的劳动效率。过去，他们的耕种效率很低，只能在贵族控制的公田、又叫井田上种地，没有能力再去开垦自己的私田了；但是，铁器和牛耕让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了，平民有余力去开垦自己的私田，甚至索性就从贵族控制的井田上跑路了。

此时君主、贵族、平民三者之间的一种复杂博弈关系就出现了。注意，这儿所说的君主，指的就是周天子封的诸侯，贵族指的就是诸侯所封的次级诸侯，这会儿的历史已经没周天子什么事儿了。

对贵族来说，平民逃离井田，会削弱自己的力量，所以要控制他们；而对君主来说，只要能帮助自己削弱贵族封臣，那就是值得拉拢的盟友。

于是君主与平民之间就逐渐形成一种结盟关系，君主向耕种私田的平民提供保护，平民向君主交税。平民从井田上越跑越多，贵族所控制的井田制就逐渐瓦解了，贵族的力量也逐渐削弱了。君主开始获得相对于贵族的优势。

但这还不够，君主要想真正碾压贵族封臣，还得有依附于自己私人的人事班底，而不能由着贵族们来处理政治事务。问题是，如果不能在贵族之外找到有文化的人，这私人事班底就建立不起来啊。

文化的载体是文字，在周朝前期，文字是祭祀专用的，通过铸鼎的方式向外分发，除了大贵族们，没几个人有机会接触到文字，有文化的人就只能是大贵族，大贵族是不会帮助君主对付自己的。

这就轮到竹简技术显身手的时候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开始被刻在一片片竹简上，这可比铜鼎要轻巧得多，不仅仅是便于携带，复制的成本也极大降低，知识传播的成本急剧下降，一般的贵族子弟、甚至运气好的普通百姓，都有机会学习文字获得知识了。

由于多年的人又膨胀，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有文化、却无法获得一块封地的贵族子弟，他们就变成游士，到处寻找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的机会。

君主们早就想养一群可控的自己人了。什么样的人最好用呢？

第一，他们要在本国没有根基，没资本对抗君主；

第二，他们的地位尊荣都取决于君主的赏赐，就有动力与君主相配合。从别国跑来的游士完全符合这两点要求。君主与游士一拍即合，游士成为依附于君主的私人事班底。这个人事班底，后来就发展为官僚制。

官僚和贵族的区别在于，本质上来说，官僚没有独立性，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其地位取决于君主的意志；贵族有独立性，他们是准合伙人，君主有大事必须和他们商量着来。

游士的出现，终于让君主们可以全方位碾压贵族封臣，诸侯国也就从君主与贵族共治的结构，转向君主说了算的官僚制结构。

这个过程在历史上被叫作什么呢？变法！没错，魏国的李悝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等等，就是这样展开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士，成了各

诸侯国的新贵，他们压制住所在国的大贵族，把君主的意志贯彻下去。随着各种变法的展开，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代。

对君主来说，这回有办法把平民也动员起来了。你们虽然不是贵族血统，但你们可以立军功。只要你有办法从战场上拎回更多的人头，你也有机会上升到比贵族还高的地位。

这种激励可不得了，战争的规模和频次急剧上升，大规模的灭国之战很容易就爆发了。灭国之战都到什么量级呢？比如很多人推崇的战神白起，一场战役就会坑杀赵国的40万降兵，这都在变法之后成为可能。

变法这个事情也有传染性，谁最先变法，谁的战争效率就大幅上升；其他国家如果不跟上，就只能等着挨打。

随着各国陆续变法，各诸侯国内部的旧贵族阶层被一扫而空。变法之后，君主能决定军功的标准，也就能决定官僚新贵们的地位高低，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就变得更强，再没有能够约束君主的力量，分封割据的封建社会也就逐渐走上了终结之日。

战争逻辑的变化，影响还不止于此，当战争规模扩大到了诸侯国承受不起的时候，中国也就开始走向大一统。

今日小结

好，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这一讲的核心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逻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铁器牛耕以及竹简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平民开始成为君主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

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贵族所重视的那种“礼”的秩序崩溃，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秩序就走上了末日。

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血光四射的年代，不仅有激烈的军事竞争，也

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思想竞争。这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的思想变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人的精神基础。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 精选留言 ——

一溜小跑

逻辑非常清晰，醍醐灌顶。可以解释我一直以来的疑问，为什么秦末六国贵族们即使灭掉了秦王朝，表面上也进行了分封，仍无法复辟分封制，最后不过是汉承秦制。因为一，战争的逻辑已经彻底改变，从礼仪性的队列比赛变成你死我活的生死比拼，赢者通吃。二，铁犁的发明极大提高了农业效率，更多的平民可以参与战争，进一步扩大了战争规模。三，竹简的发明，完全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使平民知识分子可以依附君王获得身份地位，逐渐形成官僚集团。贵族不是秦王朝大一统消灭的，而是贵族的消灭催生了秦的大一统，所以汉承秦制是必然。

Cliff

老师，内容很精彩，但有一点没有想明白，请指点：农耕技术发达后，为什么最开始实行赋税制的不是再下层的分封大夫，而是诸侯呢？诸侯管理大块疆域，治下有数座城池，如果平民开始放弃井田，以当时的交通技术，最容易对其收税的应该是该城池的分封大夫才对，当时是什么决定因素导致平民跨过了大夫层，直接向诸侯赋税的呢？这一点不是特别明白，多谢

作者回复

也有下层的次级诸侯先搞起来的，这个就看谁下手快了。如果次级诸侯下手快，就没有大诸侯什么事了，韩赵魏三家分晋，就是次级诸侯先下的手。还有齐国、鲁国等都有过次级诸侯篡位取代本国君主的例子，这也是次级诸侯先下手的。秦国魏国啥的则是大诸侯下手快，就把下面搞定了。

05|诸子百家的三大流派

诸子百家流派众多，可以依照它们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区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力挺，认为传统好极了；一类是抛弃，认为传统坏透了；还有一类是无所谓，传统跟我没关系。

这一讲咱们来聊聊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灿烂夺目的年代之一。

咱们来梳理一下，看看百家争鸣是怎么来的，以及该如何理解这些思想么是流派。

在前讲商周之变时我们谈到，在周朝建立的时候，一种普世主义文明出现了。

但那会儿的人们对这文明还处在一种很懵懂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日用而不知”，他们会下意识地用这套价值观来理解世界，下意识地形成了一些行为习惯。

这些行为习惯被整合成为“礼”，是贵族们战争时的道德标准，也是君子和小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参照系。但是，这个时候并没有人清晰地琢磨和总结这些秩序。

到了春秋后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数百年来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秩序崩溃了。

这下很糟糕，人们突然发现赖以理解世界的坐标系没有了，世界的意义丧失了。这种时候，就是思想大爆发的时候。

人们开始苦苦思索，寻找意义。那些已被实践了千百年的一系列“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就变成人们思考的基本出发点了。

不同的思考，催生了后来说的诸子百家，也就是很多个思想流派。

对待传统有三种态度

你初一看，会觉得诸子百家的流派好多啊，不知道该如何找到头绪来理解它们。

实际上，这里面有个基本的结构，这些流派依照它们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可以区分为三大类，把这三大类大致搞清楚了，就找到头绪了。

对待传统可能有三种态度，一是力挺，认为传统好极了；一是抛弃，认为传统坏透了；一是无所谓，它是好是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这三种态度，分别就对应着，儒家、法家和道家。其他的诸子百家，都可以视作这三家的某种变形；因为对待传统的态度一共也就是这三种可能性。

咱们可以把这三种态度再用三个更清晰些的词来表述。

第一种，复古。它认为，之所以事情搞糟了，是因为人们背离了传统，当今之计，是努力回归到传统；这是儒家的态度。

第二种，开新。它认为，之所以事情搞糟了，是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抛弃掉那些讨人嫌的传统，当今之计，是努力开创新规范；这是法家的态度。

上面这两种态度，都有着积极进取的入世心态，只不过给出的办法正相反。因为儒家和法家都诞生于中原地区，这里人又众多，秩序复杂，不以入世的态度，难以面对问题。

但是在地广人稀、山川众多的荆楚大地，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出现的可能性，那就是第三种态度，出世，这是道家的态度。

道家认为，正是各种入世的念头才把事情搞糟了，倘若不再追求转瞬即逝的现世成就，天地一下子就宽了，传统本身好不好、有用没用，根本无关紧要。

今天，在面对很多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这三种对待传统的典型态度。

儒家：克己复礼

接下来咱们再展开点，对三家分别更细致地解释下。

儒家是从商周两朝的巫师系统发展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巫师，不要把它理解成现代的跳大神那种巫师，而是古代沟通天意与人事的神职人员。这种工作主要通过占卜和祭祀来完成。

上一讲咱们讲到过，《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正经事是个国家大事，这属于最高的“礼”，而巫师们就是“礼”的具体操作者与记录者。

到了礼崩乐坏的时候，如果要想复古，第一步肯定得先说清楚这个“古”究竟是什么。巫师系统有这方面的很多记录，当然是最合适的选择人选，他们由此就逐渐发展为儒家。

如果你理解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莫不如把他理解为此前巫师传统的集大成者。

孔子认为复古的路径是“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自己的各种冲动，依照传统留下来的“礼”的要求来做事。这样就能达到儒家的最高理，“仁”，就是“仁义”的“仁”。

在春秋时代以前，人们依照“礼”来做事，只不过是对于传统的盲目跟从，随大流就行，用不着什么勇气。

但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依照“礼”来做事，就会显得迂腐，因为大流已经变了，遵从“礼”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时如果仍然坚持这么做，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样做是对的”，跟有没有好处没关系。

这种主动抉择是充满着担当的，很需要勇气。所以，儒家当中逐渐浮现出对于道德勇气的赞美。

孟子有一句话，叫做“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说，只要认准了是正确的路，哪怕千万人阻拦，我也毫无畏惧地走上去，知其不可而为之。

法家：君主意志

但在法家看来，儒家的理念也太迂腐了，既然明知其不可，还要为之，有什么用呢？

时代已经完全变了，你还非得依照过去的传统，不去理解现实的变化，只能是一群书呆子，不可能成事儿，而只会把天下带入危险的境地。

“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出自法家代表人物韩子的著作中。他说，想要用古代的政治逻辑，来治理当代的民众，基本上就是守株待兔的愚蠢办法。

那该怎么办呢？索性就用“法”来取代“礼”，开创一套新的制度。为了能够推行“法”，君主就必须懂得如何应用诡诈之术来控制人，懂得如何利用甚至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局势。

这就是法家三宝，“法术势”，就是法令、权术、局势。

儒家强调恢复“礼”，“礼”来自传统，贵族是“礼”的载体；法家强调创建“法”，“法”出自君主意志，官僚是法的执行者。

回想一下咱们在上一讲谈到的君主、贵族、官僚的博弈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们肯定不会愿意接受儒家，而更愿意接受法家。

所以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都没得到过重用，反倒是法家的人占据各种高位。

有趣的是，法家的鼓吹者往往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是商鞅还是李斯，都是在别国建功立业。韩非虽然在别国没有能够建立功业，但在本国也从没获得过机会。

原因在于，君主需要官僚在本国没有根基，才能听使唤；倘若是出身本国的法家，他总会有各种根基，这种人又太懂得法术势，很容易成为君主忌惮的对象。

脱离了家乡的游士，如漂泊浮萍，孤身一人，荣辱富贵都依赖于君主，辱君主最喜欢了。所以，法家只能在别国成事。

反过来，这样要心眼的君主，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就看不上。

他跟别人挤兑过曾接见他的魏国君主，说那家伙看上去就不是块当国君的料。

他更骄傲地说，能有大作为的君主，国内一定有他召唤不动的臣子，有什么想法，君主也不敢托大，会过去找臣子当面谈；假如一个国君手下没有这种臣子，那他一定不会有作为。

道家：无为而治

无论儒家法家是怎么思考的，在出于荆楚之地的道家看来，都会觉

得，中原的人也太看不开了。世间这点东西有什么好争的？

这种超然的态度在庄子的一个故事里，体现得最确切。

庄子有一位朋友叫惠施。惠施在魏国谋得宰相的职位，庄子远行路过魏国，打算顺路去看望他。有人就跟惠施说，庄子到魏国来，就是想取代你做宰相。

惠施听说后很紧张，便命人在国都大肆搜捕三天三夜，想逮着庄子把他立刻赶走。

庄子听说了，就主动去见惠施，给他讲了个故事，说，凤凰从南方飞去北海，一路上只要不是梧桐树，它不落下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它不喝；结果半路上碰到只猫头鹰，刚捡着个死老鼠。猫头鹰看见凤凰，马上大声叫唤想要吓走凤凰，生怕它抢走死老鼠。

庄子说，惠施你现在这么大肆搜捕我，你以为我看得上这宰相职位吗？说罢飘然而去。

要知道，惠施也不是一般人，“学富五车”这成语，最初就是描述他的。

所以，关于道家也不用再多说什么了，这个故事足够体现道家的气度和洒脱。

那么，在道家看来，世间的事情该怎样才能搞好呢？

道家另一个代表人物老子会反问你，搞什么搞？最糟糕的就是你们这种非要搞事情的人，你们以为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好，可世界恰恰恰就是你们搞坏了。

道家认为，当今之计，是放下非得要搞点事情的想法。

顺其自然，让世界、让百姓自由自地活动，事情自然就好了，这就

叫“无为而治”。

今日小结

好，现在咱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一讲了。

百家争鸣的出现，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人们试图重新寻找意义参照系的结果，各种学说根本上来说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

在这个问题上大致可以分出三种态度，就是主张回归传统、主张抛弃传统、以及完全不在乎传统，分别对应着儒家、法家和道家。

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很依赖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彼此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终结点是天下的大一统。一旦一统，百家争鸣马上就会受到抑制。

中国历史也走到了时空坐标系的第二个坐标点，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之后的大帝国又是如何面对百家争鸣所留下的思想成果呢？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精选留言

成洁getit

左中右三分法。真的很有意思~施展老师说的这个儒家起源于巫真是一针见血！

螺闹耳朵

当意义的大坐标坍塌了，人类就需要寻找新的意义。近代文明也将以前的宗教、自然天成赋予的意义击得粉碎，而将这个建构价值与目的、找到生命的意义的责任赋予个人的肩上。儒家、法家的入

世，道家的出世，都有其历史渊源。变法的君主喜欢别处的没有根基的法家，这样法家需要依靠君王，能更好地控制法家。

豪族社会篇





06|法、道、儒：皇上到底喜欢谁

战国末期的动荡终结了封建社会，带来了周秦之变。中国走向大一统后，对中国的思想史也带来了深刻影响。从秦皇到汉武，帝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换过程。

这一讲，咱们要说到中国历史当中的第二个时空坐标，周秦之变。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变革最激烈的时期之一，它终结了封建社会，中国走上大一统帝国，带来了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对中国的思想史还带来个自然延伸的影响，就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从秦皇到汉武，帝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换过程。

这些变化，背后的机理非常重要，是我们理解此后大一统帝国帝的一个重要线索。

这一讲就来解释这个机理。

周秦之变的“法家逻辑”

先来说周秦之变是怎么发的，这与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逻辑紧密相关。

对诸侯们来说，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提升国家的战争效率就成了重中之重。

百家争鸣的诸多学说，哪一种更注重提升战争效率，它就会获得诸

侯们在政治上的更多支持。

法家在这方面显然是最有优势的，儒家显得迂腐，道家追求出世，都不被诸侯们所重视。

只有法家告诉诸侯们，要想富国强兵就得变法，传统已经不合时宜了，得改掉。

过去人们的身份高低是由血统决定的，打仗时大家都比赛看谁家的正步踢得好。这就没法刺激人们的欲望，尤其没法刺激一般百姓的欲望。

法家认为，应该改成，身份的高低由你从战场上拎回人头数量决定，血统的标准靠边站。

这政策的激励机制非常强大，能刺激人们争先恐后地出去打仗，战争效率当然大幅提升。

法家这套逻辑一出，天下的风气就开始变了。

魏国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第一个开始变法，这就是著名的李悝变法。魏国处在四战之地、战略环境并不好，但因为变法，成为了战国前期的顶级强国，把还未变法的秦国也打得缩回老家去了。

其他诸侯国一瞧这情形，不变法就没法混了，只好也开始变法。这回，各国发展起来的力量相互抵消，形成恐怖均衡，魏国的优势也就没了。

魏国变弱，还有自己的主观成分。在魏国优势开始下降的时候，新上台的君主魏惠王做了一件蠢事，他拒绝了任用当时正在魏国寻找当官机会的商鞅。

商鞅在魏国找不到机会，就去了秦国，在这儿发起了著名的“商鞅变法”。秦国把法家的逻辑发展到极致，迅速崛起。

相比于其余六国，秦国在最西边儿，地处今天的陕西一带。这个位置战略上特别好，易守难攻，它一边能坐看东边六国互相牵制，一边能独自侵占和掠夺弱小的西戎和蜀国。



秦国位于六国西部。公元前260年，这一年长平之战结束，秦大败赵国

这样一种战略位置，基本上只有它打人，难得见到人打它。所以，秦国变法虽是最晚的一个，却后发先至，最终完成天下一统。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为什么百家争鸣的局面，最后输给了法家。

但是，秦国统一天下这件事，却让法家的逻辑走到头儿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变法的国家主要讲究的是战争效率，都是靠掠夺外部来滋养内部，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外部了，它还掠夺谁去？它的臣民怎么比较军功？

这种情况下，秦国只有掠夺百姓来滋养朝廷。这种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秦帝国二世就亡国了。

楚汉两个势力，开始角逐下一任霸主人选。

帝国官方思想开始转变

楚汉争霸当中，一度占据优势的是楚霸王项羽。但项羽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他想要恢复天下的分封制，并且还真这么做了。

我说他这是错误，不是说分封制不好，而是说到了这个年代不可行了。历史上有些关节点，过去了就回不来了，就像被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来。

项羽分封了天下，对于各个诸侯国来说，法家逻辑又能走通了，因为重新有外部世界可以掠夺了。

可是这逻辑一出来，中国最终还是会再走到天下一统。而且，极有可能还是占了当年秦国那个地理优势的人会胜出。

果然，被项羽分封在了当年秦国地盘的刘邦，没用几年就完成了对天下的统一。

周秦之变这就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上。什么关节点呢？那就是，你用法家就能够征服天下，却不能仅仅用法家来治理天下。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

汉高祖为何要“无为而治”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找到新的逻辑来治理天下了。于是帝国官方思想开始变化，这是汉朝能够持续数百年的重要原因。

西汉初年的政治，放弃了秦朝的法家逻辑，在历史中留下的是一个道家无为而治的形象。道家自称其创始人是黄帝和老子，所以这种统治方法又被称为“黄老之治”。

为什么汉高祖会选择道家呢？肯定不是因为他是楚国人出身，所以选择源自楚地的道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反复在讲的力量均衡。

与秦始皇比较一下就清楚了。秦始皇一统天下，靠的是祖先的积累，经过百余年的变法，秦国内部有能力挑战君主的力量早已被粉碎，秦始皇可以依照法家的路数来统治及扩张。

汉高祖这边怎么样呢？刘邦起家之前是个平民百姓，征汉服天下只能靠团结足够多的人。刘邦能够吸引一群重要将领和谋士追随自己，不是因为自己有力量，而是因为有威信。

刘邦和这些人近乎是合伙人的关系，并没有压倒性力量来钳制他们，反倒会被这些兄弟给制衡住。这么一来，皇帝想要专制也不可能，道家的无为而治是其没有选择的选择。

不仅如此，刘邦称帝后，还把帝国全境的2/3领土都分封给了这些合伙人巨头们。看上去，这与周朝初年的分封似乎分别不大，对天下的无为而治达到极致了。

但是别忘了我们刚刚说的，有些关节点，过去了就回不来了。

刘邦的分封只不过是一时的不得已，他在表面上恢复了分封制。但由于技术进步和新经济资源已经被开发出来了，这让刘邦有能力在制度

上继承秦朝。

比如，商鞅曾有法令，如果一家当中有两个成年男丁却不分家，则这家的税赋加倍；秦国也曾规定农村里面都必须是杂姓的村子，不许同姓聚居。这些法令在汉代都被继承下来。

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打为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

这样一来，一方面，户口变多，人口不容易隐匿，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收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了大宗族，民间要想组织起来反抗的成本变高，利于皇帝的统治。

这套打法与无为而治完全不贴边，相反，绝对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政策。这从反面也证明了，无为而治只是面对强大合伙人时的无奈之举。

张良和另一位谋士娄敬给刘邦出的定都之策也反映出这一点。

刘邦最初看上了东周故都洛阳，张良劝他，洛阳虽然不错，但其地理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秦所在的关中地区，地理环境优越，三面有自然险阻，只有东面面对诸侯，诸侯安定时一切好说，诸侯一旦有变，则进可攻、退可守。

一句话点醒了刘邦，记起了自己成功的奥秘之一，马上决策定都长安。

张良这一系列的表述，其实就暗藏着最终要消除诸侯的意思。

刘邦在登基后花了八年的时间，分步骤地将能够威胁皇帝的异姓诸侯都剪除掉，将他们的封地转封给刘氏宗亲，意图以此来巩固汉室江山。

历史证明，同姓封王，并不比异姓封王更可靠。异姓王爷如果有异心，可能也就是想要割据，同姓王爷如果有异心，可是想篡位的。

以刘邦的政治智慧，他肯定能看到这一点，他用这些策略是想要精巧地构筑一种力量均衡。刘邦不能把开国重臣们都杀掉，那些没有封王的重臣多半都留下了，因为北面还站着匈奴呢，得有人能打仗。

再封一群同姓王爷，可以平衡这些重臣；反过来，重臣对同姓王爷也能形成制衡。皇帝则超越于各种力量之上，居间操控平衡。

刘邦一死，同姓王爷果然谋反作乱了，军功重臣与同姓王爷的相互制衡作用马上发挥出来，他们把王爷们的作乱平息掉了。

此后几代汉朝皇帝不懈努力，到汉武帝时，终于将同姓王爷的封地逐渐消解为郡县大小，这时候汉朝初年的军功重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皇室不再需要这两种力量相互制衡了。

大汉帝国终于从貌似分封制的结构回归到其本质上的大一统结构。

汉武帝为何“独尊儒术”

到了这一步，官方思想的又一次转型就提上日程了。

汉武帝雄才大略，从内外两个方向都下重手，重整了帝国秩序。这样一来，讲求无为而治、追求出世的道家逻辑不合胃口了，他要寻求新的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各种作为的正当性。

于是那些追求入世的学说，又有机会了。什么学说会胜出、获得皇家的认可呢？法家的逻辑肯定不行了，因为会面对秦朝那种下场，所以更好的选项就是儒家了。

于是有了汉武帝时期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直有人因此而抨击儒家是为专制辩护的，我们倒是要为儒家说几句公道话。

汉武帝那会儿的专制都已经成型了，你不能指望几个儒生就能改变它，儒生根本做不到。

对儒家来说，可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我迎合你的权力，你不是要一个新的观念系统吗？我来给你！只要你接受了我的这套观念系统，我就可以来论证你统治的正当性。

合伙干之后，一个变化浮现出来了：对儒家来说，我这套观念系统论证了你的正当性，对它的解释能力不在你手里，而在我手里。也就是说，儒学的解释能力，在儒生集团手里，而在皇帝手里。[儒生以这种方式对皇帝形成一个反制能力](#)。

这种反制力肯定没有过去的封建贵族对天子的反制力那么强，但是没办法，儒家最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能要求更多。

从此之后，中国约两千年的历史命运，也浮现出基本形态了，这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又称“外儒内法”。

什么意思呢？从观念层面来看，是儒家在主导，儒生解读着天意，君主也不敢完全违背儒家的教导而行事。儒家表面上的迂腐，却为君主划出了大致的行动边界；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却还是法家逻辑。

这样一来，对君主来说，治理的效率有了，安抚民心的口径也有了。

到了这会儿，我们可以说，周秦之变终于走完了它的转型过程。

[汉朝能够取代秦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寿的大一统朝代，很大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综合这几家的观念；同时也让达成了均衡的各种力量，获得了有效的安顿。](#)

所以，我们说的周秦之变，并不是到秦朝就结束了。而是从周朝开始，经过秦朝，最终到汉朝才完成这个转变过程。

今日小结

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战国末期的动荡终结了封建社会，带来了周秦之变。

而周秦之变的过程中，中国的官方思想经历了从法家到道家再到儒家的转型过程，最终汉朝把所有新的要素都给综合起来，让中国从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获得稳定，中国走上大一统。

但是，历史却总是和我们开玩笑。

汉朝的大一统在汉武帝手上发展到了极致，但也正是在他的手上，刺激了社会上豪族的兴起，改变了未来大一统帝国的命运走向。

要解释这背后的深层逻辑，得先从草原上的故事讲起。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 精选留言 ————

一溜小跑

逻辑太顺畅了，由其是对外儒内法的梳理，使历史的一条暗线隐隐浮现。正是技术进步和新经济资源的开发，让刘邦有能力在制度上继承秦朝，可以说汉承秦制是必然。而武帝独尊儒术后，治理的效率有了，安抚民心的口径也有了，自此历朝历代都只是在武帝改良的秦制上修修补补，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而历史上，说到君王，一定是先说秦皇汉武，或许根源在此。

07|汉人王朝为何统治不了长城以北

中原汉人王朝和草原征服型王朝，在底层统治逻辑上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带来了中原和草原不断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原和草原的关系，也是这门课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这一讲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中原与草原的相爱相杀。

通行的历史叙述，也就是你一般看到的历史，都是从中原的视角来展开的。但实际上，中原和草原，一直以来就是保持着相爱相杀，相互塑造的关系。这种相互塑造的关系非常重要，以至于脱离了草原，你根本无法解释中原；脱离了中原，你也无法解释草原。这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极少见到的一个角度。

我们在第一讲中就提出过一系列问题，比如，为什么古代历史上，纯汉人王朝从来没有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过长城南北？

如果再反过来问，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像元、清这样的草原征服型王朝，就能够做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包含了中原汉人王朝和草原征服型王朝，在底层统治逻辑上的区别。

这个区别，也就带来了中原和草原不断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原和草原的关系，是我们这门课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会用两讲来专门跟你谈谈这其中的机理。

通过这个机理，你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到，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内部包含着多元结构的一个体系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中原的历史。

这一讲咱们先来说下中原这边。从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出发，也就是，纯汉人王朝为什么无法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究竟什么是汉人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在古代的中国，究竟什么是“汉人”？

你不仔细想，不会觉得有问题，但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实际上答案很模糊。

汉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吗？不是。汉人这个概念是汉朝以后才出现的，汉人是根据血统来定义的吗？也不是。中国历史上充斥着各种移民各种同化的过程，中原人大多都会有其他民族的混血，所以从血统上根本说不清楚。

那么汉人是用什么来定义的呢？答案是，根据文化定义的，具体说来就是儒家文化。只要是接受儒家文化，并按儒家文化的指导生活的人，在古代就被视作汉人。

儒教文化首先是作为大众日常的伦理标准存在，它跟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不一样的。区别首先在于，信徒进行文化或者宗教实践的时候，载体不一样。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一神教来说，载体就是个体心灵的皈依。

只要你信了基督了，或者信了安拉了，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按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的方式来生活。甚至把你扔到孤岛上，就剩你一个人了，也不影响你的信仰，到那会儿你就必须更加虔诚，否则精神就崩溃了。

但是儒家文化的载体就不一样了，光有个体心灵的皈依远远不够，个体还必须生活在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结构当中才行。

比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等这些规矩，都是对某种人际关系的规定，脱离开人际关系根本就没法展开。把你一个人扔荒岛上，还让你三从四德，你肯定做不到。

儒家文化所要求的这种特定的人际关系，首先就要求有比较稳定的家庭组织，而稳定的家庭组织，前提是定居的。

儒家文化的地理依赖性

定居的前提是农耕，而农耕有一个最硬性的约束条件，就是年降水量。东亚大陆上，如果一个地方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的话，靠农耕是活不下去的。

那么，东亚大陆的400毫米等降雨线在哪儿呢？



400毫米等降雨线，基本就是中原和草原的分割线

这条400毫米等降雨线，差不多和长城重合。长城再往北，年降水量就不足400毫米了。[也就是说，儒家帝国在农耕地区的扩张极限，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于是在这里，儒家帝国修建了长城。长城再往北就是游牧地区了。

在古代社会，由于农耕对降雨量的要求，使得你要是越过了长城以北，还想活得下去的话，就必须游牧化，否则是死路一条。

而一旦游牧化之后，就意味着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等都没有基础了，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

从文化上来看，只要你的生活方式游牧化了，这就不是汉人了。第一代的人也许还有点汉族的记忆，到第二代、第三代就是彻底的突厥人、蒙古人了。

说到这，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答案就逐渐清晰了。纯正的中原王朝也许有能力派兵远赴漠北，驱逐游牧者，但要说统治漠北，那就必须得驻军了。而驻军的后勤补给，无法从中原运过去，因为太远了，只能让驻军就地取材。而一旦游牧起来，这些军人也就不再是汉人军队了。所以，中原王朝即便扫荡了漠北，但办完事之后还是必须撤军，回到长城以南。

那这样，中原王朝出兵漠北，就只不过是替草原上的其他游牧者扫清了障碍而已。

于是，我们就能得出个结论，那就是儒家文化有一种地理依赖性。因为自然生态原因，儒家越不过去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儒家文化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

所以，古代社会，纯汉人王朝无法同时稳定的、可持续地统治长城南北。

中原和草原的继承逻辑区别

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结论再往前推导一步。正是因为自然生态原因带来的社会结构不同，也导致了中原和草原这两边，一旦形成帝国的话，统治逻辑和继承秩序有很大的不同。

什么叫继承秩序？就是皇帝死了由谁来继位。中原这边是农耕文化，人又都是定居的，因此很容易收税。中原王朝就能够形成稳定的中央财政，这让中原在周朝之后发展成为一个官僚制帝国。

官僚制帝国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君主和官僚，在功能上是有分工的。**君主的首要功能，是象征正当性，次要功能才是具体干活**。君主即使是干活，也不能绕开官僚体系胡乱指手画脚，否则官僚们就没法干活了。

所以，中原君主的能力只排在第二位，第一重要的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只要继承秩序足够稳定，官僚们干活师出有名，帝国就能正常运转。

所以，为了确保继承秩序的稳定，继承人的资格就必须是唯一的、易于识别且不会引起争议的，那么，嫡长子资格是最容易达成这种共识的。所以，中原的继承原则就稳定在嫡长子继承制上了。

只要是嫡长子，小孩子也能作为正当性的象征，其他一切事情交给官僚体系去处理就行了。当然，你非要找反例说有哪一个皇帝不是嫡长子继承，肯定能找到，任何原则都有反例。但咱们要看的是常例，反例也是要通过常例才能获得意义的。

而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与中原的秩序逻辑差别巨大。

首先，草原上降水量不足，只能游牧为生。也因此，中原帝国的那种官僚体系、中央财政在草原上都无法存在。

这是因为，你想要通过税收建立中央财政，有个前提，那就是税收的收益要大于成本，你不能花了十块钱雇人去征税，却只征回来两块钱，必须征回来二十块钱，这事才玩得下去。

对于中原人又因为都是定居的生活方式，所以征税相对容易，你花十块钱的成本能征回来二十块甚至三十块；但草原上，因为游牧者的生活高度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你花十块钱能征回来两块钱就不错了。

由于在草原上征税成本太高，所以在草原上根本就建立不起中央财政，也建立不起来官僚制。因为根本没钱养活官僚嘛。

没有中央财政，没有官僚体系，这就导致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所以，在草原上，人们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在小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

小群体的规模上限是多大呢？英国有一位人类学家叫做邓巴，他提出，这个规模上限是150人左右，150这个数字就被称作“邓巴数”。超过150人，要维持群体内所有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要处理的数据量就超过大脑的承受极限了。

所以，一旦群体规模超过这个临界点，它就不再是个熟人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只能靠规则来治理。规则就得有人来执行，官僚体系就是干这个的；但是草原上又养不起官僚。

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草原究竟是如何形成兄终弟及的继承顺序的，这个问题会在下一讲给你详细展开

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既然草原上不能大规模治理，那么，草原上为何会有匈奴、鲜卑、蒙古那种强大的游牧帝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要先搞清楚一个背景，就是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是何时出现的？

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强悍的草原民族。那时的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记载中顶多是跑龙套的，根本算不上什么威胁。但到了西汉帝国时期，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仿佛从天而降，突然耸立在北方。

中原形成庞大的帝国，即便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也经历了将近一千几百年的积累，如果算上有文字前的历史，那更不知道积累了多久。

那么，为什么草原几乎没经过什么时间的积累，就能一下子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呢？

以及，为什么像元朝、清朝这样的草原征服型王朝，能够超越汉人王朝，建立起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大帝国呢，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关于这一系列问题，我会在下一讲专门来谈谈。

今日小结

这一讲，我带你从中原这边入手，解释了为什么纯汉人王朝无法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这个问题，其底层是由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的地理依赖性决定的。而中原和草原在地理特征上的区别，也带来了在财政制度、继承秩序上的差异。

但是，正如我们在开头所说，中原和草原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相爱相杀、相互塑造的关系。

下一讲，我将从草原这边展开，回答我们在这一讲结尾留下的问题。下一讲见！

08|草原征服型王朝为何能一统天下

受限于草原的自然条件，草原只能依靠一个个小部落来统治。但是，之所以会出现匈奴、鲜卑、蒙古这样的草原游牧帝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原的统一。正是在秦统一中原，建立庞大的农耕帝国之后，草原上才有可能出现庞大的游牧帝国。

上一讲结尾，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受限于草原的自然生态条件，草原只能依靠一个个小部落来统治。

但是，为什么从西汉开始，草原上会出现像匈奴、鲜卑、蒙古那样的强大游牧帝国呢？而且，这些庞大的游牧帝国，仿佛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为什么是这样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草原游牧帝国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原的统一。](#)

正是在秦统一中原，建立庞大的农耕帝国之后，草原上才有可能出现庞大的游牧帝国。

游牧帝国是如何建立的

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要从草原和中原的双边关系来讲起。

草原上的资源有限，除了肉、奶等少数产品外，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种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这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战争与贸易，贸易显然是成本更低的办法。

问题是，中原地区是否愿意与草原贸易？

如果中原没有统一，中原各诸侯国会竞相和草原部落进行贸易，因为它们需要草原上的马。草原马，是战争的利器。不和草原做生意买马的诸侯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旦打起来，就该吃亏了。

如此一来，诸侯国之间竞争起来，草原无论是买还是卖，都能有个不错的价钱，小部落们也就没有任何欲望想要联合起来。因为一旦联合了，贸易利润肯定会被盟主剥去一层，还不如不联合呢。

但是一旦中原统一，这个贸易关系就变了。中原一统一，就不再有各个诸侯国的竞争，统一的大帝国垄断了中原市场，帝国就可以用政治手段去干涉贸易，要么压低价格，要么干脆断绝贸易。

这样一来，草原上的那么多小部落，他们仍然需要那些必需品，却没法正常地买来了，那就只有抢。要从中原帝国手里抢东西，小部落根本不是对手，那就必须联合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才行。于是，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了。

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其人又仍远远少于中原帝国，但却比中原帝国更有战斗力。

一方面，草原上是骑兵，对上中原的步兵时，基本是碾压性的优势；它想打你的时候，你跑不掉，你想打它的时候，你追不上，中原一方完全没得玩。

另一方面，草原上的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合一的。战斗效率高，后勤压力低，远非中原军队可比。

还有一方面原因是，草原上比中原贫穷，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对中原帝国来说，则战争近乎是净消耗，两边的战争收益和欲望大不相同。这一系列原因，使得草原帝国会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军事压力。

这个所谓的游牧帝国，事实上是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联盟的大可汗通过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形成一个由战争衍生出来的中央财政。

草原的中央财政和中原那种靠税收的财政体制很不一样，它主要是靠战争战利品形成的财政。

所以，只要联盟的大可汗，能够持续从南边的中原地区抢来东西，持续垄断战利品的分配权，那么他的帝国统一就能维系下去；一旦大可汗没法带人抢回来东西了，帝国统一也就要完了。

因此，对北边来说，对大可汗的第一要求是他必须特别能打；这一条也和南边中原很不一样。

我们上一讲说了，中原的官僚制帝国，对皇帝就没这要求，他只要能保证统治的最高正当性，也就是保证公认的继承顺序就行了。

但是北方的可汗是必须经常出去打仗的，你不能带头抢东西回来，就没人愿意跟你了。由于对可汗战斗力的要求，意味着可汗的继承人绝不能是小孩。但是草原上战事频繁，可汗的寿命有很大不确定性，当大可汗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很有可能还未成年。[所以在草原上，一般来说，继承制不是中原式的父终子及，而是兄终弟及，也就是哥哥死了弟弟来继位。](#)

草原的周期性继承危机

那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了，等到大哥二哥三哥老么这帮兄弟全都做过了可汗、都去世之后，接下来该谁继位了呢？

第二代的子侄辈们，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因为他们的爹都当过可汗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分裂，发生内战。

中原有句古语叫做“胡虏无百年之运”，为什么草原帝国没有超过一百年的国运呢？

就是因为开国那一代可汗，他的兄弟几个加一块儿也活不过一百

年。等到这一代全都去世之后，第二代一定会分裂。

我们看到的所谓大汉远逐匈奴、大唐远逐突厥，实际上就是中原帝国终于熬到草原帝国自然分裂的那一天了。只要北边一分裂，南边就有下手的机会了；而南边一定比北边能熬，因为南边有钱啊。

除了继承危机，草原上的大可汗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把这游牧帝国统一起来了，但我没有足够多的钱把所有的兵都养起来，那么，这些兵就不一定听我的。

这些兵听谁的呢？还是听他原来所属那个小部落的小可汗的，只不过这些小可汗认我大可汗做老大而已。因此，草原的大可汗，会始终面临这些小可汗的制约和牵制。

比如，在八旗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当大汗的时候，八旗里面只有上两旗是努尔哈赤的，剩下的旗都是别的旗主的。到皇太极的时候又拨走一旗，上三旗是皇太极的，另外五旗都是别的旗主的。大可汗最多只掌握三旗，还有另外五旗不在你手里，大汗就是没有办法独断专行的。小可汗就是军事贵族，军事贵族对大可汗会形成相当强的制约关系。草原上的军事贵族民主制可以长期保持下来，这不是因为大汗宽容，而是因为他没辙。

这种统治形式也和中原很不一样。中原这边，在商鞅变法后，军事贵族基本上就都不存在了，以官僚体系为代表的皇权，在中原是非常强大的。

于是，我们在中原和草原上，就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以及完全不同的命运循环。

就草原来说，它面临的是周期性的继承危机，每逢百年大限到来，它一定会瓦解，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胡虏无百年之运”。

草原力量如何注入中原

就中原来说，要面对的则是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因为皇帝是靠官僚体系进行治理的，但是官僚体系里面也都是人啊，你没有办法防止具体的官僚利用官位以权谋私的，除非皇帝能力足够强，能够制衡官僚体系。

但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只有开国的头两三代君主有这个能力，往后的君主，一辈子生活在深宫，没见识过世界，不知道如何应付官僚体系，这个帝国就会被官僚体系绑架。

最初的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工具，但是很快，它就变成一个寄生虫，并且这个寄生虫反过来主导这个帝国。于是，南边的中原帝国就会陷入离心离德的一个状态。

由于南边的财富规模足够大、社会散沙化，所以，组织化的反抗很难建立起来，它大致还能耗得下去。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另外一个变量，局势就会不一样了：就是气候变化。

一旦气候发生变化，人又对资源的压力一下子变得很大，会导致北方胡族大规模南下。

对南边来说，他必须使劲儿抵挡，就要大规模征兵和征税。问题是，南边的农民也遭遇气候变化了，他们本来就遭灾没饭吃，朝廷还要加派征税，农民只好起来造反。于是，中原帝国就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崩溃掉了。

中原帝国要重建秩序，散沙般的社会是无法自我组织起来形成秩序的，需要有一些中间阶层、就是广义的贵族，来作为社会的基石，才能把秩序恢复起来。

问题是，中原的贵族多半已经被皇帝和官僚铲除掉了，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前面说了，草原上是始终存在着天然的贵族制的，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历史上有多次，中原是通过草原力量的注入，来重建秩序的。

草原力量成功注入中原，是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开始的。之后的多

次入主的草原力量，也都是来自东北的。

二元帝国的治理逻辑

为什么都是从东北来呢？这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又一条重要线索。

要想把秩序重整起来，首先需要足够强的军事能力，冷兵器时代最厉害的就是草原骑兵。但是，游牧统治者假如不能有效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的话，没多久也会灭亡。

克服继承危机的关键是，你能有效掌握中原的税赋；稳定掌握中原税赋的前提是，你得能理解儒家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你要能稳定控制中原的办法就是，得能利用草原骑兵，懂得草原上的治理方式。

纯粹的中原人无法理解草原，纯粹的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

而东北则是中原与草原的过渡带，它北边靠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靠着辽东的农耕地区。但凡在东北能站得住脚的人，南北这两种治理模式他必须全懂。所以在入关后，他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二元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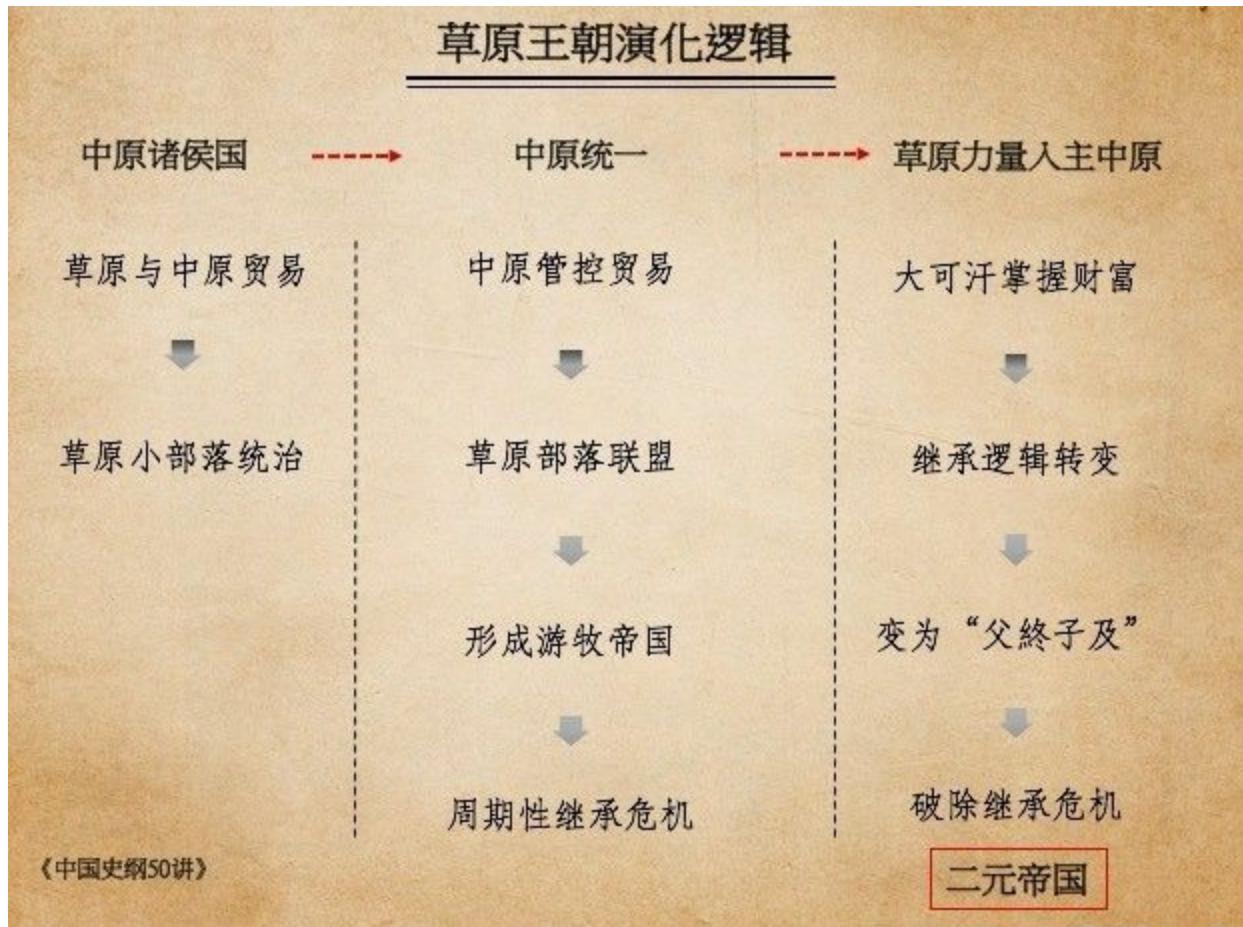
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在长城以南，能以中原儒家的方式来完成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皇帝；在长城以北，则按草原游牧的方式来完成统治，统治者的身份是大可汗。

大可汗在入关后，可以用中原这边的庞大财富，一下把所有的草原骑兵全都养起来，军事贵族就被赎买掉了。

在过去，如果大可汗没有战斗力，部落联盟就彻底没饭吃；而今天即便大可汗没有战斗力，也照样有饭吃。大汗从中原获得“饭”，再用中原的“饭”，把草原骑兵给赎买掉，然后再用草原骑兵来控制中原。

一个正向的循环就建立起来。到了这种情况下，大可汗的继承逻辑

就可以发生变化了。人们再怎么爱弟弟，也超不过爱儿子；继承顺序终于能从兄终弟及转化为父终子及，周期性的继承危机破掉了，“胡虏”就可以超过一百年了。



比如大清，一共统治了二百六七十年。这里边也可以看到满洲人的一些历史记忆。

比如在《雍正王朝》里面演到的，八爷、九爷他们想要收拾雍正，要搞“八王议政”。我们无法想象会有哪个明朝王爷敢跟永乐大帝或者万历皇帝提出八王议政的要求，因为提这要求就是近乎于谋反了，会被千刀万剐的。但是八爷九爷却会对雍正提出这要求，因为在关外的时候，大汗只能控制两三个旗，八王议政本来就是满洲人生活的一部分。满洲人入关之后仍然有着这样一个历史记忆，所以他们觉得可以这么搞一把。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草原入主中原后，两者都经历了深刻的重构过程，所有的逻辑全都变了，所以“八王议政”很快就被雍正拍死了。

今日小结

说到这，可以回顾一下这两讲的内容，我们展开讲了草原和中原的相互塑造的关系。

中原的统一的农耕帝国，促使草原出现了统一的游牧帝国。游牧帝国又反过来用军事压力改变中原帝国，并且能在中原帝国衰败时输入秩序，重建社会，建立同时统治中原和草原的庞大帝国。

这类帝国，必须能熟练运用中原和草原两套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胡汉二元帝国。

我们这一周的内容就基本结束了，明天我会带着你做一个系统的回顾。

而在未来一周的课程中，你会不断看到我们今天讲的草原和中原的复杂关系。

你会看到，中原帝国如何走向衰败，草原力量又是如何注入，中原与草原如何完成重构，令帝国获得新生，甚至焕发出比以往更加强大的活力的。

这个问题有意思|欧洲为何没有走向大一统

我从第一周3000多条留言中，筛选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专门为你解答：[为什么中国的贵族制被技术进步所瓦解，最终走向大一统。而在西欧的贵族制却保留了下来？](#)

第一周，我从第一个时空坐标点——商周之变聊起，给你展开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逻辑、思想脉络，以及封建社会是如何走向末日的。

我在留言中收到了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反馈。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代表性。很多人都提出来类似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想和你展开讲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中国的贵族制被技术进步所瓦解，最终走向大一统。但是西欧的贵族制却保留了下来？](#)

西欧为何能保留贵族制

其实，这个问题在罗胖的《重新理解中国·之三》里面，已经剧透过我的一部分解释了。

不过，还有一部分内容我没告诉罗胖，我在这里完整告诉你：

维持大一统的关键，是军事和财政逻辑。关键就要看帝国中央政府是否能够低成本地从社会上汲取财政资源，而财政资源是军事能力的基础。

如果能够低成本大规模汲取资源，超过某个门槛之后，中央政府就可以碾压任何区域性的反抗力量。

中国和欧洲相比，就是在这里分岔了。

中国的中原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连续成片的农耕地区，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规模，在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欧洲就不一样了，跟中国相比，地理很破碎，人口密度也小得多。

结果是，中国这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低，税基的规模也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大规模作战而不利于割据；欧洲那边，中央政府征税成本高，税基的规模也不大，地形结构又有利于割据。

于是，中国这边维持大一统的难度就很小，欧洲维持大一统的难度就很大。

中国这边，自从秦朝以后，即便分裂了，也还能回到大一统；宋代之后，由于社会结构变成了平民社会，朝廷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变得更强，就再也没有过长期的分裂时期，一个大一统帝国崩溃了，取代它的不是大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

欧洲那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也没能统一起来，个别强人短暂地做到了，比如中世纪的查理曼大帝、近代的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根本压制不住区域性的反抗力量，很快大一统就会瓦解掉。

以上就是西欧为何没能走向大一统的内在机理。

但如果你熟悉历史就知道，欧洲实际上也发生过这样一个君主压制贵族、建立官僚帝国的过程，但是比中国的起点晚得多，发生在17、18世纪。

它的起点也依赖于技术变迁，主要是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技术和远洋贸易技术的变迁，带来新资源，使得君主在博弈过程中有能力率先抓住新资源，扶植市民阶层，压制贵族，从而走上统一之路。

但是这个统一和中国的统一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举个例子，中世纪的法国，实际上跟周朝的状态差不多，法国国王就只能管俩地方，一个是巴黎，一个是奥尔良，别的地方他都没有控制力，都是大贵族的地盘，这个才叫做封建社会。

但是到了近代早期，国王开始有办法走上统一之路，最终削平了贵族，统一了法国，在路易十四手上走到极致。被国王统一后的法国，所形成的制度，被称作“旧制度”。

过去我们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社会，这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实际上，是法国国王推翻了封建社会，统一了法国、建立了旧制度，大革命推翻的是旧制度；如果没有国王先统一了法国，大革命甚至没有个革命对象。

这里插一句，关于法国大革命这个话题，我在我的个人公号（施展世界，ID： shizhanworld）里，有一篇扩展阅读文章《“旧制度”、“大革命”与贵族托克维尔》。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再说回到这个问题，欧洲的统一进程，进展到法国这种规模基本就到头了，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走向更大规模的统一，原因又与前面说的欧洲的税基小、地理破碎这两特征相关了。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统治规模究竟能有多大，有一个基本约束条件，就是规模收益与管理成本之间的均衡。公司的扩张规模也是同一个逻辑。这均衡是啥意思呢？简单来说，国家/公司的规模扩大，会因为规模效应而带来更多收益，可称其为规模收益；但是规模的扩大有个代价，就是管理成本会上升。

在规模扩张的初期，规模收益大于管理成本，扩张到一定程度，规模收益与管理成本达成均衡，此时就进入到了最佳规模。如果继续扩张，规模收益无法覆盖管理成本，最终多半是会坍缩回来。我们看到历史上殖民帝国的瓦解，突破了这个均衡点，也是瓦解的原因之一。

欧洲的地理破碎性，使得其管理成本的上升速度比中国快，规模收

益增长率的下降速度也比中国快，因此，其均衡点就是一个远远小于中国的最佳规模。

所以欧洲国家在近代的统一，在中国标准看来，觉得还是像分裂状态，但如果按欧洲中世纪标准来看，那绝对是统一了。

好了，我对于今天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还想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均衡点的知识，可以参见巴泽尔：
《国家理论：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

下周预告

下一周，我们会正式进入豪族社会篇。

我会继续沿着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展开，带你看中原帝国是如何衰败的，草原力量是如何注入的，最终又是如何完成重构。

明天见！

精选留言

momo

不能划线刚想提问题来着。我是历史兴趣者，但是知识零零散散，没有形成宏观的历史观，终于有机会能够听这样大方向集大成的课，特别欣喜，感觉非常值得。用两天就追平了8节的进度，特别期待，这是薛兆丰老师之后第二个让我觉得特别开眼界和脑洞的课程。跟老师比心～

郭树磊

以前学历史感觉就像散落的珠子，现在终于成串了，而且是金线穿成。感谢互联网，感谢罗胖、各位大师们！

小诺

专栏定名为《中国史纲》，特别传神，提纲挈领，谈到中国的中央集权模式的演化由来，刚好跟香帅的北大金融学课讲中国的中央货币财政体系，相呼应，有一种专栏间的联结感，知识的联结感，不同场景下的重复，会加深理解，用历史的视角看问题。

唐琪

太棒的专栏，要想知道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必须理解中国的历史！但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教科书上的历史一定不是客观的真实历史，感谢施展老师带我们进入一个脑洞大开的认知领域，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步！

亲爱的杨

对于一个处女座而言，把大师课独立出来那是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

Mindy1207

原来我不是不喜欢历史，只是没遇见施展老师，上学读书给我留下的阴影太大了，一直害怕文科相关的科目。现在每天最期待的是这个栏目，我真有冲动把中国历史从头到尾读一遍了，不会读了之后云里雾里啦！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从来没有如此如饥似渴过。

坊邻

文科生，不爱历史，原来是没遇到施展老师这样能把历史的内在逻辑讲得深入浅出的老师，只听了几讲就入迷了，现在愈发认识到，不读史不是好领导，因为看不到未来发展方向的领导人给不了员工愿景，也就激发不了内在驱动力。我得把自己行业历史先搞清楚了来。

BaGina蜀南

如果说“墙上”代表老师对我们的认可，那么“上墙”就是成功的表现。但是我们不都是终生成长者、终生学习者吗？在我们心中，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期待的老师教授我们的知识和下一次的“上墙”。

万念归一

我一个工科男，都爱上了历史了，在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历史的发展果真是有内在的逻辑的，听了老师的课，知道了什么是：以史为镜，可以之未来...

09|中国是如何走向豪族社会的

汉武帝的黩武政策，改变了汉朝社会结构，对社会的控制力由中央政府转移到了豪族手中。经过王莽篡位之后，豪族领袖刘秀干掉王莽，建立了东汉，最终形成了豪族和皇帝合作共治的局面。

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汉朝的大一统在汉武帝手上发展到了极致，也正是他刺激了社会上豪族的兴起，改变了大一统帝国的命运走向。

今天这讲就来解释这个问题，看看豪族是如何兴起的，他们与皇帝之间的博弈，如何让西汉垮掉，又如何推动了东汉的建立。

这段历史中有三个标志性的人物，就是汉武帝、王莽和刘秀，这三个皇帝代表了从西汉到东汉的三个重要阶段。

汉武帝：促使豪族兴起

咱们先从汉武帝说起，他的雄才大略的副产品就是豪族兴起。

汉武帝的爷爷和老爸，共同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这两位皇帝无为而治，有点像今天咱们说的，让“看不见的手”来主导经济与社会。

经过几十年，民间发展得非常富裕，大汉帝国的腰包也跟着鼓了起来。腰包鼓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国库里钱多得用不完，以至于串钱的绳子都烂了。

到了汉武帝，帝国终于有了本钱与匈奴掰一掰手腕。

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断断续续地打了四十四年。匈奴方面自然是被打得妻离子散、苦不堪言，但是中原人民日子也并不好过。

因为这些战争太费钱了，国库里的钱如流水一般花出去，钱不够用了，朝廷就不得不对百姓收更多的税。

钱不够用朝廷只能增加税收，一次两次地增税，百姓还能忍受。

但是长此以往，谁也受不了啊，所以很多百姓就只好抛弃家园成为流民，流民的人数一度比秦朝末年也差不了多少。

那些没有成为流民的百姓，也都受不了。他们另想一辙，把土地扔了，自家的户口也不要了，投到地方豪族的门下接受保护，让官府从此找不着我，也就不用交税了。

说到这，需要解释一下，既然社会已经散沙化了，这些豪族是怎么来的呢？

第一个来源是，战国时期贵族的后代，几百年来留下的世家大族盘根错节，还是很有势力的；

第二个来源是，文景之治的几十年，社会很自由，发展起来的很多大商人；

第三个来源是，地方的大侠、豪强，他们乐于去结交更多的人，愿意去庇护走投无路的人。

这些豪强在武帝之前就出现了。但当时他们的势力还不是很大，朝廷对豪强还是有很大的压制力。

但是到武帝时，情况变了。朝廷掌握的户口减少了，只好向还没有逃走的人征更多的税，逼着这些人也去投奔豪族。这样，豪族麾下的人口越来越多，朝廷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

以至于史书记载，到武帝末年，天下的户口减少了一半，这当然不

是战争打死了一半的人，而是跑掉了一半。

到了这个时候，朝廷就压制不了地方豪族了。豪族越来越强，中央政府能收的税越来越少，朝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地方官僚与豪族结盟

这里又出现另外一个让皇上头疼的衍生问题，就是官僚体系也开始出状况了。从战国七雄竞相变法开始，朝廷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官僚体系压制贵族。

经过周秦之变，贵族没了，皇上刚觉得痛快了，可是这回又冒出来一只帮地方豪族，朝廷对于官僚体系的需求又会变强，得通过官僚来压制豪族。

官僚得靠钱来养啊，可是正因为豪族兴起，朝廷缺的就是钱，咋养那么多官僚？

皇上没钱了，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地方上的官僚们开始跟当地豪族联手，对朝廷来说头就更大了。我本来想让你们帮我收拾豪族。你们倒好，跟豪族站一边了，我怎么养了你们这帮监守自盗的家伙？

实际上，西汉时期，朝廷对于地方官僚的控制力本来就不是特别的强，因为西汉刚从战国时期走出来没多久，它所继承的官僚系统，复杂程度比战国时期强不了太多。

这种官僚系统只能处理诸侯国规模的事务，处理一个庞大帝国的事务，远远不够用。打个比方，你不可能用管理一个小卖铺的办法来管理一个大商场，尽管这俩都是卖东西的，但从小卖铺到大商场，要处理问题的复杂程度是几何级数地上涨的。

所以，庞大帝国需要有更加复杂完善的官僚体系，才能有效运转。

这种完善的官僚系统要到宋朝的时候，也就是第三个时空坐标点、唐宋之变之后，才能发展起来。

在西汉的时候，朝廷还搞不定地方治理所需要的复杂制度，所以朝廷就把大量的工作都分散到地方上去，就是分散到郡上去，郡的最高领导人叫做郡守。

汉朝的郡大致可以理解为今天的省，但是郡守可比省长的权力大太多了，完全没法比。郡守们全盘掌握着郡里面的财政权、军事权、人事权、行政权，绝对是地方土皇帝。这些郡守甚至和自己的属下真的就是君臣相称。

在朝廷还比较有钱的时候，还有些办法控制郡守。一旦朝廷没钱了，郡守们就会琢磨如何扩大自己的势力。与豪族结盟，共同对抗朝廷，就是个不错的办法，监守自盗的戏码就上演了。

地方官僚和豪族联起手，大汉帝国的社会结构就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了。

本来它的社会结构是散沙般的，封建贵族早已不存在，民间就没什么自我组织能力，没能力跟朝廷博弈；但是现在社会结构开始转化为豪族社会，朝廷掌握的户又少了，控制社会的能力下降，而豪族则对社会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

朝廷越来越弱，豪族越来越强，西汉就由扁平的散沙状社会逐渐变成了豪族社会。

由此开始，中国从周代的封建社会，进入到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西汉初年那个散沙状社会只是历史中的一个短暂过渡。豪族社会维持了差不多一千年，一直到唐宋的转折期，豪族社会才结束。

说到这里，你就能看出，草原与中原有着多么深刻的互相塑造关系。没有中原的统一，就不会有草原的崛起；草原一旦崛起，就会对中

原形成巨大的军事和财政压力，又导致中原发生一系列变化。

所以，草原史当然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你要是不谈草原史，对中原史的理解就是非常片面的；或者说，草原史加上中原史，互相作用，才是完整的中国史。

当然，到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还要加上西域史、高原史、海洋史等等，所有这些区域，彼此之间都有着极为深刻的互相塑造关系。

所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的中国史，是这么多个相互塑造的区域，所构成的一部体系史。](#)

也只有从体系的角度出发，才能恰当地理解什么叫中国。

王莽：抑制豪族

再回到汉朝上来，武帝之后的汉朝历史，恶性循环在不断加深。豪族越发展，朝廷越衰弱，朝廷越衰弱，豪族就越肆无忌惮。

朝廷上几乎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最终一位看上去谦逊有礼、志向高远的人，众望所归，夺取了大权。这就是王莽。王莽先是成为帝国重臣，不久就篡位成为皇帝。

最近网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说王莽是从现代穿越回古代的，因为他上台之后的很多改革政策，看上去简直就像社会主义政策。

他都干嘛了呢？王莽宣布了土地都属于国有的，民间不可以自行买卖，奴婢也不可以私自买卖，盐、铁这两种最重要的民用物资、山川林泽、铸造货币的权力，等等这一切，全都被收归国有。此外，还设置了一些国家储备机构，用来调节物价。

但事实上，这些制度被设计出来，当然不是因为王莽读了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他是要努力依照《周礼》来复古改制。在这个意义上说，王莽根本不是从现代穿越回去的，而是从更古老的时代穿越到汉朝的。

王莽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都是要抑制豪族，重新恢复帝国朝廷的统治能力。但是这种努力在当时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很简单，你想要控制豪族，豪族会老老实实地等着你来控制他吗？

除非你手上掌握的资源对豪族具有碾压性优势，否则豪族反抗起来绝对够你头疼的。王莽能掌握的资源从哪里来呢？只能来自社会上的税收。可是社会已经被豪族控制了，你到哪里去获取能碾压豪族的资源呢？

要想真的干掉豪族，除非是有了新的技术进步。在豪族的控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经济资源，皇帝可以在这里收到税，用这个来养活自己能控制的军队，才能干掉豪族，否则皇帝只能接受与豪族共治这样一个事实。

这样一种新的技术进步，要到唐朝后期才会出现，正是它催生了唐宋之变。我们到后面会逐渐讲到这些内容，你只要知道，在王莽这时候，没这条件干掉豪族就行了。

刘秀：与豪族共治

豪族的兴起是个历史大势，王莽不肯接受这个大势，就轮到刘秀登场了。

豪族们起来反抗，很快就推翻了王莽的政权；刘秀作为这些豪族的领袖，建立了东汉政权。就凭刘秀的这些支持力量，东汉也注定只能是个皇帝与豪族合作共治的朝代。

也许你会想，不忙，坐等，看刘秀如何像刘邦一样，逐渐灭掉这些

合伙人巨头。

很抱歉，东汉没有这个机会了，原因就在于，社会结构变了。

西汉从秦朝所继承的是个散沙状的平民社会，刘邦身边的巨头们，并不能从社会中直接获取支持，皇帝有机会灭掉他们；东汉从西汉继承的是个豪族社会，刘秀身边的巨头们，能够从社会中直接获取支持，皇帝也就没机会消灭这些巨头了。

甚至，对刘秀来说，像刘邦一样定都长安，以便对豪族们形成战略优势，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于是，刘秀直接就选择了在洛阳定都，这里没有军事地理优势，但这里是豪族们的大本营。这相当于刘秀明白地告诉了豪族，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今日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线索就是：

汉武帝的黩武政策，改变了汉朝社会结构，对社会的控制力由中央政府转移到了豪族手中。

经过王莽篡位之后，豪族领袖刘秀干掉王莽，建立了东汉，最终形成了豪族和皇帝合作共治的局面。

咱们中学时都学过诸葛亮的《出师表》，想来你一定记得其中的一句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前汉和后汉，在社会结构上有区别也就罢了，为何在用人水准上还会有如此鲜明的对比呢？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解释的问题。

精选留言

吕可达02015223344

1. 汉武帝。文景之治，国家富裕，打匈奴，财尽，加税，流民，壮豪族。2王莽。制豪族，未成。3. 刘秀。领豪族，反王莽，建东汉。西汉社会结构：散沙状，巨头无法直接获取支持。东汉：聚集状态，可直接获得支持。老师，贵族和豪强有什么区别？

china_hwy

这才是讲历史啊！不是一连串历史事件的解读，不是一个个历史人物分析，它是时空坐标中不同力量如何利用资源进行动态的长久博弈，它是深入社会肌理层面，看气候、技术等因素如何促使个人行为改变，不自觉导致情势的推演。听施老师的课，仿佛时而策马塞北，随骁勇大汗烧杀抢夺；时而置身巷陌，看不堪流民杂乱奔投；琢磨琢磨王莽的心思，体会体会刘秀的苦衷。一眼望千年，两语论古今。施老师将伏线千里的历史脉络清晰准确地呈现出来，既带领我们在时空中飞越穿梭，总揽全貌，又关照重要临变点的时情世态，重点解读。受益匪浅，感触颇深。

Daniel

读完施展老师的文章，我觉得曹魏的悲剧可以被理解了。曹操在争夺政权中的政策是“唯才是举”，曹操晚年统一天下的失败，蜀吴和地方豪族的结合共存，“杀掉崔琰”等看似是稳固继承人，实际上是对士家大族彻底敞开了大门。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则是正式以官方文章承认了与豪族的共存关系，如老师所说，“对社会的控制力由中央政府转移到了豪族手中。”皇帝根本没有机会控制社会资源，悲剧产生了，而如同老师所说，后来的晋朝遇到了草原文明，加上自己的遗传病，开始了几百年的篡位史，直到隋唐，隋朝的科举制施行又经历了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大隋没挺过去，大唐获得了革命果实，盛极一时，盛世百代。曹操的《度关山》一文中“天地间，人为贵”正是他的理想吧，可惜他曹某人也改变不了，直到科举制这种制度的出现。

砌书匠

老师说的技术进步是不是指造纸和印刷术呢？因为西汉没有纸，所有的书都是竹简，所有文化传播都是抄写，成本极高，所以贵族和

豪强可以垄断文化知识，下层根本不可能有识字和获得知识的机会。从三国两晋开始，纸的产生降低了成本，南北朝时期印刷术使得书的成本大幅降低，普通人家能够相对负担得起，这也成为科举制奠定了基础，而科举制的创立，才正式敲响了豪族社会的丧钟。

kiko

请教施展老师，豪族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呢？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跟贵族比起来如何呢？

tonyliu213

这和社会官僚体系以及豪族结构和皇权的关系角度看，西汉依靠官僚体系巩固了皇权，皇帝依靠官僚体系治国，官僚体系的特点决定了皇帝会选贤任能，任用贤臣，国家治理和皇权都得以加强，所以，在诸葛亮眼中，前汉兴盛也；后汉，是一个和豪族共治的社会，官僚体系部分依赖甚至于依附于豪强，皇权严重削弱，皇帝依靠不了官僚体系，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和自己的亲属，所以任人唯亲，无法像前汉大规模的利用社会能人志士，所以，从任人到整个皇权的角度讲，诸葛亮讲是后汉弱的原因。

居安思危

这真的跟以前了解的历史不一样啊，以前更多的是以历史人物为主导去了解历史，基本上每一个都是个性鲜明，或崇拜或厌恶或遗憾……没想到历史还可以这样宏观的去讲，有时会有脑洞大开的感觉，但是也少了一些有历史人物的那种带入感。如果有这些宏观的历史背景，再去看某个历史节点及人物，那感觉会更深刻，体悟更多的。期待未来施老师的课

I's Y

乱了…贵族、豪族、官僚都有啥区别？

作者回复

贵族是相对于君主有着高度独立性的，跟君主是准合伙人关系。官僚是君主用来治理的工具，相对于贵族来说是依附于君主的。贵族有着很强的政治属性，豪族在初期没有什么政治属性，就是社会上的大户而已。

蝉禅源缘

这与我学过的历史完全不同。武帝、王莽、刘秀均不再是历史书上描摹的模样。武帝的雄才大略，反而促使地方豪族的兴起，主要原因是中原与草原长期战争，加大了百姓的税赋，百姓难以承受，一半人口依附于地方家族。同时，官僚体系缺乏管理大帝国的复杂制度，郡守成为类似小国的完全领导体，拥有军政财大权，与地方豪族联合，共同对抗朝廷。这一切，成为东汉后期的三国南北朝分裂的基础。

年年有余

所谓的中国史，其实是包含了中原史、草原史、高原史、西域史、海洋史，是由这么多个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区域，构成了一部生动而且深刻的体系史。也只有从体系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勇敢者

草原与中原，有没有点地理决定论的感觉？

作者回复

地理不是决定性条件，而是约束性条件。在草原上肯定没法三从四德，这叫约束性条件，但草原上的形态也可以有多种，这就叫不是决定性条件。

科

请问老师所说的豪族是指士族吗？另外为什么普通民众投靠豪族后就不需要纳税呢？

作者回复

士族是逐渐儒家化的豪族，这之后士族就具有了政治诉求，一开始的豪族没有太多政治诉求。至于纳税的问题，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它以政府掌握详细的社会统计数据为前提，才知道该如何分配税负压力，该到哪里去找谁征税。这种社会统计数据，在汉朝的时候还差得非常远，再加上地方官也没有太大兴趣去帮助朝廷做详细统计，而是更愿意与地方合谋。这种情况下，民众投靠豪族后，朝廷就是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就没法收税了。豪族家当然还被收税，但只收一个户头的税了。

换种方式

帝国的集权就是要把社会散沙化；汉武帝“穷兵黩武”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后代帝王对整个西汉的治理产生了影响。三国时期曹魏（曹操）前期的治理工作就非常好。官僚体系也打造不错，曹丕篡汉自立之后为巩固政权启用豪族。才使司马氏家族最终夺得天下。问题：为什么当初不用“分权制衡”的策略来消减豪族的影响力呢？官僚体系就是起到一个制衡的作用；如果不行为什么不顺势而为改变官僚体系内部结构；重新建立制衡？

作者回复

你好，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可以继续关注后面几讲，我会谈到这些问题。

常铮

想问一下施老师，在豪族兴起的初期，是赋税使得平民放弃自己的户籍独立投身豪族，我想问的是税赋政策不是统一的吗？豪族田多人头多不是税赋压力更大吗？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豪族的发展反倒受到了强有力的限制吗？如果是平民的税赋能收上来，豪族的税赋收不上来，那说明收税的官僚集团早就从皇帝那倒戈到了豪族那里，那皇帝早就该对官僚下手了呀？这又如何解释呢？

作者回复

豪族的户口下面隐匿着大量的人头，朝廷根本就不掌握呀。比如有些豪族门下隐匿着上千户人家，但朝廷就只知道这个豪族他们自己家，那朝廷收税就只能收到这一家。至于说什么皇帝对官僚下手，你让他用谁来收拾官僚呢？用豪族吗？不可行。用别的官僚吗？别的官僚没那么傻，他们知道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

小林610

中国史就是草原史与中原史的相互统一，刷新了我们对古代史的概念。的确，片面的了解中原史太过狭隘了，古中国就应该是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统一，所以现在中国所有民族才同属中国。秦皇汉武现在也刷新了认识，期待老师对唐宗宋祖的解读，那应该又是另一番新认识罢！

塞外晴秋

涨知识，全新的角度，原来历史还能这样看，这哪里是搜寻记忆，这明明是和未来一样新奇的新知识，新而深刻。

尹炳强

此消彼长，同一事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外因、内因、自然环境、人员关系结构、关键人物的认知和处理事情的水平，相互促进制约和发展，鲜活有趣而且发人深省。

10|为何后汉皇帝“亲小人、远贤臣”

“贤臣”其实是世家大族。“小人”就是外戚、宦官，他们是皇帝中央集权的工具。后汉皇帝“亲小人，远贤臣”的背后，其实是皇权和世家大族的权力斗争。

今天咱们来一起聊一下，为什么后汉的皇帝会“亲小人、远贤臣”？

诸葛亮说过这是后汉衰败的根本原因，后汉的皇帝为啥会这么自取灭亡呢？是他们都特别地蠢吗？肯定不是。

这是因为后汉的皇帝遇到了新形势，他们的选择其实很有限。那么，后汉的皇帝们遇到了什么形势呢？

最关键的就是，上一讲刚刚说过的，豪族社会。为啥豪族社会就会让他们亲小人远贤臣呢？

关键是要看看“小人”和“贤臣”分别都是什么人，以及他们和皇帝都是什么关系。

“贤臣”是谁

所谓贤臣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儒家化了的豪族。对皇帝来说，豪族不可怕，就怕豪族有文化。

因为，一般的豪族对社会有组织力，又让皇上收税变得困难，皇上不大容易动得了他，但他们还不会从观念上批评皇上；但是，有文化的人，则会引经据典地批评皇上，说你昏庸。

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合二为一，这个有文化的人还是豪族，皇上就只能干瞪眼地被批评，还动不了他。有文化的豪族，从东汉的时候逐渐发展起来，直到隋唐的历史上，被称为门阀士族，经常也简称为士族。

士族对皇帝有各种约束，皇上就在士族外边再去找一些有文化的人，为自己所用，不就能够反制士族了吗？你引经据典地说我昏庸，我的人就会引经据典地说我这是圣明，皇上不就不那么憋气了？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皇帝不大容易找着人。为啥呢？

因为知识传播技术不发达。要想在社会中有足够多的有文化的人，知识传播的成本必须降下来。

首先得有纸的出现，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这会儿的造纸技术还不发达，有句成语“洛阳纸贵”，这个描述的其实已经是西晋时期了，说的是有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洛阳的文化人竞相传抄，纸不够用了，于是就变贵了。

西晋时期比“亲小人、远贤臣”的东汉又晚了一百多年，这说明纸本来就不多，本来也就不会太便宜。

光有纸还不够，还得有印刷术大规模的应用。但东汉还没有什么印刷术可言，书籍的拷贝要靠抄写。这种情况下，知识传播的成本相当高，不是豪族的话，一般人根本读不起书；读得起的豪族，就成了士族了。

士族一代代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世家大族，他们垄断了知识和地位，垄断了社会上的舆论。

这些人就是所谓“贤臣”，他们差不多把持了朝廷和地方的各种重要职位。世家大族彼此间还联姻通婚，形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对皇帝有着相当强的制约能力。

“小人”是谁

东汉开国的头几位皇帝还比较有实力，而世家大族也还在发展中，他们彼此还能相互制衡，还不算什么大问题。

到了后面的皇帝，越来越受到世家大族的约束。皇上肯定感觉非常不痛快，我都是皇上了，还天天被人这么节制？不行，我得有自己的人，收拾收拾这些天天跟我叫板的家伙。

皇上要找来支持自己的人，来对抗世家大族。[但问题是，世家大族把持着官僚体系，也控制着舆论，这些皇帝的支持者就肯定会被指责为“小人”了。](#)

这与他们实际上的人品、官品怎么样关系不大。皇帝的行为，在世家大族嘴里，也肯定是“亲小人、远贤臣”了。

再看看皇上吧，他到哪去找自己人呢？到民间去找？就像前面说的，知识都被世家大族垄断，民间没什么可用之才。到朝廷上找？朝廷上放眼望去，都是彼此串通一气的世家大族，也不行。

皇上还得保证这些人能站在自己一边。对皇帝来说，什么才能确保这些人支持自己呢？忠诚这东西是不敢指望了，能指望的是，他们的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赖于皇帝，这些人即便是出于自私，也得站在皇帝一边了。

那是什么人啊？只有两种，宦官，也就是太监，还有外戚，也就是皇后的家族。

宦官和外戚还彼此看不顺眼。宦官完全被世家大族们所瞧不起，外戚有不少也是出身世家大族的，但一旦与皇上结了亲，马上就会有压过其他世家大族一头的感觉，会借此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又与其他的世家大族之间会发生矛盾。

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的博弈关系

于是，皇帝、外戚、宦官、世家大族组成的官僚，彼此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

东汉中后期昏君很多，汉桓帝尤其是昏君里的典型。但是仔细看看汉桓帝的经历，能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汉桓帝是在15岁的时候被大将军梁冀扶上台的。梁冀是前朝外戚，觉得扶植个15岁小孩子好控制，利于自己继续掌权。

那些不同意梁冀，想要拥立个成年君主的大臣，都被他给收拾了。被扶上台之后，桓帝感觉特别不爽，因为梁冀像太上皇一样天天控制着他。

汉桓帝想要反制梁冀，但又没有人可用。在当了13年的傀儡皇帝之后，桓帝终于发掘出几个心腹宦官，与他们联手，歃血为盟，发誓要搞掉梁冀。

皇上和宦官联手把梁冀做掉了之后，桓帝开始自己说了算，马上就来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就是说，有一群世家大族的名士重臣，他们痛斥宦官，结果就被指责为结党营私，这些人或被罢官赶走或被抓起来，并被规定此后永远不得录用。

我们今天历史书上说党锢之祸是“宦官专权”什么的，实际上只不过是皇帝通过宦官之手，跟这些世家大族进行PK，党锢之祸就是皇帝进行中央集权的努力。

用宦官压制了世家大族之后，汉桓帝又反过来开始压制宦官，把当年帮自己做掉梁冀的宦官们狠狠收拾了一番。

但皇上也不会抛弃宦官，只是让他们不要那么嚣张，日后还会借重宦官继续抗衡世家大族。看到这些作为，我们会感觉，汉桓帝虽然说不上是什么明君，但智商绝对不差。

宦官的力量过强，皇帝还可能再去用外戚来压制他们，东汉后期的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世家大族面对皇帝的这些对抗举措，便会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天下为己任”的形象，获得道德制高点，宦官和外戚就进一步被还原为“小人”。

这就是“亲小人、远贤臣”的由来，至于贤臣是否真的贤，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东汉的瓦解

皇权与世家大族的这种冲突过程，会极大地败坏帝国的治理水准。

正赶上东汉末年进入了一个小冰期，连年天灾，民变四起。朝堂上各种勾心斗角，民间的疾苦实际上没人真的去管。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求告无门，只好想法自己组织起来，寻找活路。各种民间信仰，就是组织的工具，因此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汉朝的儒学讲究天人感应认为天灾必定是皇帝失德，上天降下灾祸，皇帝被迫多次颁发罪己诏。皇上天天都在罪己的话，人们对朝廷的敬畏就会动摇了。民间信仰趁机说，自己才是天命所在，于是，到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动摇天下。

朝廷彻底没辙了，只能寄希望于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兴兵勤王。但豪强们各怀鬼胎，逐鹿中原的诱惑迅速地让这些“贤臣”的种子都变成了乱世的枭雄。

大汉帝国冰消瓦解，天下大分裂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今日小结

今天我们谈到，“贤臣”其实是世家大族，“小人”就是外戚、宦官，他们是皇帝中央集权的工具。

后汉皇帝“亲小人，远贤臣”的背后其实是皇权和世家大族的权力斗争。

一旦进入战乱时代，能够把握时代的就不一定是擅长读书的世家大族了，会有其他出身并不高贵却能力超凡的人脱颖而出。

三国时期的各种战争冲突，今天我们熟知的各种名字，仔细分析的话，会发现隐藏着出身不高的人与世家大族的对抗过程。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 精选留言 ——

王黎璐

士族垄断了话语权，士族讨厌的人就是“小人”好多历史人物都吃了这个亏。东汉末年，财富和权力基本都处在士族手里，每个地区都有大家族小家族联姻瓜分地盘。很多诸侯起兵也是靠士族支持的。曹操为了摆脱贫族的枷锁，广开荒地，实行任人唯才，一方面笼络士族，一方面任用庶族。士族和庶族有共同的利益，才可以化解矛盾。这也是三国中，曹魏人才众多的原因。期待明天老师对三国的解析。

Optimiste

你好 我一直有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想问你 就是中国史料复杂 是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正史的呢 比如史记里说白起是秦昭襄王时期被封为武安君 战国策有一个“秦惠王谓寒泉子”里面有一句“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战国策里面有一个张仪说秦王 也有讨论长平之战的言论 再比如 汉武帝轮台召 以前的史书说 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在资治通鉴里面有了 那中国是根据什么来定义什么算正史呢这。真正的历史在哪呢

作者回复

别忘了我在第一讲里面说的，我们所讨论的历史是由两部分构成

的，史实和史观，或者说砖头和蓝图。你所问的这个问题，是如何确认一块砖头的质量，这个在史学上是专门有一套技术的，跟破案差不多，循着蛛丝马迹来找证据，这个太专业化了，不多说了，只能额外补充一句，就是真正的史学高手，会让蛛丝马迹说话，办法就是，用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来把蛛丝马迹串联成为故事。而关于人性的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超越了砖头，进入蓝图的领域了。咱们这门课，更加注重的是蓝图，因为砖头太多了，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根本没必要去挨个翻检一遍（即便专业人士也做不到），而具体的砖头到底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取决于蓝图的，并不是砖头自己能决定的。非专业人士学习历史，本质上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理解能力，让自己能够更好地理解人性，更好地理解当下，更好地构想未来；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需要学习的就是画蓝图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你在我的课中看到的砖头（具体史实）相对有限，但是会看到我在不断地、大剂量地教你画蓝图的技术，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这才是学习历史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第七步

今天听完，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第一，诸葛家在三国三家都有下注，诸葛诞，诸葛瑾，诸葛亮，所以他们家肯定也是士族和“贤臣”了。第二，宦官没有后代，外戚在老皇帝死后，会随着新皇崛起被取代，所以宦官和外戚是注定不会留下好名声的。第三，知识传播成本太高，被士族所垄断，才是士族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原士族互相矛盾不断，给了草原帝国趁虚而入的机会。而后隋炀帝发明了科举制，才解决了知识的垄断问题。

作者回复

科举也还没有解决知识垄断的问题，只是让皇帝多了个选择人才的办法，但是在隋唐的时候，能读书的人多半还是大族的。真正解决知识垄断是要到印刷术获得大规模应用。这个就快到宋朝了

管

老师好，今天的课，让我感觉这皇帝完全没什么用，他的生杀大权哪里去了？另外，宦官无兵无将为什么能够做掉大将军，靠的是什么？不懂，求解答。

作者回复

皇帝的生杀大权，这是明清朝代的事情了，豪族社会时期，皇帝的权力远远没有那么大，并且即便是明清时代，皇帝的生杀大权也不全是自己说了算的，必须要顾忌天下公论。至于做掉大将军嘛，实际上就是个政变，用不了几个人，韦小宝带几个小太监就把鳌拜给做掉了……

老姚

施老师：豪族和贵族的区别都有哪些？

作者回复

先做个界定，咱们这里说的贵族就是周代封建社会时期的贵族哈，因为后世我们经常会称为贵族的人，和周代的贵族完全不是一回事。周代的贵族，某种意义上就是君主的合伙人，彼此之间是有一种不成文的约定的，贵族相对于君主的独立性，是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性安排；汉唐之间的豪族，不是君主的合伙人，仍然是臣民，他们对于君主的独立性，不是不成文的制度性安排，而只不过是皇上办不动他们而已。豪族在东汉中后期逐渐地越来越有文化，儒家化之后，成为士族，士族手里掌握着舆论公器，于是对皇上说话的时候嗓门更高了，皇上更办不动他们了，但他们也仍然是臣民而不是合伙人，和贵族的独立性没法比的。

心灵正能量

老师，我想问一下：世家大族的代表有哪些？

作者回复

三国演义里，军师联盟里，你能看到的人物，多一半都是世家大族出身。

上海小巴

为什么皇帝用外戚和宦官，不用自己兄弟。用兄弟，得天下可以分封啊。搞来搞去不相信自己人？

作者回复

别忘了，兄弟就是用来出卖的……听说过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吧？绝对是人类腹黑精华集锦，那可都是兄弟

辉

为何皇帝无法依靠同姓诸侯王的力量压制士族，按理说，同姓诸侯王有一定的学识，同属于皇室血脉，唇亡齿寒，用他们压制士族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作者回复

同姓诸侯王不一定可靠。历史上同姓诸侯王谋反的例子太多了

晏萌

看曹魏政权，始终能看到皇权、外戚、士族三者间的博弈，其实作为皇帝来说，士族和外戚的博弈，并不是坏事，通过彼此的制衡，皇权才会更为稳固，皇帝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维持着彼此的平衡，不希望一方有压倒性的优势。看三国里的博弈，要发展壮大，既要靠豪族的支持（联姻也是个办法），也要士族的舆论的支持，所以皇帝做很多决定跟对方是非对错无关，和政治力量均衡有关

祁恒

经施展老师一点拨，这才发现三国里很多牛逼人都是贤臣士族。曹操一直被人黑化，可能就是因为他爸是宦官的养子，他雄才大略能力非凡可惜赤壁败给了士族联合体孙刘联军，是不是可以理解曹操才是为了广大黎民百姓庶民而战呢？司马家取代曹魏恐怕也是士族大家大力支持

李跃龙

听了施老师的课，突然觉得历史不再那么冷冰冰的了，开始有血有肉活泛起来了，也觉得了解一些读历史的方式方法，知道历史从哪里来，那么我们知道将要往哪里去也就有了线索，通过读历史上一个一个的偶然去感受当时的必然趋势，影响历史进程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人物，还有广大人民群众，还有自然环境的演变，气候条件的变迁，技术的进步等等等，从此知晓历史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感谢施老师的中国史纲，感谢知识共享得到，感谢这个时代……

邓似人

之前学习历史，会习惯于了解过去发生过什么，大多时候，会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审视、分析评论某年代，某个历史人物的是非，

善恶，闲愚，美丑；也喜欢于，对于一个朝代的兴衰起落归功或归咎于一个人，并得出结论。谢谢施展老师分享了另一种学习历史的新视角。

11|诸葛亮的士族绞杀行动

天下三分，最终三国归晋的故事，其实就是士族寒族冲突，最终士族大获全胜的历史。皇帝、士族、寒族、官僚、平民，各种力量在这一时期展开复杂的权力博弈。三国时期的很多故事，都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这一讲咱们来聊聊三国。一说到三国，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魏蜀吴的冲突，但今天咱们从诸葛亮的心机说起。

在这个故事中，你会发现，国家之间的斗争，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特定社会结构下，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冲突。

历史大势，很多时候是由这些藏在明面下边的冲突决定的。

“孟达反叛”的常规版本

中国人普遍都熟知诸葛亮北伐中原，与司马懿斗智斗勇的故事。两人的第一次斗智，与一个叫孟达的人相关。

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故事的常规版本。先说说孟达是谁。

孟达这人，他原本也是蜀汉的臣子，也就是刘备、诸葛亮的旧部。他在早年刘备在世时，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他自己知道求饶无望，索性就投奔了曹魏。

在魏国这边，当时已经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当政，曹丕重用了孟达，并利用他的私人军队，让他镇守蜀魏两国之间的要道。

后来到了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前后。这时刘备死了，曹丕也死了，两边都换了新皇帝，孟达在魏国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就想，回到蜀汉是不是反而更好呢？于是，孟达通过一些渠道联系上了诸葛亮。

诸葛亮大喜，写了好多封信劝他回来。为了让孟达能够放下心来，诸葛亮还请蜀汉的前朝重臣李严也给孟达写信。李严是孟达的老相识，又与诸葛亮一同接受了刘备的托孤重任，所以他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李严告诉孟达，回来一定会得到重用。这就让孟达下定了决心，要暗自接应诸葛亮的北伐大计，算是给自己回归蜀汉交个投名状。

没想到，诸葛亮却在孟达摩拳擦掌之际，故意把他要反叛的消息泄露给了魏国。魏国方面司马懿早对孟达不放心，马上出兵来围捕孟达。更奇怪的是，诸葛亮见死不救，任由孟达被围攻了十六天之后败亡。

蜀汉的主客矛盾

史书上记录这个故事时，一般都定调说，诸葛亮是厌恶孟达反复无常，所以见死不救。

但是北京大学已故的历史学教授田余庆，却对这段历史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版本。这个版本让人听得一身冷汗，让人意识到，历史和人心有多复杂。

刚才讲的这段历史里面，有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蜀汉的主客矛盾。

所谓的客是谁呢？就是刘备这群人，他和他手下的兄弟们，几乎没有蜀川人士，仅凭冒险而占据了原本属于刘璋的西蜀，当然是客人，又被称作新人。

蜀汉的主人是谁呢？刘璋留下了大量的旧臣，这些人多半都是蜀中

的世家大族，在当地树大根深，属于蜀中的主人，又被称作旧人。

主客关系从来都是很麻烦的。刘备集团的新人虽然是统治者，但毕竟人少，出身上也并不高贵。蜀中的旧人，虽然是被统治者，但是人多，出身也比较高。

刘备假如不能将把旧人用起来，就不可能统治得了蜀川；另一方面，如果不用新人制衡旧人，弄不好就说不清江山是谁的了。

诸葛亮是新人的领袖，李严是旧人的领袖。所以刘备托孤的时候，要委托诸葛亮和李严这两位。刘备考虑，在身后也要维持新人和旧人的平衡，阿都才能稳坐江上。

但是，李严显然有更多的想法。他在诸葛亮筹划北伐之际，分兵驻屯到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在这里发展起庞大的势力，这是摆明了要与诸葛亮唱对台戏了。

诸葛亮如果不能摆平李严，可能旧人多半都会去重庆投奔李严，那样蜀汉很可能就分裂了。

所以诸葛亮以北伐之名，想法要把李严从重庆调到自己身边来，便于就近控制，但是李严百般推脱就是不出来，谁都不傻呀。

现在突然有了孟达这么一出，孟达也是属于蜀汉旧人系统的，如果他回来的话，十有八九会站到李严那一边，诸葛亮就更没得玩了。

但是诸葛亮眉头一转计上心来，利用了孟达回归这个事情，让李严给孟达写信。李严一看孟达可能回归，马上发现了有可能压制诸葛亮的办法。

李严想到孟达有可能回来相助压制诸葛亮，就放松了警惕，接受了诸葛亮的调遣，离开了重庆。

一看调虎离山计终于成功了，诸葛亮马上再放出第二手，把孟达要反的消息透露给魏国，然后坐看孟达被灭掉；李严没有了外援，只能任

凭诸葛亮收拾。

又过了两年多，诸葛亮料理了其他外围问题之后，把李严贬为庶人，终于完成了对于蜀汉的新人、旧人两大系统的整合。

看了田余庆教授的这段分析，让我后背一阵阵地冒冷汗。诸葛丞相从一个高大上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一个超级腹黑的角色。仔细再想想，我也不得不接受了田教授的分析，因为这绝对符合当时的权力关系的逻辑，也符合人性。

士族和寒族的斗争

当时的权力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上一讲曾经讲过的，出身高贵的世家大族，与出身不高的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关系。出身高贵的，历史上又被称为士族。

士族把好事都占着，他们垄断着各种官职，垄断着舆论，占据着道德制高点，这些人经营了上百年，盘根错节树大根深。但是天下大乱之际，光是说自己能以德服人、很有知识水平，是不够用的，还必须能摆平这种乱局，得靠能做事的人。

问题是，能做事的人，不一定是士族，很多是寒族出身，他们可能很有功绩，却又被士族看不起。各种冲突于是就浮现出来了。

诸葛亮对抗李严的过程，不仅是主客矛盾的表现，同样也是士族和寒族矛盾的表现。

外来的客，在当地没有根基，肯定不会被李严他们这些士族看得起的。从这个腹黑的故事出发，再看看汉末三国的各种冲突，便会发现士族与寒族的冲突无处不在，并且它会在皇帝、士族、寒族、官僚、平民等等各种复杂的权力博弈中，变得更为复杂。

三国时期的很多故事，都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比如，袁绍和曹操，就分别是士族寒族的代表人物。

袁绍家族，号称四世三公，所谓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这三个最尊贵的职衔，袁绍他们家四代以来都有人担任，袁家绝对是士族领袖。

咱们说过，士族最初的敌人是宦官，这就是贤臣和小人的对抗嘛，所以东汉中后期的宦官政治愈演愈烈，其实是皇帝与士族的对抗愈演愈烈。

黄巾大起义，天下大乱，袁绍找机会带兵杀入京城，把宦官们连锅端了。

曹操对士族的打击

这种乱世里，更能干的人就脱颖而出，曹操崛起了。

曹操的出身非常可疑。曹操的爸爸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由于曹操的出身，袁绍之流完全看不上他，觉得他也是阉党。曹操极力想洗清他的阉党身份，因为他自己也看不起阉党。他想加入士族，但是士族却不乐意带他玩。

曹操在阉党和士族双方都不能得到有力的支持，那就只有从平民那里取得支持，以此作为本钱来跟士族斗。

这股力量从哪里来？现成的，黄巾贼！黄巾贼就是平民。曹操在青州平了黄巾贼之后，将其收编为“青州兵”，这是曹操最重要的资本。

曹操以此为基础，一把获得了跟士族掰手腕儿的资格，后来又陆续打掉了一堆顶级士族，诸如袁绍、袁术之类，当然，还有纯耍嘴皮子的

士族如孔融之类。

这些士族位高权重，又有很大野心，曹操把他们全削平了，因此他得意的说：“设若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霸”！

曹操为了防止有人再称王称霸，不断地打压士族，这就意味着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平民中选拔人才。他有一句话，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意思是士族有德行，太平年月里，我可以容忍你们这帮家伙。但在乱世里，就是赏功能的时候，也就是器重有本事的人。你就算是偷鸡摸狗之辈也无所谓，只要你有能力，就能得到重用。

曹操以这样的观念，就把士族与寒族的界限给打掉了。他所凭借的根本力量，就是出身平民的青州兵。但是，青州兵只服曹操一个人，等到曹操一死，青州兵马上哗变，曹丕完全控制不住局势，只能发点儿路费让他们回家了事。

曹丕没有了支持自己对抗士族的力量，而且他还是篡位的，更不能服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若想玩儿得转，就必须对士族让步。

怎么让步呢？曹丕接受了士族的建议，说咱们搞“九品中正制”吧！

“九品中正制”在名义上是把人按照能力分成三六九等，来安排职务。但能力高低由谁来判断呢？是由士族来判断的。[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就是士族势力的大回潮，垄断了高级职位。](#)

士族最终战胜寒族

东吴和西蜀，也都面临着士族与寒族的冲突问题，并且在这两国，士族寒族冲突还都与主客矛盾搅合在一块。

诸葛亮搞死了孟达、搞残了李严之后，可以放开手脚治蜀了，他的政策以严刑峻法著称，建立了一套如臂使指的官僚体系。

这些官僚从哪里来？就从蜀中的平民中来，联合蜀中平民打击蜀中士族，然后他才能组织力量北伐中原。

可以说，正是诸葛亮继承了曹操的遗志，代表寒族不断地打击士族。

对诸葛亮来说，没有办法，必须北伐。他如果不北伐，刘备诸葛亮这个统治集团的正当性就说不通了，你们这些外人跑来占领蜀地，打的是中兴汉室的旗号，不北伐的话，就得下课。

但是西蜀的士族不愿意为了你们几个家伙的正当性，不停地把蜀川的资源送上战场啊，所以诸葛亮又不得不打击士族。

等到诸葛亮去世之后，姜维的威望不够，北伐的事业注定失败。幸亏诸葛亮死得早，否则很可能在他手上北伐事业就失败了，一辈子清名就糟蹋了。当时蜀汉的人口又不足曹魏的四分之一，还要天天主动进攻，不垮台才怪呢。

再看魏国这边，曹丕则背叛了曹操，让士族回潮了。士族站住脚后，回头看看，你老曹家宦官之后，在士族里根本就排不上号。

所以又过了若干代，士族彻底把老曹家给干掉了。司马家上来了，司马家是士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可以说司马家干掉曹操，接续了东汉的一个传统，也就是东汉士族大权在握的传统；而诸葛亮是接续了曹操的传统，代表寒族对士族的挑战。

最终，我们看到历史的结果，还是东汉的继承人干掉了曹操的继承人，士族战胜了寒族，形成了晋朝的局面。

今日小结

经过今天这一讲，我们可以说，[天下三分最终三国归晋的故事，其实就是士族寒族冲突，最终士族大获全胜的历史。](#)

但是，经过了这两百多年的发展，士族的水准逐渐败坏了，他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治理天下。晋朝虽然统一了天下，很快就带来了更大的混乱。

但历史的奥妙就在于，正是在这种混乱中，中华文化反倒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

明天，我会跟你展开讲讲这个问题。

精选留言

辰星剧社马冲

在观察历史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认为一个势力当中肯定都是统一团结的。认为蜀国人都想打曹魏，认为魏国人都想统一全国，认为东吴人都想联蜀抗魏。但真实的历史是很复杂的，甚至是腹黑的。一个势力的内部更是错综复杂，派系林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还要照顾到自己的伟大目标，是极其困难的，有的时候就被自己的目标或者信仰所困。陷入到一个出不来的死循环中。

月光

记得罗胖曾说过，在读历史的过程中，如果能读出历史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感受到“迫不得已”的感觉，那才算是真正读懂了历史。从今天的内容就可以感觉，诸葛亮和曹操那种“迫不得已”的心态，也迫使他们必须这样做，就像有句老话“时势造英雄”。

杨鸿艳 | 帝贝度假

历史上能得以流传的东西，绝大多数是明面上的东西，是当时的舆论控制者希望后世知道和流传的东西，很多真相是隐藏在真相之下的，甚至隐藏在人性里，需要靠真实的行为才能解读。感谢施老师带着我们扒开乱七八糟的砖头，看到蓝图。

保福

真是毁三观啊，听了五遍。

作者回复

听这么多遍，那你的三观都快成了饺子馅了.....

金龙鱼

今天的故事联想到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怎么安内呢？同样是借助外力！借助外力，至少可以形成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至于具体操作就，看当时局势以及运气啦！我们都习惯于将故事简化模型化，这样更便于理解。晋朝，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朝代，书本上的描述很少，我给它贴的标签只有陶渊明和竹林七贤，五胡乱华更是不太理解，期待施老师明天的讲解。

鲈鱼

东汉三公，应该是太尉，司空，司徒。

作者回复：是的，你说的准确，我说的那三公是周代的说法，后来历朝历代对于三公的title都有过变迁，并且到了元朝中期之后，太师、太傅、太保更多地是个超级荣誉的虚衔。我在里面的说法并不准确。感谢指正。

Michael

曹操的另一个兵源是移民，先是迁移了数十万氐人，西安一带戎狄漢人各半，216年，將匈奴分五部，遷移太原，鮮卑和烏丸入河北蔚縣，這決定對抗了世族，但在一百年後差點滅了漢族。

作者回复

是的，胡人是另一个重要的兵力来源。实际上，胡人兵力，从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为帝国所用来镇守边疆，这就类似于罗马帝国中后期任用蛮族来镇守边疆一样。后来西晋末年天下大乱，跟中原大佬们乱动员胡人很有关系。

Y&N

历史和人心是如此的复杂！眼界的限制使我只看到表象，今天的学习使我扩大眼界：蜀汉的主客矛盾，还有士族与寒族的冲突，无处

不在，并且它会在皇帝、士族、寒族、官僚、平民等等各种复杂的权力博弈中，变得更为复杂。

瓜子居士

今天老师的讲述不禁让我想到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权力计算的论述。其实每一代君主和君主的智囊团对于何为道德何为人性的理解是超于很多常人理解范围内的，但是正式这种超越才能保证让君主的权力能够最大化的提现。对于国家来说，最大的道德或许就是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完成收益，稳定统一。说到底，在那个乱世里就是快点结束乱世，恢复国泰民安。

宋晔

蜀汉之中的主客矛盾是确实的，但是我觉得诸葛亮也不是寒族，而是士族，从他家的长辈，同辈就能看出是士族的家底。

作者回复

确实，诸葛亮本人并非寒族，但是他作为掌权者，却一定要用寒族而排斥士族，这是权力逻辑。站到塔尖的人，必须有一种全局考量，而不能仅仅是站在自己的出身阵营来考量，否则一定会失败，因为没法整合足够多的力量。换个例子，特朗普是超级富豪，但他（至少自称）是代表美国穷人来说话的，对手是华尔街的富人，这就是“士族出身”的人要联合“寒族”对抗“士族”的新例证。

佛祖门徒

我认为孔明北伐还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蜀汉对蜀魏在政治上处在劣势和守势，这一部分缺陷只能通过军事攻势来弥补。第二，稳住东吴，用不断北伐来告诉东吴孙权，自己只想兴复汉室，对江东暂时没兴趣。第三，稳定蜀汉内部的政局的需要，把所有人的价值观统一到复兴汉室上来。

ft-hz

011听完今天这一讲应当说解决了一个长久以来的疑问，究竟是历史创造了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答案是前者。所谓英雄一定是顺应历史潮流成其事，而不可能逆流而动。聪明如诸葛亮，本身内政治理水平就超越军事水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明明不可能成功的北伐实际上也是拗不过蜀地原有的士族要求你外来户证明统治正当性的大趋势而已。

南極北極熊

諸葛亮與蜀國舊勢力的利益集團的衝突的視角去看魏蜀關係，蜀國士族被魏蜀關係中厚黑的絞殺，腹黑的政治角度看清士族如何被後起之秀不斷的套殺。政治局勢的無情，借由魏國之手打擊政治對手，鞏固自身（諸葛亮）政治地位，寒門不斷絞殺士族，用能力替代出身，三國演化成階級鬥爭野台戲，一場比一場精彩。

张欣

施老师这样的历史观点应该不仅是首创，在历史学家圈子里应该也有相同的声音。为什么我们活了30多年，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听到？这背后是因为人为的原因呢？还是传播的原因呢？

作者回复

感谢互联网时代全新的知识传播机制吧。对诸葛亮的这个历史分析，史学界早就有了，但是一直没有传播出来。

12|彩蛋：司马懿时代的冤冤相报

通过司马家、曹家、桓家和诸葛家这几个家族的恩怨，会让你对魏晋那段历史，获得一个大比例尺的时间地图。站在这个大比例地图上看这段历史，你一定会感慨人生的无常，命运的轮回。

上一讲，我们从诸葛亮的心机讲起，谈到了三国时期士族和寒族的对抗。

最终，这种对抗的结局，是士族战胜了寒族，形成了晋朝的局面。而开创晋朝的司马家，就是士族的重要代表力量。

三国的历史很有名了，但是之后从曹魏到晋朝的这段历史，你可能相对比较陌生。正好，最近优酷正在热播一部电视剧，军师联盟之《虎啸龙吟》，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里面大部分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虽然具体情节有不少虚构，但是大的时间线都是符合历史的。

正好咱们这门课的讲述也进展到这段历史了，接下来，我想给你一个彩蛋，专门讲讲这段历史中的人和事，让你感受一下人性的复杂，和真实历史的跌宕。

我要讲讲这个时期的几个大家族，司马家、曹家、桓家和诸葛家的家族恩怨。

通过这几个家族冤冤相报的过程，让你对魏晋那段历史，获得一个大比例尺的时间地图。站在这个大比例地图上看这段历史，你一定会感慨人生的无常，命运的轮回。

曹丕和曹叡的托孤策略

先说曹家。司马家和曹家的关系太复杂了，这一讲，咱们只从司马懿接受曹丕托孤讲起。曹丕短命，去世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比被他废掉的汉献帝死得还早。

如果他能再多活个三十年，像司马懿一样活到七十多岁，那天下也就没有司马家什么事了，还有可能成就圣君贤相的一段佳话。但是曹丕壮年去世，幼主继位，便需要托孤，曹丕留下了四个顾命大臣，分别是曹真、司马懿、陈群、曹休。

为什么是这四个人呢？这个人事安排是很有学问的。

曹真、曹休是曹氏宗亲，司马懿和陈群则是魏国功臣。托孤的技巧在于，首先要把政权的根本命脉——军权，放在皇室宗亲的手里，免得被外姓人家把天下给搞走了，所以安排了曹真和曹休这两个宗亲。

但是除了宗亲，也要用特别能干的功臣，来制衡宗亲。一方面可以让这些有才干的人主管文官系统，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可以压制住宗亲们别的想法，免得这些人想要自己当个皇上爽一把。曹丕安排司马懿和陈群这两个功臣做顾命大臣，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所以，咱们在《军师联盟》这部剧里面，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一直能看到司马懿和曹真的斗争关系，是真实的，虽然具体的斗争过程和剧里演的可能不一样。

这样一种斗争性的人事结构，其实都是皇帝刻意安排出来的，这样他才能居间操控全局，立于不败之地。

老皇帝通过托孤安顿身后事，但是顾命大臣往往权利太大，以至于和新皇帝之间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古往今来的顾命大臣，能有好下场的很少，多一半都被杀掉了。

往早了说有李斯，往晚了说有鳌拜；而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也不是《三国演义》小说里写的那么和谐，实际上双方各种提防。

再说司马懿，他居然顺利活下来了，这是因为被托孤的新皇帝曹

叡，登基时已经二十多岁了，并且相当英明神武，迅速掌握了权力，所以司马懿他们还没来得及对曹叡形成威胁，就已经被曹叡搞定了，这也让君臣能够相安。

司马懿是真长寿，曹真、曹休、陈群都在他前头就死了，甚至连新皇帝曹叡也死在了他前头。曹叡比他爹曹丕还要短命，三十多岁就去世了。这会儿太子曹芳只有八岁，所以曹叡只好再次托孤。

本来曹叡担心太子控制不了司马懿，不打算让他当顾命大臣了，但是多方考虑之后，还是用了司马懿。有了功臣，就还得有个宗室执掌兵权，于是第一代顾命大臣曹真的儿子曹爽，又当上了大将军。

高平陵之变

虽然曹叡继承了曹丕的托孤策略，让功臣和宗室相制衡，但无奈曹爽实在是太草包了，只迷恋于权力的外观，并不真正懂得权力的实质。

他没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安全，只有两种策略。

要么是坚决不动别人的奶酪，尊重其他人的权力范围，这样才能换得别人也愿意尊重自己的权力范围；要么是，动别人的奶酪，那就得把坏事做绝，绝对不能让对方留有任何还手的机会。

但是，曹爽这草包几乎把所有人的奶酪都给动了一遍，却又给每个人都留下了还手的机会，这就逐渐把大家都给推挤到了同一个阵营。

曹爽逼着垂帘听政的郭太后跟皇帝分开，以便独自掌控小皇上；他扶植各种跟自己私人关系好的人，排斥朝堂重臣，并且通过一系列人事调动，让自己的亲弟弟全面掌握了宫廷禁军。

他又极力排除司马懿在实际政治中的影响，在司马懿的嫡系陕西关中部队里，安插自己人进去，试图瓦解掉司马懿的军权。司马懿这老狐

狸哪里会坐着等死啊，他就跟曹爽做了个交换，让自己的大儿子司马师掌管了宫廷禁军当中的一支。

这样，曹爽往司马懿阵营插了一脚，司马懿也往曹爽的阵营里面也插了一脚。

后来的历史表明，曹爽做的这个交换是致命的。关于这段历史，复旦大学仇鹿鸣老师的研究很值得一读。

曹爽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大家都忍了他很久，这也就给了司马懿以私下串联的机会。司马懿又假装中风，病得快死了，把曹爽也完全给蒙住了。曹爽觉得自己已经大权在握，没有任何人敢跟自己竞争了，就带着掌管禁军的亲弟弟和皇上一块儿外出到高平陵祭祖。

司马懿探听清楚曹爽的力量全部在首都洛阳之外，马上从床上一跃而起，带领豢养的几千死士，再加上司马师掌握的部分禁军，迅速控制了皇宫。

而宫里的郭太后也早想报复曹爽了，她半是主动配合司马懿、半是被挟持，司马懿就奉太后之名，下诏要废除曹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之变。](#)

其他的重臣们多一半都等着这一天呢。到了这会儿，曹爽的草包本性更深地暴露出来。

司马家族的事业急剧上升

这也轮到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家族，桓氏家族登场了。

当时朝廷上有个支持曹爽的人，叫做桓范，官拜大司农。桓范早就告诫曹爽，认为曹爽和兄弟们掌握朝政和禁军，不要一同出城，免得被人关闭城门，在城里搞动作；曹爽不听，终于出事了。

桓范听说了司马懿的动作，马上矫诏骗开城门，跑到曹爽在城南的军营里。司马懿这边有人听说桓范跑出去了，担心曹爽会用桓范的计策绝地反击。司马懿则对曹爽的草包性格太有把握了，冷静地说，“桓范的计策，曹爽肯定不会用。”

桓范出的什么计策呢？很简单，你司马懿是矫诏太后的名义废除曹爽，但皇上可是在曹爽大营里呢。手里有皇上还怕什么呀？这可比太后更正当。

所以曹爽应该带着皇上逃到故都邺城，然后以皇上的名义发诏，征集天下兵马剿灭司马懿的叛乱。司马懿现在实际控制的就是洛阳一座孤城，他可用的兵都远在关中，远水不解近渴，所以曹爽肯定能获胜。而且我桓范是大司农啊，我手上有印信，以此可以调集天下粮草，可以支持大军作战，几天就能灭掉司马懿。

按说桓范这计策绝对有效，可是曹爽兄弟不肯听，反倒接受了司马懿派来的人的劝说，愿意交出兵权，从此以后老老实实，做个富家翁就算了。桓范要气疯了，痛骂道，“曹子丹英雄一世，怎么生出你们这么五六头猪出来，连累得我如今要跟着你被灭门了。”

最后桓范只得硬着头皮，跟随曹爽兄弟回到洛阳城。之后没有多久曹爽兄弟就被司马懿杀掉了，桓范也被诛灭了三族。

司马家族从此进入了急剧上升期，架空了曹魏皇帝，并最终篡权建立西晋。桓氏家族的血是司马懿成功的垫脚石。

没想到的是，桓范的儿子中有一个逃脱了法网，隐姓埋名，以低微的身份在东晋政权中谋生。桓家这家人还是非常能干，逐渐又崛起了，到桓范的玄孙一代，叫做桓温，位极人臣，差一点就能篡掉司马家的皇位；桓温的儿子桓玄最终完成了篡位工作，虽然很快又被人推翻，但东晋之后也还是很快就亡掉了。

桓氏家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居然鬼使神差地实现了复仇，亲手将司马家族的事业送上终点。冥冥之中，似乎有天意。

诸葛家族和司马家族的恩怨

说完了曹家和桓家，接下来再说说司马家族和诸葛家族的恩怨。

不过这里要说的不仅仅是诸葛亮。诸葛家族是三国时期最狡兔三窟的家族。诸葛亮在蜀汉，他亲哥哥诸葛瑾在东吴，都身居高位，他们还有个堂兄弟诸葛诞，在魏国任征东大将军，相当于大军区司令，也不是等闲之辈。司马家族和诸葛这三家都有复杂的恩怨关系。

你最熟悉的肯定是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争斗历史。这个争斗对司马懿非常重要。他几次被曹魏贬黜，但是随即就会有诸葛亮北伐，司马懿便又被起用。

正是跟诸葛亮争斗的这个过程，让司马懿在关中地区培植了自己的军事势力，这是后来司马懿能够成事的关键之一。

可以说，正是诸葛亮，开启了司马家族攀向事业最高峰的道路。

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过了两年多去世了，长子司马师继承了他的位子把持朝政。司马师没有太多战功，人心不稳。

这会儿诸葛亮已经去世多年，蜀国疲弱不堪，而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当上了东吴的宰相，诸葛恪又来攻打曹魏，司马师苦战之后击败了诸葛恪，稳固了自己的位子。

于是，在司马家族的第二代继续攀登权力顶峰的道路上，诸葛家族的第二代又给垫了一块石头。

又过了没多久，司马师也病死了。司马昭再继承哥哥的位子，他的战功还不如哥哥，人心又开始不稳。

诸葛家族第三位垫石头的人又来了。魏国的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发动叛乱，并向东吴求援。司马昭经历苦战，打败了诸葛诞，稳固了自己的位子。

之后司马昭之心日渐显露，但他还是觉得功劳不够大，没有篡夺皇位的基础。于是，在众人的反对声中，司马昭毅然决定要派钟会去攻灭蜀汉，一旦这个事情能够做成，那么自己有了超级军功，就可以取代曹魏自立为帝了。

魏军出奇兵攻至成都城下，诸葛亮的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率领蜀军最后精锐都战死在城外，蜀汉就此灭亡。

诸葛家族终于助力司马家族走完了登上皇位的最后一步。

但是，司马昭即将篡位了，却突然也病死了。之后是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他的位子，并最终篡夺帝位，开创了西晋。

本讲小结

司马家族就此走上了事业的最巅峰，但一个巨大的风险也就此埋下了。

从司马师到司马昭再到司马炎，这个继承关系里埋着一系列复杂的连环套关系，导致各种得位不正的问题，这是西晋皇室即将跳入的巨大陷阱。

正是这个陷阱让司马家族的事业从急速攀升走向了断崖式下跌，导致这个下跌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

但是客观说，司马家族的事业下跌，并不是仅仅因为得位不正，还因为一些谁也拗不过的时代大势。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精选留言

晏萌

原来诸葛家族才是司马懿家崛起的重要的“隐性玩家” 真是精彩！所以有时候，敌人不是来灭你的而是来成就你的。内在资源和外在资源，都是那么重要。

换种方式种

听施展老师讲让我联想：司马家族整个篡位史里就是另一个想成大事的家族意外成全了另一个家族。而司马家族最后的快速衰败应该是没有一个良好的官僚制衡体系，司马家族篡位应该只是名义上的篡位。一个新政权接替了另一个旧政权的悲剧。本质上社会士族结构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司马家族最后还是以悲剧收场。

打开的世界

司马懿心机了得，又确实命长，熬到人生最后时刻半被迫地通关升级。曹丕对司马的火箭提拔，让司马懿即使沉浮也尽在高位，格局毕竟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能力评估是原因之一，深层也算是对士族阶层的一种倚重。请问施展老师：曹魏宗亲尽管开始身份不算特别高贵，但是历时4代，文武兼备，时间也有几十年，完全有时间通过与士族联姻等方式扩充宗族影响，引入助力。为何却感觉其宗族实力始终相对孤立，外延不足？

吴孟晟

想请问施展老师，关于高平陵之变，桓范的计策，曹爽不用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何他要乖乖的束手就擒阿！难道是怕战胜司马懿的机会太渺茫吗？否则试都不试，就这样白白的交出兵权似乎不太合理。

作者回复

这又涉及到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信念了，士族之间斗争，轻易不会置人死地，只要认怂就行了，胜利者这一边确认认怂者确实无力反抗，一般也会放过。曹爽这边、甚至包括司马懿阵营的一些人，都相信司马懿做事会守住底线的，所以会交出兵权。但是没想到，司马懿不按套路打。不过反过来说，如果换成曹爽是曹操，肯定会采用桓范的计策的，甚至会想出比桓范还狠的计策，这就是人和人的差别，也是我说曹爽是草包的原因。

诗屋爱54566806

今天居然有彩蛋，很惊喜。其实国人对晋朝历史的了解并不深入，

期待施展老师对这段历史的解析，同时也想听听施展老师对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率真洒脱，狂放不羁的“魏晋之风”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做一下解析。

r. a. bob (peixe pāo)

施老师，我关注了您的微信公众号，本来想找有关“八王之乱”的延伸阅读内容，可是没找到，望明示。谢谢！

作者回复

明天发布，敬请期待。

明涛

在整个中国历史中，相比于其它朝代，两晋似乎是被大众知道最少的，但听下来，两晋的故事并不少啊。这是为什么呢？

秋水

看完施展老师的微信公众号里写的“八王之乱”，何止是感慨万千。也让我想起了高希希版的《新三国》的一段情景，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司马懿在江边送别最后的大汉天子，“山阳公”刘协说出一段打油诗：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土后人收。前人收的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貌似在说给收了自己的曹丕，也是在说给收了曹丕的司马氏，更是在说给收了司马家族的一代又一代的屠戮。

时光的味道

看了施展老师微信公众号八王之乱的拓展，继承人的不确定性，会给组织带来极大动荡。这个唐初和宋初都有类似情况，是否只有在其他不确定性的推波助澜下，才得以爆发。晋初，士族为何如此不稳定？假使没有发生八王之乱，想必西晋也会朝着东汉的脉络发展了。

13|司马家族事业的断崖式下跌

司马家族，面临一系列难以抗衡的历史大势，最终天下大乱，中原人口被迫进行了第一次的大规模南迁。有意思的是，这次人口大迁徙，不但没能使中华文明灭亡，反而促使它向南扩张，甚至远播海外。

前面的彩蛋，咱们讲了司马家族的事业如何急速上升，又如何断崖式下跌。彩蛋主要是故事为主，对于更深层的历史机理没有太多分析，这一讲咱们再回到这门课的逻辑上来，分析一下深层的历史机理。

你会看到，西晋末年的天下大乱，不仅仅是司马家族自己的问题，还有一系列难以抗衡的历史大势在背后起作用，最终天下大乱，中原人口被迫进行了第一次的大规模南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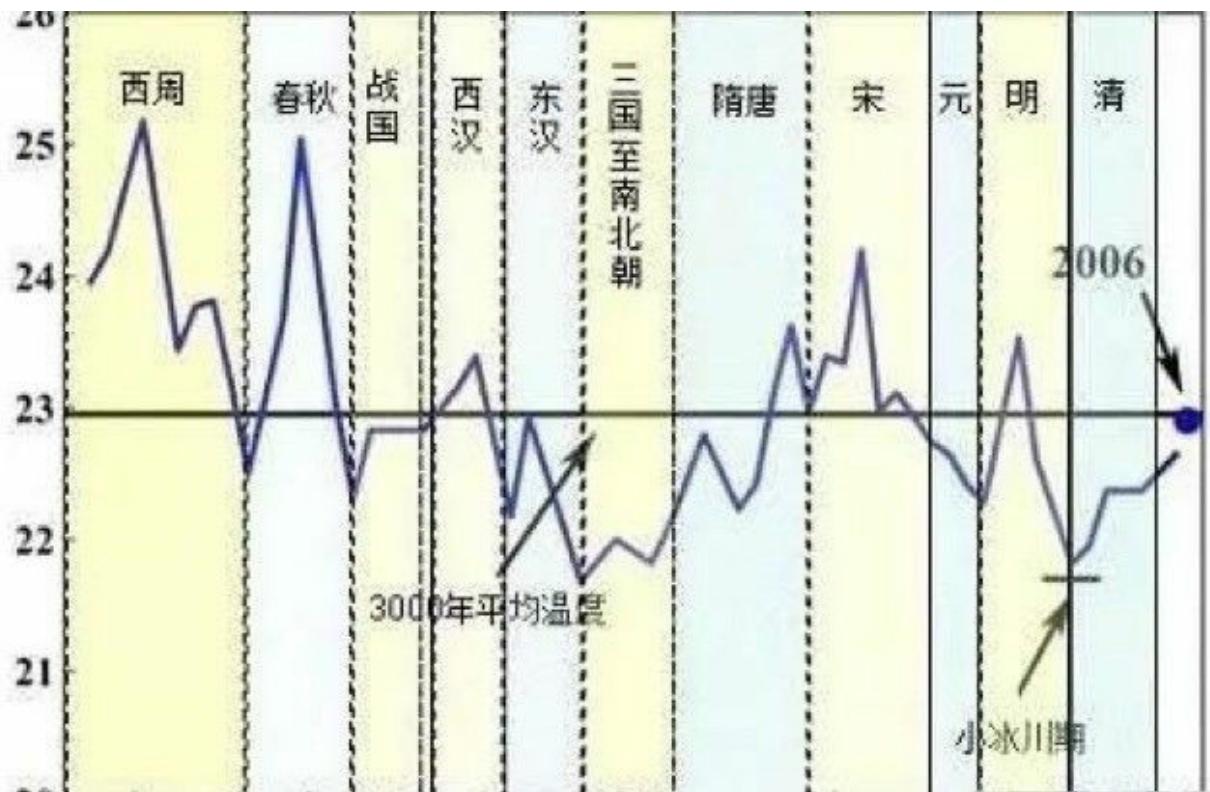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这次人口大迁徙，不但没能使中华文明灭亡，反而促使它向南扩张，甚至远播海外。

司马家族面对的历史大势

咱们先来说说，司马家族所面临的历史大势是什么，这些大势是天下大乱的深层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司马家族就算再牛，也牛不过气候变化去。从东汉中期开始，气温在不断降，到三国魏晋时期降到了最低点。

东汉时期，匈奴早已分裂为南北两支，随着气温降低，草原上的资源越来越少，南匈奴逐渐移居长城以南，其他的一些胡人也陆续迁到这里。迁来的胡人比例不大的时候，帝国还能比较容易地消化他们，当比例大到一定程度，帝国就扛不住了。

另一次气候变化的最低点是什么时候呢？没错，就是明清朝代更替的时候。所以说，改朝换代，气候是一大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中原社会的豪族化，它不断地削弱着帝国政府的能力。

黄巾大起义闹起来后，豪族们为了增强自卫能力，建起了很多坞堡，坞堡就像一个个小城市，大的坞堡里面能有几千户人家。

坞堡内部的经济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不怎么需要和外面的经济交往，整个社会越来越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

这对朝廷来说非常头疼，没有了商品经济，税收就成了大问题，政府没有收入，那还怎么统治啊？这种情况下，朝廷能够支撑下去就不容易了，根本无力对付中原的豪族和边境的胡族。

相反，朝廷还得借助于豪族的力量来维持运转，借助胡族的力量来守护边疆，但这两拨人实在都不可靠。

第三个原因，就是士族的堕落。豪族虽然进化成了士族，却在不断堕落。

到了东汉末年，官方的儒学已经发展得极为精致，经常是儒经里面的一句话，能写出十几万字的注解。但是你把问题说得再精致，还是天下大乱，那说这么多还有什么用？

于是很多人索性抛弃了儒学，开始谈玄论道，这就有了著名的魏晋玄学。有些人觉得无力回天，彻底看透了世间的肮脏，于是返归内心，去寻觅桃花源了，比如陶渊明。

但还有更多的人，在社会动荡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再分配机会。于是他们一边高谈阔论，仿佛出世高人，一边拼命往兜里装钱，还依凭着咱们在前面说到过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捞钱的地位给制度化。这后一种人，大大败坏了政治和社会的道德水准，士族变得相当虚伪。

第四个原因就是西晋皇族的内斗，也就是“八王之乱”。

前几个原因都是外因，还得有司马家的神助攻，才让天下真地大乱起来。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之后，眼看着高门士族垄断着朝野，皇帝却没有足够多的资源能够压制住士族们。

晋武帝曾经问他的一位大臣，你看我像历史上哪位皇帝呢？这位大臣说，我看您就像汉桓帝、汉灵帝。这可是两个著名的昏君。大臣不客气地说，桓、灵两位皇帝，卖了官，钱还进入国库，陛下您卖了官，钱揣自个儿兜里了，照这么看，您还不如那两位呢。晋武帝哈哈大笑说，那两位的朝廷上可听不到这种忠言，可见我还是比他们俩们强！

这故事里反映出两点，第一，朝廷真是缺钱啊，缺到晋武帝也不顾吃相了，第二，皇上拿士族大臣们真是没辙啊，所以大臣们什么都敢说。

与士族共治的东晋政权

于是，晋武帝就大肆分封同姓诸王，力图让他们驻守在全国各地，以便压制不服的士族，拱卫朝廷。结果就造成了“八王之乱”。

这帮姓司马的家伙彼此间打得头破血流，打输了的就想着找帮手来继续。帮手在哪呢？一看，旁边有一帮蛮族。他们想，这些蛮族都不是汉人，肯定不会跟我争皇位，先用他们一把再说。可是，谁告诉你，蛮族会老老实实被你使唤的？司马家族的各种神助攻，终于让天下不可收拾了。

人们一定还会给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提出更多的原因，但咱们说了这四条也就差不多了，不再多说了。

天下大乱了怎么办呢？往蛮族少的地方跑吧。于是大量的士族，带着其治下的百姓，向南逃往淮河和长江流域。皇族的大支们多半死于动乱，反倒是一个小支，司马睿，在南逃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

东晋就是在士族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晋的皇帝比起西晋，就更需要与士族合作。甚至司马睿在登基时，极力要拉着南逃过来的士族的领袖王导，与其一起接受群臣朝拜，当时人们有句话描述，叫做“王与马，共天下”。

士族们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拥戴权力有限的司马氏为共主，建立了这个共识，就放手分割权力。

士族本身并没有能力抵御北方胡族的继续南侵，需要把南逃过来的流民编成军队，作为国防倚仗。但是士族也分高下，高等士族是在朝廷中当权、制衡皇帝的豪门大族，比如前面说的王导家族。低等士族则统领流民军队。这样，政权与军权就分离了，这构成了一个动荡来源，也造成了东晋的最终覆灭。

高等士族里面很多人开始更加玄乎地谈玄论道，甚至开始追求各种病态美，要把自己塑造出一种弱柳扶风的感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与任何体力粗活无关，才是有地位的人，才能把自己和其他的人、包括低等士族区分开。

可是这样一群人把持着朝政，如何能指望低等士族的人甘心啊？甚至高等士族内部，也不断地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要搞些大新闻出来，时不时地就叛乱一把。

掌握着军权的低等士族，终于忍受不了这一切了。咱们在前面讲过，在东晋立国百年之后，桓家的后人桓玄篡夺了东晋的皇位，给自己的祖先报了仇。

但是桓玄随即被统领军队的低等士族赶下来。最终，军队的领袖刘裕，依凭军功，逼迫司马氏把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刘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到南朝。

南朝皇帝的正统性困境

南朝的政权和军权的重合度，比东晋要强。

但是皇帝们的正统性有问题，不能令人信服。司马家的正统性虽然也不怎么样，但好歹已经统治了一百好几十年了，大家习惯成自然。

南朝的这些新皇帝们，刚刚上台，人们可还没有习惯成自然呢，再加上他们的出身又不够高，于是引得无数野心家跃跃欲试。

对南朝皇帝来说，他们还面临着意识形态上的问题。随着北朝逐渐稳定下来，南朝在武力上越来越不是北朝的对手，南朝就只能通过坚持儒家理念强化自己的正朔地位，说我才是中原正统，占据北方的不过是蛮夷。

可问题是，南朝皇帝们自己也不过是篡位上来的，越坚持儒家的理念，就越放大了自己的正统性缺失。

这是个两难困境，皇上们非常难办。如果皇上们手上掌握着很多资源，能碾压任何野心家，那么他们也不会害怕。问题是，坞堡经济还是

主要的经济形式，资源都掌握在豪族手里，皇帝家里还是没多少余粮。

结果，南朝始终处在严重的不稳定当中，皇位乃至朝代都跑马灯似地变换着。

这段历史非常糟心。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视角再来看看东晋和南朝，却能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价值出来。

江南土地的开发

今天我们一说到中国的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方，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江南，以及岭南。

但是在宋朝以前的历史上，江南人口一直是远远比中原地区要稀疏的，岭南就更不用说了。人口稀少，无力进行开发，经济上自然也就不值一提。

汉武帝曾经出兵攻灭江南和福建一带的土著政权，但是打赢了之后就把当地人口迁徙到了江淮之间，放弃了新征服的土地，可见汉朝时的江南、岭南多么无足轻重。

这是因为，中原地区的黄土地带，开发难度远远低于江南。长江中下游流域，气候湿热、水网纵横，要在这里进行农耕，首先要排除沼泽地区与湖泊中多余的积水，比开发黄河流域难得多。

除非江南的人口大幅增长，否则不可能有效开发这里。而且，中原地区又不是住不下了，谁会愿意费力不讨好，向江南地区迁移呢？

别忙，到了西晋末年，蛮族来了，中原百姓自然就迁移了。经过北方的若干次战乱驱赶，长江中下游平原就被开发出来了。这里潜力巨大，一旦开发出来，迅速成为帝国的经济重心。西晋末年这一次，正是中原百姓大迁移的第一次。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现象，每一次北方游牧者大规模南下，都会伴随着中原人大规模南迁，也就带来了帝国对于南方土地开发的大规模深入，儒家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传到了过去根本传不过去的土著地区。

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在南朝的时候，中华文化不仅仅是传播到了长江以南的土著地区，甚至跨海传向中国土地之外。

南朝的皇帝们发现自己无法与北朝在军事上竞争，于是就在文化上竞争。原本在中原已经很精致的文化，在南朝发展得更加精致。

同时，为了防止过度强调儒家正统性反而伤及自己，南朝的皇帝们又大力支持佛教。南朝的艺术和文化，都发展到很高水准。为了让更多的人承认自己的正统性，南朝便通过海上向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传播文化。

到了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东亚世界发展出了更宏大的结构。也就是草原-中原-海洋，共同构成了三重结构的世界。东亚的历史开始联动发展。

草原和中原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成为秩序的生成线。也就是说，新的秩序，是在草原和中原的过渡地带生长起来的，这个新秩序的载体就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鲜卑人出身于东北和长城沿线，能同时调动草原和中原的资源。

而这个时期，中原和海洋的关系，是秩序的传播线，载体就是南朝。南朝之所以有动力向外传播文化，正是因为北方的压力。

可以发现，每一次北族的南侵过程，给中原带来了血腥与混乱，却也让中华世界向更大规模扩展。鲜血从来不是白白流淌的，历史就在这

种血光与勇气当中，缓慢而坚定地向前发展。I

今日小结

西晋的灭亡，是受制于一些无力改变的历史大势，比如气候变迁、中原的豪族化、士族的堕落等等一系列原因。这些原因使得，有生命力的新秩序，已经不能指望过去的这些中原士族了。

南北朝的对峙，则使得南朝方向不断努力向外传播文化，以便跟北朝进行正统性的竞争。中华世界就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为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宏大结构。

未来中国秩序的重整，南朝那边已经指望不上了。咱们就来看看北朝这边究竟是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这就是下两讲我们会聊的内容。

。

精选留言

一轮明月满乾坤

南北朝的对峙，则使得南朝方向不断努力向外传播文化，以便跟北朝进行正统性的竞争。这句我有两个疑问，一南北对峙位什么会刺激南朝对外传播文化，对外寻求军事帮助，或者贸易增加税收。可以理解。二为什么老师那么强调正统性，这东西虚幻着，有那么重要吗？正统性北朝外族谈不上，不也生根发芽吗。

作者回复

正统性看似虚幻，实际上最有力量了。真正可持续的统治，必须降低自己的统治成本，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降低成本呢？让大家都自愿服从你。大家凭什么自愿服从你呢？除非你有正统性。谁说北朝不谈正统性的，过去的历史书里不怎么讨论这问题而已。到后面几讲你就知道了，北朝对于正统性的论证，有多么大的脑洞，又是如何

催生了隋唐大帝国。

王黎璐

北朝前期靠草原胡人势力，后期果断汉化。汉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感是逐步上升的，不会再产生大批汉人流亡南方，为南朝政府做炮灰抵抗北魏的事了。从这个变化来说，南朝最可靠的兵力来源，就没有了。然而不论是搞皮毛汉化的北魏，还是崇佛的南朝，虽然在拉拢豪强士族的认同感上都下了苦功夫。然而最终还是获得了庶族认同感的北周北齐崛起强大，获得了士族和庶族共同认同的隋唐最终统一了天下。

作者回复

北魏后期果断汉化，才带来了北魏更大的麻烦，这是咱们历史书里基本不说的。后面两讲就是谈论这个问题的，到那时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吧

佛祖门徒

今天的课不仅再一次展现了草原对中原文明塑造的深刻影响，而且，海洋这个坐标也引入了文明进程，历史越来越精彩了。拜读了老师的《腹黑不见底的八王之乱》一文，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泯灭了亲情、人性，司马懿用一辈子的算计给后人带来的只不过是灾难并非富贵。结合今天的课，不禁想到如果没有“八王之乱”，中原文明又是怎样一番景象？被气候所迫的草原部落如果面对的是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原帝国又该何去何从？

肖亮

“南朝的皇帝们发现自己无法与北朝在军事上竞争，于是就在文化上竞争。原本在中原已经很精致的文化，在南朝发展得更加精致。同时，为了防止过度强调儒家正统性反而伤及自己，南朝的皇帝们又大力支持佛教。”老师我没有读懂这里的两处逻辑～：为什么无法再军事上竞争，最后会选择在文化上经营？为什么不能过度强调儒家，最终会选择佛教？

作者回复

五胡时期北方局势未定，等到北魏把局势安定下来建立北朝，这是游牧者建立起来的军事帝国，南朝在军事上就不是北朝对手了。既

然打不过，咋样还能让人对自己有认同呢？除非南朝能想办法证明自己比北朝更有正统性，证明文化的血脉在自己这一边，所以南朝会大力发展文化。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儒家文化，又有个问题，在于儒家最恨乱臣贼子，而南朝多半都是篡位上台，都是乱臣贼子，于是过度强调儒家反倒会让南朝伤及自身，所以要用其他的文化来稀释掉儒家对自己的负面效应。

卢笛

士族建立的坞堡很像欧洲一个个的城邦，既然士族们有地，有钱，有军队，为什么还要推举一个天下共主，自己割据一方不就可以了

作者回复

大的坞堡确实就是准割据状态。但是要想事情做得长久，最重要的是要有个名分，没有名分，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反对你，有了名分，反对你的人自然就成了叛乱。天下共主就是用来给士族提供这个名分的。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如此重视正统性的原因。正统性就是名分的基础。

14|五胡乱华的血泪与梦想

五胡十六国时期，不同的政权都对胡人和汉人的关系作了不同处理，并不是简单地就是要欺负汉人。根据他们对胡汉关系的处理方式，可以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昨天聊了东晋和南朝的历史，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北边的历史。

北边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一是著名的五胡乱华的阶段；一是北魏建立了稳定统治的大帝国之后的阶段，后面这段被称作北朝。

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大唐盛世，正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今天咱们先集中讲讲五胡乱华。过去，我们在对这段历史的讲述中，往往会强调，这是游牧民族带给汉民族的灾难，说这是中原的陷落。

但是，如果我们展开讲讲这个时期的历史。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结论。

五胡乱华的三个阶段

实际上，五胡十六国时期，不同的政权都对胡人和汉人的关系作了不同处理，并不是简单地就是要欺负汉人。

根据他们对胡汉关系的处理方式，可以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胡人本位”，也就是胡人第一，胡人欺负汉人；

第二阶段是胡人政权开始意识到问题，于是尝试融合胡人和汉人。但是由于步骤没走对，没有取得成功，这也就是胡人混一胡汉的不成功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混一胡汉的成功阶段，最后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一个混一胡汉的二元帝国，实现了胡人和汉人的融合。这也是后来唐朝发展起来的基础之一。

既然都说“五胡乱华”，那么先得说说这些胡族是怎么来的？

前面我们谈到，匈奴在西汉末期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开始移居长城以南的边境地区。到后来，气候变迁，天气越来越冷，草原上没得吃，更多的胡族迁移了过来，他们主要在大汉帝国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和汉人一起混居。

从东汉开始，直到西晋，中原王朝一直利用这些胡人防御北部边境。

这些胡人在中原的地位非常低下，遭受歧视和欺负，早就不满了。终于，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司马家族内部自相残杀得不亦乐乎，胡人们趁乱而起，天下就此变成了一锅粥。

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五胡乱华过程中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了，有可能你对他们的名字都不熟悉，我会仔细一点来讲。

胡人刘渊：兴复汉室

第一个起事的胡人，是南匈奴的首领，叫做刘渊。

刘渊这个人很重要，他开启了五胡乱华的时代。虽然刘渊他是个胡人，但是他起事的名义却是要兴复汉室。为什么他会用这个名义呢？

因为刘渊是汉朝与匈奴和亲的公主所生的后代，他的身份虽然是胡人，却自认为是汉朝的外甥，由于曾经长期在西晋当人质，也精通汉文化，所以他起兵的口号就是，晋朝窃取了大汉朝的天下，我这个外甥得替汉朝报仇，他声称要向刘备学习，兴复汉室。

刘渊显然意识到，要成大事，必须能够整合汉人。这个大思路是对的，但是，兴复汉室这口号很难给他带来帮助。

因为站在当时汉人的角度，真要兴复汉室的话，轮得到刘渊你这个胡人吗？所以汉人不会真正支持他。

反过来，刘渊天天喊着兴复汉室，让别的胡人兄弟们怎么想？你成功了的话，到底是个汉人国家还是胡人国家？如果是汉人国家的话，胡人还是要被欺负，那胡人为啥要支持你？

所以，刘渊这个听上去似乎有号召力的战略，实际上却是两边不讨好。

刘渊的做法，也揭示了北方胡人政权的战略困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究竟如何处理胡汉关系？

胡人本位阶段

刚才我们说，按对胡汉关系的不同处理，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胡人本位阶段。在刘渊兴复汉室的努力失败之后，就进入到了胡人本位阶段。

胡人发现刘渊的策略不行，两边不讨好，就觉得还不如战略简单点，索性放弃整合汉人的努力，反过来欺负汉人得了，这样至少能把胡人都整合起来。

所以刘渊的后继者也不扯什么兴复汉室了，直接赤裸裸地说了，我

这就是胡人国家，汉人在这就是得被统治，被奴役。

对于胡人来说，这个策略无论如何都比刘渊那个靠谱。虽然很多汉人南逃了，但中原地区的胡人人口仍然只占少数，必须要先把胡人团结起来才能维持统治。所以，还是胡人第一，先把自己人都拢住再说。

但是，这些胡人本位的国家，统治水准太烂，中原百姓本来已经接受他们的统治了，他们却还经常要来抢一抢，和土匪差不多，完全没拿这些百姓当自己的臣民，这种统治是不可能持续得下去的。

终于，出来一位汉族领袖冉闵，他本来是个胡人皇帝的养子，但遭遇一系列歧视之后，一气之下推翻了胡人朝廷，自立为天王，颁出了有名的“杀胡令”，命令对于境内所有高鼻深目多须的胡人都杀无赦，一时间血流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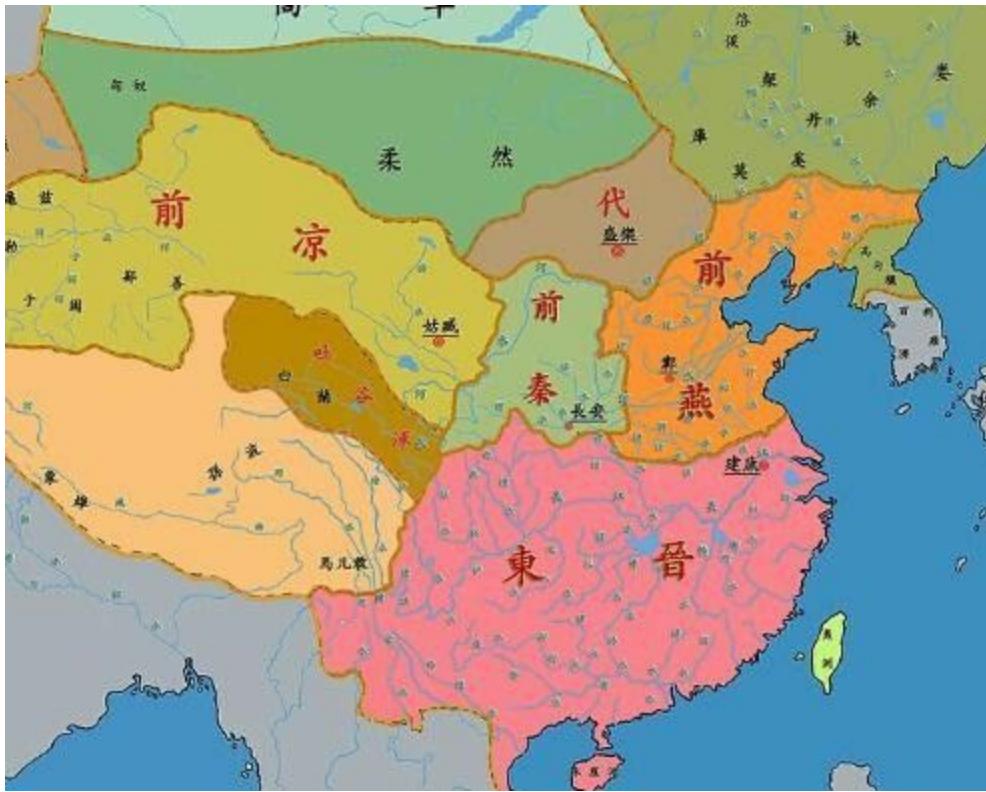
胡人虽然还是少数，但想要把他们全都杀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政策基本上就是胡人本位正好翻了个个儿，太过于暴虐，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成功的统治政策，必须能把国内的各种力量都整合起来，共同对付外部的敌人。无论是压迫汉人、还是屠杀胡人，都是把敌人设置在了国家的内部。对内不能整合，对外无法抵抗，怎么能搞得下去呢？

虽然冉闵的战斗力不下于项羽，但还是很快就败在了来自东北的慕容氏之手。

混一胡汉的不成功阶段

在冉闵暴虐的统治失败之后，就进入了五胡十六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努力混一胡汉却不成功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领袖是前秦的苻坚。



苻坚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呢？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以弱胜强，强的那一方，就是苻坚。

虽然输了淝水之战，但不要以为苻坚就是个笨蛋。苻坚绝对是个明君英主，只不过他在几个重要的策略上，把步骤走反了，导致满盘皆输。

为啥说苻坚是个英主呢？因为他清晰地意识到，胡汉对立的统治模式，注定会失败，要真正想成就大业，必须消除胡汉差异，打碎各种胡人汉人的小共同体认同，才能建立统一的国家。

但是，苻坚虽然意识到了问题，却没找对方法。他想打碎小共同体，于是就先从自己所属的氐族开始。因为他想，如果不能先摆脱自己的氐族身份，那也就没法让别人摆脱胡人身份、汉人身份的约束，也就没法混一胡汉、实现统一大业了。

于是，苻坚重用汉人王猛为宰相，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有氐族老将非常仇视王猛，与其发生口角，苻坚发火大骂，说“必须杀掉这个

氐族老东西，大家才懂得守规矩”。

除了重用汉人，苻坚也重用胡族的力量。他意识到，要想保持帝国的军事战斗力，还是必须依靠胡族。

既然氐族已经被自己消解掉了，就要广招天下英雄。苻坚对各种投奔而来的胡族英雄，都收留并重用。这种态度极为得人心，他很快就统一了大半个中国。

但这个策略埋藏着很大的风险。当时，有个鲜卑大英雄慕容垂，刚才我们说打败冉闵的，就是慕容垂他们家人。慕容垂因为本国前燕发生内乱，被迫来投奔前秦。

宰相王猛一眼就看出慕容垂绝非池中之物，劝苻坚及早干掉他。苻坚却说，“我正要以诚来招募天下英雄，慕容垂落难来投，我却杀了他，让别人怎么看我”。结果，不仅没有除掉慕容垂，反倒让慕容垂带领鲜卑部落军，镇守重地。

结果，当苻坚在淝水之战战败后，前秦的兵力损失惨重。又过了一段时间，慕容垂起兵反秦，兴复大燕，一下就让苻坚的前秦彻底瓦解了。

苻坚的失败，在于他太想超越于胡汉之上，成为天下的共主了。他的意图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很可惜，他把政治步骤走错了。

在打造起真正的统一帝国之前，苻坚就先放弃了自己的老根据地氐族，他怕氐族不服，甚至保留鲜卑军事贵族，来对抗自己的氐族。结果是，其他胡族的军事共同体仍然很强大，苻坚的自家军队却涣散掉了。

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家出点问题，苻坚肯定罩不住局面，国家只能四分五裂。

我们再来看看刚才那个鲜卑大英雄慕容垂。对慕容垂来说，他不认为自己起兵反秦是反叛，因为在投奔苻坚之后，苻坚又灭掉了前燕。

对慕容垂来说，自己起兵反秦这是复国，是要兴复慕容氏的大燕国。于是，慕容垂自称燕王。这一段，历史上称为“后燕”。

混一胡汉的成功阶段

在慕容垂起兵反秦之后，即将进入五胡十六国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成功实现了混一胡汉、建立二元帝国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除了燕国的慕容垂，还有一个鲜卑人叫拓跋珪，这两个人可以被称为鲜卑人的绝代双骄。他们终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摸到了成功的门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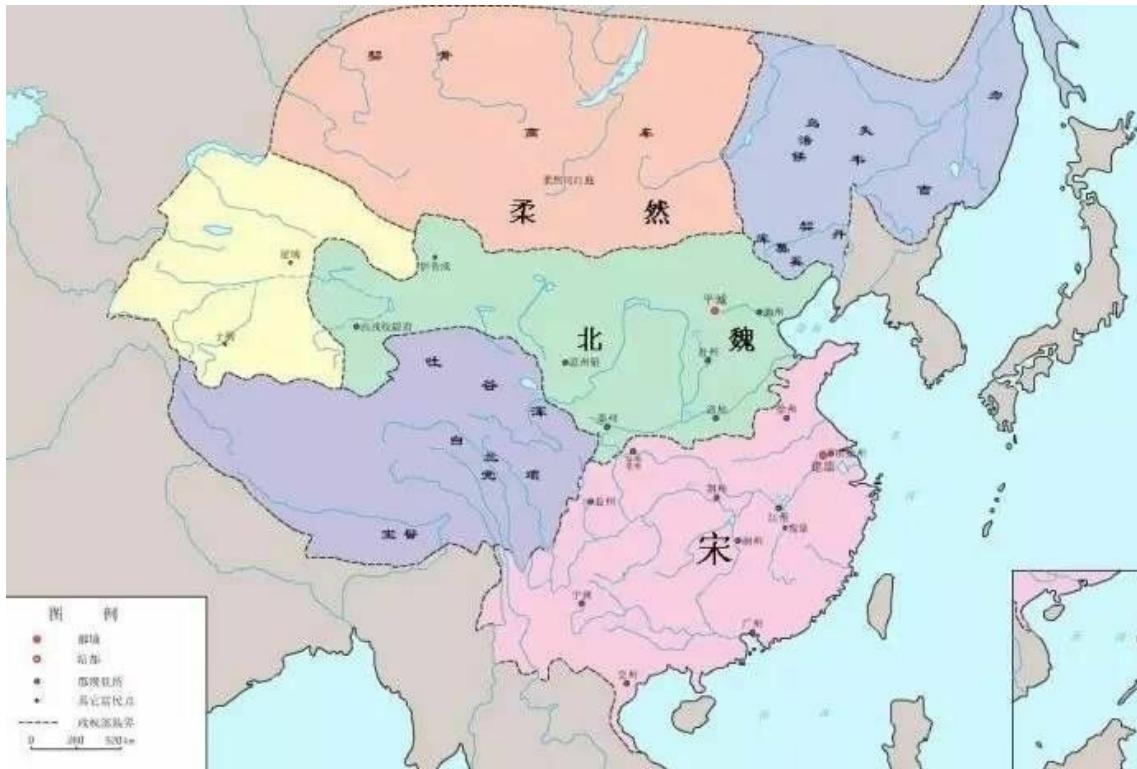
慕容与拓跋两家有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来自中原与草原的过渡地带。慕容氏起家于东北，拓跋氏起家于山西北部的长城沿线地区。

在过渡地带起家的人，必须既懂得草原的逻辑，也懂得中原的逻辑。只懂得一边的逻辑，就肯定站不住脚。所以他们两家都能够建立起胡人汉人相融合的二元政权。

来自东北的慕容氏建立的前燕，率先实现了对草原力量和中原力量的整合。前燕因此发展得不错，后来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冉闵。冉闵，就是一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战斗力爆表的汉人。

打败冉闵之后，前燕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于是就打算入关玩个大的，不巧碰上了正如日中天的前秦苻坚，于是就被灭国了。这也就有了刚才说的慕容垂起兵，兴复大燕国的事情了。

但最终，慕容氏兴复大燕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他败给了真正统一北方江山的英雄，就是建立起北魏的拓跋珪。



拓跋氏真正地建立了持续统治北方的大帝国北魏。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和苻坚一样，都琢磨着要混一胡汉。但是又和苻坚不一样，他把步骤走对了。

咱们之前谈到过，草原上的部落小可汗们都是军事贵族，他们对大汗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大汗只有把这帮人都摆平，才能说了算。

但大汗要想摆平他们，又必须能够在中原获取足够多的财富，才能用钱把这些军事贵族赎买掉。

于是，拓跋珪先是带领人马扫平了草原上其它部落，再南下进入中原，把慕容家在各个地方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三四个燕国，又挨个灭掉，完全不考虑慕容家的感受。

北魏的制度安排

在南下夺取了中原的财富之后，拓跋珪的实力壮大了，于是他推行了一个重要政策，叫“离散部落”，就是把部落这种小共同体打碎。就这样，拓跋珪同时离散了他统治下的拓跋氏部落，和其他胡人的部落。

但拓跋珪也没有把鲜卑部落制彻底毁掉，因为部落制同时是游牧者的军事编制，是其战斗力的来源。

拓跋珪采用了一种新的制度，他已经把他给离散掉的鲜卑各族，重新编为八部，设立了八部大人来统领他们。

在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下，拓跋珪打碎了原来的部落制，同时又建立了自己能控制的新部落制。

这样既不受军事贵族的约束，又能保证草原骑兵的战斗力。这种制度后来演化为隋唐的柱国大将军制度。

北朝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就初步成型了，这不是秦皇汉武所统治的那种散沙状社会。因为，八部大人及其下属军官都还是军事贵族，虽然不如早年前的部落小可汗那么有独立性了，但还是有着特殊地位。

在这些军事贵族身上，全然看不见魏晋士族那种浮夸衰朽的风气，他们都是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有着鲜活的激情与勇气。那些没有南渡的中原士族，在鲜卑人的影响下，也摆脱了过去士族那种衰败虚伪的面貌，逐渐进入到北朝的统治机构中。

北魏帝国混一胡汉，实现了汉人和胡人的融合。这种超越于中原-草原之上的努力，终于将北魏转化为一个二元帝国，皇帝居于各方之上，作为均衡力量，代表着帝国的统一。

这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造。

今日小结

这一讲我们看到，五胡乱华到北魏时期的北方，如何历经波折，最终建立了胡汉混一的二元帝国。

接下来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应该就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了。

过去的历史叙述，一般都在谈魏孝文帝的南迁如何促成了民族融合。但是从来没讲过，北魏在魏孝文帝去世后不久，就亡国了。

这里面蕴含着关于二元帝国更加深刻的政治奥秘，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 精选留言 ——

懒妈妈

任何统治想要长久维系，必定要使内部的各方力量达到一种制衡的状态，不能把一部分的被统治者作为其他被统治者的敌人。一个智慧的领袖不会通过售卖仇恨来煽动人民，更不会因为种族、肤色、地位的差距而将统治区内的一部分人视做敌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失败就是如此。历史真的是一面镜子啊！

| 作者回复

握手！握手！

佛祖门徒

胡人成功建立一个统一帝国的基本条件：长期生活在胡汉中间地带，深谙两边文化的精髓，深知唯有整合而不是对立两方力量才是正力|道。正确战略路线：首先，稳固大后方，收复草原各股势力，破除原有结构，建立更易管理指挥的新体制；然后，文臣重用汉人、武将重用草原骑兵，逐步向南拓展，并将所征服之地的民众归化到统一的政治体制之下；最后，建立起一个平衡状态的二元政权。

银

这是对五胡乱华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但是网上对这段写得非常冗长。老师把这一段非常有逻辑的介绍了进程，实在是受益匪浅。之前知道冉闵这个人物，但不知道他居然有项羽一样的战力。之前也

了解符坚这个人物，但没人想过他居然是个明主。慕容复一直想光复大燕，也终于看清了他的势力和版图。这一段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含糊，不被了解的历史，顿时有了一层逻辑线索。是中国历史上长城南北，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BaGina蜀南

看到今天的文章，不禁想起了陈寅恪先生所写“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对立的中原、草原文明相互对抗、相互影响直到相互理解与融合，其过程确实充满鲜血与希望。废土狼烟之后孕育出盛唐的鲜花，依旧让中华儿女对拥有大唐这般历史充满自豪感。

作者回复

是的，在今天中国的格局下，如果不能站在一个超越于各族群之上的、更宏大的中国角度来理解历史，而是仍然执着纠缠于胡汉分野，那真是有些说不过去了。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是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由各个族群共同缔造的，我的课程就是要把这样一个过程给完整地呈现出来。

Paladin

一次次的迭代尝试，最终找到了成功的模式，和如今的创业者何其相似，他们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创业者，一旦失败了就是身首异处的下场。

zealotsuper

大师就是可以深入浅出，施老师一篇文章就把五胡乱华时期的脉络梳理清楚了，更重要的是站在混一胡汉的维度来重新看新旧个中变迁，就不会陷入纷繁的具体历史事件不能自拔。越来越精彩了！孝文帝后，汉化的胡人和胡化的汉人是不是结合成了所谓的是关陇贵族集团，看看独孤信就知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灭国的只是皇帝家，对于贵族政治集团来说，只是换了一个代理人。拓跋，宇文，杨，李

FU

基督教的商周之变与豪族化：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但双方有本质的区别，犹太教认为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是天选之民，而基督教将耶稣作为救世主，让他为天下所有人承担罪责，从此成为世界

n下性宗教打下基础，这与商周天命的变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在汉朝开始形成豪族社会，基督教也在欧洲扎根，中国的士族像一个个沙堆，虽有联系但是只是在文化方面认同，反而在武力方面会比较依靠中央，但是基督教有严密的层级，又有最高领导人教皇，因此，可以聚集十分强大的力量，而欧洲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被基督教控制，但中国士族在中国大乱是只能各自想办法。读施老师专栏及《罗马人的故事》有感

作者回复

我再推荐两本书吧，一本叫做《人的宗教》一本叫做《神的历史》，作者都是凯伦·阿姆斯特朗。前一本是把各大主要宗教的教义逻辑和发展简史都讲了一遍，也做了一些比较研究，后一本则是对三大一神教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两本书对于宗教问题的解释比较清晰易读。

老羊

孝文帝的汉化乃汉族之大幸，但乃鲜卑之大不行。这说明二元帝国如果不能两者兼顾，必然会引起一方的不满和反扑，造成国家的动荡不稳，如何掌握这个平衡乃是大学问。

作者回复

是鲜卑之大不幸，就不可能是汉族之大幸。因为只要鲜卑大不幸，那就意味着会天下大乱，汉族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幸呢？在多元共存的格局中，没有哪个群体是孤岛，可以独善其身，必须找到办法共存才行。如何共存呢？打造平衡与相互尊重，这确实是个大学问。

吴孟晨

想请问施展老师，有一段读不太懂，“匈奴在西汉末期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移居长城以南，后来胡族也迁移过来。”所谓南匈奴跟胡人有何区别呢？

作者回复

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五胡。不过这也是概称，当时的人口结构很复杂，并且那会儿的民族概念跟今天也完全不是一回事。

八万

南北朝一直作为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隐痛。教科书都只是简单的提及。从老师的角度看，这段历史，虽然是汉族受难史，却也是再造史。从宏大的角度看到这片大地上文明的演绎逻辑，也再次感受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尺度上看，个人的荣辱沉浮都只是微小事件，甚至个人生死都那么微不足道。只能归类到“羌”字的一员。

作者回复

各个民族都会有苦难，没有哪个民族是轻轻松松一马平川发展起来的。关键是否能为苦难找到意义。找不到意义，苦难只不过是单纯的死亡，找到意义，苦难就会上升为伟大的牺牲，从而实现自我的再造。汉族的苦难与少数民族的苦难，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苦难，无法被割裂开来理解，通过我前面的各种讲述，让大家看！看到各族群之间深刻的相互塑造关系，便可知他们的共性。我们需要找到所有这些苦难背后共同的意义出来，才能将苦难上升为这个民族的自我捏槃，打造出中华民族宏大而又从容的内心世界。

逐浪

从东汉开始，直到西晋，中原王朝一直利用这些胡人防御北部边境。-胡人本身就是中原王朝防御的对象，由于气候变迁，他们逐步南迁，和中原王朝边境的汉人混居，那么此时胡人防御北部边境防御的又是谁呢？

作者回复

胡人有的与中原合作了，有的仍然是对抗关系，就是防御那些对抗的胡人啊。推荐阅读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一书，这书里对于游牧者的各种不同战略选择，有过极为精彩的分析。

击戈而歌

五胡乱华是胡族作为少数民族，对中原+草原的二元文化统治的一场大实验。虽然直到魏孝文帝时达成了一个小成功，却昙花一现。不过，这场大实验却给此后唐朝的统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由此而知，历史是事实的积累，无论这些事实，在当时是对还是错，它们都会成为经验。而康德说：“经验即是知识。”

赵东亮

佛学是从汉朝传入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从北魏孝文帝迁都前的云冈石窟，到迁都后的龙门石窟，风格不同的设计体现了北魏不同时期的文化程度和历史变迁。敦煌始建于汉朝，曾在元朝后被世人所遗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是军事重镇，同时也是佛学的重要思想基地。本人认为，佛教作为心灵的寄托和政治手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实现愿景，超脱世俗，为下辈子好好活的心灵寄托。执政者以此来凝聚人心。为什么北魏还要向往儒家思想呢？难道是因为为了笼络那些士族阶层吗？

作者回复

你要统治汉人，是不可能完全放弃儒家文化不理的。因为文化不仅仅是一套价值观念而已，它还会表现为一整套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任何可持续的政治治理都要顺应现成的社会要理治治|结构和家庭结构才行，否则治理就没有渗入社会的抓手，很难持续。所以，即便统治者想要推崇佛教，也不可能抛弃儒家不理。另一方面也多说一句，理解文化绝不能仅仅只看它的经典在说什么，同时一定还要看到它在社会中具体呈现为什么样的形态，这两个加在一块，才是对于文化的完整理解，否则必定是残缺的，会得出不靠谱的结论。

jimmy

施展老师好，我一直在听您的得到课程。听到目前，有三个问题不明白，特此请教：1、您说春秋之前国家战争是贵族战争，与之后的杀戮程度不同，打法比较象征性，这个就不太明白，具体是怎么打呢？如果不以杀戮对方为主要手段的话。2、您讲到诸葛亮利用孟达这个机会把李延调虎离川，但为啥劝降孟达需要李延离川呢？李延呆在蜀地等着孟达回来以后再看离不离川不行吗？3、您讲到东晋时期，上流豪族把控朝政，下流豪族掌握军权，这个分割给了刘裕崛起的机会，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上流豪族不重视军权控制？控制军权应该是任何有政治头脑的势力都会很重视的事情吧？能否请施老师就上述三个问题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作者回复

1、顺便推荐一下“每天听本书”里面有一讲，讲张宏杰老师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这书的，里面引用过几个春秋时期战争原

则的例子，非常有趣。在那会儿打仗有一系列规矩，比如，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实施偷袭。等等。2、诸葛亮不是调李严离川，而是调他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江津（重庆）。3、东晋上等士族也有掌握军权的，但是比较少；更重要的是，下等士族对于军队是直接管理者，和军人之间有着私人关系，上等士族在这方面的控制力就没法比。

打开的世界

前秦苻坚对外宽容以致纵容养虎为患，对内严苛薄情以致离心离德，没能及时把握住国力上升时期的良好局势，将突然拓展好多倍的领土内多民族矛盾尽快消解。相反，将国力的短期膨胀看做成功的基础，急于对东晋出手，着手统一，导致极短时间内将内外各种矛盾集中触发，超出了承受能力。可以说前秦，前燕的一系列对抗和矛盾释放为北魏的整合奠定了基础，在力量达到新平衡状态时，北魏对领地范围内多民族进行了彻底地重组和制衡，同时又形成强大内核高忠诚度的向心统治力量，避免内部的重新分化瓦解。请教施展老师：在北方政权秩序未能完全建立，分合对抗的过程中，东晋有着较完善的官僚和税收体系，也有相对稳定的政权，那么从实力对比上看，东晋能算是局部最强？如果是为何没有出现东晋远交近攻，或者至少是战略主动的情况，相反一直采取守势？如果否，这反是因为北方骑兵战力压制南方还是南方因自然资源基础不牢，实力无法短期开发凝聚？之前还被压制的胡人武装为何能短期就在乱局下同时应对相对统一的南方政权？印象中，北魏统一后，东晋倒反对北方政权组织了征讨。这是东晋没掌握好节奏，还是南方自身的融合整顿并不比北方轻松？

作者回复

东晋的所谓官僚体系实际上各种士族的共治结构，他们彼此间有着各种相互牵制，很多精力花在了内耗上。确实曾经有人主持过几次成功的北伐，但这些北伐的目的都不是北伐，而是获取军功，以便在东晋内部的权力博弈中占据更佳位置。推荐阅读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绝对是天才之作。

explorer

老师，这里面的三个阶段是混合的吗。比如冉闵属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提到了前秦苻坚，讲第三阶段时讲到了慕容和拓跋，慕容灭

了冉闵，这按时间顺序理解不通啊，请老师指点！这一块的历 | 老史有点多，理解起来感觉比较费力

作者回复

这三个阶段我主要是做了一种逻辑划分，彼此之间在时间上确实有交叠部分，因为不会是哪一个力量起来了，其他力量马上就不存在了，都是有个过程的。

Melissa沈

施老师，我想问一下美国和中国都是大国，为什么美国最后形成的是联邦制呢？

作者回复

美国联邦制的形成有一系列历史前提，中国很难复制。不过倒是可以推荐你读一下《联邦党人文集》当中的第九篇，看看他们对于联邦制的讨论，网上就能找到电子版的。这一篇中关于联邦制的文字，几乎是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扒出来的

大空翼

施展老师，你好。拓跋珪，他让我想到吴军老师曾提到具有bioculture的一种人，也具有创新力、组织能力、领导力。人之所以不同，是植入到脑中的操作系统不同，不管是管理个人、家庭、公司，乃至国家，都要深入研究他们的操作系统，才能统筹协调融合好他们，谋求更好的发展。对不会那么简单。胡人的屠刀屠戮了多少无辜的汉人，北方汉人基本上被杀绝了，为什么冉闵的反抗被老师说的那么不堪，不把胡人杀怕了他们根本不会坐下来跟你合作的，

作者回复

北方汉人基本被杀绝了，这是过去的历史教育给你留下的错误想象，这种错误想象才真是把历史给理解得很简单。很浅显的一个道理，如果把汉人杀绝了，去收谁的税啊？胡人就算出于自私的目的，也不可能做那么蠢的事情。去找一些靠谱的历史研究著作读一下吧，比如陈寅恪、田余庆、阎步克、罗新，等等学者，在这方面都有非常好的研究著作。

拈花听禅

今天这堂课用了一个半小时学习和思考，内容精彩，打通对这一历史时期认知空白！老师在对留言区的提问解答的更是干货！对苦难及其承载的意义、对没有那个民族是孤岛可以独善其身、儒家文化在统治中的作用……这些都刷新自己的认知、拓展了思维的边界！老师历史演变的逻辑来分析建构让我学习的酣畅淋漓，学习效率高！站在历史发展演进的高度、视野来规划建设自己才更有指导意义！施老师的大师课是排在我每天学习的第一位的。老师能否给详细_一的讲解一下拓跋珪整合草原上的大小部落的？

作者回复

可以参见田余庆的著作《拓跋史探》

向博

老师的历史课逻辑分析精细，本来对历史就比较感兴趣，现在把很多历史内容串在一起，脉络清晰，豁然开朗。请我老师多久能更新一集音频。

15|鲜卑人如何为隋唐打下基础

南北朝之后，北边的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再加上南边的南朝，再一次形成三国鼎立的阶段，这就是后三国。这个时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创新，这些制度都被隋唐大帝国继承下来了，于是才有了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大唐盛世。

这一讲，咱们讲讲从后三国到天下一统。你可能会说，三国我很熟悉，后三国是哪一个时代？

后三国，就是在南北朝之后，北边的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再加上南边的南朝，就再一次形成了一个三国鼎立的阶段，这就是后三国。为什么后三国很重要呢？因为正是这个时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创新，都被后来的隋唐大帝国继承下来了，于是才有了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大唐盛世。也就是说，要搞清楚大唐盛世，就一定得搞清楚后三国这段历史。要解释清楚这段历史，我们重点得说两个事情。

一个是魏孝文帝迁都。这个事件我们过去的解读，一般是说它成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但实际上，魏孝文帝迁都直接导致了北魏的灭亡，从而带来了后三国时代；第二个重要节点，是乱世中北周的崛起。刚说的那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创新，正是北周搞起来的。

北魏孝文帝迁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事情，北魏的魏孝文帝迁都。北魏，我们在上一讲说过，这是一个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魏孝文帝是北魏的第七任皇帝。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虽然是鲜卑人，但是他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家文化有很深的感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他的奶奶冯太后一手安排的。冯太后，是历史上著名的女强人。冯太后的老公是北魏第五任皇帝，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新继位的小皇帝主少国疑，一些大军事贵族开始欺负孤儿寡母。没想到，年轻的冯太后手段凌厉，几下就把大贵族们干掉了。但是等到小皇帝长大亲政之后，对冯太后的控制很不满意，于是又过了几年，冯太后就把小皇帝也干掉了，扶植了小皇帝的儿子继位，也就是魏孝文帝。

冯太后掌权，不符合祖制，跟各种皇亲国戚大贵族们斗了这么多年，所以她必须在贵族之外，建立自己的官僚系统才能控住局面。咱们在前面谈到过，建立官僚系统这种事，草原上的人根本不擅长，只有中原汉人才擅长，所以冯太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改革还必须得后继有人啊，否则自己的身后事就不好说了。所以，冯太后也对魏孝文帝进行了系统的儒家教育。魏孝文帝果然对儒家很有感情，亲政之后过了三年，就把首都从原来在长城沿线的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河南洛阳。

魏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呢？如果说仅仅是因为他喜爱儒家文化，这肯定说不通。因为定都平城，丝毫不妨碍他学习儒家文化，小时候不就是这么学过来的吗？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魏孝文帝想要摆脱各种军事贵族的控制，进一步压制这些军事贵族。只有贵族被彻底削平了，皇帝才能真正说了算，否则皇上肯定总是感觉不痛快。

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压制这些军事贵族呢？很简单，远离他们的大本营。军事贵族的力量基础就是军队嘛，而北魏主要的军队驻守在帝国北部靠近长城的六个军镇，分布在今天内蒙古地区，离原先的首都平城比较近。所以，对魏孝文帝来说，离平城远点，进入内地，让军事贵族和他们的军队分开，贵族自然就失势了，自己就好办了。

孝文帝连蒙带骗，把一部分军队和贵族们带到了洛阳，之后迅速地推行全面汉化的政策，要求跟他一块迁移过来的鲜卑人要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与汉人通婚。

这一系列改革初看上去，是文化水准不高的鲜卑人提升了自己，深刻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但对帝国来说，这里面却蕴含着巨大的危险。

汉化改革带来的危险

危险在哪呢？在于皇上对于帝国制度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我们上一讲说过，北魏之所以成功地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稳定的大帝国，在于它建立了二元帝国，也就是北魏同时整合了草原与中原的两种统治逻辑。

一方面，北魏的军事力量，是出身草原的六镇军人构成的，他们拥有极强的武力，可以扛得住其他胡人的攻击。另一方面，从中原输送过来的财富，使得北魏帝国能够从原来兄终弟及的草原继承顺序，转变成为中原的继承顺序，也就是变成父怒子及。

因为有了中原的财富，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靠武力来抢夺财富了，因此继承人的战斗力也就不再是最重要因素了。所以，皇帝死了，哪怕是他未成年的儿子来即位，也不会有大问题。于是，有了中原财富的北魏，就能破解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不至于像其他胡人政权那样，在开国可汗的那一代兄弟们全部去世之后，马上出现内乱。所以，草原和中原这二元缺一不可，两边必须都统一在皇帝的麾下。但是，孝文帝南迁之后的政策，却把草原这一元给丢掉了。**这些汉化的改革意味着，皇帝不再认同鲜卑人的身份，转而要放弃各种鲜卑人的习惯，把帝国转化为一个汉人国家。这对鲜卑军人们的自豪感是个巨大打击。皇上不再认北边的这些老兄弟，那就不能指望老兄弟们还认你。**

军事贵族这回是约束不了皇上了，皇上爽了，但北方的军人们越来越不痛快，军人离心离德，这个帝国就太危险了。迁都后没几年，孝文帝就去世了，后续又冒出个想要学习冯太后的胡太后，但胡太后没有冯太后的才能，一通乱搞，于是六镇官兵们发生暴动，北魏王朝也就很快土崩瓦解。

北魏瓦解后，分成了东魏和西魏，再加上南边的南朝，这就是所谓后三国时代。在这个时代，就轮到出身六镇军人的英雄们登场了。

东魏和西魏的建立

在胡太后还在洛阳胡作非为的时候，一个出身怀朔镇的小兵偶然来到洛阳送信，他看到洛阳的乱象，认定天下即将大乱，该是成大事的时候了，他回到怀朔就散尽家财，募集英雄。这个小兵叫高欢，后来就是他主导成立了东魏。

怀朔镇离今天的包头不远，它东面还有个军镇，叫武川镇，离今天的呼和浩特不远。武川镇出来了另一个英雄宇文泰，他主导成立了西魏。

高欢和宇文泰在天下大乱中趁机起事，都是先跟着别的英雄混，后来各自扶持了一个北魏王室成员成立新政权。高欢主导东魏，定都邺城，就是今天邯郸附近。宇文泰主导西魏，定都长安。



高欢和宇文泰一定有既生瑜何生亮的痛苦，俩人依托各自的国家，苦斗了好多年，几次都有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机会，但是都失之交臂。高欢主导的东魏，后来在他儿子的手上变成了北齐，北齐的核心是中原地区，人口和财富都更多，本来是更有优势的。但高欢看到了魏孝文帝改革带来的问题，他为了避免鲜卑人离心离德，就使劲把帝国往鲜卑化的方向拉。鲜卑军人们是高兴了，但是，这就没法充分动员起汉人的力量，结果东魏人多钱多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

鲜卑人宇文泰复周礼

再说宇文泰主导的西魏，西魏其实就是后来隋唐帝国的母体。西魏

的主体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人口和财富都没办法跟高欢的地盘相比，宇文泰不得不想法设法把手下所有人的力量都充分发挥动员起来。

宇文泰是怎么做的呢？他首先得安顿鲜卑这一方的人心。所以他没有继续孝文帝改汉姓的这种做法，而是要求鲜卑人都恢复鲜卑姓，甚至，他还要求汉人也要给自己起个鲜卑的姓氏。这下鲜卑人满意了，但是汉人的人心怎么收拢呢？宇文泰又搞出了一个极有想象力的办法，“复周礼”！

复周礼，这是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之一，之前一直没人做到过。鲜卑人宇文泰却努力做到了，一下子就收服了汉人的人心。复周礼对宇文泰来说，还有个好处，那就是一下子获得了比谁都强的正统性。你们另外两国，甭管是老高家的北齐，还是南方的陈朝，谁都没有我的正统性强，因为你们都没本事恢复周礼。所以宇文泰的继任者，在篡夺了西魏的皇位之后，新建立的国号就是周，史称北周。

说到这，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既然复周礼在政治上有各种好处，为什么中原的汉人都没有去做，反而是鲜卑人宇文泰恢复了周礼呢？这就得再说一下周礼的来源，咱们在前面曾经说到过，周礼是周代早期贵族们的行为规范，那会儿的贵族都是军事征服者出身。所以周礼实际上是一种由贵族所主导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秩序。

但是在中原，贵族先是被君主们碾压了，后来出现的世家大族也很快都堕落了，这种情况下，想要复周礼，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因为没有贵族啊。但是草原上有现成的军事贵族，只要把他们的身份用周礼来重新规定一下，再依照周礼，把汉人也都整合进来，整出个兵民一体的结构，复周礼这事大致就成型了。

宇文泰把他在武川镇的兄弟们封为柱国大将军，柱国大将军下面再设置大将军，大将军下面再设置开府，一共有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由此形成了府兵制。鲜卑军人和汉人士兵都被整合在里面，各种力量都被有效地动员了起来。这样，宇文泰的地盘，虽然人少钱少，但是效率却更高。

府兵制是北周，以及后来的隋朝能够一统天下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基础。府兵制当中的那些军事贵族，被称为关陇贵族集团，这个贵族集团也是隋唐历史中，举足轻重、影响帝国命运的一个群体。这里不得不提，宇文泰出身的武川镇，后来出现了一系列声威赫赫的大英雄，其中最传奇的就是宇文泰封的柱国大将军之一，独孤信。

独孤信可比什么国民岳父牛多了，他的女儿们嫁给了前后三个朝代的皇帝，这是三朝帝国的岳父。独孤信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后来成为北周的皇后；他的小女儿嫁给了大将军杨忠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这个小女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独孤皇后。独孤信还有一个四女儿，嫁给了另一位柱国大将军李虎的儿子，生了个儿子叫李渊，这就是唐太祖。唐太祖后来也追封自己的母亲为皇后。你看，独孤信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帝国的岳父。

接着说北周，在一系列大英雄的推动下，北周以富有想象力的混一胡汉制度，征服了北齐，一统华北。很快杨坚取代了北周建立隋朝，又一鼓作气征服了江南的陈朝。自东汉末年，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已经分裂了近四百年的东亚大陆，终于重归统一，并最终形成了大唐帝国。草原的视野与武功，中原的精神与财富，被整合为一体，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终于将出自中原的儒家普世主义理想，现实化为一个庄严恢弘、灿烂夺目的世界帝国。

今日小结

现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放弃了帝国的二元结构，也因此让帝国走上末日。混一胡汉、建立二元帝国的事业，最终由北周完成，并奠定了隋、唐世界帝国的基础。这个世界帝国内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统治机理。咱们下一讲就从隋唐两位皇帝的老婆讲起，看看她们的活动如何呈现出帝国的深层结构。

精选留言

浪子小俊

两个细节可能是施老师口误吧。1、后三国前期，北方的西魏东魏是跟南方的梁朝鼎立。到了后期的北周和北齐时，南方才是陈朝；2、李渊的庙号是唐高祖。唐太祖应该是李渊封给他爷爷李虎的庙号吧？

作者回复

是的，没有注意就滑过去了。

且学且珍惜

施展老师，您好！请问历史、政治科学理论体系及其经典著作对人类及社会有什么实践性意义：到底有什么用：对于我们在校的大学生来说怎么才能系统地掌握它？麻烦回复一下，谢谢老师啦！

作者回复

简单说，整个世界实际上都是一堆砖头，你之所以能够理解世界，只不过是因为你的头脑里有一些预置的蓝图，你不自己反思一下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正是这些蓝图让你能理解具体的砖头的意义。就像大马哈鱼总要洄游，这就是它的头脑里被预置的蓝图，但是它自己并不知道。预置的蓝图会有一些问题，就在于它会给你形成一些偏见，让你对于世界的理解遭遇到各种遮蔽。人要长大，长大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能力不断地调整、重画自己头脑中的蓝图，从而让自己对于世界能够获得更深刻、更立体的理解。那么，到哪里去学习画蓝图的技术呢？就是你说的这些学科和经典著作。说到这里，不用我多解释，你也知道它们的实践性意义在哪里了。

王黎路

今天的学习收获，一手抓住枪杆子，一手抓住钱袋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孝文帝汉化居然如此危险确实没有想到，看起来正确的事情未必真的该做，历史的真面目确实不易辨识，期待老师讲杨广。中国古代兵制中，府兵和募兵是比较有代表形式，可以说，除了那些少数民族带来的部族兵制以外，正统王朝所使用的兵制不外这两种，魏晋南北朝隋和唐前期是府兵制，唐中后期五代两宋使用募兵制。府兵制作为世袭兵制，其核心在于兵员另立军籍、世代为

兵、自备粮食装备，作为交换，政府为其提供土地并免其其他徭役。让军户为国家服役的土地，作为均田的一部分，是政府或者说是皇帝直接给予的，不得随意买卖，也就是说，府兵的效忠对象，直接面对皇帝，这对中国古代强调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来说，其优点不言自明。没有最合适的选择，只有最适合的。

变迁

想想自己以前一直觉得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原因和基础就是汉化。现在想来自己真是幼稚，这几天的课才让我醍醐灌顶，二元帝国才是政权稳固并且强大的原因。对统治者来说必须要对实际存在的力量进行充分的利用和整合，并且根据不同的特点给予不同的政策。从这一点来说清朝真的做得很成功，给予汉族稳定，给予蒙古财富而满族真正的统治。看来玩政的最高境界不是要东风压西风或是西风压东风，而是要平衡和利用各种势力来使利益最大化。

飞翔

施老师好，听了您的分析我挺开眼界。您说孝文帝迁都后造成了北魏的二元分裂，主要军事力量放在了北部边境。不过那个时候南朝还存在呢，孝文帝为什么没有把六镇力量分化去进攻南朝呢？或者按您的说法，孝文帝既然按汉人的做法组建了官僚系统，为什么没有利用汉人组织起自己可靠的军队呢？就像清朝那样。期待您的高见，谢谢

作者回复

北魏的北边还有柔然汗国存在，花木兰去打仗就是跟柔然打，北边必须放置主力部队。另外，六镇的军队，是在草原游牧的部落逻辑基础上改造出来的，它的组织机制决定了，它也必须保持相当部分的军人在游牧地区，全部迁移到中原定居地区的话，即便军事建制仍然在，但是战斗力会迅速萎靡。八旗入关之后，没多久就萎靡掉了，就是例证。此时，八旗当中仍然保有战斗力的，主要是仍然留在关外的部分，以及大清也不得不调用类似于僧格林沁这样仍然是从草原走出来的人。至于组建汉人军队嘛，第一，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会在本族群之外组建军队，毕竟军队是政治力量的根基，必须足够有把握，孝文帝就是这点上出了差错；第二、这个财政压力太大了，养活两支军队的事情不那么靠谱，除非找到了新的财源；第三、大清组建了汉人军队（咱说的是湘军之类的哈，不是绿营），就符合前面的两个条件，一方面，大清面对太平天国迫不得

已了，死马当活马医，让汉人权且试一试，一方面，当时出现了新的财源，能够养活得起了。这些条件，在北魏的时候并不具备。

远

从小喜欢听历史故事，现在对历史还是充满兴趣，只是还是停留在故事阶段。谢谢施展老师！我终于从故事里跳脱出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全新的视野看历史。好像终于爬上顶峰的登山者，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气概，有了站在山下不曾有的大局观。新年将至，祝愿施展老师快乐幸福！祝《得到》的朋友们乘风破浪！祝每一位《中国史纲50讲》的听友，更上一层楼！

作者回复

谢谢啦，新年快乐！

荣人_个

从施展老师对历史的解读，突然就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以往上学期间的历史课的很多疑问突然有了答案。对历史的解读必须站在宏观的高处来看待这个事情，才能够管中窥豹，寻找到真正的原因。从这方面看，历史学真的是未来学。

击戈而歌

魏孝文帝迁都，本来是想通过汉化削弱鲜卑族军事贵族，结果却把草原+中原=悍兵+有钱有思想=二元统治逻辑给打破了。从而导致了魏孝文帝死后，北魏迅速衰落。由此不得不感慨，历史就是一系列偶然促发出的必然现象。

Rock-Rocket

鲜卑化的汉人与服周礼的鲜卑人这招真的高明，彼此都有损失但彼此都有获得，而且难以量化，两方都被尊重，两方都服领导，各自的功夫都可以落到实处，而且没有像北魏孝文帝这样剑走偏锋，导致后继者hold不住难以动员鲜卑贵族的那一方。古老的政治智慧真是从血泪换来的，每一次的领导者都在给出时代的药帖处方笺，开不好真的会死掉。施展老师请问，中国历史中有如此复杂的动态关系，时间轴上摆满了各种历史事实，身为一个历史小白，有哪些是我们可以联系的武功呢？例如，看一件历史事实，身为一个历史初探者，我们要掌握哪些最少必要性知识呢？例如：内部的主流价值观，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税收制度等等。外部结构：

例如：国际关系（外部的贸易，军事力量）等等。

16|影响隋唐历史的两个女人

隋文帝的老婆独孤皇后，和唐高宗的老婆武则天，这二位都是女中豪杰。但更重要的是，从她们的故事里面，可以发现理解隋唐帝国的核心线索，就是关陇军事贵族与皇权之间的对抗。

上一讲说到混一胡汉的二元帝国最终得以建立，隋、唐世界帝国一统天下。

正如前几讲说过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决定的。大隋大唐，也不例外。所以，今天咱们要来讲讲两位老婆的故事，一位是隋文帝的老婆——独孤皇后；另一位是唐高宗的老婆——武则天。

为什么要讲这两位老婆呢：不仅仅因为这二位都是女中豪杰。更重要的是，从她们的故事里面，可以发现理解隋唐帝国的核心线索，就是关陇军事贵族与皇权之间的对抗。理解了这条主线，就掌握了理解隋唐帝国的钥匙。像隋朝的灭亡、大唐的兴盛、乃至安史之乱，都可以沿着这条线索来理解。

独孤皇后背后的关陇贵族

隋文帝杨坚的老婆独孤皇后，能力非凡，在杨坚夺取天下、治理帝国的过程中，出谋划策，居功甚伟。两人结婚之际就约好了，一夫一妻相守，不能再亲近别人。

杨坚是出了名地怕老婆，一直恪守着这个约定差不多四十年，终于忍不住偷了一次腥，独孤皇后闻讯大怒，不顾病体，带领几百名宫女闯

入别宫，把杨坚刚宠幸过的宫女乱棍打死。杨坚闻讯也是大怒，但他不敢去找皇后算账，于是不顾劝阻，单人独骑夺门而出，骑马朝山里狂奔二十余里。两个重臣在后面拼命追赶，终于追上了，拦住马头苦苦相劝，皇上哭着说：“我贵为天子，也不得自由！”这俩重臣只好劝皇上：“陛下你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置天下于不顾，咱不和她一般见识还不行吗？”

独孤皇后固然能干，两人也确实感情不错，但隋文帝毕竟是天子，怎么会这么怕老婆呢：实际上隋文帝怕的并不是独孤皇后，而是皇后背后所代表的豪族集团。独孤皇后出身名门，她老爸独孤信是关陇集团顶级军事贵族，她老妈出身清河崔氏，是从汉朝直到唐朝的中国北方顶级汉人豪族。独孤皇后的姐妹们又嫁给了另外一些顶级关陇豪族。这些大豪族靠着联姻关系，结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杨坚靠着这个庞大网络的支持，才篡夺了北周宇文氏的皇位，进而一统天下。倘若他得罪了这个豪族集团，可能皇位分分钟就坐不住了。

所以说，隋文帝的“不得自由”并不是因为惧怕独孤皇后，而是因为必须小心维护与豪族集团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才不得自由。所以他的那位重臣一语道破真相，不可因为一个女人就置天下于不顾。

依赖关陇贵族的这种统治，历史上叫做“关中本位”。关中，就是长安所在的渭河谷地一带；往东边走过了函谷关叫关东。隋炀帝的野心杨坚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志存高远，他可受不了这样一种日子。杨广所留下的历史形象是个暴君，但实际上他是颇为雄才大略的。他是隋朝征服江南陈朝时的最高军事统帅，战争结束之后又广为结交江南士人，并且娶了南朝梁代皇族的后裔为妻，一举收服人心。

杨广是次子，本来没机会登基的，但他给哥哥下了好几个套，最终成功地取代哥哥成为太子。登基之后开凿大运河，又巡游天下，东到大海，南到江南，北到突厥边境，西到哈密，极力要成为个有为之君，天下共主。

但是，这样的一种野心，关陇贵族未必喜欢，因为这会打破他们和皇帝之间的力量均衡。隋炀帝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登基之后就要极力

摆脱“关中本位”，摆脱关陇贵族对他的约束。怎么办呢：和魏孝文帝一样，先离贵族的大本营长安远一点，所以隋炀帝很快就迁都洛阳。

他又进一步发展了隋文帝时期开创的科举制。科举的目的就是，要在贵族之外发掘人才，充实官僚系统，替换掉不怎么听皇帝招呼的贵族。问题是，这个时代，读书仍然不是件便宜的事，能读得起书的多半都是贵族出身，这些人考上之后，仍然未必很听话。所以科举制所能给皇上提供的人才基础，并不那么好用。

隋炀帝还面临着另一个与魏孝文帝类似的危险。隋朝一统天下所依赖的军队，就是府兵，都掌握在关陇贵族的手里，隋炀帝要想大权独揽，就必须另外建立一支军队，由自己直接掌控。

问题是，要想另建一支军队，这个花销可太大了，皇上要想能养活自己的军队，就必须能在豪族的庄园经济之外，另发掘出新的经济资源，从里面搞到更多的钱。

这种新经济资源在哪呢？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出现的。隋炀帝既招不到足够的听使唤的人，又养不起能够压制关陇贵族的兵，他肯定不甘心啊。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征高丽吧。

高丽是小国，但隋炀帝为了征高丽动员的军队，规模空前。为啥要这么搞呢：因为只要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动员过程就有可能把国内的政治结构给改造一番，贵族们的日子肯定不像过去那么消停。一旦战争打得不错，还能从外部攫取到新的财富，用这些来收拾不听话的贵族。想到这些，隋炀帝豪情万丈，几次组织征高丽。

问题是，他还是没钱养自己的兵啊，那意味着，发动战争所依赖的还是各种军事贵族。贵族们在战争中打得非常辛苦，实在不愿再忍受了，于是发动兵变，大隋帝国马上陷入天下大乱。

唐太宗回归“关中本位”

唐朝开国君主看了隋炀帝的下场，所以再次回到关中本位，以巩固国本。但皇上肯定就得接受军事贵族的制衡了。后人常感叹唐太宗能够开明纳谏。唐太宗本人确实是非常宽宏大度，但是贵族对皇权的约束，是确保皇上能够开明纳谏的前提。

在关中本位下，皇上跟属下的柱国大将军们、乃至草原部落的酋长们，是某种意义上的盟友关系。大家都尊重皇上，但更尊重传统。比如唐太宗曾经要求礼部为天下的家族编修谱牒，就是有点类似于家族英雄谱的东西。结果编出来的第一等家族是前面说过的关东的崔氏，还有卢氏，皇上他们家的李氏反倒要往后排。

唐太宗很生气，但后果也严重不到哪去，因为他拿那些大家族也没有特别多的办法，只能要求礼部重排一下了事。但是重排的标准可是有讲究的，不再是根据古老的血统，而是只看当下的官职高低。这就意味着，家族地位的排序，皇上多少有些控制权了，他试图以此来渐渐蚕食掉贵族的势力范围。

武则天再次放弃“关中本位”

唐太宗晚年，纳了个才人，武则天，她后来又成了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前后两次入宫先后嫁给父子两代人，这在中原看来纯属乱伦，禽兽一般。但是在草原上，这是个很正常的习惯，父亲死了，儿子就可以把除了亲妈之外的父亲的各种夫人给娶了。比如王昭君，就曾经嫁了祖孙三代。

这样一种婚姻制度，是跟草原上的财产继承制度直接相关联的。实际上，自然形成的任何形式的家庭结构，都是与财产继承和保全的制度相关，中原也不例外，只不过草原和中原的财产形式不一样，保全的办法不一样而已。草原上女子的地位也远高过中原，人们都习惯了女人会很强势。比如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就是这样，人们也没啥不适应的。

武则天在唐代命运起伏，最终居然能够成功称帝，这里面可以看到大唐王朝深处的草原底色。武则天执掌大权之后，她知道关陇贵族肯定不会支持她的，所以她放弃关中本位，迁都洛阳。武则天一朝又开始大规模地开科取士。

这些做法是不是都听着耳熟啊？没错，跟隋炀帝的办法差不多。隋唐帝国的核心问题都是皇权与关陇贵族的关系问题，武则天与隋炀帝的诉求类似，当然策略选择也就会类似。

但是在武则天的时代，印刷术还是没有发展起来，知识传播成本仍然比较高，能够参加科举的人多半还是贵族出身，只不过是关东贵族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武则天就可以用关东贵族来制衡关中的贵族。可是只要是贵族，就还是不会特别听皇上的话，皇上就又得提拔一些对自己有着高度依赖性的、会很听话的人，来约束无论是哪里的贵族。所以在武则天时代，有一些很有名的酷吏，像什么周兴、来俊臣，他们都是出身无赖，对皇上有高度依赖性，做事也没有贵族们的那种道德标准，各种没底线。最后皇上用完他们，又会很轻易地抛弃他们，再去寻找新的无赖来替代他们。

本讲小结

今天这一讲，并不是要给你呈现八卦，而是要呈现隋唐大帝国最深层的政治逻辑：就是关陇军事贵族和皇权之间的对抗关系。独孤皇帝代表了关陇军事贵族；武则天，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代表了皇权。

武则天的统治被终结后，出于恢复正朔的考虑，首都再迁回到长安，又历了几年的皇室变乱，最终是唐玄宗父子安定了局面。但对新的雄主唐玄宗来说，他也并不想奉行关中本位，受到关陇贵族的约束，他在某种意义上继续了武则天的统治策略。

隋唐帝国政治的主题，皇权和关陇军事贵族的对抗，到了唐玄宗这

里，仍然在继续。但是他的统治策略里面隐含了一些极为危险的东西，最终让盛唐的辉煌戛然而止。这是怎么回事呢？且听下一讲来解释。

17|安史之乱终结了豪族社会

让唐朝盛极而衰的安史之乱，实际上也是促使中原由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化的关键节点。正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技术变迁成为可能，引入了新的经济资源，使得皇帝一直苦苦寻找的豪族之外的财政能力成为可能。

今天来讲一下，安史之乱如何终结了豪族社会。

上一讲到我们说到，唐玄宗在政策上有一系列致命的问题，带来了巨大的危险，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这个问题就是，唐玄宗在不懂得怎样用胡人的情况下，却在滥用胡人。

安史之乱是在公元755年到763年，由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一场叛乱。正是这场变乱，使唐帝国从最巅峰跌落下来。

安史之乱如何终结了豪族社会？

正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技术变迁成为可能，引入了新的经济资源，使得皇帝一直苦苦寻找的豪族之外的财政能力成为可能。

大唐帝国的二元性

从皇权的角度来看，武则天真是给唐玄宗留下了很不错的底子。

经过武则天的统治，关陇贵族已经遭受重创，武则天从关东发掘出来的很费用全为个人整理多重臣，对于抗衡关陇贵族的剩余力量用有用途，这些重臣都被玄宗继承了下来。

但是玄宗感觉还是不过瘾，因为关东的人才多半也是贵族出身，只要是贵族，就总是不那么听使唤。

所以玄宗还努力提拔重用各种没有政治根基的人，这种人更容易控制，对于皇权的扩展用有好处。

什么人没有政治根基呢？除了平民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群体，那就是胡人。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胡人出身的安禄山就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玄宗时期的帝国北部边境一共设置了四个节度使，相当于四个军区，安禄山一个人就管着其中三个，帝国的命脉几乎是完全交到他的手里了。

任用胡人将领，这种事情对大唐来说毫不新鲜，这本来就是一个胡汉混血的朝代。太宗时期就重用了不少胡人将领。

但是胡人将领来自草原，要用好他们就得懂得草原的政治逻辑，太宗与玄宗在这方面的理解水准用不相同。

太宗常年与游牧军人打交道，极其熟悉草原上的政治逻辑，对它的运用达出神入化之境。唐太宗曾经单枪匹马冲到阵前，痛斥入侵的突厥颉利可汗违背盟约，硬是把他给骂跑了。

当然，可汗还是看到了太宗身后的庞大军队才跑的，但太宗单枪匹马所表现出的勇气，绝对符合草原英雄的特征，一举吸引了草原上大量粉丝。

唐太宗最终分化并击溃了突厥帝国，以“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统领起各种胡人，把突厥的组织机制与大唐的帝国秩序揉在了一起。

唐太宗还任用突厥将领，征服了广袤的中亚地区，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这显然是一种二元帝国的逻辑。

但是，从唐高宗开始的皇帝，都不具有太宗那样的战争经验，也没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再加上用唐定都长安，远离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皇帝就越来越欠缺治理草原所需要的知识。

所以，到了高宗朝的后期，突厥就脱离了用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独立帝国。

唐玄宗放弃草原身份

玄宗对于草原上的逻辑更是没有感觉，甚至开始主动放弃用唐的草原身份。

在太宗的时候，用唐以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为正统所在，认为用唐继承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周帝国以及隋朝的统绪，并不认为胡人做天子有什么问题。

但是玄宗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出唐朝的统绪是从汉朝继承过来的，于是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就不在胡人组建的北朝，而在汉人组建的南朝。用唐的草原身份就此被抛弃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大唐虽然建立了二元帝国，但这种二元性太过于依赖于皇帝的个人能力，没有发展成为制度化的安排](#)。倘若皇帝对草原不理解，二元性也就泡汤了。

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却把帝国的命脉交到胡人将领的手里，这几乎就是等着出事了。唐玄宗统治了几十年，感觉超级良好。到晚年突然遭遇到安史之乱，用唐从最巅峰一下就摔了下来。

用唐帝国内地的军队已经不堪一击，只好再去借用其他的胡人力力量来对抗安禄山的军队；最终，动乱倒是平定了，帝国的命运也不再由自己做主了。

江南经济的大发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安史之乱之后，一种新的技术变迁却能够出现了。

安史之乱后用唐陷入藩镇割据，华北是割据最严重的地区，而这里在以前是帝国的财政来源中心。这一下，帝国名义上恢复了天下秩序，但实际上没有钱，啥也玩不转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安史之乱却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从隋炀帝到武则天、唐玄宗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豪族社会之外的财政来源，在这里冒出来了。

要说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得先看看江南人口的一个用变化。

安史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都带来中原人口的用规模南迁，但两次有个巨用差别。永嘉之乱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乱了快两百年了，对于在乱世中该如何自保，人们很有经验，那就是组织起坞堡。南逃的时候，也是比较成建制地逃走，所以跑到江南的还是豪族社会。

安史之乱却是突然爆发的，人们仓促之间来不及组织起来，只能零散地南逃；而安史用军是草原骑兵，打到淮河一带也就不怎么往南走了。逃难者跑到江南基本就安全了，这样江南就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人口始终是相对稀少的。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让这里从过去的地广人稀变成地狭人稠了，这就改变了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相对价格。

地广人稀的时候，土地有的是，劳动力稀缺，所以各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都不划算，像什么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就是一年两熟，这些技术都没人用的。

实际上，水稻插秧这种技术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了，但是江淮地区一直到了唐代前中期，还是火耕水耨的种植技术。这个技术太省事了，想要种地了，先放把火，把田里的杂草树木啥的烧掉，再放水进来把烧剩的草木灰啥的沤一阵子，地里有了基本的肥力，然后开始种。

并且，江南还是轮耕制，就是土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甚至两年以便恢复地力。不是江南人不懂插秧技术，而是他们不需要那种技术，反正有的是，干嘛想不开非要搞那么费劲的精耕细作啊？粗放点多省心。

但是安史之乱后，人口用规模南迁，江南开始变得地狭人稠了。这下人地关系变了，地不够用了，人有的是了。省心的搞法不行了，现在首要需求是省地。

水稻插秧技术开始获得应用，轮耕制也不搞了，土地要连续耕种了，甚至到了再晚一些的宋朝，发展出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各种精耕细作因此也逐渐成为必须。人力越来越便宜，这回不怕费人工，只怕地不够用。

这样一种变化，让建立了平民社会的江南，一下成为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在原来的贵族社会之外，发展起来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就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

晚唐时期，大诗人韩愈曾经说过，江南所提供的赋税，占了天下赋税的差不多十分之九。这个数比较夸张，但江南已经发展成为帝国的核心经济区是毫无疑问的。

财政制度改革

大唐帝国劫后余生，开始努力恢复，江南的开发让皇上意外地获得了新经济要素，有可能用它来对付各种过去搞不定的力量。

但首先得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新的经济要素才能为皇上所用。

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财政制度是从北魏继承下来的租庸调制，主要是按照户来分派，每户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多少绢帛、要服多少劳役等等。

这套制度已经运转不下去了。公元780年，唐朝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两税法，把过去的各种劳役、粮食、绢帛等等都折算为钱，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

两税法原则上来说必须缴纳铜钱。这意味着，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了数百年的实物财政，又转成了货币财政。皇上想要搞点什么事的话，拿着钱可比拿着粮更好办，皇上对付豪族的办法就变得更多了。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

这些新的经济和财政资源，终于让从隋炀帝开始的皇权对抗豪族的努力，获得了政治可能性。

不过大唐已经无法利用这种可能性了，因为唐朝皇室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已经没有办法把各种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只能苟延残喘。

但是如果没有江南的新资源、没有两税法改革的话，估计大唐想要苟延残喘都喘不下去。

要打破过去的社会结构，光有新经济要素的出现还不够，还得有新的知识传播技术，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得起书，形成新的人力资源基础，新秩序才真的能够浮现出来。

新的知识传播技术就是印刷术，实际上这也不是全新的技术发明，而是对既有技术的新应用。在唐朝的时候印刷术就已经在应用了。但那会儿主要是用来印佛经，因为当时的豪族社会，社会上对于儒经的需求相对有限，寺院对于佛经则很有消费能力，印佛经很划算。

但是随着平民社会的发展，对儒经的需求逐渐浮现出来，五代十国时，官方第一次主持了对儒经的大规模印刷，到了宋代，印刷儒经完全

变成一个社会性的商业活动。

知识传播成本由此急剧下降，很多平民百姓都能读得起书了。这让宋代皇帝有机会从平民中大规模拔擢人才充实官僚体系，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终于真正转化为皇帝对抗贵族的一个重要武器。

至此，中原从豪族社会结构不可逆地进入到了平民社会结构。

本讲小结

唐玄宗为了加强皇权、对抗关陇贵族，重用胡人胡将，引发了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却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使皇权获得了新的经济资源。

同时中原向江南的移民过程，使社会逐渐平民化。平民化又促进了印刷术的普及，为皇权对抗贵族提供了人力基础。因此，让唐朝盛极而衰的安史之乱，实际上也是促使中原由豪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化的关键节点。

安史之乱不仅仅在中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草原、西域、乃至雪域高原都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历史变化，它们进一步对于后世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就是下几讲我们会谈到的话题。

18|西域，帝国命运的催化剂

近代以前，大中亚地区是东西方贸易交通的核心要道，也是高度自治的自由城邦。整个中世纪，中亚的文化水平极高，还可以在东方和西方世界的文明处于没落的时候，中亚反过来向它们输送文明，进行文化反哺。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中原和草原上发生的事情，讲了它们如何相互地改变着对方。

但实际上，草原和中原的互动过程，很多时候都有第三方的介入。第三方就像催化剂，草原和中原之间发生着各种化学反应，催化剂则决定着这些反应发展的节奏。

那么，第三方催化剂是谁呢？实际上不止一个，在古代历史上，西域和雪域高原都曾经起到过这种作用，这就是接下来几讲，我们会重点讲的内容。

没有这种第三方催化剂的存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节奏会是大不一样的。

中亚的自由城邦特征

这一讲咱们先来说说西域。西域就是新疆，它和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加在一块，还构成个大中亚的概念。

由于它们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近代以前，大中亚一直都是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特征，中亚在历史上形成了很多自由城邦。

自由城邦的意思是，这些城邦彼此之间互不统属，强大的帝国也没法直接统治它们，而只能间接统治，于是城邦生活不会受到政治的压力。

自由城邦的特征再加上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在古代，这就是能够形成高水准文明的标配。

中亚的文明是伴随着贸易从东西方传过来的，但传到中亚之后却能发展起比东西方还高的水准。在历史时机合适的时候，又会反过来再传向东西方，改变东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这就是我所说的中亚作为催化剂的作用。

比如，中亚向东传播文化，草原帝国的精神世界有一大半是由中亚所塑造的，这显然会极为深刻地影响草原和中原互动的模式。

再比如，中亚向西传播文化，对欧洲的精神世界带来深刻刺激，甚至奠定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

地理结构带来的政治逻辑差异

说了这些，你大致就能知道西域和中亚作为历史催化剂，有多大的重要性了。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它特殊的地理结构。所以，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地理结构。

你可以先看看文稿里面的大中亚地图，先看横向的，中国境内的天山，以及一条起源天山、向西流的大河锡尔河。

天山-锡尔河这一条线很重要，这条线以北是中亚的游牧区，这条线以南是中亚的定居地区。这条分界线的意义，就跟长城在东亚的意义一样。



大中亚地区地形图

天山-锡尔河以北的游牧地区，政治和社会的逻辑，和长城以北的草原上差不多，但南面的定居地区则与中原有很大差别。

中原有很多大河，有充沛的水源进行灌溉，农耕区的规模很大，连成片，财富总量就很大；中亚定居区的水源，只有雪山融水还有一些内流河，水资源很匮乏，只能形成一些高度分散的小规模绿洲，因此财富总量很小，和中原没法比。

所以，东亚的游牧者一旦入主中原，就能获得足够多的财富，把自己的军事贵族什么的都养起来。

在中亚，就算游牧者能够完全征服南方的绿洲地区，但是从南方能搞到的钱，也不足以把本国的军事贵族都养起来。大可汗要压住下面的小可汗，仍然得依靠自己的战斗力。

所以，继承顺序仍然只能保留草原社会的兄终弟及，也就是哥哥死了弟弟即位，因为要保证战斗力，就不能让还没成年的孩子即位，只能是让成年的兄弟即位。

而我们前面讲过，兄终弟及的继承逻辑，一定会带来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因为等到第一代都死了，第二代谁来继承呢，人们没法达成共识，只能靠内斗解决问题，于是草原帝国就解体了。

所以，在中亚就没什么长寿的帝国，再强悍的帝国，最多维持个几十年也就完了。

而在东亚的大清，统治了267年，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了差不多六百年，这都是因为他们进入定居区域后，用不着可汗有战斗力，也能获得充足的财富。继承顺序就能从兄终弟及转为父终子及，国运便能够突破百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再来看看中亚的定居区域，这边和东亚的差异就很大了，这也是由中亚的地理特征决定的。

看看地图，你会注意到，中亚的绿洲地区，空间非常破碎，每个绿洲的规模都不大，彼此之间都被大漠戈壁所隔开，相距很遥远。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个绿洲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征服并持续地统治其他绿洲，因为要横跨大漠来统治，太费钱了，这些绿洲谁都没那么多钱。

所以，中亚南部的绿洲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由外来者统治的，要么是北边的游牧帝国，要么是来自远方的其他拥有轴心文明的庞大帝国，比如东边的中国、西边的波斯之类的。

但对远方的大帝国来说，统治中亚有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了。

所以，它们对中亚绿洲都是采用间接统治的方式，也就是说，外交、国防由帝国掌控，其他的一切都由绿洲地区自理。只有这样，统治才有正收益，否则，一定是赔本买卖。

咱们看汉唐对于西域的统治，都是以西域都护府的形式，而不是像内地一样的郡守、刺史之类的形式。

西域都护，差不多可以理解为汉唐帝国驻扎在西域的总督，他主管

当地的外交和国防，别的也就不管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在古代接受过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近代接受过俄国的统治，但基本上也都是间接统治。

正是这种间接统治，让中亚的这些绿洲城邦始终保留着一种高度的自治，城邦之间没有相互的统属关系，外部世界也无法长期地对这些绿洲进行直接统治，可以说就是一群自由城邦。

自由城邦的属性，让中亚在近代以前，在贸易和文明两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可以说是贸易和文明的中心。

中亚的贸易地位

先来说说贸易，这样一种自由城邦，是最适合于贸易的需求的。在这里，商业的逻辑不会被政治的逻辑所干扰，贸易的效率能够得到保障。

古代中亚有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绿洲城邦，比如西域的鄯善、库车、和田、喀什噶尔等等，越过帕米尔高原，还有《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出征过的撒马尔罕、花剌子模等等，这些都是中亚历史上的贸易重镇。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多数产自中原，但经营这些贸易的人，主要是中亚商人。他们在中原的主要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商站，然后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接力，贩运到欧亚大陆的西部。

这些商人的生意规模如此之大，效率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发行的支票甚至比政府的支票的信用度还要高。欧洲语言中支票这个词，就是check，最初就是在中亚出现，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的。

中亚商人发达的商业活动，还对周边国家的统治秩序带来了重要影响。比如，大唐帝国当时经常要进行超远距离的战争，并且要对遥远

的地方进行统治，这种超远距离所需要的后勤运输体系太复杂了，对帝国来说简直是噩梦。

刚好，中亚商人有发达的贸易网络和远距离运输能力，他们的商业运输活动从辽东一直能达到中亚，正是这些中亚人帮助大唐完成了后勤运输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些中亚商人，大唐帝国的统治成本会急剧上升，帝国疆域恐怕会大幅缩水。

当然，中亚商人在本质上是生意人，不会拒绝任何生意，大唐的对手，比如突厥帝国以及后来的回鹘帝国，在战争中也会用中亚商人的网络，商人们还会成为突厥人重要的军事参谋。

中亚的文化传播

除了贸易，从文明传播的角度讲，中亚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就更重要了。

中亚绿洲地区地理太过破碎，单个城邦的财富总量很小，因此它无法原生性地发展起轴心文明。原生性的轴心文明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希伯来文明等，它们只能出现在财富总量很大的地方。

但是，伴随着贸易和战争等，各种轴心文明都会传播到中亚地区。中亚虽然总财富量不大，但是人均财富量很高，这让中亚人养得起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有能力进行深刻的学术思考，思考这些轴心文明所提出的问题。

各种文明在中亚自由传播、自由竞争，在这里又没有强大帝国的直接统治，文明的逻辑不会遭遇到政治的逻辑的压制。在大帝国内部，政治一定会压制文化的。所以各种文明在中亚能够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发展，这对于人类的文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比如佛教。诞生于印度本土的佛教，是通过中亚才传播到中国的，佛教对于整个东亚世界的影响与改造是全方位的。

再比如，在公元3世纪诞生于波斯的摩尼教，就是张无忌的明教。摩尼教在波斯帝国本土发展得总是不顺，有时候被帝国政府捧杀，有时又被打杀，直到它传到中亚之后，才形成了独立的教会，不再受教会总部的管辖，一下子反倒发展壮大了，到8世纪中期，独立出来的中亚摩尼教，甚至成为草原霸主回鹘帝国的国教。

在中世纪的中亚，最灿烂辉煌的文明，就是伊斯兰教。和咱们今天对伊斯兰教的一般认知不一样，在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极为开放、包容，文化发展水准极高，有着发达的哲学思辨。

古希腊哲学很早就传到了中东和中亚地区，伊斯兰思想家把这些哲学进一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其他还有天文学、数学、医学、航海学等等，伊斯兰世界的水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反倒是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处在很不宽容、很蒙昧的状态。

但是有趣的是，伊斯兰教这么高的文化水平，并没有出现在阿拉伯帝国的大本营——中东，而是出现在中亚，因为这里远离帝国中心，有自己独立的伊斯兰经文学院，文化的逻辑不会受到政治逻辑的压制。

而帝国中心的伊斯兰经文学院，则要受到最高统治者哈里发的控制，文化被政治所压制。所以，中亚的伊斯兰教才能把文明的各种可能性都释放出来。

到了公元9-10世纪的时候，中亚出现了几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等，他们将古希腊哲学与伊斯兰神学结合在一块，发展出宏大的思想体系。

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工作后来辗转传入西方世界，处在蒙昧状态中的中世纪西方人，才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哲学，这些知识传播过程奠定了后来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

所以有人评价，在那个年代，中亚才是世界的知识中心。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可以说，在近代以前，大中亚地区是东西方贸易交通的核心要道，也是高度自治的自由城邦。

中亚虽然没有产生轴心文明，但是各种文明传播到了中亚，就像登上了诺亚方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释放。整个中世纪，中亚的文化水平极高，还可以在东方和西方世界的文明处于没落的时候，中亚反过来向它们输送文明，进行文化反哺。

但是，到了地理大发现，新航道开辟出来，中亚沦落为很次要的贸易通道，人均财富量也大幅下降，没有足够多的人有闲情逸致仰望星空，中亚就从人类的知识高地跌落了下来。

而在中国这边，在唐末安史之乱之后，中原、草原和西域之间发生了非常复杂又有趣的历史联动关系，西域的历史催化剂作用表现得极为到位，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19|回鹘，草原霸主的兴与衰

唐朝中期后，出现了一个新的草原霸主——回鹘汗国。在中原和西域的影响下，先是促成了回鹘汗国的崛起，随后又让它走向败亡。从回鹘汗国跌宕起伏的命运里，你能看到草原、中原与西域深刻的联动关系。

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了西域的重要意义，以及整个大中亚地区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催化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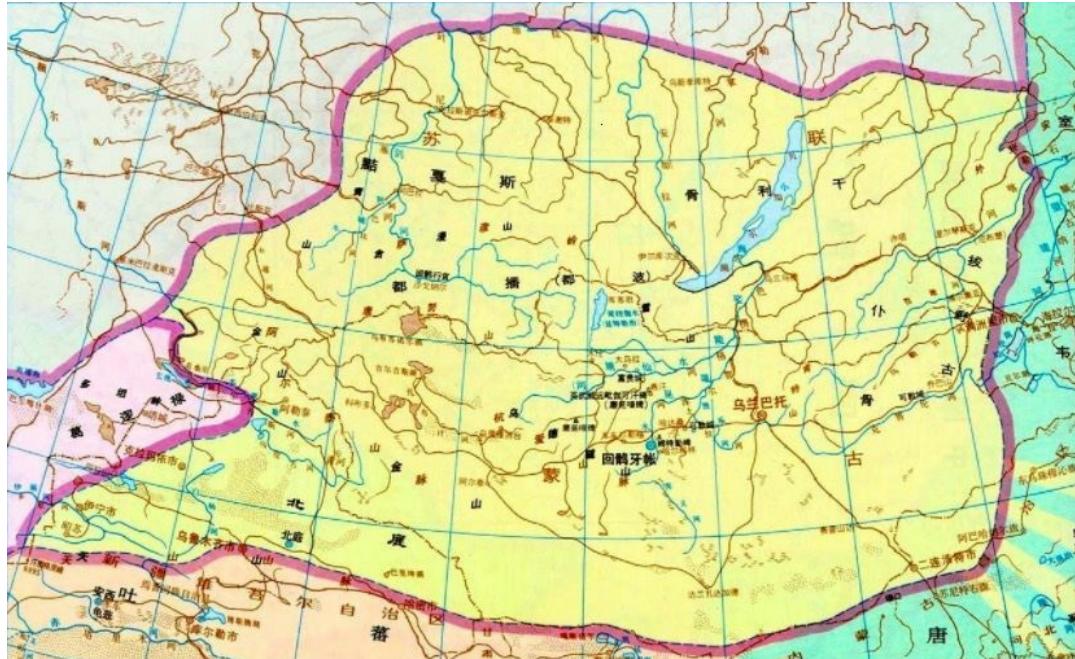
这一讲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唐朝中期以后的草原霸主，回鹘汗国。你会看到中原和西域分别是如何促成了回鹘汗国的崛起，又如何让它败亡，后续的历史又是如何深刻地改造着西域。

从回鹘汗国跌宕起伏的命运里，你能看到草原、中原与西域深刻的联动关系。你也会更好地理解，我为什么说中国历史是一个体系史。

回鹘汗国是如何崛起的

其实在回鹘之前，还有一个草原霸主，就是突厥汗国。突厥汗国曾被唐太宗征服，后来在武则天掌权期间，又复国了。再后来，唐玄宗为了打击它，又扶植了一个突厥人的附属部落，回纥。

在大唐和回纥的联手打击下，突厥汗国在公元744年灭国了。突厥汗国被灭掉之后，回纥就成为了新的草原霸主，后来它又改名成为回鹘。



唐时期的回鹘

回鹘汗国成立后刚过十年，就赶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利。这个红利是什么呢？跟安史之乱有直接关系。

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主谋安禄山，出生在农耕、草原过渡地带的辽西地区，他爸爸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属于东波斯族群，他妈妈是出身草原的突厥人所以他的身上同时流着中亚和草原的两种血。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派遣大将哥舒翰去应战。但是唐玄宗一通瞎指挥，导致哥舒翰被安禄山俘虏，唐玄宗这下慌了，被迫逃离长安，并黯然退位。

大唐终于发现，光靠自己搞不定安禄山了，甚至有亡国的危险，于是，回鹘人的巨大红利就来了。

大唐不得不向这个刚刚被扶植起来的小弟求助，于是回鹘的牟羽可汗带领大军南下助战。回鹘大军协同唐军作战，收复了东都洛阳，回鹘在洛阳也抢得不少财富，除了财富，牟羽可汗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三个来自中亚的粟特僧人，牟羽可汗回程的时候，把这三个僧人也

带上了。

当然，这三位不是佛教僧人，而是摩尼教的僧人，我们上一讲也说到过这个摩尼教，也就是张无忌信的那个明教。你别小看这三个不起眼的粟特僧人，他们让草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他们几个人，说服了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并且通过可汗之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回鹘人皈依摩尼教，没多久就让摩尼教成为回鹘帝国的国教。

原本身处中亚的粟特人，看到摩尼教在回鹘发展得这么好，就纷纷来到回鹘。粟特人由此与回鹘、大唐发生了复杂的多重博弈关系，并深刻地政变着这几方的命运。

这个时候，大唐帝国勉强从安史之乱中活了下来，却又陷入藩镇割据的困境，再也没有当年的雄风，有好几次，帝国政府在试图打击藩镇的时候，差点被反过来搞死。

每逢这种时候，大唐就不得不再向回鹘求救，对回鹘来说，他们当然愿意接这种买卖，于是再次南下，帮助大唐平息内部问题，顺手再狠狠地敲诈一笔保护费。

回鹘很乐意让大唐的帝国政府和藩镇之间，保持这么一种均衡关系，不让藩镇有能力推翻帝国政府，也不让帝国有能力灭掉藩镇。只有这样，回鹘才能不断拿到保护费。

上一讲我们说到过，做买卖这种事，中亚贸易要道上出身的粟特人最擅长了。而这个时期，刚好又有大量粟特人移民来到回鹘，其中有不少就成了回鹘人的重要参谋，帮助回鹘更有效地从大唐榨取保护费。

这个过程肯定让大唐非常痛恨，但是也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回鹘为了能够持续收到保护费，便不得不保护大唐的帝国政府，免得它被藩镇割据给颠覆掉。

实际上，帝国政府早就风雨飘摇了。在安史之乱后，唐朝还能延续

将近150年，回鹘人的干预是一个重要原因。

回鹘帝国的灭亡

刚才说的这批移民过来的粟特人，除了能帮回鹘榨取保护费，还帮回鹘人发明了文字，这种文字是从东地中海的叙利亚地区传播过来的，经过粟特人之手，又传播到了蒙古高原上的回鹘帝国。

直到今天，蒙文和满文所用的字母都还是这种源自粟特文的字母。

这些粟特人帮助回鹘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他们又把这些财富转卖到西方，并且还引导着回鹘人对抗波斯人，以便打击贸易上的竞争对手。

这个过程中，中亚粟特人成了回鹘汗国的大脑。包括西域在内的大中亚，与中原、草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联动关系，你能清楚地看到，中国这部体系史的脉络。

回鹘与粟特人的这种合作共生关系，让回鹘人获得了知识与财富，迅速地文明化了。

这带来一个衍生的结果，文明化之后的回鹘，开始琢磨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开始修筑城墙。于是，回鹘成为蒙古高原历代游牧帝国当中，唯一的一个筑城的帝国。

对于游牧帝国来说，筑城定居绝对是大忌。因为这样一来，游牧帝国的机动性就会丧失掉，游牧者兵民一体、生产-生活战争密切结合的组织特征也将发生分化，组织结构变得复杂。

游牧者令人生畏的战斗力正是依赖它的高度机动性，以及超级简单的组织结构。这方面发生变化，会让游牧帝国变得脆弱，在遇到危险时难以自保。

于是，在公元840年，从回鹘帝国西北方森林中跑出来又一个野蛮的突厥人部落黠戛斯人。黠戛斯人发起的攻击让回鹘帝国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很快就亡国了。

喀喇汗国的建立

你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了吗？后面发生的事情更精彩。

亡国的回鹘人分为几支四散逃亡。对于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向西逃亡的回鹘人。西迁回鹘又分成了好几支，其中有两支，分别逃亡到中亚地区，和甘肃、青海一带，对后世有重要影响这一讲主要说投奔到中亚的这一支，他们对整个中亚的政治、人口和文化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群迁移到中亚的回鹘人，征服了当地游牧者，建立了喀喇汗国，主要位于今天的新疆西部和中亚的几个斯坦国，后来又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分裂为东喀喇汗国和西喀喇汗国。

这个汗国可能你都没听过，但它非常重要，上一讲里说过的那些中亚伟大的思想家，都生活在喀喇汗国。

喀喇汗国对中亚的改造

先看看喀喇汗国在政治上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东亚这边的游牧定居复合结构的二元帝国中亚却一直没有这种复合帝国，直到喀喇汗国的建立喀喇汗国的北部，是游牧区，回鹘人是很熟悉的。喀喇汗国的南部是定居地区，按理说，出身草原的回鹘人是没法搞定定居区域的但是，早年在漠北的时候，回鹘人

在粟特人的帮助下，积累了足够多的懂得中亚的定居文明该如何治理。所以回鹘人也有能力去统治中亚的定居地区，从而建立起了二元帝国，也就是喀喇汗国。有意思的是，这些回鹘人仍然有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他们作为喀喇汗国的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桃花石”就是中亚人对于中国的称呼，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北魏的皇族，他们姓“拓跋”，到了中亚，口音不大准确，被称为“桃花石”。

随着喀喇汗国的建立，中亚的人口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波斯人口的突厥化。

在喀喇汗国以前，中亚的定居地区，也就是天山-锡尔河以南，我们今天说的南疆地区，多半是东波斯族群的粟特人，就是广义的波斯人吧，他们是高鼻深目的白色人种。

而在北边的游牧地区多半是突厥人，突厥人其实是蒙古人种。这些突厥人以前也没有多少兴趣迁居到天山-锡尔河这一条线以南，因为他们没兴趣定居。但是回鹘人在漠北的时候已经有过定居的经验，所以在迁到中亚之后，他们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开始进入天山-锡尔河以南，转为定居的生活方式。

这些回鹘人和当地的波斯人口混血，逐渐改变了中亚的人口结构，让中亚开始了普遍的突厥化过程。今天我们看南疆的少数民族白色人种的特征相对更明显，北疆的少数民族则是黄色人种的特征相对更明显，这种差异就和这段历史上突厥人与波斯人混血的不同比例有关系。

人口结构的变化，喀喇汗国的建立，还带来了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突厥民族的伊斯兰化。

在回鹘西迁前，中亚地区已经伊斯兰化了，但之前在中亚来来往往的突厥人并没有信仰伊斯兰教，因为他们并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直到喀喇汗国，开始了突厥人的伊斯兰化进程。因为这个时候的伊斯兰教，正处在文明发达如日中天的阶段，回鹘在漠北的时候虽然已经跟随粟特人，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但毕竟时间太短，也不那么系统，

到了中亚，看到当地伊朗语系人群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政治秩序与文明成果，心向往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另外就是，如果皈依了伊斯兰教，统治当地穆斯林的成本也会变得更低。几件事加在一起，突厥人开始了伊斯兰化。

本讲小结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了。

回鹘这样一个草原帝国，本来是循着通常草原帝国的路子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中亚粟特人的深度介入，它的历史走上了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并深刻地影响了大唐与自身的兴衰。

到了回鹘灭亡后，又深刻地改变了中亚的历史命运。通过回鹘汗国的历史，可以说看到草原、中原和中亚绿洲，多个地区历史联动的典型案例。

但回鹘人的故事还没完。我刚刚提到西迁回鹘比较重要的有两支，除了西迁中亚的这一支，还有一支投奔了高原上的吐蕃帝国，在甘肃、青海一带建立了被称作甘州回鹘的附庸国。

这群人并没有喀喇汗国那样的文化与武功，但他们给雪域高原上带来了深远变化，导致了强大的吐蕃帝国的崩溃，也带来了藏传佛教的独特体系。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话题——吐蕃，雪域霸主的聚与散。

20|吐蕃，雪域霸主的聚与散

雪域高原上自古至今，只有过一个帝国，就是吐蕃帝国。吐蕃帝国一度非常强大，甚至对大唐构成巨大威胁。但是强大的吐蕃帝国很快就亡国了。崩溃之后的雪域高原，走上了和中原、草原差别巨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从而带来了藏传佛教的独特体系。

我们在上一讲谈到了草原霸主回鹘汗国的崛起和败亡，以及在回鹘汗国灭亡后，向西逃亡的一支回鹘人，如何深刻地改造了中亚。

这一讲我们要讲的主题是雪域高原上的吐蕃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命运却和另外一支向西逃亡的回鹘人关联了起来。

这支亡国的回鹘人来到吐蕃寄人篱下，但却又很快导致了吐蕃帝国的灭亡。崩溃后的雪域高原，走上了和中原、草原差别巨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从而带来了藏传佛教的独特体系。

而藏传佛教，对元明清的帝国统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讲，就是要讲这背后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让你看看吐蕃帝国是怎么崛起的，又是怎样亡国的，之后又是如何兴起的藏传佛教体系。

雪域高原的地理特征

先来说雪域高原上的这个吐蕃帝雪域高原的地理条件特殊，资源极度匮乏。所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分成一个个小部落，由部落首领来领导的。

一直到了公元六百多年的初期，也就是和唐太宗差不多的时代，才

由松赞干布建立起了统一的帝国，也就是吐蕃帝国。于是也就有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

为了能理解吐蕃帝国面临的现实条件的约束，咱们得先看一下雪域的地理特征。

这里有一系列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都属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之列，高原的北边是昆仑山到祁连山这一线，基本是青藏高原和西域的分界线，下面就是塔里木盆地。高原的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大致是青藏高原和印度平原的分界线。

高原上多数地方都不适合人类生存，只有在大山之间的河谷地区，海洋上的水汽能够曲折地传进来，也形成了一些很分散的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小区域。



雪域高原上分为三个亚区域。

在东北方向上，是安多藏区，包括今天的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

东南方向上，是康巴藏区，主要包括今天的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香格里拉就属于康巴藏区的。

还有一个是卫藏地区，包括今天的西藏大部分地区，“卫”在藏语里就是“中心”的意思。

吐蕃帝国的贵族制

吐蕃帝国的核心地区就在卫藏，吐蕃的最高统治者叫做赞普。而松赞干布是第一个有明确年代的赞普，在他之前的雪域高原历史，都处在传说当中。

虽然只有传说，但我们明确可以知道的是，在松赞干布之前，高原上就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了，叫做苯教。

苯教是个多神教，有萨满教特征，就是类似于跳大神那种。高原上最初那一个个的小部落，部落首领多半都兼有宗教属性。在松赞干布建立起吐蕃帝国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成了帝国的大贵族。

苯教和贵族制，在吐蕃帝国内部就是一种共生关系。

在雪域高原那种资源如此匮乏，人口如此稀少的地方，能建起这么个庞大的帝国，松赞干布确实是个天才。

但在这个帝国里，赞普肯定是和贵族合作共治的，赞普不可能通过官僚体系来进行中央集权式的统治。因为官僚体系是个很复杂的统治技术，而吐蕃帝国是迅速崛起的，根本还来不及发展出这套统治技术呢。

最起码的，要想用官僚来统治，好歹得有文字，文书系统是官僚体系运转的一个最基本前提。可是吐蕃是到了松赞干布时期才开始引入文字的。有了文字，这也只是有了个最基本的前提，中间需要很长时期的积累。

中原也是在商朝出现文字之后，用了一千多年，才在战国后期建立起官僚体系

松赞干布对贵族的控制

那么对松赞干布来说，问题就来了，赞普不得不与贵族合作共治。但是贵族都有离心倾向，不愿意受制于赞普，让自己丧失独立性。

如果赞普不能找到办法来控制贵族，用不了几天帝国也就解体了。那怎样才能控制贵族呢？

伟大的松赞干布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双管齐下。

首先是精神层面，贵族们是借助苯教来凝聚本部落的。为了从精神层面上对抗贵族，赞普就引入了佛教来对抗苯教。

苯教是多神教，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主神，各个部落之间就没有精神上的认同感，有离心倾向，这也很适合贵族的需求。**而佛教不是多神教，是普世主义的宗教，能够建立一种超越于地方小群体的大范围认同感，这特别适合于赞普的需求。**

所以，赞普支持佛教，贵族支持苯教。赞普和贵族之间的对抗关系，又呈现为苯教和佛教之间的对抗关系。

光靠精神上的统一是不够的，基督教也是普世主义宗教，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还不是分裂了。所以，赞普还得有物质上的办法，可是他没法像中原一样，通过税收的方式养活官僚体系，从而来压制贵族。

这不仅仅是因为前面说的没有文字，没有官僚系统，更因为雪域高原上交通太困难，税收成本太高，靠税收来养官僚完全不可行。

赞普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雪域之外去获取财政资源，只要能在外面

搞到钱，就有办法在高原上压制贵族。

可是去哪搞到钱呢？高原的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跨过大山到印度去搞钱，很不现实。高原的西边是帕米尔高原，也没法越过去跑到中亚搞钱。

而高原的东北部、青海一带的安多藏区，有一条很重要的通道，被称作青海道，可以直接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

这可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啊。对地处卫藏的吐蕃赞普来说，安多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能够控制安多，就能够威胁到河西走廊乃至西域。

从这条重要商道收取保护费，如果运气好，占领这里的话，那赞普就更是不用愁钱了。所以，从松赞干布开始，历代赞普始终要牢牢控制安多藏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压制贵族，维持帝国的统一。

安史之乱给吐蕃带来的机遇

安多藏区算是中原和吐蕃的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往往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带，大唐和吐蕃在安多和西域有大量的战争。

吐蕃在这方面肯定没有大唐有优势，毕竟大唐有钱嘛，战争的后劲远远好过吐蕃。所以在唐玄宗的时候，吐蕃被打得很惨，在西域好不容易抢来的一些地方都丢了，安多也快保不住了。

没想到，就在吐蕃快要扛不住的时候，公元755年，大唐发生了安史之乱，所有用来打吐蕃的军队都被调回到中原来打安禄山。

吐蕃一下子抓住机会，迅速出兵，不光牢牢控制了安多，还攻占了西域的大片领土。

在此之后，在西域的争夺，就不再发生在大唐和吐蕃之间了，而是发生在草原霸主回鹘和吐蕃之间了，双方又是打得不亦乐乎。但对吐蕃来说，回鹘还是比鼎盛时期的大唐好对付一些，所以它在西域的成果基本都保住了。

西域的财富源源不断到来，赞普这下就牛气得很了，他对于贵族们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于是赞普就开始筹组自己的私人班底，以便从人事层面上进一步压制贵族。

这个人事班底肯定也得是识字的人，赞普才好用，僧人们很多是识字的。所以赞普最初是发展起一些僧官，就是把佛教当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纳入自己的人事班底。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赞普给了佛教大量的支持，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对他对抗贵族的一个表征。

这会的赞普看上去越来越强大了，但实际上他是越来越脆弱了因为他要养活的僧官越来越多，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依赖于来自西域的财政。

一旦西域出点问题，赞普的麻烦就来了，他不光是养不起僧官的问题了，因为贵族在这个过程中被赞普压制得越来越厉害，他们的反弹也同样会变得非常厉害。

回鹘人促使吐蕃灭亡

没多久，麻烦果然来了。

从哪来的呢？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支跑过来寄人篱下的回鹘人。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吐蕃的死对头一直是回鹘。而回鹘终于亡国了，反倒让吐蕃遇到麻烦了，完全体现了“福兮祸所依”的道理。

回鹘亡国了，吐蕃一开始感觉很好，觉得终于算是把回鹘人给踩在脚底下了。跑过来的这支回鹘人，建立了一个附庸国，甘州回鹘。

但是吐蕃没注意到，甘州回鹘的地理位置，非常要命。它位于哪里呢？正在从青海道进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要道上，甘州，就在今天的甘肃张掖地区，来自西域的财富，要想运到赞普所在的拉萨，肯定得过甘州回鹘的地盘。

要他们在里面略微截流一下下，马上赞普就受不了。对甘州回鹘来说，肯定要截流啊，没有放着钱不赚的道理。

所以回鹘帝国在公元840年亡国，而仅仅两年之后，吐蕃也就亡国了。

亡国的导火索是老赞普遇刺，而帝国财政已经陷入危机，新赞普没有任何能力压制反抗的贵族们。

强大的吐蕃帝国就此解体，佛教也遭遇到巨大挫折。

雪域高原的组织逻辑

接下来一个有趣的历史过程就出现了。

说实在的，雪域高原上那么恶劣的自然环境，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实在是难以想象，它需要各种历史的机缘巧合才能建立起来，这种机缘巧合是不可能被复制的。

所以吐蕃帝国解体之后，高原上就再也没有过什么强大的政治体了，只能再恢复到过去的那种区域性的部落、小共同体的状态。

这样一种散落的小共同体，要想形成秩序，其核心逻辑就跟中原大不一样了。中原这边是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效率高的会吃掉

效率低的，最终一统天下。

但是要想比拼效率，前提是资源非常丰富，因为高效率通常伴随着高消耗。而高原上资源太稀缺了，消耗不起。所以高原上要比拼的，是哪种组织模式的成本更低，谁的成本低，谁的存活机会就更大。

对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来说，哪种组织模式成本最低呢？当然就宗教。

于是，雪域高原上又像吐蕃帝国崛起之前那样，形成了一系列宗教主导的小共同体。雪域高原因此也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它成了唯一一个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地方。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的政权很强大，它就不会允许教权有机会独立发展，那么这个地方的宗教性肯定会被政治的世俗性冲淡的。

又过了一百多年，佛教再一次传入雪域，这次的佛教没有赞普作为强力的后盾，就必须和苯教相融合，才有可能被那些小共同体当中的贵族话事人所接受。

于是，我们今天会看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气质很不一样，根源都在这里。而正是这样一种气质，使得藏传佛教更容易被草原上的游牧者所接受。

几百年后，藏传佛教主导了蒙古草原上的精神世界，这是后来的满洲人能够联合与控制蒙古人的一个重要抓手

本讲小结

讲完这一讲，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等中国的各种组成部分，全都闪亮登场，并相互影响着展开历史演化。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构造，脱离开一方，真的是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

我们通过对于边疆地区的讲述，可以更深刻地看到，中国史是一个体系史。中国内部所有的这些组成部分之间，通过彼此的相互依赖，而彼此相互成就，它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着深刻的共同历史记忆。

大唐时期的历史结束，进入到大宋，中国就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开始了一轮不同的历史演化过程了。

讲，我们要来看看宋、辽这两个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之间的历史博弈，与此前的历史博弈有何不同。

古代平民社会篇



21|大辽，首破百年的游牧帝国

正是因为大辽占领了幽云十六州这片土地，使得它有能力进行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才带来了中原与草原之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并为中国后续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制度基础。

上一讲结尾说到，从唐到宋，中国由豪族社会变为平民社会。宋朝又分成两段，北宋和南宋。北宋的历史是和大辽共同度过的。

你听评书《杨家将》可能会觉得，宋、辽经常在打仗。事实上，杨家将的抗辽战争发生在北宋初年。此后直到北宋灭亡，两国基本没什么战宋战争了，保持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持续百余年的和平。

为什么会这样呢？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幽云十六州。说到幽云十六州，汉人经常为之捶胸顿足。

因为这里是中原帝国最重要的北部屏障，一旦失去这里，中原将无险可守。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大宋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没能收复幽云十六州。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来看这段历史，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那么，幽云十六州又是如何到了大辽手里的？我们先看一下幽云十六州的位置。



幽云十六州位置图

这片土地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两省的北部区域，面积大概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

别看面积不大，但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们都在长城以南，幽云十六州的北部边界差不多是长城和各种崇山峻岭，南部则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因此，这片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屏障。

中原和大辽的格局

当时中原和大辽的格局是怎么样的呢？

中原这边，在唐宋两个朝代之间，有一段分裂割据的历史，就是五代十国。

安史之乱后唐朝内部藩镇割据，帝国政府的话越来越没人听。唐朝末年又有一系列大变乱，帝国终于彻底崩溃，那些割据的藩镇将领都

自立为王，但绝大部分都没有称帝。这些小国先后有十几个，但人们一般称之为“十国”。

另外，当时还有个最强大的军阀叫朱温。朱温本来是唐末黄巢大起义时的起义军将领，后来又投降大唐，获得高官。

在公元906年朱温强迫唐朝天子退位，自己登基称帝，建立了新的朝代称为梁，史称“后梁”。

但是没过多久，后梁很快又被人颠覆，建立了新的朝代。

在宋代之前，共建了梁、唐、晋、汉、周共五个短命的朝代，合称为“五代”。人们一般在这些朝代名字前面再加个“前后”的“后”字，以区别于历史上的正牌朝代。

这段分裂的历史就是“五代十国”，在公元十世纪前期，共持续了大约六十年的时间。

再来看看北方的情况。公元916年，也就是后梁这一朝的时候，北方草原建了一个王朝叫契丹，后来又改名叫辽。

五代的那些统治者都称帝了，大辽的统治者也称帝了。**称帝这个事情很重要，它有非常深的象征性意义，只有自认为是大唐继承人的统治者才会称帝。**

说实话，如果从各种公共建筑的风格和气势上来看，大辽还真是五代甚至比大宋更像大唐。大辽的建筑都有那种气吞万里的气势，大宋就太婉约了。

今天的山西还有很多大辽时期的寺庙留存下来，去那里看看，会有特别直观的感觉。大辽的佛学水准在那个年代也属于顶级之列。

大辽如何占领幽云十六州

那么幽云十六州是怎么到了大辽的手里呢？在后梁和后唐的时候，幽云十六州还掌握在中原手中。一直到了后晋，这块土地才到了大辽手里。

这就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也就是著名的“儿皇帝”。如果你对幽云十六州的历史感兴趣，就要记住石敬瑭这个名字。

石敬瑭本来是后唐的重臣，但是他遭遇到后唐皇帝猜忌，就在公元936年起兵反叛。为了寻找支持者，石敬瑭便想拉拢北方王朝大辽。

他向当时的大辽皇帝耶律德光许诺，一旦大辽帮助他登基，便可以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向大辽进贡，并认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

耶律德光肯定全都笑纳了，于是幽云十六州就此落大辽手中，成为中原汉人心头永远的痛。

后来经常有人痛斥石敬瑭是个大汉奸，出卖了中原的北部屏障，以致此后大宋北部无险可守，最终亡国。

这种痛斥，把历史过于简单化了。首先，石敬瑭根本就不是个汉人，说他是汉奸就不大说得过去。那石敬瑭是什么人呢？他是沙陀部的突厥人，后世经常也管这一部落的人就叫沙陀人。

事实上，五代的梁、唐、晋、汉、周里，梁是汉人朱温建立的，唐、晋、汉都是沙陀人建的，周也是个跟随沙陀人打天下的汉人郭威建立的。再往后的大宋，则是跟随郭威发展起来的，跟沙陀也有渊源。

对于草原民族来说，军人们经常会结成义父义子的关系，一个草原军事首领收一大堆义子事情很常见，这种关系更利于形成信任关系，有利于战场上的同心协力。

所以“儿皇帝”这个身份，在中原人看来是奇耻大辱，但是对于石敬瑭这个沙陀突厥人来说，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我不是说这事很光荣，只是说我们需要看到不同文化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理解。

大辽的制度创新

对大辽来说，幽云十六州太重要了，倒不是说这里可以让它更顺畅地入侵中原，实际上在宋朝初年之后，大辽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入侵中原的事。

幽云十六州的重要性在于，它让大辽有能力进行重要的制度创新。

首先，大辽的财政逻辑变了。

幽云十六州的土地面积虽然只占大辽总体疆域的很小一部分，但其人口却占大辽总人口的六成还要多，从而确保了大辽稳定的中央财政。再加上大宋在1004年的澶渊之盟之后，每年向大辽提供岁币，大辽就更有了稳定的中央财政。

财政逻辑的变化，让大辽的统治逻辑也发生了变化。

大辽是一个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王朝，草原上的契丹人，本来都是部落联盟的形式。幽云十六州在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常住人口主要是汉人。

咱们在前面讲过，如果要同时统治长城南北，就必须得是一个兼容草原和中原的二元帝国，此前的北魏和大唐都曾经做到过，但这俩帝国后来又都逐渐地放弃了二元性，转向汉化。

大辽的制度创新是，它放弃了对全面汉化的追求，建立起南北两院制度。南院用儒家的方式来治理汉人，治理的地方主要就是幽云十六州；北院则以草原的方式来治理契丹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二元帝国这种形式给制度化了。北魏和大唐的二元帝国，差不多都是靠实用主义，走一步看一步搞起来的，实际上并未真正理解这种二元帝国的核心逻辑，所以才会有魏孝文帝迁都，和唐玄宗乱用胡人这些问题。

唐能够统一长城南北，主要是依靠唐太宗这样同时熟悉草原和中原游戏规则的个人，一旦这种个人不在了，二帝国的逻辑也就快要搞不下去了。

大辽把二元帝国给制度化，就意味着，帝国的稳定，不再是依靠哪个领导者个人的能力了，而是依靠一制度安排。制度超越于所有人之上，不会因为哪个人死了，帝国就碰到麻烦。

我们在前面还讲过，一旦能够建立起这种二元帝国，那么草原的继承逻辑也会转化。会从兄终弟及转为父终子及，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就被破解了，帝国的生命周期就能大大延长。

再加上二元帝国的制度化，大辽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由游牧者建立的帝国。它对幽云十六州农耕地区的掌控，是它能够长寿的关键。

大辽的这个制度创新，对后来的中国影响极为重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大辽的制度创新，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元朝和清朝，今天中国的领土就只能局限在长城以南了。

在咱们过去的历史讲述中，通常是站在大宋的视角，大辽经常作为大宋的对手出现。在民间，由于评书《杨家将》的影响，大辽更是作为坏人出现的。

真实的历史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杨家将》基本上相当于 部“抗辽神剧，跟今天的“抗日神剧”也差不太多。

本讲小结

唐宋之间，中原政权出现了一段分裂割据的历史，也就是五代十国。而五代里面有三代都是沙陀突厥人所建立的。其中后晋这一代，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北方的草原王朝大辽。

大辽由此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改变，最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兼容草原和中原的二元帝国制度化了，并对后来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今天中国的庞大疆域，奠定了古代的制度基础。

这一讲我们从大辽的制度，说了幽云十六州，下一讲我们再从大宋的角度来讲讲。

历史书上常常说北宋“积贫积弱”，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北宋始终收不回幽云十六州。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下一讲我会跟你聊聊这个问题。

22|大宋:和平换来的高发展

被割走的幽云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头之病，但实际上却是其保护伞的必要骨架。在和平雍容的环境之下，大宋发展起了极为繁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上一讲，我们讲了幽云十六州是如何割让给大辽的，以及大辽因此发生的一系列深层转变。

这一讲，我们重点来看看北宋。

大宋并不积贫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无法收复幽云十六州，常常被视作是大宋“积贫积弱”的象征。

大宋是否“积弱”，这个话题先放一边。但是要说“积贫”，那绝对是大宋的污蔑。

实际上，北宋不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技术层面，都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应该是古代中国最自由、开放、富足的时代了。

可能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大宋能够获得这样一种发展，前提恰好是大辽占据着幽云十六州。

虽然宋朝人对北方的土地如鲠在喉，但它却是大宋之所以成为大宋的生命线。这讲咱们就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公元960年，赵匡胤篡夺了五代时期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皇位，建

立了大宋。

从后周末代皇帝开始，再加上宋代头两位皇帝赵匡胤、赵光义，都心心念念地想要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始终没有成功，有两次可以说是功败垂成。

不过大宋倒是完成了后周没有完成的工作，把中原其他地方给统一了。虽然北方失地没有收回来，但大宋却发展起极为繁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繁荣发展的经济

先看看大宋在经济上是如何富裕的，跟大唐对比下更能看清楚。

在大唐的时候，城市里的小商小贩是不能随便摆摊、开门店的，而是要依照政府的规定，在被四面墙围起来的“坊”里面活动。

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贸易肯定是受到抑制的，社会自由度不会太大，人们也不能随便迁徙。

你可能看那些想象万千的唐诗，以为唐朝高度自由，实际上那主要是属于豪族的生活，民间的生活是受控制的。

到了大宋，“坊”这种制度被取消了，百姓的迁徙也变得自由了，人们可以随便摆摊做生意，挑着炊饼到处走。

这意味着朝廷不再对社会进行紧密控制，民间贸易一下变得极为发达，百姓也变得非常富裕。武大郎光靠卖炊饼，就能住着二层小楼，还能养活一个全职太太。

古代中国长期地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地位非常低，宋朝是唯一一个不长期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们也不以经商为耻。

看宋朝人写的书，就见到过里面说，如果考不上科举，就经商去，能发财的话，也不算辱没门楣。

宋朝还积极鼓励海外贸易，工商业税收和关税收如成为政府财源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这在古代王朝中是独一份，其他王朝主要都是依靠农业税的。

宋代发达的经济催生了繁荣的第三产业。各种酒馆、戏楼、杂货铺，非常之多。

经济当中也形成了很深入的分工。社会中有养鱼的，就分出来专门培育鱼苗的行业；有养花的，就分化出来专门培育花苗的行业。

这些鱼、花之类的，都得是生活悠闲，有了闲情逸致的人才会去消费。当时最大消费群体并不是达官贵人，而是平民百姓，可见当时的民间社会有多繁荣。

各种新行业的出现，也就在社会中催生出大量的工匠。工匠们规模大了，又发展起行会制度，形成这种发达的民间社会自治。

宋朝的海外贸易规模巨大，于是大宋的铜钱大量流向海外，竟然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岛，整个环中国海的庞大货币共同体。

货币大量外流，大宋的货币就不够用了，于是又发行了各种纸币，以及食盐做担保的信用票据等等。这些票据都可以作为交易工具流通，提供流动性，市场经济因此很繁荣。

更牛的是，这些票据甚至发展出了二级市场。在北宋时期的开封，有100多家获得了官方许可的商号在交易这些票据，通常还会有一个溢价。

一千年前的这种繁荣，在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再来看看文化层面，宋代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儒学在东汉时代曾经发展到非常精致的程度，但是在前面曾经说过，汉末天下大乱，好多人就不再信奉儒家这一套了，开始谈玄论道。

再加上佛教的大规模传入，这是个一点都不比儒家差的、完整的宇宙观世界观体系，儒家就更加萎靡不振了。

到了宋朝，出现一批大儒，把儒家、佛家、道家给进行了有效的综合。儒家一下发展到一个新高度，重新确定了中国的思想方向。向后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对外则决定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儒家文化地区的思想气质。

宋词的发展，其文化高度就不用多说了。要多说一下的是，词这种文学形式，最初是作为歌舞伎唱的小曲出现的。最后能发展为一种伟大文学形式，一定是以一种高度发达的民间社会和市民文化为前提的。从这一点也能推想宋朝民间的发达和富裕程度。

技术广应用

在技术层面，宋代的航海、造船、医药、工程、农艺等等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大发明当中一半多都是宋代以前出现的，但它们全都是到了宋朝才获得广泛应用的。

任何一种技术发明，要想能够获得广泛应用，一定得以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为前提。宋代发达的民间社会经济，刚好就提供了这个庞大的市场。

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大宋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富裕，而又进步、开放，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它拥有中国古代最高的社会自由度。

换句话说，就是朝廷对社会的压制力是很小的，这样民间的创造力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大宋朝廷对于社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

如此之弱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 ，对内倒是自由了，对外安全上怎么办呢？

其实也好办，只要有钱，花点钱就解决了。只要对内足够自由，就能足够有钱。也就是说，大宋是把各种军事问题都转化成了财政问题。

实际上，这套打法首先是用在大宋内部的。

你一定听说过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请高级将领们喝酒，在酒宴上故意感慨，说不知道哪天又会有别人被麾下士兵拥立为皇帝，黄袍加身。

将领们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回家后纷纷交出兵权，赵匡胤则给了他们大笔的金钱 田宅。君臣相安无事，北宋成了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功臣的朝代。这就是大宋对内以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

对外，大宋通过提供岁币向大辽购买和平，相当于帝国对外以财政手段和平解决军事问题。

这套打法对外能奏效，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有一个能够长期期做交易的对手，财政方案才能执行。

如果对手总是没几天就死了，那就任何财政方案都没法落实了。幽

云十六州的重要性于是浮现出来了。

我们上面讲刚说过，幽云十六州让大辽帝国有有了长寿的基础，大宋能长期做交易的对手就有了。

草原上还有时不时冒出来的游牧部落，大辽会定期地到草原上扫荡一番，消灭这些可能构成威胁的部落。

大辽本来就有草原的一面，做这种事情驾轻就熟。这反过来让大宋不再头疼什么草原部落的问题。

在大辽那边，因为有了幽云十六州，又有了大宋的岁币，已经有效地解决了自己的财政和治理问题，也就没有多大兴趣南侵。

因此，在1004年的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未曾发生战争。

如果大辽是个短命帝国，大宋必将面临草原上各种无序力量的冲击。那么大宋的选择就很有限了。或者会更早地亡国，或者要不亡国，就得像后来的大明一样，对社会进高度控制，以便确保国家的动员力，应对北方的威胁。

对社会严厉控制，就不会发展起富裕的社会和优雅的文化。因为那都是基于和平与雍容的环境才能出现的。

从这个角度看，被割让的幽云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头之病，但实际上是其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进入大宋，中国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经济、社会、文化

都高度发达。所有这一切的发达、繁荣，都以政府对社会的压制比较轻，社会拥有一种和平雍容的环境为前提。

之所以大宋能够拥有这种环境，在于北边的大辽是个长寿的草原帝国，大宋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对手，可以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因此，幽云十六州是大宋的安全保护伞的必要骨架。

从后世的视角来看，中原帝国选择与草原帝国合作，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是个最低成本的选项。

中原帝国由此不面临外部威胁，不需要强大的动员与控制机制，于是其社会层面有着高度的活力。后世拒绝以财政方案解决军事问题的大明，与大宋正好构成鲜明对照。

但是当时的人却未必都这么想，很多宋朝人也感觉还是要富国强兵，才能扬眉吐气。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另一位伟大的人物司马光，则因此成了王安石的政敌。他们的争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那他们究竟是在争什么呢？这会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23|王安石与司马光在争什么

北宋年间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斗争，也就是求新变革和保守传统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变法努力的一个缩影。

这一讲来说一下北宋年间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就是王安石变法。

说王安石变法里面一个主角肯定就是王安石，但还有另一个主角，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砸缸的那位—司马光。

这两位都是宋代的名臣，但是在变法这个事儿上针锋相对，成为最大的政敌。

那他们两个究竟是在争什么呢？简单说来一句话，是在争究竟怎样才算一种好的政治。

两个人肯定是都想要好的政治，问题是他们俩对于什么叫好，标准不一样。

王安石认为如何才是好的政治呢？是勇敢去创新，守旧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但是司马光就不这么认为了，他说：假如你连传统都不尊重，那你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不拘小节的王安石

王安石这个人超级不拘小节，有一个特别好玩儿的小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一个朋友请他吃饭，然后饭后就跟王安石的老婆说，我终于知道你们家老王爱吃什么了。前几天吃饭，他把一盘鹿肉给吃得精光，一点儿没剩。

王夫人听了就笑了，你是不是把这鹿肉放在他眼前了，等下次吃饭的时候你换盘菜试试。果然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王安石就把他面前的一盘菜给吃得一点儿不剩，而旁边放着的鹿肉看都没看一眼。

从这个故事能看出什么呢？王安石这个人超级不拘小节，他只关心自己内心真正关注的大事，其他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那王安石真正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变法。

为什么要变法呀？因为大宋咱们上一讲说过虽然不积贫，但是它积弱。它面对大辽、面对西夏的时候始终国力不振，王安石就想我一定得想办法改变这个状况。

北宋到了王安石所在的时代，已经统治了有快一百年了。由于一些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就形成了大量的冗兵冗官，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对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你不能改革的话，国家很快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虽然咱们在上一讲里面说过，由于有了幽云十六州，大辽就成了大宋的保护伞。但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家，你不可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别人的善意上面，你肯定还是觉得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更保险一些。

那么，王安石觉得真正的大事是什么？必须要经邦济民，要变法，这才是值得大丈夫追求的事业，其他的事儿都是鸡毛蒜皮。

王安石推行新法

王安石获得了宋神宗的重用，开始了变法。他虽然有着一腔的报国

热情，变法的效果却一点都不好。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他推行的几个新法。

首先，军事方面有一个叫做保甲法。把乡村的百姓十家一组编成一个兵民一体的结构，每家里面要是有两个男丁以上的就要抽一个人出来，农闲的时候军训。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可以节约养兵的费用，这是军事方面的法律。

其次，经济方面的法律—青苗法。规定到了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以由官府给百姓贷款，收取比较低的利息。当然在今天看来这个利息不低，但是比那时民间的高利贷要低很多，用这个办法来缓解民间资本不足的困境，减轻百姓的压力。

还有一个法叫做市易法，就是在开封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负责在产品滞销的时候政府收购。在产品短缺的时候再卖出，用来平衡市场。

还有人事方面的法律，他颁布了一个叫做贡举法，就是要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在考试的时候不再考那些经典了，而是要考经世致用的学问。

刚开始看上去，你会觉得这法令不错，既能够节省军事的开支，又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能筛选出真正能干事的人。

所以王安石曾经夸口，说这套新法要是一旦能够施行，那朝廷根本不用向百姓加税，照样能让国库充实起来。但是等他真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新法推行失败

咱们先说这个保甲法。保甲法是把老百姓都给编成兵民一体的组织结构，王安石设计这个法令的时候，是有着非常高大上考虑的，要复周礼，但是他失败了。

为什么呢？最初的周礼实际上顺应的就是一个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把这个社会结构整合一下就成了周礼了。

宇文泰在统治北周的时候，北周是有这么一种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所以宇文泰复周礼是能够成功的，但到北宋不一样了。

前面讲过，到了北宋中国历史就从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了，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早就没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王安石要搞的保甲法，就不是顺应现成的社会结构做出的一种整合，而是要把现成的社会结构给彻底打乱，重搞一个。你说老百姓能受得了吗？

比如经济方面的青苗法和市易法，这两个新法你初看上去是想要帮助老百姓获得更好的融资机制，以便刺激市场的经济流通，让朝廷获得更好的财政基础。

但是这些法律要想能够有效实行的话，一定得有比较清楚的现代法律基础，市场才能自动运转起来，才能足够流畅。问题是这些法律基础在当时根本就没有。

那结果怎样了？这些法律运转起来就是当官的胡乱调配，甚至强迫老百姓必须得贷款，老百姓肯定更受不了了。

当然了咱们也得客观点评价，在王安石那时候，他是不可能想明白这些前提条件的，咱们这是事后诸葛亮能够说明白。所以，王安石不可能想得到这些新法在运转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现实是，新法的运转确实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于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很多人批评王安石。说这新法完全是胡闹，一定会把国家搞坏，而这些人出来一通骂之后，皇上就开始犹豫了。

王安石不管不顾的个性马上就起来了，他充满豪气地说了一段特别有名的话——“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什么意思？天灾、人们的非议、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用怕，只要你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要排除所有这些外部的干扰。

司马光这帮人已经忍了王安石很久，早就很不满了。等到王安石啥都不用怕的说法一出来，舆论更是一片哗然，对王安石又是一顿猛批。

王安石也火了，马上就把司马光这一派的人陆陆续续都赶出朝廷，贬到地方去了。司马光本人级别太高了，没法贬到地方去，于是就哄到洛阳，让他赋闲。

当然这个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也不是坏事，司马光就是在洛阳赋闲的这段时间写出了《资治通鉴》。

政治原则之争

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安石和司马光究竟能竞争的是什么？他们争的实际上是一种最根本的政治原则。

在王安石看来旧法早就不行了，要行的话，不至于被西夏这种小破国家给欺负了。这些新法对国家好处颇多，就算有一点瑕疵，你们也应该帮我改进，而不是劈头就骂。

在司马光看来不是这样，他说老王你那能叫瑕疵吗？这完全证明了你那根本就是胡闹，你要想治国首先得老成持重，不能依照一些异想天开的念头把天下搅得不安宁。老王，你得知道要是把秩序搅乱很容易，但是要想恢复起来可就难了。到时候遭殃的是谁，还不是老百姓吗？

王安石一听，火更大了，啥叫异想天开的念头啊？没看我那新法是复周礼吗？你再老成持重，你还能老得过周礼去？既然你们这帮家伙不愿意帮忙，还拖后腿，我不用你们行吗？我就用新人。于是王安石的那套人事改革方案就派上用场了。

但问题是双方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道德感比较强的人肯定就不愿意跟王安石混了。因为王安石这个人个性确实太奇葩，的确是不容易合作。再加上他以复周礼的名义连祖宗之法都可以不要了，那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君子不会来的，各种能力很强但是心术不正，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就被王安石提拔起来了。

当然，王安石本人是非常重视道德的。王安石曾经点评战国时期很有名的齐国的孟尝君，他说世人全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收拢天下的人心，各种人才全都愿意为他所用，鸡鸣狗盗之徒他也能用起来。

王安石非常看不上，他说就凭齐国那么强大，要真能得到一个人才，绝对就能压制住秦国称霸，你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吗？正是因为孟尝君门下有一堆鸡鸣狗盗之徒，所以真正的人才才不来。

王安石想得当然是非常清楚了，但是这种话说起来很容易，真干起来就不一定那么回事了。肯为王安石所用的人，我给你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你就知道都是什么货色了。

这个例子是谁？蔡京，就是《水浒传》里面那个有名的大奸臣蔡太师。蔡京这种人确实不管祖宗之法，而且特别能忽悠，他把宋徽宗一通忽悠。于是北宋的政治水准就越来越差劲，最终就亡国了。

那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咱就能看出，司马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祖宗之法了。

北宋已经进入到平民社会了，那么在更早的封建社会和豪族社会里，实际上社会本身对于皇上的制衡能力非常强。但是到了平民社会，社会里对皇上的制衡能力就越来越小了，传统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还能够用来制衡皇上的东西了。

那传统是什么呢？祖宗之法。如果皇上对祖宗之法都没有敬畏了，那问题就大了。官僚本身是皇上意志的延伸，如果祖宗之法可以随便就被突破，蔡京这种人就会以皇上之名干各种坏事。

但是咱们在前面也说过，王安石变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宋过去的一系列做法真是不行了，必须得变，老路根本维持不下去。

司马光所强调的祖宗之法就是这条老路，确实能够对皇上和官僚构成约束，但问题是现实面对着一大堆问题，这怎么办？司马光能解决吗？

大宋在这种时候就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境地，既需要王安石的改革，也需要司马光的稳健，但却很难找到这两种政策的均衡点。

所以到了力挺王安石的宋神宗去世之后，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就随着皇位的变迁而多次的此起彼伏，这两个党就开始了非常激烈的竞争。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还活着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是君子，所以他们虽然有党争，但是不会失去君子之风。

他们的后继者就不一样了，都是一些烂人。所以到后来的争夺水准就越来越烂，再也没有人从天下情怀这种大格局出发，堕落为纯粹私人的争权夺利。

大宋的结局

到了北宋后期的这几十年里，就沦落到了越来越烂的政治水准里面。大臣和皇上们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以至于到了北方出现剧变的时候，大宋一方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新的格局，居然觉得大辽是自己的敌人，要跟新兴的女真人合作。

大宋根本就没想过大辽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女真是一个新兴的蛮族，要是打败了大辽的话，怎么来对付女真？而且女真是没有接受中原文化的，一定会对付大宋，到时候怎么办？大宋根本就没想这事。

且把这些放一边，另一方面大宋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担当，和女真人达成了一个联盟的条约，要联盟联手来打败大辽。但是达成这个条约之后，大宋不停地占小便宜，被女真人揭露之后又百般地遮掩。

举个例子，比如双方都约定了不许从对方占领的地盘招降纳叛。那么大金把大辽的土地占领了之后，上面有一些还是汉人，所以大宋就偷偷鼓励那些土地上一些原来是大辽将领的汉人来投降自己。

但是等到真的有将领从那边投降过来了，大宋肯定是违约，金国就来找大宋算账，大宋矢口否认。大金不干了，把证据拿出来，大宋傻眼了。于是，就只能从军营里面找一个和前来投降的那个人长得很像的人杀掉，然后把头颅给大金送过去。

大金一看不对劲，是假的，于是大宋就不得不再把那个真的将领再杀掉，再送过去。可是这么搞来搞去，你觉得大金还能信任大宋吗？

另一方面，那些来投降大宋的辽国汉人将领，他还能信任大宋吗？所以等到宋、金再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人很容易就投降大金了。

类似于这种低劣的政治行径，在大宋跟大金打交道的时候太多了，各种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最终也就导致了极为屈辱的靖康之变。差不多可以说北宋被大金灭亡几乎是咎由自取的。

朱熹评价靖康之变

到了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大儒叫做朱熹。他评论靖康之变这段历史特别的愤慨，痛斥说：

“你看看宋徽宗那一朝有一件事做的是对的吗？古代大国的君主就算再差，总还是有一两件大事能做对，就算这样都免不了要亡国。可是宋徽宗那会儿，连一件小事都没做对过，就算没有女真人南下，这国家也别想能搞好。女真人是一帮夷狄，他们和咱们签约了说话还能算数，

咱们却反反复复地违约，能不把女真人惹毛了吗？”

朱熹不是小人物，他集宋代儒学之大成，他的学说影响了整个东亚的儒家世界，一直到清朝末年。可以说从他往后一直到清末，东亚世界的精神秩序是由朱熹所决定的。你就可以想见，如此之伟大的大儒，他来批评北宋末年政治的时候，是多么的痛彻心扉。

但是如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后继者不是如此低劣，大宋的变法是否有机会成功呢？朱熹认为还是没戏。

他在大宋全盛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忠臣良将，但是面对内政外交的各种困境还是没办法，只能挺着。到了后来变法闹到党争一起来，天下就没法不乱了。

上一讲里我们说，大宋的富裕繁荣主要是在民间社会，而这种富裕繁荣得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障才可持续。

但是大宋在政治上有一种先天的困境，导致到了北宋的后期进退为难。往前进的话，那就是王安石的路数，但是他的后继者什么人呢？多半都是蔡京这种人。

往后退的话，就是司马光的路数，但是内政外交上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怎么办？只能是最终被女真人灭国了。

女真人灭亡了北宋，成为了此后东亚大陆的头号强国，南宋甚至一度要对女真称臣，奉大金的正朔。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讲了北宋重要的一段历史—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在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上产生了分歧，王安石要求创新，而司马光则提倡尊重传统。

王安石所开创的新党和司马光所开创的旧党，开始了非常激烈的党争。最后导致北宋的政治水准越来越差，最终被金国灭亡。

但是看大金历史，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它的政治秩序在它立国之后不长时间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而这个变化跟金太宗有一次被打屁股相关。

更深远的衍生后果是什么呢？—蒙古的崛起。这背后有特别有意思的历史逻辑，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

24|金太宗挨板子，促成蒙古崛起

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二元帝国的情况下，一个来自关外的帝国居然主动放弃了二元帝国的身份，没有了草原视野。趁着这个机会，成吉思汗一下就崛起了，一统了蒙古高原。

这一讲咱们来说一下女真人建立的大金朝，看一下金朝的一个童年阴影是如何让金朝最终亡国的。

这个童年阴影是跟金朝的第二位君主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相关。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大辽还没有被完全灭掉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到后来彻底灭掉大辽和北宋的是金太祖的弟弟金太宗。可以说金朝是太祖和太宗这两个兄弟联合开国的，金太宗好歹也能算半个开国皇帝。

但是金太宗却曾经被大臣们拉下龙椅来打了一顿屁股，这个事情对后续的皇帝们来说肯定算是帝国的一个童年阴影。

这个童年阴影是如何给蒙古的崛起造成了历史机会呢？这跟咱们讲过的中原和草原两种不同的政治逻辑相关。

金国的童年阴影

咱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金太宗会被大臣们打屁股，这个事儿还是跟他大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留下了一个规矩有关。

金太祖当年在起兵的时候，那会儿的女真人可是非常的贫穷落后，回想一下咱们前面讲过的组建政权所需要的财政逻辑，你就能知道金太祖手下的那些重臣肯定不是乖乖听话的臣子，而是一群军事贵族合伙

人。

因为皇上家里也没余粮，他没钱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些贵族。既然是要共举大事，太祖就跟重臣们定下一个誓约：国库里所有的财物除非是打仗才可以用，平时任何人要是敢随意乱动用这些财物，不管是谁都要杖责二十，也就是说要打二十大板。

这个时期，金国的皇上家真是没有余粮。

举一个例子，北宋末年，宋徽宗曾经派了一个使臣走海路，躲开大辽跑到女真人的地盘上和他们结盟。

这个宋朝使者到了金国人的地盘上一看，这叫什么皇城啊？宫墙就是用榆树、柳树什么编成的篱笆墙，而旁边好多篱笆、女人和狗，放猪赶羊的老百姓就在这皇城的院子里面随便便出入。

皇宫也就是一个简单的房子，皇上跟皇后这两口子并排往土炕上一坐，旁边有一个贵妃忙前忙后招待客人。

金太祖还得跟使者解释：您别见笑，我们这儿自古就这风俗，这房子冬暖夏凉，非常好，我们不用劳动百姓盖宫殿了。

金太祖本人他和手下的大臣们虽然是有君臣的名分，但是他们关系跟亲密战友差不多，经常勾肩搭背，一块儿喝酒、摔跤、泡澡，什么都干，没有任何的尊卑上下之分。而且他们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也都是高度平等的，一旦事情说定了马上严格执行，赏罚分明。

所以朱熹也曾经感叹，说金国赏罚如此之分明，那肯定能成大事儿。

到了金太宗刚上台的时候，他也严格地遵守了太祖和大臣们的约定，对国库绝对不敢乱动。但是这个扛不住时间长，日子长了之后，太宗的心思就开始活动了。

有一天这哥们儿终于扛不住了，他就偷偷地打开了国库，抓了一把

财物，拿出来就跑了，出去换酒喝了。

很快，国库里面东西没了，丞相清点国库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马上丞相就告诉了宗室的一个重臣，叫做完颜宗翰。

宗翰听了之后很快就调查清楚，这是皇上干的，他毫不客气，跟其他重臣执行了太祖的誓约，把太宗从龙椅上给揪下来，结结实实地打了二十大板，打完之后再把他请回到龙椅，然后跪下磕头请罪。

打都打完了，太宗还能说啥呀？太宗只能喝完压惊酒说，爱卿们果然是栋梁之材，恕你们无罪吧。太宗说是这么说，但心里肯定窝囊的很，肯定心里会有阴影，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被大臣打屁股的皇上。

金国的汉化

在太祖的时候皇上家里没余粮，手上没钱，他只能靠着跟重臣们平等相待，生死与共，才有可能带来凝聚力和战斗力。

但是太宗的时候可再也不是那种没钱的状态了。后来还有一位宋朝使臣，也有过记载，这位使臣比上一位出使的时候晚了三年，这会儿大辽是刚刚覆灭，而大金还没有来得及进攻大宋。但是大金已经从大辽掠夺到了大量的财富，这帮兄弟就开始奢侈了。

于是这位宋朝使臣来到了金朝的首都上京，就在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县。金朝人在这里修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皇宫，宫廷里也都变得特别复杂。

他们御膳的时候吃的菜也都还是很粗糙的东北菜，皇上跟大臣们一块吃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但是在吃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地讲排场，各种奢靡。太祖时期的俭朴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有了这么大的财富之后，皇上手里也终于有办法来控制那些重臣了。太宗还是开国的皇帝，所以他对开国的各种艰难他还是有历史记忆的，他本能的还会服从当年的誓约。

但是不能指望后面的皇上仍然重视那个誓约，更何况太宗就是因为重视这个誓约屁股就开花儿了，后面的皇上一想到这个肯定会有更大的动力要去控制群臣。所以从继承了太宗皇位的皇上金熙宗开始，大金就迅速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对皇上来说，汉化一举N得。

首先可以很有效地统治从北宋抢过来的庞大的中原领土和大规模的汉族人又。你假如完全不肯接受这种汉化的话，你没法统治他们。

但在这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皇上想要改变跟那些军事贵族的合伙人关系了，怎么样能改变呢？

只要你汉化了，你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用这套官僚系统就能够把贵族、重臣，把他们都给压制住，建立起一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秩序。

你再也甭想跟皇帝勾肩搭背，一块儿喝酒、摔跤、洗澡、光屁股了，皇上到了这会儿就可以一言九鼎。

这种权力的诱惑绝对没法抗拒，更何况还有那种皇上被打屁股的童年阴影给助攻一下。

所以咱们在史书里面就能看到一种很矛盾的现象。按照史书的记载，金熙宗以及金熙宗之后的皇上海陵王，这两人都是特别残忍的暴君。

但史书里面还记载他们对百姓都还不错，尤其是海陵王特别照顾百姓。按说暴君就不应该亲民，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暴君如此亲民？这很矛盾。

很简单，这俩暴君，为啥他们被叫做暴君？就是因为他们要压制贵族。而历史是谁写的呢？历史是贵族写的，贵族写历史，你又在压制我，当然你就是暴君了。

反过来对这俩皇上来说，为了能够有效地压制贵族，他就得在贵族之外去找支持力量，去哪儿找呢？老百姓，所以他们对老百姓都还不错。

海陵王完颜亮之所以比金熙宗对老百姓还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金熙宗上台是合法继位的，他有正当性，而海陵王是刺杀了金熙宗上台的，他正当性非常之不足。

所以对这俩人说都得到贵族之外去寻找支持力量，但是紧迫程度不一样，海陵王的紧迫程度更高，所以他在政策上会更加地向老百姓倾斜。

那为啥这个皇上叫海陵王，而不是正经的皇帝谥号呢？因为这哥们儿他也是被人给推翻的。

而且由于他的皇位来的不正，所以他被推翻之后皇帝的称号就被剥夺了，只保留了他当皇上之前的称号，叫海陵王。

金国迁都

海陵王虽然他的皇帝称号被剥夺了，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儿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什么事儿呢？迁都，把大金的首都从今天的黑龙江一带给迁到了北京。

回想一下咱们前面讲过好几位皇上都迁过都，北魏的孝文帝迁都、隋炀帝迁都、武则天迁都，回想一下这帮兄弟，海陵王迁都的意图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是什么呢？远离军事贵族的大本营。只要远离了这个大本营，就能够有利于皇上极权，那皇上当起来多痛快。

不仅如此，海陵王的皇位不正，他必须得建立更大的功绩才能让群臣服气，怎样才能建立更大功绩？一统天下。

所以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还不够，他还想要进一步的迁都，要迁都到开封，而且要发兵南下，要灭掉南宋，一统天下。

一旦到了那一步，他就名正言顺天下控主，丰功伟业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金太祖、金太宗，群臣就没人敢再多说话了。

海陵王一想到这个伟大理想夜不能寐，所以这哥们儿还专门写过一首诗，要歌颂他这个伟大理想，后面两句叫做“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但是没想到，就是在他要南下灭宋，打到了长江边上的时候，他离军事贵族的大本营太远了，后院就起火了。

贵族们发动了政变，推举了驻扎在今天辽宁地区的另一位宗室登基，这个人就是后来被人们尊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

但是你别以为金世宗是贵族们推举出来替代海陵王，他就愿意被贵族们控制了，不是的。他马上继承了海陵王的重要政策——定都北京。

贵族们不是这么想的，贵族们把金世宗一推举出来，马上就跟他说要还都到黑龙江，金世宗说不行，还是得定都北京。而贵族最后也没辙，真就定都北京了。

从这里面能够看出什么呢？经过金熙宗跟海陵王的两代统治，贵族们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尤其是在海陵王统治的时候，他大肆地屠杀宗室的贵族。

这些贵族能够约束皇上的能力已经大幅下降了，那么皇上和贵族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力量均衡。所以金世宗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不

怕被人打屁股了。

金世宗以及在他之后继位的金章宗，这两个皇上汉学的修为都非常之高。

举一个小例子就知道了。北宋的亡国之君是宋徽宗，宋徽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皇上，但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书法天下一绝，就是瘦金体。

金章宗把瘦金体模仿的惟妙惟肖，以至于到了今天有人拿出那个年代的书画文物，一看上面有题字，分不清这到底是宋徽宗还是金章宗的。可见他们的汉化达到了什么程度。

蒙古的崛起

但是金国一旦汉化到这个程度，一个衍生性的效应就出现了，就是蒙古的崛起。这个历史过程肯定跟那童年阴影相关。

怎么相关呢？那个童年阴影的影响太深远了，以至于到了金熙宗之后的金朝皇上，全都放弃了大辽那个二元帝国的政策，建成了一元帝国。

大金一旦被建成一元帝国，那它的自身定位就变了。

所以金朝的统治阶层曾经很明确地说过，我们大金和大辽不一样，大辽的根基在哪儿？在燕山以北的临潢府，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市下面的巴林左旗一带。

但是我们大金的根基不一样，我们大金的根基在燕山以南的燕京。

这摆明了就是说我们大金的政治逻辑不是草原的，它是中原的。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因为只要你仍然确认自己有一个草原根基，那

皇上势必还是要受到草原军事贵族的约束。

但中原这边不一样，贵族早就没了，这边只有长期官僚统治的历史，贵族是没法跟皇上叫板的。

所以金朝要把自己的统治根基放到长城以南，确认自己是个中原王朝，最大的可能性就在于当年的那个童年阴影，印象太深刻了。

咱们再回想一下前面曾经讲过有一位皇上，他的帝国本来也是个二元帝国，但是他丧失了草原视野，拒绝承认帝国的草原根基，最终就出了大事儿了。谁呢？唐玄宗。

从金熙宗开始，金朝的政策都跟唐玄宗这个风流帝王差不多了，草原视野也全都丢了。

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大金在统治了几十年之后，它居然开始修长城了，你听说过任何一个草原王朝要修长城的吗？

可是大金居然就开始修长城了。而且这个长城修到哪儿呢？一直修到大兴安岭，因为东北是龙兴之地，是老家，这地方肯定得保住。

但是蒙古高原那种地儿给它隔出去算了，草原上一帮蛮夷，不能跟他们混一块儿。

他这么搞什么意思？大金只要保住自己农耕地区的这一小块土地就算了，草原上他放弃了。

大辽帝国是有着二元帝国属性的，它有草原视野，这种草原视野让它懂得如何去有效地利用和操纵草原上的部落矛盾，分而治之，它可以非常好地控制草原。

但是大金放弃了二元帝国，它也就没有了草原视野，那草原的事儿它还能搞得定吗？肯定搞不定。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成吉思汗一下就崛起了，一统了蒙古高原。

在这之后大金面对蒙古帝国的压力，应对得非常之拙劣，看上去完全就像当年大宋面对大金，甚至比那还要差。

到了金朝末年首都被人攻破的那种惨状，比北宋末年的惨状有过之无不及，几乎就是个翻版。

到了这儿金朝的历史就结束了，金朝的历史有点像一个插曲，我倒不是说金朝的历史不重要，而是说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二元帝国的情况下，一个来自关外的帝国居然主动放弃了二元帝国的身份，肯定没有办法维持住帝国。

在这之后要想组成一个庞大的统一稳定的帝国的话，它必须得是一个二元甚至是多元的帝国。

大金用自己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我们讲了金太宗因为破坏誓约而被大臣们打屁股，成为了金朝帝国的童年阴影。

受这个阴影的影响，大金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以至于放弃了二元帝国的属性，失去了草原视野。它带来的衍生效应是蒙古的崛起。金朝应对草原势力的攻击，以失败告终。

既然大金失败了，在这之后的历史很快就要进入到元朝了，这是一个震古烁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

今天咱们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有些人在说，元朝不是中国的朝代。

但是通过咱们这门课的讲述，你肯定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元朝的统治者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自己呢？他觉得自己是谁呢？以及推翻了元朝的明朝，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元朝呢？

把这个东西说清楚，这对于咱们理解究竟何为中国非常之重要，这会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

25|从元朝看中国历史的正统性

元朝的时候人们对于正统性的认知，可以分为四种。蒙古人有两种

从大蒙古帝国的视角和从大元帝国的视角；汉人也有两种：身份汉人对于正朔的认知和南人对于正朔的认知。

这一讲咱们来说一下元朝的正统性问题，咱们来看一看元朝是如何理解自身的，以及明朝人又是如何看待元朝的。

正统性这个事儿对中国历史来说可太重要了，儒家学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正统究竟在哪儿。

同样，咱们要想理解一个超越于中原之上的中国，理解一个作为体系的中国的话，正统性这个问题同样也是个核心的问题。

近年来咱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流传的文章，它说元朝、清朝都不是中国的朝代，因为它们不是汉族人建的。

这个说法肯定是很荒唐的了，但是很好玩儿的是，这么说的人很多都会是明朝的粉丝，因为明朝曾经有过一个口号，叫做“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它重建了汉人的王朝。但是咱们来看一下，明朝人又是怎么理解元朝的呢？

明朝人如何理解元朝

有一篇复旦大学的姚大力教授写的文章，叫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这个在网上能搜到，我推荐你搜来读一下。

姚大力老师在文章里面引用了钱穆先生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钱穆先生曾经注意到，明朝的人对于元朝的灭亡并不是从胡汉之分的角度理解的，他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什么赶走了蛮夷，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和以往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他当然说过驱逐胡虏这个话了，但是他经常说的是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元朝虽然是夷狄建立的，但是它统治了天下将近一百年，而天下的百姓全都有赖于元朝的生养。

所以朱元璋在即位诏书里面说，宋朝统治了中国三百多年，但是后来气数已尽，天命就流转到了大漠当中崛起的元朝。又过了一百来年元朝的气数也尽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明朝获得了天命，但明朝这天命不是从元朝，而是从群雄手中夺得的。啥意思呢？朱元璋完全承认了元朝统治这一百来年的正当性。

更好玩儿的是当时甚至有一种流言，说朱元璋手下的头号大将徐达奉命北伐。但是徐达快打到北京的时候却故意地放了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

等到他再班师回朝的时候，朱元璋就责备徐达，徐达就反问朱元璋，就算我已经把他给打跑了，可他毕竟曾经是天下之主，我要真把他抓回来你咋办？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人家曾经是皇上，你敢杀了他吗？你要杀了他，你让天下人怎么看你？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的天下人对于元朝的皇室没有任何认同，只有仇恨的话，徐达的这种顾虑就完全没有必要。

就算这个事儿是个流言，但居然这种流言能够出现，那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元朝的。

钱穆先生更注意到了，在明朝的初年曾经有过很多元朝的遗民。什么叫遗民呢？遗民就是自愿地认同前朝，而不是本朝，作为前朝遗留下来的有效忠者。

打个比方，清朝的初期就有很多明朝的遗民，在民国的初期也有很多清朝的遗民，等等很多了。

在明朝初期的这些元朝遗民，你可别以为他们都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这些遗民里面有大量的是汉人。

非常典型的是一个叫做张昶的汉人，这位兄弟在元朝的时候曾经当过户部尚书，就是财政部长，而在元朝还没灭亡的时候他就奉命出使到朱元璋的地盘。

朱元璋一看这人很能干，就把他留下了，还给他封了一个官儿，封成副宰相，这朱元璋对张昶绝对是有知遇之恩了。只要张昶愿意效忠朱元璋，那前途肯定是一片大好。

但是张昶他就亲又说，自己是“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仍然心怀故国，不愿意真的给朱元璋办事，反倒故意给出了不少坏招，朱元璋最后只能把他杀了了事。

注意这是一个纯正的汉人，他却“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是怎么看待元朝的。那些说元朝不是中国朝代的人，你回到当时试试看。

元朝人如何认识自身

明朝人的这些历史认知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那么咱们再来看看，元朝人他们是怎么认识自身的呢？

当然这个情况就非常复杂了，所谓元朝人的认知，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一个是元朝蒙古人的认知，再一个是元朝汉人的认知，这肯定得分开来说一下。

咱先说蒙古人。对蒙古人来说这事儿也很麻烦，它也有一个双重的

认知，一个是从蒙古帝国的角度，再一个是大元帝国的角度。

从蒙古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肯定认为他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帝国下面分了好几支，有统治俄罗斯地区的金帐汗国，有统治中亚地区的察哈台汗国，有统治西亚地区的伊利汗国，还有一个就是统治东亚地区的大元帝国。

但是大元帝国很特殊，大元帝国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大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元帝国是有一种特殊地位的。

而且大元帝国是大蒙古帝国里面最繁荣、最富庶的一支，以这一支为基础，蒙古人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秩序。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所有这些东西全都被他们给整合在一块儿了，形成了一个空前的东西方大交通、大融合的一个局面。

游牧世界、农耕世界、海洋世界，所有这些地方都在欧亚大陆的规模上被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蒙古帝国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各种古典的帝国和文化，当然它也超越了蒙古自身了。



元朝时的蒙古帝国

这个是大蒙古帝国的角度，可是从大元帝国的角度来说，蒙古人必须得对儒家的世界观做一种回应，否则没法统治这么庞大的汉人群体。

那怎么回应呢？最深远的一个动作就是为前朝修史，也就是说写前朝的历史。新的朝代为前朝修史这肯定不是一个草原传统，草原上没谁去写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儒家传统。

对儒家来说只有修了前朝的历史，才能说清楚这个朝代是如何继承了前朝的天命，从而才能让帝国的法统获得一个清晰的表达。

元朝在给前朝修史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前面不是只有是只有一个朝代，它前面有宋、辽、金这三个朝代或者说三个国家。那到底把正朔放在哪儿呢？正朔就是正统性，它到底把正统性放在哪儿？

这个事儿很麻烦，如果你把正朔归给大宋的话，那大元的草原身份，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如果你把正朔归给大辽和大金，这从儒家理念上又肯定说不通。

这到底怎么办？人们对这个事儿肯定是争吵不休，结果是从忽必烈的时代就打算修史了，一直到元朝后期一直都没有修成，就是因为这种争吵。

元朝汉人如何认知正朔

那么说到了这儿，咱就又得转过头来看一下元朝的汉人是怎么认知正朔这个问题了。因为很多的争吵都是发生在汉人内部的。

但是经常被咱们忽略的是，元朝的汉人对正朔这个事儿也有双重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跟元朝内部人们的身份差异有关系了。

咱们在历史课上都学过，元朝是把帝国内部的人给分成四种，分别

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

南人指的是1279年才被蒙古所征服的南宋的人。汉人是谁呢？汉人是1234年的时候就被蒙古征服的金朝统治之下的人。

当然了，这个汉人里面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汉人之外，也包括那些已的义个然经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等。

到了金朝的后期，金朝的人口已经非常膨胀了，全国人口超过了5000万，虽然经过蒙古的征战，人口的损失非常严重，但也还是千万量级的。

其中契丹跟女真人的人口占比例非常之小，主体就是通常咱们所说的跟跟其汉人，那这个就很好玩儿了。

咱们今天的语境之下所说的元朝的汉人，实际上里面包括两个群体，就是元朝所划分出来的汉人和南人。这个在今天的语境之下很模糊，说不清楚。

所以为了清晰起见，咱们在后面用俩概念，用广义汉人这个概念来指汉人跟南人加一块的这个群体，然后再用身份汉人这个概念来指原来金朝统治之下的那个汉人群体。

所以咱们要讲当时的汉人究竟是怎么看待正朔问题的，就一定得注意到当时的广义汉人是分成身份汉人和南人这两个群体的，而这两拨人对正朔问题的认知不一样。

在忽必烈统治的时候，大辽早就灭亡一百多年了，所以讨论大辽问题不会触动什么人的感情，大家可以比较客观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大金可是刚刚被大辽给灭亡了不久，金朝留下的人民多一半都活着，这些人就是早期的身份汉人。

在南宋灭亡之前身份汉人是大元帝国的主要人口。而这些身份汉人他们接受了金朝的统治已经一百多年了，所以他早就形成了对于大金非

常深刻的认同，有很多大金的遗民。

举个例子，比如元朝很有名的大诗人元好问，兴许元好问你没听过，但他的一首诗你肯定听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就是元好问写的。

元好问的高祖和曾祖都曾经在北宋当官，但是元好问本人是生活在金朝中期的，而且他本人在金朝末期也当过官，所以到了大金亡国之后，元好问坚决只作为大金的遗民，不到元朝政府任职。

那么对于这样一群高度认同于大金的身份汉人来说，如果你把正朔放在大宋，他们就得问一下了，包不包括南宋？假如包括南宋，那大金怎么算？

忽必烈的时候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很沮丧地得出一个结论，大金的地位就和五胡十六国时候的那些胡人政权差不多，只能在宋史的一个小角落里面混个身份了。

身份汉人肯定不能接受这个状况，这谁受得了，这一百多年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身份汉人肯定会坚持正朔在大金，更何况在南宋立国未稳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可以向大金称臣，奉过大金的正朔，那更应该说正朔在大金了。

但是南宋所留过大元的南人，就不能接受身份汉人的主张了。

因为如果大金有正朔的话南宋怎么算？南宋就只能在金史的角落里面混个身份了，这肯定不行。

而且大金也是认北宋，它是有正朔的。南宋是北宋的继承人，正朔当然是在南宋这边了。

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在正朔这个问题上完全卡这而了，没法往下聊了。

政教分离

假如正朔这个问题没法往下聊，那很麻烦，前朝的历史没法修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解决呢？最后索性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就给解决了，谁干的？到了元朝的后期，有个宰相是个蒙古人，叫做脱脱。脱脱说宋、辽、金这三个国家全都有正统，或者说正朔有仨，而不是一个，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脱脱来说这个事儿很简单，但对儒家传统来说这个做法匪夷所思。正朔只能有一个，因为天命只能有一个，所以身份汉人和南人才会吵得不可开交。

那么脱脱的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这里面就有一个更深刻的伦理观念了，就是说究竟什么才叫文明的代表？

对儒家来说必须得讨论文明问题，不讨论文明问题这根本就不叫正朔。而正朔所在就是文明所在，没有正朔的野蛮人

但是脱脱不一样，脱脱非常简单粗暴，他直接把正朔跟文明的关系给直脱脱切开了，对脱脱来说只要你这有个国家，你能组织起来一个政治秩序，你这儿就是正朔，跟文明没关系。

这很好玩儿，这就形成一个什么呢？一个政教分离的观念。

要解释一下的是，政教分离首先是一种基本的政治逻辑，它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的价值观。

政教分离所关注的是什么呢？政治是否必须通过宗教或者通过文化才能获得意义，还是说政治能够独立于宗教跟文化之外自己就能有意义。

如果政治是必须得通过宗教或者文化才能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合

一；如果政治可以独立于宗教和文化之外获得意义，那就是政教分离。

在儒家看来正朔就意味着文明所在，这个绝对是广义上的政教合一。但是如果按照脱脱的路数，你这到底有没有正朔，只看你是否有个国家，这就是广义的政教分离。

脱脱让宋、辽、金都有了正朔，都有了正统，这不仅仅带来了广义的政教分离，这也还带来一个东西，就是中原中新这样一种观念被他给打破了。

政教分离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根本前提，而元朝提前给中国做朝本的的政代现了一个实验。

本讲小结

说到这儿咱们总结一下，元朝的时候人们对于正统性的问题或者说对于正朔问题的认知，可以分为四种。分别是蒙古人有两种：从大蒙古帝国的视角和从大元帝国的视角；以及汉人这边也有两种：身份汉人对于份种的于正朔的认知和南人对于正朔的认知。

这四种视角加在一块儿，在一个帝国内部同时在争夺话语权，那这个对于正朔问题的讨论或者认知那就非常之复杂了。

这绝不是咱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个，你到底是中国的还是不是中国的、非黑即白那么简单。这种复杂性有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就是元朝末期的一个学者杨维桢。

杨维桢这个人是非常反对脱脱那种历史观的，在脱脱所主编的宋、辽、金这三部史书刚刚一问世的时候，杨维桢就马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

他采取的就是南人的那种史观，认为历史的正朔肯定是在宋朝这

边，要顺着北宋、南宋这个脉络延续下来。他这说法一出来马上国内很多人热烈地支持、热烈地赞成，并且到了明朝建立之后有好多人就试图按照杨维桢的这个说法来重新写宋史，把正朔从辽和金那儿给剥夺出来。

但是很奇怪的是，杨维桢本人到了明朝的时候，他却拒绝到明朝政府当中任职，他成了元朝的一个遗民。

这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了杨维桢自己在内心里面对于元朝正统性的认可。他对脱脱的拒绝并不是拒绝元朝有正统性，只是拒绝了脱脱认为正朔可以分为多个以及正朔不一定在中原的主张。

讨论了所有的这些复杂性之后，咱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网上所流传的那些文章，说元朝、清朝不是中国的朝代，因为它们不是汉族建立的，这种说法太浅薄、太荒唐了。这种人你要是把他扔到元朝和明朝去，一定会被人撕了。

元朝结束之后就进入到明朝了，咱们看明朝的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就是，它非常盛产奸臣，也特别盛产忠臣，这个现象很自相矛盾。

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咱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26|明朝为何盛产忠臣和奸臣

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特别盛产忠臣，也特别盛产奸臣，几乎每个皇上的治下都会有几个著名的大忠臣和大奸臣。这是因为明朝制度性的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权力，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

这一讲咱们来讲一下大明王朝。

取个特别的角度，我们看明朝的历史会发现，和其他朝代相比，明朝特别盛产忠臣，也特别盛产奸臣，几乎每个皇上的治下都会有几个著名的大忠臣和大奸臣。其他朝代很少有这么多的忠臣和奸臣。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呢？

老子在《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就是说只有家里的亲戚各种不和睦，才能显出来孝子，大家都很和睦的情况下，反倒显不出来；只有政治很糟糕，才能显出来忠臣，在政治清明的情况下，反倒显示不出来。

明朝有如此多的忠臣和奸臣，看来是政治很不清明？可是明朝还有个著名的特征，就是经常是皇上几十年不上朝，帝国还运转得没问题。政治不清明的话，帝国怎么能坚持得下去呢？

要解释这些问题，咱们需要把它放到一个大的历史中，对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来作个比较，就容易理解了。

皇权和皇帝的权力

要作这个比较，咱们先得区分一下经常会被混淆的两种权力，就

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和作为皇帝个人的权力。

这俩权力不仅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经常还有冲突。不同朝代，它们的冲突方式不一样，明朝盛产忠臣和奸臣，奥秘就在这里。啥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呢？它是一种以皇帝作为最高首脑的、与贵族或者豪族权力相对抗的制度，官僚体系是这种制度的工具。所以，强大官僚体系的存在，就意味着皇权有了强大的工具，皇权也就很强大。

但是，官僚体系必须是严格按照规则来行动的，原则上来说，皇上个人的意志也不能随便挑战这种规则，否则官僚体系就干不了活了。所以，皇上个人的权力，反过来会受到官僚体系的约束，不过皇上不一定愿意受到这种约束，总想要反制，就会和官僚之间发生冲突。咱们不能把作为制度的皇权，和作为个人的皇帝的权里，给混为一谈。

这个说起来太抽象了，咱们来具体比较下那几个朝代，用几个例自来看看吧。

唐宋：皇权由弱变强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是个豪族社会。豪族强大，官僚体系就弱小，皇权也就不会特别强大。咱们在第十三讲的时候讲过，这是唐朝皇上能够开明纳谏的一个很重要前提，也是隋文帝特别怕老婆的原因，因为他们要想能够统治，就必须与豪族们共治天下。

到了宋朝，进入平民社会，豪族没有了，大宋就建立起远远比唐朝要发达的官僚体系，皇权变得比唐朝强大得多。

这里还要额外多解释一句，皇权的强大，和帝国的强大，是两回事。

皇权是指对内的权力，帝国是指对外的权力。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帝国强大，但皇权并不强大；宋朝皇权强大，但帝国并不强大。

宋朝虽然没有与皇上共治天下的豪族了，但这种共治天下的信念还在，只不过豪族换成了士大夫。也就是说，宋朝人认为应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通过当官僚，来和皇上共治。这种情况下，宋朝作为制度的皇权很强大，因为其官僚体系很强大，但是宋朝皇帝个人的权力并不强大。

宋神宗朝就有个例自。有一次大宋对西夏战争失败，皇上很愤怒，打算杀掉一名对此有牵连的漕运官员，杀一儆百。没想到，宰相根本就不配合，跟皇上说，咱们朝代从来没杀过士大夫，您破这例可不大好。皇上犹豫了一下，说，那就把他刺字发配边疆吧。副宰相又上来了，说，要这样还不如杀了他呢。皇上蒙了，问，你这话啥意思？副宰相说，士可杀，不可辱！

皇上大怒，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痛快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副宰相也是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这种痛快事，做不得也好。

这个例子里可以看到，宋朝皇帝的个人权力是很受约束的，这不是因为有皇上搞不定的豪族，而是因为有强大的官僚体系，它是帝国的公共工具，体系的规则对包括皇上在内的所有人都有约束力。

但只要皇上的意志和这套规则不冲突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能够反抗的，就是强大的皇权，这和豪族社会大不一样。

元明：皇帝权力的上升

到了元朝，情况变了，草原上来的皇上不太容易理解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因为在草原上，可汗只能理解两种关系，或者是和其他军事贵族之间的共治关系，或者是和自己的私人奴仆之间的关系。

到了中原，皇上用巨大的财富把军事贵族们都养起来，共治关系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和私人奴仆的关系了。所以，元朝就没有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这种事，皇帝把官僚们都是当成自己的奴仆来对待，皇帝个

人的权力远远比宋朝要强大。

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的私人奴仆，那主人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哪有那么多规则的约束，要有规则，也是自己的家法，不是什么公共的规则。

于是元朝的皇帝就可以时不时就搞一把痛快的事情，不按套路来，这带来一个反向的结果，就是[元朝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远不如宋朝](#)。

元朝的奇葩诏书，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在元朝中期，皇上曾经给少林寺赐过一道圣旨，圣旨最后一段的原文如下：“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这就是当时的大白话啊，告诫和尚们，不合规矩的勾当，别做，敢做就弄你，这就是俺的圣旨，最后一句还依照蒙文语法倒装了一下，“圣旨俺的”。

圣旨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意志的表达，这种公共意志要有一定的规矩，所以咱们看通常的圣旨都是文字非常典雅又庄严，因为这代表着帝国的水准嘛。元朝这圣旨，俨然是个黑道大哥在给少林派训话。

官僚们看着这套打法肯定很无奈，不知道该怎么配合皇上。结果，虽然元朝皇帝的个人权力很强，但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却并不强，松松垮垮，因为官僚体系跟不上皇帝似魔鬼的步伐，皇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就不再强，元朝的社会经济因此相当繁荣。

至于朱元璋评价说，元朝之所以会失去天下，就是它对社会管得太松了，这大概和你对元朝的直观认知很不一样吧。

不过，朱元璋也是在大元朝成长起来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所以他经常有奇葩诏书。比如有一次有倭寇来侵犯沿海地区，朱元璋下诏，原文如此：“奉天承运，皇帝昭曰，告诉百姓每，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这绝对是史上最接地气的圣旨之一。但毕竟老朱家的皇帝都是出身中原了，他们能够理解官僚体系是帝国的公共工具，所以明朝的官僚体

系高度发达，这就意味着作为制度的皇权是非常强大的。

而有了元朝统治的历史，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信念也被打破了。所以，明朝的皇帝不能允许自己被官僚系统过分约束，不能太给那些士大夫们脸了。皇上一直努力要建立一套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直属于皇帝个人的系统，这就是由太监们主管的东厂、锦衣卫等等各种系统。

这套系统是不按官僚体系的逻辑运作的，只按照皇帝的个人喜怒运作。明朝有很多为害天下的大太监，这并不是因为皇上个人没权力，而恰恰是因为皇上个人有权力，大太监们的权力只不过是戴着面纱的皇帝个人权力而已；皇上一发怒，权势熏天的大太监也随时会被弄死。

比如，著名的大太监刘瑾，权势最大的时候，曾经有人说，咱们大明有俩皇帝，一个是坐皇帝，是咱那正牌皇上，还有个立皇帝，就是站立着的皇帝，那就是刘公公。

有人曾经考证，刘瑾贪污的财富，让他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但你再首富又能怎么样？后来皇上一发怒，直接把刘瑾就给凌迟处死了，就是给刷了。

而且刘公公绝对是个人才，就连被刷也要创造纪录，他是史上被刷刀数最多的人，一共刷了3357刀，整整三天才弄完，中间刘公公还喝过几大碗粥补充体力。

明朝：皇权与皇帝权力的大冲突

不过，明朝盛行大太监，反过来也证明了明代的官僚体系的强大。它对作为个人的皇帝的制约力度相当大，否则皇上对作为打手的太监也没这么大需求。

制度性的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权力，两者之间的冲突，从未像明朝那么大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了。

宋朝的忠臣和奸臣就没明朝那么多，宋朝比较多的是名臣。名臣是啥呢？就是相对较少地受到乱七八糟的影响，能够认真干事。

但是明朝的大臣们面对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影响太多了。作为个人的皇帝，总要通过太监们搞一搞事情，有些人就会攀附上去，形成一系列奸臣。

刘公公的攀附者还发展得不到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是明末魏忠贤魏公公为首的阉党。不过客观来说，也不是攀附了阉党的就一定是奸臣。因为魏公公权力太大，你要想干点事，不把他哄好是不行的，但是只要哄他，就容易被人给指责为奸臣阉党了。

而能够坚持原则的人，就是忠臣，但是忠臣很多精力要放在和奸臣的对抗上，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对抗，也不得不结成党派。结党之后，个人的原则也不得不受到党派原则的约束。忠臣到底是不是个好的大臣，这事也不好说了。

所以，明朝的政治，越到后来，越糟糕。**忠臣和奸臣分别结成党派，但实际上党派本身与道德没多大关系，只和结盟的需要有关系。**面对着紧迫的国家大事，一方提出应对方案，另一方往往会对人不对事地大肆批判，对问题的讨论于是又迅速堕落为竞争。到了帝国晚期，局势极为艰难，需要作出一些重大的政治决断，但是各种党争，已经让帝国的决断能力瘫痪掉了。

崇祯皇帝曾经有一系列机会能够把局面挽回来的，比如：

李自成曾经想要跟朝廷讲和，讨个大大的封赏就行；

皇太极也曾经想和大明讲和，多要点岁币就行；

在局势极度危难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迁都南京，那边有一整套现成的官僚班子，因为最早明朝的首都曾经就是南京嘛，要崇祯别困在北京，必须留得青山在。

所有这些提议，都能给大明王朝续命，但是在党争当中，一个也通

不过。因为一定会有另一派的人站出来骂街，说出这主意的是卑鄙小人。

党争把人的道德心性也败坏掉了，最终一帮人都眼睁睁看着帝国大厦崩塌掉，等李自成和大清先后进北京了，再去攀附新的力量。

甚至到了这会儿，有王爷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却根本没法搞成南宋那样，大家仍然在党政当中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只好投降大清了事，少数不愿投降的就战死拉倒。

清朝：明朝官僚体系的继承

到了清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明朝的官僚体系。而清朝的皇上也不打算被官僚体系所约束，但是他们用不着通过太监的力量来对抗官僚体系。

明朝的皇上之所以必须用太监，在于他们必须找到只依附皇上、不依附官僚体系的人。也就是说，和皇上有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的人，才能放心使用。

大清的皇上们不用太监，也有这样与自己有紧密的私人关系的人，那就是自己的包衣奴隶以及满蒙八旗的人。不要以为包衣奴隶就是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苦命人，他们经常是主人的心腹，比如雍正朝著名的年羹尧、李卫等人，你要是看过《雍正王朝》电视剧，对这俩名字应该不陌生，他们都是雍正的包衣奴隶。

这些包衣奴隶以及满蒙的八旗子弟，都和皇上之间有着一种私人性的认同关系，这和一般的汉人官僚是不一样的：[前者对后者可以形成制约；而包衣奴隶和八旗子弟们又在真正意义上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所以私人认同关系并不会使得官僚体系的运转受到严重干扰。](#)

这样，清朝的制度性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性权力都很强大，但这两种

权力却没有像元朝和明朝那样发生严重的冲突。所以，大清治理的水准比元朝和明朝都要好些。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最核心的就是，作为制度性的皇权，与皇帝的个人权力，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们之间的冲突关系，在不同朝代都不一样，而明朝正是两者冲突最剧烈的一个朝代，所以盛产忠臣和奸臣。

但是，明朝的兴盛和衰败，有着很复杂的逻辑，不能仅仅用它的官僚体系这一套来解释，它还和世界局势的变迁有着深刻的关联。

中国从这个时候起，就和世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联系了。这就是咱们下一讲的内容，“世界格局的变迁与大明国运的跌宕起伏”。

27|美洲白银与明朝的国运

明朝初期，民间社会受到朝廷压制，社会活力一般。但是到了中后期，民间社会活力巨大，不亚于大宋。这前后的区别，其实和世界白银的短缺与流入息息相关。

这一讲咱们来说一下，世界格局的变迁与大明王朝的国运。

看明朝的历史，咱们能发现，在明朝初期，民间社会受到朝廷很强的压制，社会活力一般般；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却有了发达的民间社会，活力巨大，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不亚于大宋。这前后的区别，和明朝所面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深刻关联。今天咱们就来解释下这个问题。

伊斯兰世界白银短缺与元朝的瓦解

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明朝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货币作为传导机制。说到这个话题，咱们还得再回头看看元朝。元朝重用来自西域、中亚地区的色目人来理财，咱们在第十五讲说过，这些人是古代和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人群体之一，他们太擅长做生意理财了。这些色目人做生意天然以整个欧亚大陆为思考单位的，所以元朝的理财高官也不是以大元帝国为单位，而是以横跨欧亚大陆的整个大蒙古帝国为单位，来琢磨怎么进行资源调配，怎么促进商业流通。

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几种要素都被整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秩序。这个时候，伊斯兰世界的白银很短缺，白银在中亚和西亚的购买力比中原高得多。于是，在大蒙古帝国通盘调配的逻辑下，中原的白银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中

亚和西亚地区。欧亚大陆西部的经济，因此在中世纪后期获得了活力，但是中原地区就遇到麻烦了，货币严重短缺。于是元朝又发行纸币作为通货，但是帝国政府根本就控制不住发行纸币的数量，这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原的老百姓一看，你这纸币这是什么破玩意啊，根本不靠谱嘛，没人愿意接受纸币，结果中原的货币就更加短缺。货币短缺就会导致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时候，东西变得越来越便宜。

不要以为这是好事，人们一旦遭遇通货紧缩，就会不愿意进行生产了。因为在生产的时候，预计这东西能卖一百块钱，我就投入了八十块钱，结果由于通货紧缩，等生产完了，这东西已经跌价只能卖八十块钱了，那我还生产干嘛呢？所以通货紧缩会导致经济萧条。大元帝国运气也是糟糕得很，到了朝代后期，又赶上黄河决口，连年大水灾，朝廷没钱救灾，只好发行更多的纸币，这又进一步败坏了纸币的信用，经济更加萧条，形成了恶性循环，元朝的统治最终就瓦解了。

明朝应对白银短缺的户口制度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严重的货币短缺。这会导致经济大萧条，而明朝面临的萧条问题比元朝还要严重。这是为什么呢？

在元朝的时候，货币虽然短缺，但是对产品的需求还在，因为它能够以帝国为主导，推动中原与中亚和西亚的贸易过程。如此远距离的贸易，风险成本很高，不容易运转起来，但是有了帝国政府在背后做推手，就能运转起来，从而使得中原经济获得外部需求的拉动。这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掉货币短缺的问题，经济萧条可以获得缓解。

但是明朝一立国，就意味着与中亚和西亚的贸易中断了。没有了外部需求的拉动，货币又不足，内部经济立刻会陷入困境，明朝就算想要让市场经济像大宋时期一样运转，也根本做不到。因为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前提是足够的货币，货币是交易的中介，没有足够多的中介，市场交

易就没法足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于是，朱元璋立国后的一个特殊政策就起了作用。这个政策把老百姓给分成四种户口，分别是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四种户口就是四种职业身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要继承，不得更改。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评论说，朱元璋这是用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作为全国的标准，取消了商业经济，以农民为主体把国家给统一起来。

但考虑到货币问题，我们能看到朱元璋这一政策的另一种效应。他把人口按照职业进行划分，又不许人们改换身份，这相当于事先规定了每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关系；他还规定老百姓没事不许外出乱走，去到离自己家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就要申请。

这些政策加一块，搞出的差不多是一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正是这种准计划经济，才能应对货币不足的困局，因为准计划经济本来对货币的需求量就很小嘛，以货易货就行了。

大明能在立国后不过十年的时间便恢复经济，这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指望像宋代那样通过市场活动完成经济恢复，反倒很可能会出大问题，因为没有货币，市场经济没法展开。

对应地，明朝初年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控制形式，朝廷肯定会对民间社会形成很大的压制，社会活力就不用太指望了。

但是，朱元璋的设计有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各种职业身份的比例关系，在他刚设计的时候也许还能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可他没法确保每一职业身份的人都是干一行爱一行，更没法确保不同职业身份的人，繁衍的速度是完全一样的。时间稍长一点，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繁衍速度不一样，四种户口的比例关系就会出问题。再加上有不爱自己这一行的人，跑出去干别的了，而政府又没法长时间盯着每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职业来干活，四种职业的比例关系就更有问题了。这就使得明朝初年的准计划经济，在运转了几十年后，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

到了这会儿，就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让社会健康运转了。但是市场

经济需要有足够的货币，明朝缺的就是货币，咋办啊？朝廷也动了些心思，像大元一样开始尝试发行纸币，但大明也控制不住自己滥发纸币的冲动，很快就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彻底没人要，所以尝试了若干年后，也只能放弃这个办法了。

美日白银与明朝的灭亡

最终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依赖于世界的变化。

在明朝统治到中间阶段的时候，欧洲人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到嘉靖年间，西班牙人在其美洲殖民地，今天的玻利维亚一带，发现了一个规模超级巨大的银矿。比美洲银矿的发现略早一点点，也是在嘉靖年间，日本也在其西南部发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银矿。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的发展，大明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成为销往欧洲的顶级奢侈品；对日本方向，嘉靖朝仍然坚持着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倭寇肆虐，这些倭寇首先是武装走私商人，到了嘉靖朝之后，放弃了海禁，倭寇就变成了合法商人，明朝的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美洲和日本这两大银矿的白银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大明的经济一下子获得了双重的刺激。一重刺激是，有了来自远方的市场需求，这就能够刺激本土经济发展，就像当年大元帝国组织起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贸易一样；另一重刺激是，远方的需求还带来了大量的贵金属货币，大明的市场经济一下子就被刺激起来。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朝后期，江南一带的市场经济极为繁荣，民间社会高度发达。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至此已经与全球历史深刻地嵌合在一起了。于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国运，大明的灭亡也与此有关。

咱们在第十讲的时候曾经说到过，明清之交的时候，正赶上进入一个小冰期，温度骤然下降，导致游牧者南下。但大清在真正有机会入关

之前，并没想到自己能够征服天下，因为大明还是太庞大了，关外的大清和它比起来非常之小。除非是大明自己遭遇到严重的内部问题，大清是不会有机会的。而大明这会儿真就遇到内部问题了，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供给出问题了。

1618年到1648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战争，叫做“三十年战争”，战争的主角之一就是西班牙帝国。来自西班牙所属美洲的白银，这回都流到欧洲去做军费了，流入中国的大量减少。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明朝后期，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对银矿也开始进行控制，日本方面流入大明的白银也大幅减少。这里可以插一句，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军费主要就是来自这个银矿。

欧洲和日本方面的政治秩序变化，却影响到了大明的货币供给，明朝末期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开始萧条，财政也严重地吃紧。

要命的是，小冰期来了，北边游牧者南下的压力开始变大，大明帝国内部又是民变四起，张献忠李自成啥的全出来了，朝廷不得不更多地征税来应对这些问题。

更要命的是，白银短缺了，铜钱的数量却没发生大的变化，这导致大明内部的铜钱相对于白银发生贬值，因为铜钱的相对数量变多了；老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主要是用铜钱，朝廷从老百姓那征税，却是按白银来核算和征收，百姓必须把手里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可是铜钱贬值了，这就意味着税率变得更高。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老百姓只好就投奔李自成去了，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加速度式地冲向了悬崖，最终亡于大清。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这一讲的核心内容就是，大明的国运变迁，和外部

世界的秩序变迁之间，有着深刻的联动关系。

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不能再以中国为单位来理解中国历史的问题了，而是必须进入一种世界视野，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

再看看取代了大明的大清，虽然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就已经在沈阳称帝了，但他并不是说自己就能取代大明皇帝了，而是认为自己继承的是大元皇帝的统绪。入关之后，满清认为自己同时继承了大元和大明两个统绪。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这就是咱们到下一讲的主要内容，雪域高原如何改变了蒙古世界的历史命运，藏传佛教怎样帮助大清入关。

28|藏传佛教怎样帮助大清入关

大清入关的力量来源，不仅仅是来自满洲八旗，而是来自满蒙联盟，就是满洲人和蒙古人结成的一个紧密联盟。蒙古从雪域高原获得了精神秩序的输入，从而在蒙古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给了满洲人以崛起的机会。

上一讲咱们留了个引子，说到大清在入关之前，就已经继承了元朝的正统，入关之后又继承了明朝的正统，就把两个正统给整合在了一块。清朝继承明朝的正统性这个好理解，但是大清入关之前就继承了元朝的正统，这个就得解释一下了。

大清入关依靠的力量是啥呀？你可别说是吴三桂把它引进来的，大清入关首先是得自身有力量。大清自身的力量来自什么呢？不仅仅是来自满洲八旗，而是来自满蒙联盟，就是满洲人和蒙古人结成的一个紧密联盟。而之所以蒙古人肯买满洲人的账，首先是因为皇太极继承了元朝的正统。说到这，你就明白这个事情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了。

西藏和蒙古的联动关系

那么，叱咤风云的蒙古人，为啥会接受满洲人作为他们的大汗呢？

这个还要从西藏说起，西藏和蒙古在历史上也有好几次互相支持、互相联合的过程。正是这种蒙藏联合，让雪域高原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藏传佛教也因此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才有了达赖喇嘛这种制度的出现：

反过来，这个过程也让蒙古草原上的精神世界陷入分裂，随后开始

了长时间的内斗。于是，大清趁机抓住机会崛起，形成了新的军事联盟，也就是满蒙联盟。这才有了后来入关征服中原的可能性。

雪域高原和草原世界互相影响的过程，就是咱们这讲要讲的主要话题。

蒙古高原的继承逻辑

咱们先来看看在明朝的时候，蒙古高原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看到朱元璋的大军北伐，觉得打不过，于是自己主动逃离北京回到草原上。

但是他并不认为元朝已经灭亡了，而只是认为元朝统治的地盘变小了，中原丢了而已。元顺帝及其继承人在草原上以元朝的名号继续统治，史称北元。

但是这些蒙古大汗已经没能力控制草原上的众多蒙古部落了，部落彼此之间经常各种混战。

不过，蒙古人有了统治中原的一百多年历史，继承逻辑跟原来在草原上的兄终弟及的顺序早就不一样了。虽然草原上一片混战，对于谁有资格当最高的大汗，各个部落却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只有黄金家族的人，才可以当大汗。

什么叫黄金家族呢，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后来，这个概念又进一步窄化，只有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这一脉的后代，才算黄金家族。黄金家族中，又是长子这一支有优先继承权，其他人只有在该脉找不到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才有继承资格。

历史上，中间偶尔也有会其他不符规则的人夺取蒙古汗位，但没多久，汗位还是会回到正统继承人手中。

只要各个部落对于法统的唯一性有共识，蒙古人的精神世界就仍然有一种底层的统一性。在北元后期开始，正统大汗固定在了察哈尔部，只有这个部落的首领才能成为大汗。

蒙古世界的法统分裂

但是，在16世纪中期，也就是明朝统治的中后期，出现了变化。黄金家族的小支当中崛起了一位英雄，叫做俺答汗。俺答汗非常能打，带领着自己所属的土默特部，几乎统一了整个漠南地区的蒙古诸部落。赶上这个时候正统大汗的武力不大灵光，就被俺答汗给排挤到了东蒙古地区。

俺答汗几乎成为蒙古诸部的共主，但是因为血统的问题却不能当大汗，这个让他感觉很不爽，于是开始动了别的心思。

俺答汗在继续征战的过程中，一路打到青海，在这里发现了新的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实际上有很多派别，而让俺答汗发现机会的，是其中一个派别格鲁派，也叫黄教。雪域高原上教派众多，有红教、白教、花教，等等。黄教格鲁派是在15世纪初期建立的，但跟其他教派竞争的时候一直很痛苦，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寻找外援。

于是，1578年，在一个精心安排的场景中，俺答汗和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进行了一次会面，这次会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俩人一见如故，索南嘉措说他一眼就认出，俺答汗是元朝开国君主忽必烈转世，而俺答汗则一眼认出，索南嘉措就是曾经大元帝国的国师--八思巴转世。

八思巴是一位很有名的藏传佛教高僧，在三百多年前，忽必烈和八思巴曾经曾结成过师徒关系，那是蒙古草原和雪域高原发生的第一次相互塑造的历史。

俺答汗和索南嘉措，认为他们的这次会面，就是当年那对师徒的转世重逢。于是两个人互赠尊号，索南嘉措把忽必烈的汗号赠给了俺答汗，俺答汗则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意思是拥有如大海一般广阔智慧的高僧上师。

今天咱们所知道的达赖喇嘛制度就此建立了起来。格鲁派有了强力外援的支持，很快就压过了雪域其他的教派。

俺答汗这回痛快了，他是忽必烈转世，这可比什么正统大汗都要更加正统，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了。

不过，为了让人们都接受这一点，必须要让大家都接受藏传佛教才行。所以，俺答汗开始极力推动藏传佛教在草原上的传播。这一次，藏传佛教终于成为蒙古普通百姓的信仰了。

然而，一个衍生性的效果就出现了，等到大家都信了藏传佛教之后，活佛可以向草原首领授予可汗尊号这件事情，也就被普遍接受了。

问题是黄教里面不只有一个活佛，高原上也不止黄教这一个教派，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草原上有若干个黄金家族小支的部落首领，甚至还有并非黄金家族的部落首领，都通过成为某个活佛的檀越，就是施主，而获得了可汗的尊号。

蒙古世界的统治正当性，也就是法统就此分裂了，那种精神世界的底层统一性也就破掉了。

蒙古内斗促成的满蒙联盟

蒙古世界的法统分裂，严重削弱了蒙古对于东亚世界的影响力，这就给了大清崛起的机会了。也就是开头说的那个问题，皇太极获得了机会夺得元朝的正统。

这个还是跟蒙古的内斗有关，这个内斗又是跟藏传佛教的一系列影响有关。蒙古内斗的核心人物是林丹汗，他是在17世纪初期登上察哈尔

部的大汗地位的。注意啦，他是察哈尔部的大汗，这可是黄金家族的正牌大汗。林丹汗也是个雄才大略的人，而俺答汗的后代则不那么强大了，林丹汗便决心要重新恢复正统大汗的地位。但是他也得面对黄教已经是蒙古人普遍信仰这样一个事实。林丹汗也信仰黄教的，为了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支持者，他组织人把大量的藏文佛经译成了蒙文，这样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掌握蒙古地区的黄教解释权，从而统合其他蒙古部落。

光是掌握精神解释权还不够，还要在军事上把不服的挑战者压制住，所以林丹汗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但是，那些不服的部落根本就不理林丹汗，一旦打不过，就投奔女真人去了。这下把林丹汗气坏了，我帮你们建立更完整的精神世界，却没人买我的账。既然黄教不能给我带来帮助，我干嘛还要信黄教。

林丹汗正在郁闷中，另一个蒙古部落喀尔喀部有一位好兄弟却图汗来找他，跟我一块改宗得了，别信黄教了，改信白教的红帽派吧。林丹汗一气之下跟着却图汗改了宗，这下别的蒙古部落更排斥他了。皇太极趁机联合这些蒙古部落，在1634年一举打败林丹汗，成为满蒙两大族群的霸主。

但这会儿皇太极还没能继承元朝的正统，必须得拿到元朝留下的玉玺才行，但玉玺还在林丹汗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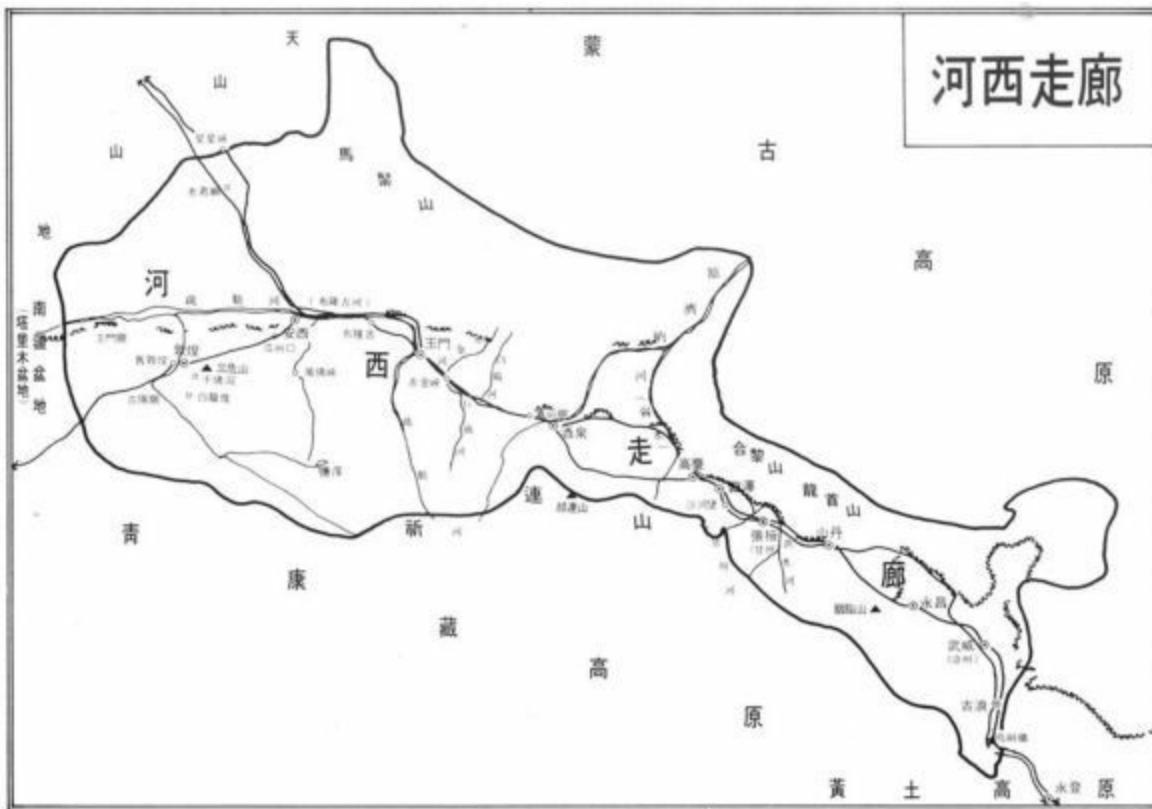
这会儿被打败的林丹汗去哪了呢？要说林丹汗真是个英雄，他在这会形成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战略。林丹汗带着仍然忠诚于他的部众逃往青海，计划在这里和他的好兄弟却图汗会师。俩人加一块手上就有将近十万人，这支力量可以横扫雪域高原了。

林丹汗计划凭这支大军攻入西藏，以千钧之力灭掉黄教，扶植红帽派，一举掌握住雪域高原的精神秩序。然后，再逆袭回蒙古，扫平已经丧失了黄教精神世界的蒙古诸部，一举成为横跨草原与高原的霸主，同时掌控政治秩序与精神秩序，雄踞整个内亚世界。

这个大胆的战略如果能够成功，会结合起高原与草原两种力量，将会对东亚其他力量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从汉武帝开始，中原帝国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要防止草原与高原联合起来，以免受到一种战略包围。](#)

汉武帝为了防止草原上的匈奴和高原上的西羌形成联盟，不得不攻占河西走廊，把它们隔开，而为了保住河西走廊，又不得不通西域。



河西走廊地图

林丹汗的战略极有想象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到了青海没多久就染上天花病死了，伟大的战略无疾而终。

林丹汗死后，他的家人无处可去，只好又回到老家投降了皇太极，并交出了大元传国玉玺。皇太极于是登基称帝，成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共同的大汗，满蒙联盟的军事基础就此成立。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雪域从草原方向获得政治秩序的输入，使得雪域内部的教派秩序发生深刻变迁。

草原原则从雪域获得精神秩序的输入，这个输入却在蒙古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给了满洲人以崛起的机会，满蒙联盟成为大清得

以夺取天下的重要基础。但不要以为大清的天下就是靠满蒙联盟的战争能力维系的，实际上，大清帝国经过多年征战，把汉满蒙回藏全都纳入了中华帝国的统治I

之下，这背后有一系列极为高超的治理技术。没有这些政治智慧，大清根本就维系不了如此庞大的帝国，今天的中国也无法继承一个庞大的领土。

那么，大清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29|大清的高级政治智慧

鸦片战争之前的大清帝国，有着高超的统治智慧。汉满蒙回藏各个区域，都被它整合进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体系当中。古代的中国历史达到了完备状态，作为体系的中国获得了政治统一。

这一讲我们来说一下鸦片战争以前的大清。跟其他朝代相比，大清离今天太近，清朝末年又遭遇到太多令人憋闷的历史，导致咱们经常难以平心静气地讨论大清的历史。

实际上，大清的帝国统治有着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古代中国的最终完成形态。

最终完成形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清差不多是把中华帝国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都成功地整合进来了。

注意，我在这一讲里所说的都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大清，对它的评价也是基于古代中国的标准，大清还不是个现代政治体，咱们不能用现代政治的标准来简单化地衡量大清，那会严重地扭曲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错误地理解历史，就没法恰当地理解今天的中国。

游牧者的春天

要讨论大清的历史，可以把视野放大一下。

进入公元15世纪之后，世界气候进入一个小冰期时代，但对游牧者来说，他们进入了政治上的春天。从西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往东，波斯帝国、印度帝国、大清帝国，都是在这一两百年里由游牧者

主导建立的。

大清入关，只不过是游牧者在欧亚大陆上普遍获得主导地位的一个案例。大陆上唯一的例外是西欧和北欧，那边离草原太远，游牧者没法深入进去。

冷兵器时代的游牧者，不仅是战斗力强大，纵横驰骋的空间尺度也大于定居者。大清入关之后，在大明的基础上大规模开疆拓土。

你可别按照咱们经常看的历史地图来理解大明，表面上看大明的疆域一直覆盖到黑龙江以北，但它维持这个疆域只有很短的时间。并且，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大明只是给当地的土著首领发了个任命状，人家接受不接受，主动权并不全在大明这边。

大明对于东北的实际统治，只延伸到今天辽宁的中南部地区。到了明朝后期，帝国疆域更是大幅收缩，大约只相当于收复了幽云十六州的大宋，再加上大理国和小半个西夏的领土。

大清在1644年入关，自带了东北和内蒙的庞大领土。到1660年代，最终击败了南明政权的剩余力量，征服了整个中原。

郑成功家族在台湾坚持与大清对抗，到1680年代也被征服了，接下来的历史主要就是跟准噶尔汗国的PK了。

1690年代，大清第一次打败了准噶尔，把外蒙纳入帝国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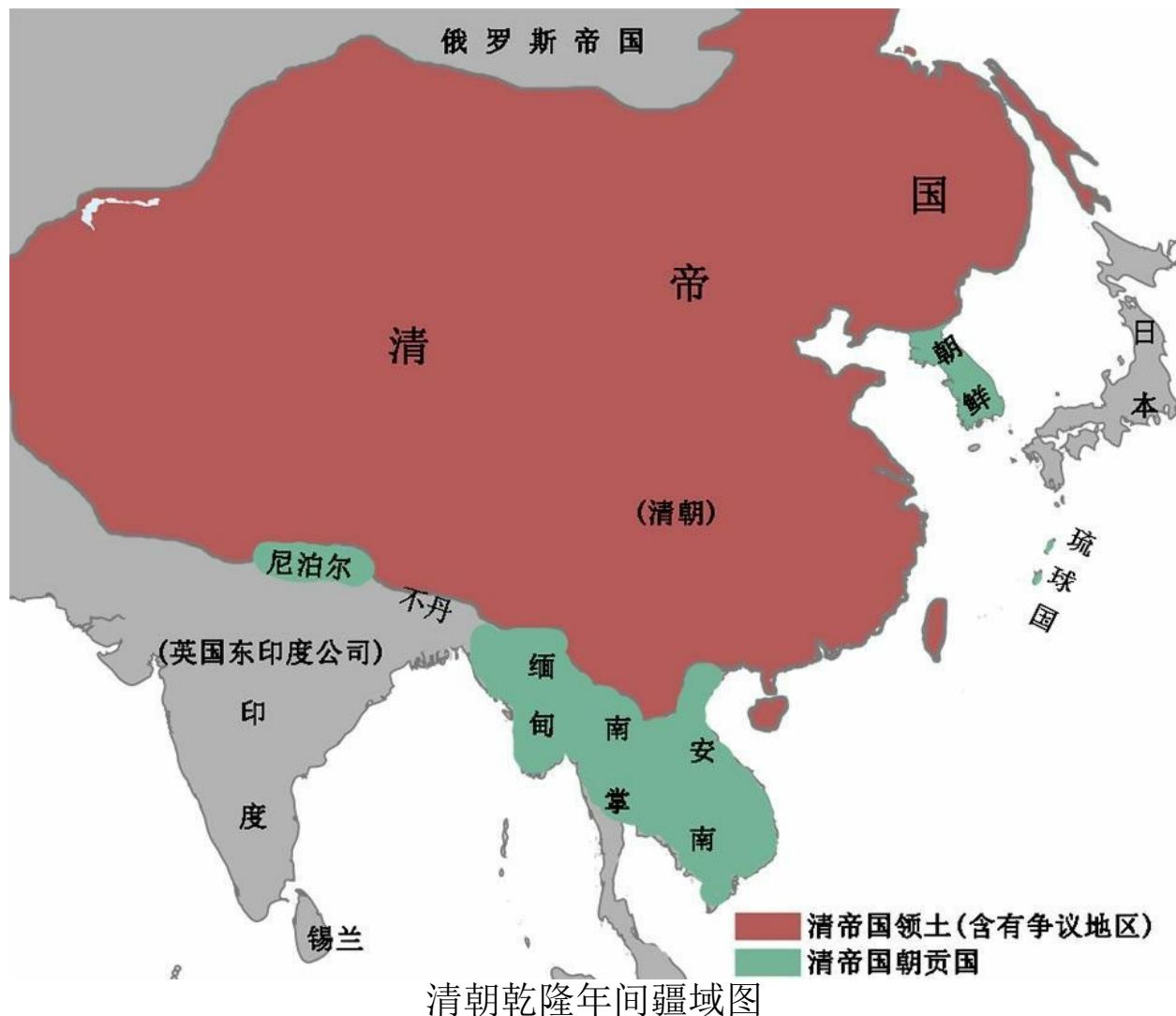
1720年代，再一次击败准噶尔，把雪域高原纳入帝国统治之下。

到1750年代，经过又一次大规模战争，最终灭亡了准噶尔汗国，把整个西域纳入帝国。乾隆说西域是汉唐时期的帝国故土，现在重新回归，这叫故土新归，赐名为“新疆”。

到了这个时候，咱们经常说的统治了汉满蒙回藏的大清帝国，终于全部整合起来了。此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接近于明朝末期的四倍。



明朝晚期万历年间疆域图



尽管后来晚清的时候又丢掉了不少，但剩下的领土仍然是明末领土的接近三倍，今天的中国继承的就是大清留下的疆域。

可见在领土意义上，大清曾经为中国攒下了多么厚的家底。你比较一下明朝晚期的地图，和大清地图以及今天的中国地图，就明白了。



中国地图

大清的多元帝国

大清征服的疆域极为庞大，治下的人口也是极为复杂，没法用同一套办法吃遍天下，在不同的地方必须发展出不同的统治技术。

大清在这个过程中把大辽开创的二元帝国治理技术，发展为多元治理技术。汉满蒙回藏这些次级区域，在大清内部各自起到了其他区域完全无法替代的作用。

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些地方也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作为体系的中国，其内部整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是整个帝国最有钱的地方，所以这里主导着大清帝国的财政秩序，依靠这里的庞大财富，统治者可以把八旗的军事贵族都给赎买掉，克服掉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大清统治者在中原以皇帝的身份出现，这是儒家所赋予的身份。

再看草原方向。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队是草原骑兵，所以满蒙地区的游牧者主导着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统治者在这里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现。

只要有满蒙骑兵，就能控制中原。反过来，只要有中原，就能统御满蒙的军事贵族。

满蒙里面的满，那完全就是自己人，“蒙”的内部则很复杂了。比如蒙古的科尔沁部，世世代代和满洲贵族通婚，康熙的奶奶孝庄太后就是科尔沁部的，这个部落早就被满洲皇室当做自己人了。

此外还有内属蒙古，就是由大清皇帝派人直接统治的蒙古部落，这里不设置世袭的土著首领，也算半个自己人。

再有外藩蒙古，算是作为藩属的蒙古部落，它们有自己的世袭土著首领，和大清皇室有点类似于合伙人的关系。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与后来的内蒙古、外蒙古有一部分重合，但并不是一回事。

对大清皇上来说，外藩蒙古还是要加以某种控制的，以避免当年大金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历史重演。

怎么控制呢？这就要看外藩蒙古的战斗力的基础是什么了。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支持不了大规模人口，所以它的战斗力不是靠人多，而是靠蒙古骑兵的高度机动性，一旦把这个机动性给控制住，外藩蒙古就不会构成威胁了。

大清有一个非常高超的办法，就是大力鼓励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上一讲说过，俺答汗就推动过这个事情，大清把它继续推向深入。

为啥这个会对大清有帮助呢？不仅仅是因为信了教的人有好生之

德，不愿意喊打喊杀。更重要的原因是，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的信徒，都会从属于某一个寺庙。

牧民是可以移动的，但寺庙移动不了。信了教的蒙古游牧民，游牧半径就被寺庙给固定下来了，就进入某种准定居状态。高度的机动性没有了，对大清就不构成威胁了。

康熙曾经说过“一座庙胜十万兵”，这是实打实的胜过十万兵。

但是皇上还得想法再对藏区形成一种有效的统治，避免蒙和藏联起手来。怎么做呢？

大清统治者除了皇上和大汗之外，还有第三个身份，那就是文殊菩萨转世，在藏传佛教里获得了一个特别高的地位。

你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转世，我是文殊菩萨转世，咱俩级别差不多，这样，皇上凭这身份，对藏传佛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控制力。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在特殊意义上提供了帝国的精神秩序。

西域地区，则是主导着整个帝国所需要的安全战略空间。因为外蒙与新疆、尤其是北疆，在军事地理上可以说是同一个空间。

所以，清末重臣左宗棠要收复被中亚冒险家阿古柏所割据的新疆时，就上书朝廷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也就是说，如果新疆没了，蒙古就悬了，如果蒙古没了，那北京可就悬了，大清也就完蛋了。

汉满蒙回藏这些个地方，彼此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它们共同构造了一部作为体系的中国史。

直到大清，才把这些地方全都纳入到同一个帝国之中，汉满蒙回藏各得其所，每个亚区域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

满蒙回藏的人数少，但在帝国内部的权重并不低，汉族人数多，但

权重并不会更高。

所有这些区域，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多元帝国实现了内在的均衡。作为体系的中国，到这时才完整地获得其政治统一性，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础。此前的历史，可以说都是为这种政治统一性做的准备。

大清帝国的中介性

大清帝国的治理技艺之高超，还体现在，它善于寻找到各种中介性因素，作为帝国治理的依靠力量。

比如，台湾有学者研究发现，在清朝时期，台湾的人又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从东南沿海迁徙过去的汉人，一类是当地已经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熟番，还有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生番。

你能猜到大清统治的依靠力量是谁吧？是熟番，熟番就是汉人和生番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为啥帝国一定要找到中介性要素呢？原因在于，中介性的要素有着一种跨界性的身份，它与两边都有相似之处，两边对它都会有所认可。但它与两边也都有不同之处，两边也都会对它有所排斥。

于是，中介性要素要想获得比较好的地位，便只能依赖于朝廷的支持。在朝廷这边来看，中介性要素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别无选择，只能对朝廷保持高度忠诚，所以是可信赖的。

而另外两边的任何一边如果反抗朝廷的统治，朝廷都可以联合起中介性要素与另一边，来压制反抗者，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二比一的关系，统治就更稳定。

这样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在大清治理各个地方的时候都能看

到。

比如，在蒙古地区，用皇上直接统治的内属蒙古，作为满洲与外藩蒙古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再比如，大清通过藏传佛教来统御蒙古，却又规定，蒙古的两个大活佛，必须从藏族地区转世，而不得在蒙古地区转世，以这两大活佛系统作为藏与蒙的中介性要素。

还比如，对新疆的统治，在南疆地区，是依靠当地传统的头人制度，叫做伯克制。大清允许当地穆斯林都保留过去的着装习惯，也不用剃头梳辫子，但是土著头人、也就是伯克，干得好了，朝廷赐给他剃头梳辫子的权利。

在内地，梳辫子是义务，到了新疆反倒成了恩典。为了得到恩典，伯克就会努力干活，等到他梳起辫子，也就成了当地穆斯林和北京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在整个帝国的层面上来看，大清以汉文化水准已经很高的满洲为中介，把蒙古和中原给联系起来。又以蒙古为中介，把雪域高原以及西域新疆与整个帝国联系起来。

而在这样一种帝国结构下，大清皇帝也不再是满洲人的皇帝，只要他固守这个身份的话，就无法统治这个庞大帝国。

大清皇帝成为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天下共主，以皇帝的多重身份凝聚于一身为基础，而把整个帝国统合起来。

本讲小结

鸦片战争之前的大清帝国，有着高超的统治智慧，汉满蒙回藏各个亚区域都被它整合进一个彼此相互依赖的体系当中。

古代的中国历史达到了完备状态，作为体系的中国获得了政治统一。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超级的大一统当中，中国历史走上了自我锁死的状态，以至于它为了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便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内在需求，就是要加入世界秩序。

这就是我们的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30|郑成功为何没成功？

郑成功曾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海洋帝国，但最终被大清消灭了。原因在于郑成功的海洋帝国，其信用机制依赖的是同乡关系、宗族关系，因此没法建立一套超越熟人社会的普遍信用机制，于是无法扩展成为一个全球秩序，最终只能受制于大清。

这一讲咱们来讲一下明清时期的东亚海洋。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间，而不是帝国朝廷，如何成为东亚的海上霸主，但是这些人又是如何注定会失败的。

这里面包含着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一些重要密码。

明朝官方的海上活动

要说明清时期的海洋活动，大概你的第一反应就是郑和下西洋。经常有人在感叹，说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如果继续坚持下去，不是半途而废，征服世界的就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了！

是这样吗？一方面，郑和下西洋确实挺伟大，这壮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将近九十年，船队的规模也是哥伦布望尘莫及的。哥伦布的船队只有三艘小船，郑和的船队有两百多艘大船；哥伦布的旗舰，船的长度还不如郑和舰队当中一般的船的宽度。

但另一方面，郑和的壮举是肯定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纯官方行为，而不是民间行为。

郑和下西洋，要的是显示天朝国威，要的是一个派头，而不是斤斤

计较挣了几毛钱。民间行为则是要赚钱的，不赚钱的事儿就没人干了。

由于大明的海禁政策，郑和船队遮天蔽日，但后面不可能有民间的船队跟上。朝廷总这么烧钱，却没法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把烧的钱收回回来，那这个事情当然持续不下去了。梁启超也曾评价，说郑和下西洋这事儿，基本上就是雄才大略的皇上自娱自乐而已。

哥伦布那种小破船开创的事业，为啥就能够持续下去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过程呢？

因为其中的行为主体起于民间，一群又一群的冒险家到海外去搏机会，多数没搏成，就死了。少数搏成的，就发了大财，发财的家伙再用这笔钱反过来促成欧洲国家的政治变化。

因此可以知道，海上和陆地上的秩序原则是不一样的。

在陆地上，可以靠帝国的征服来解决问题。而到海上去活动，要想能够坚持得下去，一定是以发达的贸易为基础，这就只能是以民间行为为主。

民间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推动着国家政治变迁。变迁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国家要出动海军力量，保护民间商人们在远方的贸易利益，商人则从贸易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税，以便支撑国家的这种军事行动。

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秩序，以及它们所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明朝民间的海上活动

那么，古代的中国是否有民间力量要到海上去贸易呢？

当然有，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变得地狭人稠，这些地方的百姓，靠种地已经不够吃了，有很多是到海上讨生活的。他们通过家族成员迁徙的方式，在很多重要的贸易港口都有自己的据点，发展起遍布环中国海地区的贸易网络。

东南亚很多贸易城邦以朝贡贸易的名义和中国这边做生意。实际上居间操作的，多半也是这些华人，他们形成了很大的海上力量。

但对这些人来说很郁闷的是，大明朝一立国，就开始了海禁政策，也就是不许民间到海上去贸易了。

为什么大明要搞海禁呢？

明朝开国的时候把人分成四种户籍，搞起了一种准计划经济。这个政策让大明王朝在货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能比较快地恢复了经济。但是对于准计划经济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不能让人随意移动，否则没法计划了。所以大明必须得搞海禁，免得沿海的人到处乱跑。

问题是，朝廷能够搞海禁，可是民间到海上贸易的需求还在。东南沿海地狭人稠的状况，到了明朝越来越严重，朝廷又没法给这些人找到别的饭吃。不让做贸易了，那这些人就只能变成海盗，进行走私贸易。

东亚海面上这些海盗被称作什么呢？也许你已经猜到了，就是倭寇。

倭寇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是一群日本海盗，实际上，倭寇里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是马仔，真正的大Boss都是中国人。

当时最有名的倭寇首领是个安徽徽州人，叫做汪直。汪直极为精明能干，逐渐地把各路走私商人都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海盗走私集团，差不多垄断了整个东亚海面上的贸易。

他把大本营设置在日本长崎，在这立国号为宋，自称徽王。他募集了大批的日本武士听他号令，手下有五千多人作为常备武装，必要的时

候能够鼓动起来差不多十万人。汪直长期是大明朝剿倭寇的重点对象，后来终于被逮着杀掉了。

大明没想到，此后倭寇问题反倒更严重了。因为过去的各种倭寇海盗还是受汪直节制的，大明要想谈判的话，还知道找谁去谈。汪直没有了，各种倭寇海盗没有了统一的头目，大明不知道该跟谁去谈判了，这成了明朝中后期极为头痛的一个问题。

到最后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不是靠戚继光剿倭寇的神勇，而是靠开放海禁。能够合法经商的话，人们做海盗的冲动就下降了。

郑成功的海上帝国

但是，虽然大明朝廷开放了海禁，却仍然严格限制对日本的贸易，只有限度地开放了对东南亚的贸易，这就仍然给了海盗以生长的空间。

到了明朝末年，又一个强大的海盗兼海商崛起了，这就是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郑芝龙以长崎和台南两个地方作为他的海上大本营，纵横东亚洋面。巅峰时期，他手上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只，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军队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南洋人甚至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

任何人要到东亚海面上做生意，都必须向郑家交保护费，一艘大船要交三千两白银，交了保护费，就会得到郑家的一面令旗，可以平安航行。荷兰人是那个时代欧洲的海上霸主，但是到了东亚照样得给郑家交保护费。

郑家在东亚洋面的这种保护费生意，每年入账上千万两白银，富可敌国。而由于这个大海盗的存在，其他小海盗都被灭掉了，东亚洋面上反倒获得了一种秩序。

注意，我在后面说的都是郑家，而不是郑芝龙。原因在于，他在崇

祯年间被大明招安了。到了大清入关之后，又投降了清朝，他的庞大的海上帝国就被他坚决不肯降清的儿子郑成功继承了下来。

郑成功接手这个海上帝国还是颇费了不少力气，但是接手下之后，就以厦门为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反清复明战争。在清兵入关十几年后，郑成功还走水路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北伐，从长江顺流而上，差点攻克南京，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次战役结束后，郑成功反思失败的原因，决定进驻台湾，毕竟厦门这个根据地还是太小了点。

当时的台湾已被荷兰人侵占了三十多年，但毕竟郑成功才是东亚海上霸主。郑成功攻打台湾虽然费了些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但荷兰人肯定是扛不住的。到台湾被郑成功打下来时，大清这边顺治已经不在了，是康熙继位了。可见郑成功的海上帝国曾经坚持了多久。

但是很快这个帝国就要坚持不住了。不是因为郑成功攻克台湾没有多久就去世了，而是因为康熙朝一开始就颁布了迁海令，规定从山东向南到广东，沿海二十里的范围内不许住人，都得迁到内地，沿海的船只也都毁掉，寸板不许入海。

庞大的大陆市场一下子关闭了，郑成功的继任者马上面临了财政困难。郑氏家族在台湾又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终于被大清灭掉了。

到了这有一个问题就需要解释了，为什么汪直和郑成功最终都无法成功，都被大陆帝国给灭掉了呢？和后来到来的英国人对比一下，问题就更明显了。

郑成功面对的大清，还在初创时期，清朝的统治仍未被中原百姓普遍接受，而郑成功手下有约二十万将士。

英国人所面对的大清，是康乾盛世之后的时期，清朝的统治早就获得了百姓的认同，英军在鸦片战争中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万人，并且这会儿英国对大清的武器优势并不是特别大。

两相比较看来，郑成功面对的困难比英国人小得多。那为什么郑成功最终失败了，英国人却能成功呢？

原因就得到海上帝国的生存逻辑当中来找。

英国人建立的是一个全球海洋帝国，它依赖的是全球市场。而郑成功、汪直他们建立的只是一个东亚海洋帝国，依赖的只能是东亚大陆市场。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海上贸易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是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建立。就是说，我到远方去做生意，贸易双方都相信对方会依照合同履约。

如果你不能建立远距离的信用机制，那就意味着你的贸易成本极高，因为你总得用军队来强制对方履约，这种贸易成本，基本上也就没多少利润了，持续不了多久。

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规则上的共识，只要双方都认同这个规则，发生纠纷大家也能有公认的解决机制，那么贸易就能低成本持续。因为这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贸易还能不断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那么，汪直、郑成功他们这些人，远距离贸易的信用机制是什么呢？他们的共识基础是，同乡关系、宗族关系、妈祖信仰等等。这就很麻烦了，这样一种信用机制，扩展力很有限，没法扩展到陌生人社会。

在空间上，大概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往更远扩展就很难了。如果你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你最大的市场就在大陆。那就意味着，你会在本质上被大陆帝国掐住脖子，最终大陆帝国想剿灭就能剿灭你。

英国人过来了，为什么清朝非但奈何不了他们，反倒吃了英国人的亏？因为英国人是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起了一套能够突破熟人社会的普遍信用机制。

这使得他们可以以全球海洋为单位，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整个世界市场为活动单位。世界市场对大陆帝国的市场是有压制力的。

假如只以东亚海面为活动单位，则大陆市场对你是有压制力的。所以英国不会被大清反制，反倒会压制大清。

本讲小结

说到这里，就能看出来，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发展起自己的海洋世界，但是这个海洋世界很容易受制于大陆世界，因为它没有办法扩展为一个全球秩序。

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就是如果中国需要融入海洋的话，就得从外部世界吸收各种新的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了，否则中国没法真正地进入到海洋秩序。

那么，中国是否有必要进入海洋世界呢？

随着中国在大陆世界的秩序走到了某种完备状态，它逐渐让自己陷入一种走不出来的陷阱，从而进入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必须通过加入海洋世界才能实现自我突破。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31|人口太多，技术发展不动了

中国的超级大一统，反倒让中国历史走上一种自我锁死的状态。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过度膨胀，它使得中国经济只能在一种低水平均衡上挣扎。中国要走出这种困境必须加入世界秩序。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中国在大陆秩序方面太成功了，反倒带来自己在海洋秩序方面的失败。这一讲就来看一下，为何中国必须加入世界秩序。

你会看到，中国在大陆方面的超级大一统，反倒让中国历史走上一种自我锁死的状态；自我锁死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过度膨胀，它使得中国经济只能在一种低水平均衡上挣扎。

到了此时，中国历史就走到了又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上。

“一条鞭法”与人口膨胀

先来看看中国人口为何会过度膨胀吧。这和底层百姓所面临的财政压力的变化有着直接关联，也就是说，底层老百姓交的税少了。

老百姓财政压力的变化源自两个事情，一是明朝后期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改革，再一个是大清入关。

先说“一条鞭法”改革。咱们在第二十三讲的时候讲过，明朝初年，中国货币短缺，朝廷收税的时候想收银子很费劲，市场经济也不大容易运转。

所以，明太祖规定把老百姓给分成四种户籍来进行管理：既然收税

费劲，索性就少收点钱，这些钱不够帝国治理所用，那么不足的部分就让老百姓服徭役，以此来解决问题。

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套户籍制度以及配套的徭役制度，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地方上早就有官员开始改革，让老百姓交钱把徭役了，再用这钱去雇人干活。

到了万历九年，也就是1581年，终于由明朝最有名的宰相之一张居正把地方经验推广到全国，形成一套全新的财政制度，叫做“一条鞭法”。新的制度规定：各种农业赋税、杂税、徭役等等，计算起来太复杂了，征收成本也太高，把它们给合并起来成为一条，按田亩来折算，统一征收银两。

之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能够进行这样一种财政改革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涌入了中国，大明的货币不再短缺，就可以把所有的赋税全都货币化处理。

对于帝国来说，赋税货币化，可以提高征收效率，也提高帝国的行政效率。对于老百姓来说，有另外一个好处，“一条鞭法”把征税的基础从“人”改成了“地”；过去甭管你有没有地，只要是个人就得交税，现在好了，只要你名下没有土地，有很多税就不用交了。

这使得底层百姓的财政压力大幅下降，老百姓就有能力生养众多的孩子了。要知道，底层百姓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是最大的，他们能够生养众多，这就意味着会大大提高中国人口的规模上限。

一个直接的例证就是，以往的朝代，人口极少超过一亿，超过一个亿就会流民四起天下大乱，王朝崩溃。但是明末的人口达到了将近两亿，才发生流民内乱，而且还是因为这会儿赶上了小冰期的到来。

到了大清，继承了明朝的这种税制并继续向前推进。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都知道，雍正皇帝推行一个政策叫做“摊丁入亩”，这就是把张居正的财政政策推向更加深入。所以大清的人口膨胀得更加厉害。

但是，大清人口的膨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入关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和平红利”与“自我锁死”

“和平红利”在这是啥意思呢？咱们知道，在明朝的时候，中原的百姓要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大明的军队肯定是对中原百姓养活的，关外的游牧者依靠从中原抢来的战利品维系统一，事实上也是靠中原百姓养活的。老百姓被迫交各种五花八门的税，苦不堪言。到了清朝入关之后，中原百姓只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就行了，因为关内关外一统了，打的仗也少了。老百姓要交的税一下子少多了，财政压力再次大幅下降。

康熙说过“永不加赋”，就是永远不增税。他是有资本说这话的，明朝皇上就没这资本。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更有能力生养众多了，这就是满清入关的和平红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大清的人口接连突破了两亿、三亿、四亿，之后才出现问题，天下大乱。

过去有人解释说，清朝的人口规模能够如此大爆炸式地增长，是因为引入了来自美洲的农作物，比如玉米、土豆等等，能养活的人更多了。但是一些新的农业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表明，并不是因为大清引入了美洲作物于是人口变多了，相反，是因为人口变多了，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于是引入了美洲作物，过去把这个因果关系给说反了。

即便是这样，统计数据表明，到了民国初年，美洲作物的产量还不足中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所以人口爆炸是不能用美洲作物来解释的，而应该去看到底层百姓面对的财政压力与人口规模上限之间的关联。

通过前面的二十多讲，我们差不多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走到古代末期，是一定会走上类似于大清这样一种多元帝国的状态的。

即使不是在1644年，不是大清入关，也会是在一个别的什么年份，由别的什么游牧者主导建立的朝代。

因为只有在多元帝国中，作为体系的中国，其中的历史潜能才充分释放出来。就是说，它可以把草原、中原、绿洲、高原等等各种自然地理环境中的人群都纳入到统一而又多元的帝国当中，帝国的疆界一直扩展到它的有效治理半径的极限。

所谓有效治理半径的极限，就是说，帝国统治到那里，花的钱跟得到的各种收益，达到了均衡，往更远走就该亏本了。到了这样一种阶段，帝国会获得一种和平红利，中国也会进入人口的大爆炸式增长。从中原百姓多子多福的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正是人口大爆炸，却让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种自我锁死的状态。美国加州大学有一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他们给这种状态起了个名字，翻译成汉语叫做“内卷化”，咱们来具体解释下这种状态。

中国人口在清朝过度膨胀，导致出现大量过剩人口。啥样算过剩人口呢？就是说他们没啥活儿可干，或者是劳动所得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就算过剩了。

对这些人来说，本来就没钱赚，任何活儿，你给他一点钱他就肯干，劳动力成本极为便宜。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可能内生性地出现了。因为我这最不缺的就是人，你发明出来一个技术还要帮我省人，这技术对我来说没用啊。

这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了，因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以技术变迁为前提。古代中国是可以出现依靠工资生活的雇佣劳动的，但是没有工业革命，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法真地发展起来，那些雇佣劳动仍然是农业经济汪洋大海当中的点缀。

加入世界秩序，跳出困境

这个情况有些麻烦，因为这些过剩人口，靠农业经济是吸收不掉的，只有靠工业经济才能吸收掉。但是，正因为人口的过剩，导致中国无法内生性地进入工业经济。

超大规模的人口，自己把自己给锁死在一种低技术水平的状态上，于是掉到一个陷阱里出不来了。这就是“内卷化”。

这对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既然无法通过工业经济吸收这些过剩人口，最终会导致流民四起天下大乱，就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内乱，自我屠杀来解决过剩人口问题。那样的话，历史就太悲惨了，我们伟大的文明将因此而黯淡下去。

必须跳出这个陷阱，但是依凭自己的旧有资源是做不到了，因为前面解释得很清楚了，旧有资源只能让困在内卷化的陷阱里出不来。那该怎么办呢？有个办法，既然靠中国自身没法出现技术变迁，出现了内生的工业革命，那就从外部传入新技术呗，这样就能刺激中国发展起工业，然后就能吸收掉过剩人口了。这外部世界是谁呢？就是西方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相遇，或者说，通过与西方相遇，而加入到世界秩序当中，已经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内在需求了。

西方的到来当然给中国带来了战争与屈辱。西方征服了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和地区，让它们沦为殖民地；但是西方却没法完全征服中国。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太大了，人口也太多了。

这样一种超大规模，使得没有任何一国能够完全征服它。而列强们都是这心理，我吃不着，你也别想吃着，中国就利用了列强的这种矛盾，寻找到夹缝，不仅没被彻底征服，反倒挺过了屈辱，还发展出解决自己困境的手段。

随着西方的到来，中国的超大规模又呈现出另外一个效果。在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过剩人口一定会导致内卷化的困境；但是一旦加入到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过剩人口反倒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巨大的竞争优势，因为比拼劳动力价格谁也比不过中国。

而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在它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无论它是否主动想要做，都会深刻地改变世界秩序。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明朝末年的税收改革，以及清朝入关所带来的和平红利，让中国的人口获得了大规模成长的机会。但是，如此超大规模的人口，反倒让中国没法内生性地发展出新技术和工业经济，陷入一种内卷化的困境，只有通过加入世界秩序，才能够克服这种困境。

讲到这里，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讲解就告结束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界，就是中国开始努力融入世界秩序的开始。

虽然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谈到了，加入世界秩序不仅会让中国跳出内卷化陷阱，还会让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必须从政治意义上先对自己完成一种现代式的整合。

如果不能完成这种政治整合，加入世界秩序反倒有可能让中国陷入更大的麻烦；只有完成这种政治整合，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竞争优势才真地能够释放出来。

加入世界秩序的初期，中国陷入更大麻烦。如何克服这种麻烦，如何实现现代式的政治整合，以及在此之后如何把中国的竞争优势释放出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与现代历史上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小课题的下半部分要讲述的核心内容。

下一讲，咱们先从加入世界秩序后中国第一个大事件讲起，通过太平天国起义，来看看近代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近代转型篇





32|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太平天国时期是中国真正地开始认识世界，努力推动自己进行转型的起点。但是这个时期也给中国埋下了一系列困局的种子，它们在未来会成为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必须克服的问题。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在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联互动中发生的，我们再也不可能脱离开世界理解中国。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进入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讨论，先从太平天国时期讲起。

也许你会奇怪，近代史的开端不是鸦片战争吗？为什么从太平天国时期讲起呢？

虽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面临了来自西方的压力，但当时的帝国统治阶层并没有理解这个事情。在他们看来，英国人打过来跟噶尔丹打过来，没有本质区别。就是说，帝国虽然遭遇了一场近代意义的战争，但对其理解却还是停留在古代。

那是什么时候，帝国开始意识到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呢？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

所以这一讲并不是讲太平天国，而是围绕着太平天国时期的前后几十年展开。让你看到太平天国的兴起与鸦片战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太平天国如何导致了大清内部的深刻变化，又如何导致了大清对世界理解的变迁，以及这一切与世界大势的变化之间有着怎样的深刻关联。

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

先来说说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之间的关系吧。要讲清楚这个，还得先看看鸦片战争与世界秩序变化的关联。

英国人往中国输入鸦片导致白银外流，只是鸦片战争的表层起因，后面还有个更深层的原因——国际秩序的变迁。

前面讲到过，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供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明朝经济乃至国运的兴衰。这样一种影响，在清朝仍在继续，甚至变得更加深刻。能出现康乾盛世，其外部原因就是当时的世界白银供给很充足。

到18世纪后期，日本再次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这对大清来说问题还不算大，反正还有源源不断的美洲白银。

但是没多久，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这与中国也产生了关联。法国大革命之后，很快就侵入西班牙，而美洲白银都是来自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所以世界白银供给马上严重受挫。

好不容易等到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拉丁美洲又开始了独立运动，一系列的战争导致白银生产还是迟迟恢复不起来。

这些动荡的结果是什么呢？从1790年代到1830年代，全世界的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也骤然减少。这下大清就头大了，白银供给短缺，导致经济变得很萧条。

但是通过刚才的解释可以看出，在19世纪前期，鸦片的流入不是导致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白银一直是既有流入又有流出的，世界白银供给的骤然减少，导致向中国流入的白银急剧减少，才是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于是经济就萧条了，大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但当时的局内人不可能看得清这个问题，大清把白银短缺归因于鸦片的大规模流入，最终引发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战争的结果你应该很熟悉了，一方面是割地赔款，一方面是改造了外贸秩序，从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改为五口通商。

五口通商对大清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大清当时主要的外贸商品是茶叶、生丝、瓷器、漆器等。产地在江南、江西、两湖、福建等地。在一
口通商的时候，出口品得千里迢迢地运往广州，运输中最困难的就是翻
越南岭的一段路，这段路养活了一大批广西籍的搬运工。



中国东南部主要山脉示意图

看了上图，你就知道华南的主要地理结构了。

五口通商之后，就用不着往广州运输了，出口品可以就近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地出海，于是广西籍搬运工失业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经济既萧条，大清的人口也已经膨胀到临界点。正好赶上两广地区又是基督教比较早传入的地区，基督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动员和组织机制。

这些因素全都加在一起，太平天国起义就在1851年从广西发动起来

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大清最富庶的地区，一直坚持到1864年。太平天国的具体过程就不多说了，重点看看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清内部变化

太平天国起义兴起之后，大清发现曾经叱咤风云的八旗军队，要对付太平天国已经完全不顶用了。

在灭掉准噶尔之后，大清经历了近百年的和平，中间只打过规模比较小的几仗。八旗这帮爷主要的本事是提笼、架鸟、听戏、唱曲，不能再打仗了。

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吧，皇上只能硬着头皮起用汉族地方官员，过去是绝不能起用他们的，担心他们有异心。让他们想辙看能不能摆平太平天国，于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等一批晚清中兴名臣就在这个过程中走上了历史舞台。

曾左李胡这些人，在地方训练出湘军、淮军等军队，这完全是在大清传统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之外的军事系统。朝廷在这会儿没银子给曾左李胡他们，那他们怎么练兵呢？

朝廷虽然没钱，但给政策，允许他们征收厘金充作军费。这是什么钱呢？就是各个省之间运送商品时的过境税。几位重臣就是靠厘金的支撑训练出了可用的军队。

当时能够征收到的厘金规模还是不小的，这意味着各省之间的商品贸易规模不小。如此规模的内贸发展，依赖于外贸的拉动。而外贸的拉动力，则是因为五口通商导致的中国贸易规模扩大。

大清允许地方督抚们通过厘金来筹军费，这带来一个后果，地方财政对于中央的依赖性变小了。

中国自从宋朝进入到平民社会后，帝国朝廷一直是采取一种强干弱枝的政策。财权和军权收归中央，地方要受制于中央，以此来确保帝国的统一。这种政策使得从大宋到大清这九百多年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时期的分裂割据状态。

与宋朝以前的豪族社会时期不一样，那时常出现分裂状态，而且一出现就是好几百年。为应对太平天国，使得大清帝国从强干弱枝开始转为强枝弱干，帝国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开始下降了。中央控制力的下降不仅仅体现在财政方面，也体现在人事和军事方面。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朝廷不得不允许地方督抚们便宜行事，可以自行任免和奖惩地方各级的军政官员，这就逐渐培植出了庞大的地方势力集团。

与太平军打仗时，人们又发现用冷兵器完全搞不定了，必须用热兵器。李鸿章从洋人手里买了不少洋枪、洋炮，最终用这些轰倒了南京城墙，灭掉了太平天国。中国的战争从此进入热兵器时代。

要用热兵器的话，你要是能自己生产那是最好的，至少你也得自己能修理，才能顺畅地应用。生产和修理热兵器这种事，需要有比较复杂的生产分工才能做到。这种复杂分工，在草原地区的脆弱环境下是支撑不起来的，只有在中原地区才能做到。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起义给中国内部带来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一方面，在大一统了八九百年之后，帝国从强干弱枝变成了强枝弱干。几十年后的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早在这个军时候就埋下了种子。

另一方面，这种强枝弱干，又正好与满汉差异叠合在一起。鸦片战争以前，大清的治理智慧极为高超，汉、满、蒙、回、藏各种群体起着彼此完全无法替代的功能，而且每个群体权重都是一样的，帝国有着一种内在均衡性。

太平天国之后，财政秩序、军事秩序、人才秩序，甚至是精神秩序，全方位地转由中原地区的汉人主导了，帝国内部的均衡被打破了。

对帝国来说，这就很麻烦了。过去的帝国有均衡，满蒙两个群体又吃饭又干活，有一些特殊地位可以为人所容忍。但是现在帝国失衡了，满蒙群体有光吃饭不干活的嫌疑了，他们的特殊地位逐渐就不为汉人所容忍。

对满蒙两个群体来说，他们本能地能感受到危险，于是就会做一种自保的努力。呈现在政策上，就是变得越来越保守。对于一部分汉人来说，你们不仅是光吃饭不干活，还对我们拯救帝国的努力不断地拖后腿，那索性推翻你们算了。于是，革命的理念就在这个时候隐隐地埋下了种子。

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对中国内部产生了两个深远影响。第一，埋下了地方分裂的种子；第二，导致了帝国内部的失衡，从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清对外变化

太平天国时期，大清对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大清对于世界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变迁。大清开始努力地融入国际条约体系。国际条约体系就是西方在近代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国际关系形式。

严格说来，对外的变化不是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只是赶在了同一个时代而已。同时代还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呢？那就是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这一次干的。

这一场战争的结果让大清大吃一惊，不得不重新理解世界。火烧圆明园意味着国家的首都已经被别人刚给攻占了。

在过去，首都被敌人占领了，这基本就意味着要亡国了。但是大清

没想到，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之后，居然没打算灭亡大清，而是要求跟大清签订条约。只要条约签订了，两国就按照约定退兵了，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搞法。

大清由此见识到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前面所说的国际条约体系。国和国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国际条约来确定的，缔约的国家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大清过去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是古代中华帝国留存下来的朝贡体系。

这两次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国家过来想要跟大清签订平等贸易条约，但是大清坚决不同意。

在大清看来，你们这些破国家，离我天朝十万八千里，还想要平等？离得远只能说明你是最低层的国家。再说，跟你们平等了，朝鲜、越南这些离得近的藩属，我该咋对待他们？所以大清坚决地拒绝了英国、法国等国家所要求的平等。结果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被打得不行了，不得不接受了和西方国家签订平等条约，但实际上条约里埋藏了许多不平等的条款。之后大清想要平等，西方不给了。

大清和西方国家签订了条约之后，发现过去的六部衙门都没办法作为处理这种条约的部门。于是又设置了一个全新的部门，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咱们在电视剧里时不时会听到的总理衙门，专门负责对外事务。

中国由此开始了努力融入现代世界的进程，总理衙门在这里起到过重要作用。一方面是作为最早期的外交部；另一方面主导开启了洋务运动，推动大清寻求自强。

洋务运动的推动与发展，也和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供给的变化紧密相关。1856年之后，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银矿，并且拉丁美洲的秩序也逐渐恢复，白银供给又比较充足了。

于是可以看到，在这之后几十年里，大清的鸦片进口数量比鸦片战争之前还大，却有着持续的白银净流入。这极大地缓解了大清的财政压

力，并且让经济开始恢复景气。帝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能力。

又过了十几年，西方国家陆续开始实行货币金本位制，主动储备黄金，抛售白银。世界上白银的供给开始过剩，而大清的货币仍然是银本位，对白银的需求仍然很大，白银便源源不断地流入进来。

这个过程中，由于黄金相对于白银的比价不断上升，相当于大清的货币在不断贬值。这在一方面刺激了大清的出口，另一方面使得西方国家到大清来投资变得相当有利可图。因为西方投资者是拿着黄金来的，到了中国能兑换出比在本国更多的白银。

大清过去主要都是农业经济，而洋务运动所要发展的是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对于资本的需求比农业经济要大很多。

所有这一切的合力，使得洋务运动欣欣向荣地搞了起来。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太平天国时期是中国真正地开始认识世界，努力推动自己进行转型的起点。

但是太平天国时期也给中国埋下了一系列困局的种子，它们在未来会成为中国在现代转型中必须克服的问题。

所有的这些变化，都是在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联互动中发生的，我们再也不可能脱离开世界理解中国。甚至可以发现，中国加入世界秩序，给自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但也同样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手段。

从中原角度，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变化的冲击力。但是把视角切换到西域，我们更能感受到这种变化深远的世界意义，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秩序之间相互构成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

33|左宗棠借力伦敦，收复新疆

新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意义，中国最早是在这里找到了大国博弈的感觉。如果新疆丢了，连锁效应就是北京就危险了。那么，帝国必须安顿新疆的秩序，这是它必须担负起来的历史命运。在肩负这个历史命运的时候，中国在不自觉中就成为了海陆枢纽。

这一讲来说西域，也就是新疆。西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意义，中国最早是在这里找到了大国博弈的感觉。

西域是大中亚的一个部分，再加上西边的几个斯坦国，共同构成了大中亚。

大中亚在近代历史上是大国博弈特别重要的场所。中亚的大博弈，包括两个方向。南北方向，主要是俄国和英国的博弈。东西方向上，主要是中国和俄国的博弈。

这一讲我们来展现中亚大博弈的历史，以及在东西方向，俄国和中国的博弈。

我们会用左宗棠收复新疆这段历史作为例子。这段历史，可以说折射了中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的作用。

中亚的大博弈

先来说中亚南北方向的博弈。不管是哪个方向的博弈，都跟地理结构相关。

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大中亚可以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东边就是中

国的西域，西边是今天个人中亚的几个斯坦国。

大中亚还有一个南北疆界，那就是从帕米尔高原西南方向延伸出去的兴都库什山脉，以这座山脉为界，又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区域。

俄国和英国在中亚的博弈，就是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确立边界的一个过程。

俄国的战略是，努力深入欧亚大陆腹地。通过中亚南下，只要能够往前冲到兴都库什山脉，就能威胁英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搞得好，甚至能搞个印度洋上的暖水港。即便搞得不好，也能威胁印度，掌握跟英国谈判的巨大筹码。

那么英国肯定不愿意，所以英国的战略是，一定要为印度保住其北部战略空间，不能让它受到任何人的威胁。只要印度是安全的，这里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就会成为海洋帝国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基础，再在海洋方向对大陆帝国形成包围。

两国在中亚的争夺反复了好多年，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一个缓冲国，就是跨越兴都库什山的阿富汗。用阿富汗把两大帝国彻底隔开，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实际上，两个帝国谁都没有能力实质性地越过阿富汗，这里的崇山峻岭就是海洋与大陆两大帝国的天然疆界。

由于地理的原因，中国是不会参与到在南北这个方向上的博弈的。但是大中亚的东西方向上，中国就是博弈的玩家之一。东西方向，东就是新疆，西边就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

从东西方向上的博弈，你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上独特的位置，就是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的中介位置。

通过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博弈，启示出中国作为海陆枢纽帝国的历史意义。



大中亚地区地形图

新疆是怎么丢的

既然谈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就得先说一下新疆是怎么一度丢掉的。

大清在19世纪中期的十几年当中，被太平天国搅得天翻地覆，根本没有精力去认真经营边疆了，结果一个来自中亚的冒险家阿古柏抓住了机会，在1865年趁乱侵入新疆。

阿古柏是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动员起一批信徒跟他一块冒险，迅速地控制了整个南疆。阿古柏又挥师北上，打败了另一教派的穆斯林，攻占乌鲁木齐，眼看着又要席卷北疆了。

俄国眼看着阿古柏势力的扩张，便在1871年派兵冲进了北疆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伊犁，把这里控制住了。但俄国并没有说要割走这里，而是说要替大清代为管理伊犁地区，等到日后大清收复新疆，再把它归还给

大清。

俄国在中亚的策略

这就有点奇怪了，俄国对于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的痴迷，为什么对伊犁抱着这样一种暧昧的态度呢？

第一个是俄国根本没想到日后大清还能收回伊犁。

第二个考虑是，俄国当时正在想办法控制今天中亚几个斯坦国所在的区域。俄国意识到，阿古柏的原教旨主义对自己很危险，如果阿古柏只在南疆，对俄国麻烦还不大。

如果阿古柏控制了伊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伊犁跟今天哈萨克斯坦的地理近乎是一体的，阿古柏太容易从这里再冲到帕米尔以西的中亚了。

所以，俄国一定要把伊犁控制住，绝不能让它落入阿古柏之手。但是这样的话，就可能把阿古柏及其追随者的敌意都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这个实在是不划算的。

咋样才能把激进的伊斯兰力量的注意力转移开呢？很简单，把大清拉上，分担风险。

在俄国看来，反正大清根本无望收复新疆，那就以代管的名义做个顺水人情。一方面证明我没有贪图你的伊犁，同时又能把大清拖在这趟浑水中不让它走，让大清至少分走原教旨主义者一半的注意力，这就是最佳策略了。这是俄国没有直接霸占伊犁的根本原因。

在后来的历史上，俄国及苏联有好几次都有机会拿下新疆，但都把这机会放过去了。原因都在于，它不愿让极端势力的敌意都汇聚在自己身上，而一定要拉上别人。

这别人就只可能是中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中亚没法自主地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外部世界建立大陆帝国来帮助它提供秩序。

但由于各种极端势力的存在，对深入中亚的大陆帝国来说，一种特殊样式的“分而治之”，即由两大帝国来分别面对它，就是一个更优选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亚西部注定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而中亚东部则注定是属于中华帝国的。

左宗棠收复新疆

再来看一下左宗棠到底是怎么收复新疆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将海洋资源转化为内陆秩序的具体过程。

大清在平定了中原地区的战乱之后，终于能腾出手来应对边疆问题。左宗棠说服了太后，要出兵西征。但是太后跟左宗棠说了，要西征的话，兵是现成的，就用你的老部下湘军，可是朝廷手上的银子根本不够给你发军饷的。

左宗棠于是头很大，收复新疆肯定是持久战，没军饷这仗根本就无法打。朝廷于是另想了个办法，啥办法呢？贷款！大清从汇丰银行贷款，前前后后陆续贷了1500万两白银，解决了军饷问题。

这里就有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对于汇丰银行来说，贷款就必须有担保物，否则建立不起来信用结构，贷款不会发放出来的，这是个非常正常的商业逻辑。大清用什么作担保呢？用帝国海关的税收。

问题是，汇丰要如何才能接受这个担保物呢？至少有两个前提必须要满足，第一，大清海关的账本需要符合现代会计规则，让汇丰能看得懂。倘若海关的账本跟个当铺似的，汇丰银行不会接受的。刚好，大清

海关是在英国人赫德的管理下运行的，账本肯定能看懂。

紧跟着第二个前提，即便赫德把账目整理得很清楚，但如果海关的关税规模很小的话，仍然不足以作为一个担保物，贷款还是发放不出来。关税规模取决于贸易规模，只有帝国的外贸规模很大，才能确保关税规模够大。

那么大清帝国的外贸规模是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呢？上一讲我们就说到过了，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了，帝国的贸易规模就扩展起来了。

鸦片战争和外国人管理海关，让大清帝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战争融资手段。假如没有这个融资手段的话，军饷跟不上，西域丢了就是丢了，肯定无法收复，历史上这种事情有过好多次。

大清没想到的是，自己和英国打仗失败了，半推半就地加入了世界秩序，却让帝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保全能力。

回过头来接着说汇丰银行，它是到哪里搞了1500万两白银借给大清呢？它不是靠储户的存款，而是到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债券。通过发债完成融资，借给大清，大清再以此来平定内陆深处的动荡。

伦敦金融市场在当时对世界的统治力，要远远大过今天纽约的统治力，它就是整个海洋世界的运转轴心。

中国的海陆枢纽位置

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就浮现出来了。

整个海洋世界基于多年的远洋贸易和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资本秩序，以中国为中介，转化为向失序的大陆深处投放秩序的历史过程。而对于英国来说，由中俄两国分治中亚，远远好过俄国一家独占中

亚，在可能的情况下，它也愿意支持中国收复新疆。

于是，中国成为联系海洋与大陆的必须的中介性存在，是一种海陆枢纽性的存在。

至此，咱们能够发现，近代的中亚正是通过它的混乱失序状态，而让中国能够发现它的历史意义。左宗棠说服太后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也就是说，新疆丢了，连锁效应就是北京就危险了，那帝国也就完了。那么，帝国为了成就自身，也必须安顿新疆的秩序，否则帝国甚至无法成就它自己。这不是它能选择的，而是它必须担负起来的历史命运。

在肩负这个历史命运的时候，中国在不自觉中就成为了海陆枢纽。

这一地位只有中国能够承担起来，因为要将海洋方面的资源转化为向大陆深处的秩序投放，这个中介者必须具有超大规模性，否则根本没有能力。而中国的中介性地位，正是通过融入世界而被激活的。

本讲小结

这一讲所讲的核心内容就是，西域-中亚是人类世界秩序的一个缩影，这里构成了海洋帝国、大陆帝国、作为第三支力量的海陆枢纽性帝国的边界。

中国正是在这里，才能够看清自己的历史责任。

但是，中国要想真的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必须更有效地融入世界，完成自己的现代政治转型。

南洋就起到了激活中国这种意识的作用。于是，为了理解西北，我们就必须再看看南洋。这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34|南洋华人对近代中国的塑造

南洋是中国近代的过渡地带，宗族是南洋华人的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小团体内部增加信任、分摊风险，反过来又制约了华人在当地的政治影响。而在排华势力的推动下，接触了近代思想的南洋华人更有动力推动中国变革，从而直接促进了革命的进程。

这一讲咱们来聊一下南洋，为什么要聊南洋？因为这里蕴含着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结构。

中国历史是在一个草原-中原-海洋的三重结构中展开的。而帝国就是在过度地带形成起来的，具体是谁的过渡地带呢？

在古代，是草原与中原的过渡地带，这里他们能获得重要的治理智慧。比如大唐、大清，他们以草原和中原为基础，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向海洋传播自己的文化。到了近代，这个过渡地带是哪？

就是南洋了。

它是中国近代转型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智慧的来源。以这里为基础，中原跟海洋的资源都能够被调动起来，然后才有了咱们上一讲所说的，向大陆深处、向动荡地区投放秩序的努力。这些加到一块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的结构。

必须着重解释一下，所谓的海洋与中原的过渡地带，这里的海洋所指的绝不是指东海、南海这种区域性的海洋，而是整个世界海洋；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全世界的海洋就联为一个整体，此后要讨论海洋就必须以全球为单位才行了。

南洋作为过渡地带，能调动中国和海外两部分资源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南洋华人、海外华侨。那他们是怎么去到海外呢？这个故事

就非常有意思了。

宗族关系，帮海外华人开枝散叶

海外华侨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开枝散叶，能够建立遍及整个南洋，一直扩散到整个美国、日本、欧洲的庞大网络，最基本的载体是什么？

宗族关系。

这个宗族关系主要是依托东南沿海地区既有的社会结构。

宗族关系有一种双刃剑效应，它既帮助华人铺开了一张庞大的跨越海洋、地区的网络，也限制了海外华人的政治影响力。

最终，它需要被一系列的新观念所突破与整合，才能真地推动中国现代观念和现代转型的过程。

这么说起来太抽象了，我们进入到一些具体的历史过程来解释下，就容易明白了。

咱们先得解释一下，为何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宗族关系会比中原其他地区更加强大。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得回到地理上去。

东南沿海从浙南开始一直到两广一带，有绵延不断的丘陵，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地理结构很复杂，交通起来就很困难。

你在北方跑了几千里地，当地方言都能听得懂；但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就算你翻过一座山，可能旁边说得话你就听不懂了。

那样的一种地理结构，使得东南沿海与中原相比，受到战乱波及较少，地方自治受中央权力的干涉也较少。这就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族结构远远比中原、比北方保存得好的多。

东南民间老百姓“下南洋”，宗族秩序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风险安排机制。

因为，到海外去冒险，与纯粹在中原种地相比，风险要大得多，需要有特殊的风险对冲机制的安排。在现代社会有很多保险机制来对冲这种风险，但是古代没有。

那古代怎么办？就是靠宗族。同一个宗族内部的人都有信任关系。

而且，同一个宗族的人迁徙到海外之后，会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逐渐吸引人过去。这些人到了当地之后会形成互助关系，通过这种互助关系，也能把单个个体的面临风险分摊掉。

而反过来，在海外开枝散叶的人群，与家乡之间因为宗族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又形成了基本的贸易通道。

这个向海外迁徙的过程从宋朝就开始出现了，一直保留了几百年。这几百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一来，现代轮船出现，下南洋的人就更多了。晚清时期的过剩人口，在南洋这个方向也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出口。

这时的南洋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发展优势：

南洋本身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又被西方征服成为殖民地，一下子可以分享西方庞大的世界市场；

这里又有西方所提供的一整套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经济与技术；

而且因为地处西方与大清的贸易通道，这里还有充足的货币资本；

再随着大量廉价的中国劳工的到来，于是就发展起一种畸形繁荣的殖民地经济。

很有意思的是，宗族结构这时也开始参与塑造了一系列东西了。

他参与塑造了东亚地区现代国际金融秩序。华人劳工们在南洋挣了钱，之后想回报乡里，就想把钱寄回老家，这就需要有相对比较可靠的汇款通道。

可靠的汇款通道从南洋到大陆的有两个重要节点，分别是新加坡和香港，而这些汇款在通道上又可以转化为重要的金融资源。

于是，华人劳工回报乡里的愿望，反过来促成了这两个重要的现代金融中心的崛起。

宗族关系，限制了南洋华人的政治地位

另一方面，华人在南洋的政治地位，却因为宗族结构而受到了限制。为什么呢？

因为宗族可以帮助华人到海外去贸易，获得信用体系，但是华人对宗族的依赖，也局限了华人对秩序的想象。

因为他们所能想象的秩序，都是以宗族为基础的，这就一定会压缩其政治视野，对于宗族之外的事情的不会太关注，宗族和宗族彼此之间也难以产生认同。

而且更要命的是，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的人认为大清就是世界，他不知道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地区。

我举一个例子，陈独秀在辛丑条约之后说，我到了那会儿才知道，大清只是全世界的国家之一，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如果南洋华人都这么想，那他们对所处的新的国家，不会有认同。你的认同一定是区域认同，就像今天咱们不会对地球人有认同，只会有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这种国家性的认同。

在欠缺彼此认同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以前，根本就无所谓南洋华人，只有南洋福清人、南洋潮州人、南洋厦门人、南洋客家人等等。

所谓的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对中国人作为整体来说；在作为同乡的意义上，他们是相当抱团的。

同乡抱团会带来很强的小群体凝聚力，以这些为基础，发展起强大的华人帮会组织，在南洋和美洲等地最著名的就是洪门三合会了，其他的青帮、哥老会什么的，则是在大陆的口岸地区势力强大。

这些帮会组织让华人在近代早期的南洋地区一度颇有势力，比如马来亚的土著经常内战，华人武装在旁边一站，两边都能吓得住。

因为他们的组织力、战斗力都很强。但是会带来一个问题，帮会组织越成功，就越会让人只认同自己的小群体，无法产生超越于血缘关系和同乡关系之外的政治意识。

这种事，人算不如天算，认同这件事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还得看南洋的别人怎么办。别人就是：土著和白人。

土著居民和白人殖民者给南洋华人的压力，最终在南洋华人身上开始逼问出一种政治意识。

对于土著居民来说，华人劳工直接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因为晚清因为人口过度膨胀，中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内卷化”的问题，华人劳工极度便宜，能接受极低的工作标准，土著都受不了，于是土著的工作就没了。

对于白人殖民者来说，华人帮会打打杀杀是潜在的秩序扰乱者，也影响税收，白人也想收拾你。

因此，无论是土著还是白人殖民者，都产生了很强的排华欲望，而且他们在排华的时候不会区分什么福清人、潮州人、客家人之类的，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笼统的中国人。所以他们是对地方性群体不做区分的，

笼统地排华。

所以，共同的屈辱，终于让来自不同地区的海外华人浮现出某种共同的身份感，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渐渐开始出现了。

革命力量从南洋兴起

但是，南洋华人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了对新观念的需求，却还说不清楚，所要的新观念究竟是什么。想要把这个意识说出来，就需要有人进行观念的灌输和塑造。

于是，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等人的工作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通过各种政治宣传和组织工作，把海外华人对于各种苦难的感知，转化为一个意识：

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大中国，你们将会获得保护。

海外华人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民族主义观念，他们渴望中国能够保护自己，也渴望中国也能拥有他们在海外见到的那些现代的法律和制度；但是回头看看中国，实在不争气，民族主义情绪便被逐渐地引向了革命激情。

也正是因为各种生活遭遇，海外华人反倒成了最早拥有中国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群体，这是中国现代转型所必须的两种意识。

孙中山的革命努力，在海外华人当中获得大量支持，以致他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举几个数据就更容易说清楚：

1.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组织过十次起义，其中有八次是靠南洋作为支援的，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中有二十九个人就是从南洋

赶回来参加起义的。

2. 孙中山为革命募的款，有差不多85%来自南洋，再加上来自美国的募款，则占到了93%。

3. 更有意思的是，孙中山要想发动革命，就必须找到把理念转化为行动能力的组织资源。南洋华人的帮会组织，就是现成的组织资源。为了能把帮会充分动员起来，中山先生还曾亲自加入洪门，当上了其中的大龙头，这成了他发动起义所依托的重要组织资源。

不过，中山先生在早期发动的革命一直不成功，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因为你依托帮会作为你发动革命的组织资源，帮会所关注范围也就决定了这种革命的动员极限。

帮会里的人主要来源还是福建、两广，意味着你革命的动员也就是在这几个省份，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动员。

因此，革命要想真的搞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光靠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已经不够用了。大陆地区的口岸城市，开始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上海、广州、汉口、九江，这些有租界的地方，都是口岸城市。它们比中间层的南洋，与中原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在租界地区，他们也能感受到，现代政治、法律、观念。

所以口岸地区，我把它们定义为一个广义的南洋。这里“南洋”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包括所有对现代政治、法律、观念有接触，同时对中国内部有深入了解的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我称为广义的南洋华人。

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初年，以口岸地区为基础成立的一些革命组织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对中原地区的了解比南洋华人更加深入，他们所能动员的资源也不再局限于福建和两广有限的几个省份，而是能在国内形成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动员。

所以，我们看到20世纪初年，以口岸地区为基础成立的一些革命组织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对中原地区的了解比南洋华人更加深入，他们所能动员的资源也不再局限于福建和两广有限的几个省份，而是能在国内形成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动员。

我们在20世纪初期，看到成立了一些比如，广东地区的兴中会、浙江地区的光复会、湖北地区的华兴会，最终这些组织又合并成为同盟会。这几个地方：

1. 有口岸、有租借；
2. 跟内陆有更深刻的联系；
3. 能动员起的人已经远远超出了两广和福建。

所以这些组织合并成同盟会后，带来了辛亥革命。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革命的世纪。

本讲小结

咱们大致介绍了，中国走出古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的这个关口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状况。而中国要走上近代转型之路，不是只靠内部的努力就能完成的，是内部跟外部两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内部的动因，接下来我们就得再讲讲外部的动因，也就是对近代中国转型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英国、俄国、日本。它们的谋划与行动，是中国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

只有把内外两种动因都搞明白了，你才能恰当地理解近现代的中国历史。

接下来的三讲，我们会暂时地脱离开中国，来讲讲那三个国家。

35|英国秩序下的中国角色

要理解近代的中国，就要理解深刻影响中国的其他国家，首当其冲的就是英国。英国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什么最开始要求的是通商口岸？这是英国的国际策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本讲就告诉你英国在近代做了哪些努力。

上一讲，我们说到了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内在动力，也就是南洋。

从这一讲开始，我会用三讲来给你讲讲外部因素，也就是对中国近代转型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是英国、俄国和日本。

它们构成了中国转型的外部约束条件，不理解这三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就没法真地理解中国历史所面临的处境。

这一讲先来说一下，近代历史上的英国。

主导世界市场的英国

英国这个国家很特殊，其他的列强国家就仅仅是个国家，大英帝国却同时有着国家性和世界性这两重属性。

- 就国家性来说，它和其他列强并列竞争；
- 就世界性来说，它超越于所有国家之上，主导着全球贸易体系与金融体系，其他国家都没有这种主导能力。

举个例子，拿破仑当年称霸欧洲大陆，发现搞不定英国，于是就宣布大陆封锁政策，要把英国封锁欧洲大陆的市场之外，试图用这办法困死英国。英国马上就搞了个反封锁，把欧洲大陆封锁于全世界的市场之外，最终反倒把法国给困死了。

后来的世界大战中，德国也做过类似努力，也被英国以类似办法击败。这就是英国的主导能力的一个体现。

为什么英国有这种主导能力呢？

这对咱们理解整个西方世界的运作很有帮助，咱们得先从贸易市场变化说起。

近代以前，世界各国的主要财富来源都是传统的农牧业经济，长途贸易的规模很小，主要是短途贸易，所以经济基本是以本地市场为单位运作的。

近代以后，近代技术发展起来了，工商业开始成为更加重要的财富来源，长途贸易规模变得非常大，经济以世界市场为单位运作，农牧业也被拉入到世界市场之中。

重要不是农牧业的变化，重要的是贸易市场的变化，带来了政治秩序的一个衍生变化。

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是以本国经济为基础的，但到了近代，本国经济开始以世界市场为单位，而世界市场的变化，又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国家控制。

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以及财政，都不再能完全自主了。因为世界市场不在你的控制之内，以财政方案为基础的国家政策，也开始受制于世界市场的波动。

既然没法控制世界市场，那就只能想法顺应它，顺势而为。

由于世界市场始终是在动态变化中，你没法事先判断它的势头是哪个方向，所以顺势而为这个事儿，也没法事先规划。

要想能够主导世界秩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层面是高度打通的，外部世界有什么变化，都能迅速地反馈，转化为内政层面的调整。

打个比方，世界市场就像大海，这个国家就像一条小船，过去人们都认为只有站在坚实的陆地上才安全，现在它反其道而行之，让自己就在大海上漂着，高低起伏都和世界市场的波动相同步，反倒能够驾驭大海。

也不是驾驭，而是适应，作出你在陆地上做不出来的事。

大英帝国就有驾驭大海的这个能力，这就是前面说的大英帝国的世界性。

它能够通过内政和外交的高度打通，来主导世界秩序，还能用世界市场作为放大器来放大自己的政策效果，借力打力。

后来继承了它的位置的美国，也具有这个世界性。

英国的小社会、大政府

那么，为何英国能让自己的内政和外交高度打通呢？

英国说明白了，美国你就可以推演知道了。这是因为它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很特别。

英国是大社会小政府，而欧洲大陆国家通常都是小社会大政府。

为啥会形成这个区别呢？还是跟地理有关了。

任何国家，在近代以前都跟英国一样，是大社会小政府的，不是因为他们都要学习中国，而是因为那时的政府能力都还很弱。

但欧洲大陆国家很特别，会面临来自大陆的威胁，因为有自保的需求，迟早都会发展出强大的陆军。政府手里掌握强大的陆军，就不仅能够用来御敌了，也有能力对本国的社会进行压制，所以欧洲大陆国家在近代以后会形成小社会大政府。

而英国是岛国，它不需要强大陆军也能保卫自己，所以政府对社会也没有形成压制力，一直保持了大社会小政府的状态。

像欧洲大陆国家这样的小社会大政府，政府是政治议题的主要发起者，政府对社会有更强的管理属性。

而英国这种大社会小政府，社会是政治议题的主要发起者，反过来政府对社会有着更强的服务属性。

英国的社会如何发起政治议题呢？通过议会。议员们就是社会的传声筒，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利益博弈，多半都会进入到议会当中去辩论，争取把自己的诉求转化为国家政策和法律。

之所以咱们容易忽略这一点，中国是个大陆国家，是小社会大政府，所以咱们观察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的时候，注意力本能地会主要放在政府部门，诸如总统府或者首相府之类的地方。

对于欧洲大陆国家来说，这种观察角度是可行的。但是要观察英国以及美国的政策制定，更值得观察的是它们的议会部门。

诉诸国家保护的英国商人

既然是社会博弈决定着英国的政治主题，社会的变化就会直接反映在英国的政策变化上。

近代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变化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启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历程。

但不要搞错了，这个海外殖民扩张主要是社会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

一群群商人到海外去冒险，寻找发财的机会。比如著名的东印度公

司，就是个私人合伙公司，根本不是国有公司。但就是这个私人公司，却征服了整个印度。

商人冒险家很多都命丧海外，但也有小部分人获得了成功，比如像东印度公司这样的。

一般来说，这些人不会愿意国家插手自己的海外利益，更愿意自己组织力量进行保护；因为一旦国家插手就要交保护费了。所以我只要自己搞得定，就不需要交这个保护费。

但是有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自己保护已经搞不定了，他们就会转向国家要求其出面提供保护。

国家是否会出现保护呢？

全看这些家伙是否有能力在议会里进行成功的游说了。一旦游说成功，他们的海外利益就会被界定为国家利益，国家就派遣军队进行保护；游说不成功，他们就还是自生自灭。

游说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实际上大致可以定量地测出来，就是你到底能花多少钱来进行游说。

这倒不是花钱去贿赂议员们，而是在公共舆论中造势，雇佣高水平的顾问和律师，帮自己把诉求表达为一套看上去很高大上的理念和提案。拿着这个东西博取社会更大的支持，到议会里游说。

各种利益集团都会进行议会游说，它们的诉求经常会有各种冲突，谁花的钱多，谁就更有机会游说成功。但所谓的成功，不会是胜者全得，因为别人的钱也不会白花，会有各种对冲、抵消的效果。最终的决议就会是多方博弈妥协的一个结果，只不过会朝花钱最多的那一方有所偏重而已。

这也很合理，肯花足够多的钱，意味着在海外相关利益的规模足够多，对它进行保护就是合理的政治决策。

来议会游说的利益团体，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甚至还有纯粹的外国利益团体也会雇人来游说。所有国内国外的各种考虑，要在同一个场子里面PK，内政与外交很自然地就打通了。

还要再强调一下，重要的事情分三点来强调：

这些利益集团花钱游说，并不是行贿。

第二，不要看到利益集团就觉得它会绑架社会，于是想要打击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是内在于人性，人类社会的常态，永远会存在的，所以要打击的根本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不按规则行事的利益集团。

第三，利益集团根据自己在一线经济的感受，对游说费用的调整，就会影响到国家政治决策的变化。

这种决策方式，对于世界市场的变化能够非常敏感地进行反应，所以英国的内政、外交就高度打通了。

不殖民、只通商的非正式帝国

政治决策是要保障国家利益，在英国的这种决策逻辑下，国家利益不是被事先规定出来的，而是被动态发现出来的。

所以，要问近代历史上英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首先应该问的是，英国商人的利益是什么，因为英国商人的利益会转化为英国的国家利益。

对商人来说，利益是什么呢？就是寻找到稳定的市场，扩大贸易规模，以及尽量少地付出管理成本嘛。

在大英帝国的扩展逻辑中就能发现这一系列特征。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除了印度这个特例之外，英国在海外只要有可能，就不占领土

地，只占领一些重要的贸易和海上交通据点，比如香港、新加坡、好望角、直布罗陀等等。

对其他地方，英国的政策都是能不直接统治就不直接统治，而只是扶持当地的统治者，条件是，被扶持的统治者愿意向英国开放市场。

这样，对英国来说，贸易的好处都能获得，但是不用付出统治殖民地的成本。不要以为征服殖民地是个赚钱的买卖，很多时候是赔钱买卖，因为统治的成本很高的。

研究大英帝国史的学界有个经典的说法，大英帝国包括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两个部分。

正式帝国就是直接统治的地方，比如印度；但更大规模的是非正式帝国，就是既加入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又用不着英国花钱去统治的地方。

可以说，几乎整个非西方世界都处在大英帝国的非正式帝国范围当中，英国的统治成本却非常之低。

直到19世纪末期，其他欧洲国家开始大规模抢殖民地了，英国也开始主动占领殖民地，免得其他列强占了殖民地，用政治手段关闭市场。结果是，英国的正式帝国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它的非正式帝国的规模却越来越小，他的统治成本上升了。

这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之后，大英帝国统治世界越来越吃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的统治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了。

英国想要稳定统一、适度繁荣的大清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英国和大清进行了几次战争，却从来没有想过要统治和灭亡中国，战争的目的只不过是让中国开放贸易。

大清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稳定、统一而又适度繁荣的帝国，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

- 如果大清政治不稳定，就意味着英国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市场；
- 如果大清被列强肢解，列强有可能在自己瓜分的地盘上向英国关闭市场，这肯定不如大清的统一市场对英国更有利；
- 但如果大清太贫困，这个市场就算稳定，也没消费能力，英国进入这个市场也没啥用；
- 如果大清太富裕，就可能变得太强大，有可能用政治手段向英国关闭市场，这也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只有大清既稳定统一，又不会太过强大，而是适度繁荣，才能让英国既能从这里赚钱，又不用承担额外的成本。这是最符合英国商人利益的，也就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为了确保这些利益，英国还是要做些事，就是要帮大清进行内政层面的改革，免得大清的统治太糟糕，自己崩溃了，中国市场就会乱成一团，那也不符合英国利益。

大清的统治如果比较稳定，它还能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合作者。

因为远东还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俄国。

在远东牵制俄国的力量，俄国在欧洲就没法跟英国叫板了，英国就能更低成本地调控欧洲的力量均衡。

所以，在近代史上我们就能看到，就算大清自己做了蠢事，比如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引来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结束后英国也还是要竭力保住大清的统一，免得市场就被别人瓜分了。

所以，晚清的内政改革和洋务运动的一系列努力，以及大清能够始终保持着统一，除了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之外，也要看到这背后英国的影子。

英国在这里面当然不是安着多么大的好心，但也不是安着多么大的坏心，它在中国做的一系列事情，都是为了尽量符合它的国家利益的事

情。

也就是稳定一个稳定统一又适度繁荣的大清，维护一个稳定市场。

但它的这些作为，却是中国在近代转型当中能够借重的一个力量，这是我们必须理解的。

我们不能笼统地把英帝国主义与沙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混为一谈，它们在利益与策略上是有着很多差异和矛盾的。

清末能够保持帝国统一不至于崩溃瓦解，极为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以夷制夷”，但“以夷制夷”的策略能够运用，前提是列强彼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不理解这个，就没法真地理解近代中国历史。

本讲小结

要理解列强的冲突和矛盾，前提就是理解列强的生存逻辑跟利益结构。

列强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矛盾，就是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矛盾。海洋帝国自然就是英国了，大陆帝国最有代表性的力量是俄国。

下一讲，咱们就来看一下俄国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以及它的战略规划如何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36|俄国秩序下的中国角色

俄罗斯传承了东正教的衣钵，以救赎人类苦难为民族精神。地理上的平坦也给了这个北方大国不安全感。所以，在拯救人类和地理扩张双重动力下，俄罗斯对中国长城以北的所有土地都虎视眈眈。其中东北是重中之重，俄国、日本、英国三股势力都在东北汇合……

这一讲来说一下俄国。

俄国几乎就是大陆帝国的代名词，但让俄国成为大陆帝国的，不仅仅是它的地理特征，还有它的精神特征。

俄国有一种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特殊命运观，俄国认为自己这个国家承担着一种神秘而又神圣的历史责任，要通过承担苦难，来完成对人类的救赎。

它认为这种命运来自于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拯救，这个使命在今天要由神圣的俄罗斯承担起来。

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救世主的意思，那么俄罗斯帝国就是个弥赛亚帝国。

东西罗马的分裂

弥赛亚帝国的观念和俄国的大陆地理特征结合在一块，才能完整地解释俄国在近现代的一系列内政和外交行为，也才能真正理解它在近现代历史上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

咱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种精神来自东正教，所以咱们先简单地说一下作为基督教分支的天主教和东正教是咋分化出来的。

基督教是公元初年诞生，在诞生后不断遭受打击。

但在三百多年后，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条件是罗马皇帝要作为教会最高领袖。这样，罗马皇帝就同时有了世俗和宗教两个身份，罗马帝国建立起一种政教合一的结构。

但是你不要搞错啊，政教合一都是，政压制教的，教手里没有枪，没法压制政的。

基督教成为国教没多久，罗马帝国就分裂成为东西两半，又过了几十年，西罗马彻底崩溃了。

于是东边和西边就发生了历史上的分叉。

这样，在西欧，教会就获得了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发展的机会，到中世纪变得很强大，发展成为今天所说的天主教会。西欧的世俗政权那个时候比较衰弱，但他一直跟教会竞争，没有停止过。

但是，在东罗马帝国那边，强大的世俗政府一直存在，所以从古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政教合一的结构就一直没动过。

基督教追求的是对人的救赎，教会认为自己就是帮助人类实现救赎的机构。在西欧，教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它就使劲挤兑世俗政权，说你们就是一帮打工的，给我们打工，我们独自承担追求救赎的使命。

对教会来说，垄断救赎使命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中世纪的人别的不想，只想着救赎。谁能掌握救赎之道，谁就掌握人们的效忠。

但是在拜占庭这边不一样了，教会在皇帝手里掌握着呢，所以皇帝就一鱼两吃，说我这帝国既统治天下，同时又像教会一样，承担着特殊的使命，要帮人类实现救赎。

东西两边的教会本来就一直有矛盾，它们解释圣经时的侧重点不一样，而在救赎这件事上，它们连啥叫教会，都说不到一块儿去。

西边认为教会必须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东边则认为教会必须是和政权相配合的。

两边都忍了对方很久，到公元1054年终于忍不住了，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彻底分裂，于是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天主教与东正教之分。

所谓东正教，就是东边的正统教会，它认为，我这是从古罗马直接继承下来的，当然我这才是正统，你们西边那是被坏人篡夺了。

俄罗斯的东正教渊源

拜占庭帝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帮助人类实现救赎的弥赛亚帝国努力向外传教。

在公元988年，让原本信奉萨满教的俄罗斯人改信了东正教，此就是拜占庭的小跟班。

没想到，到公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没救赎成人类，自己先完蛋了，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了。

帝国末代皇帝在巷战里战死了，他有个侄女逃到了俄罗斯，后来又和莫斯科大公结婚。这个小跟班跟古老的罗马皇族联姻，身份一下子就起来了，莫斯科大公就开始自称为“凯撒”。

这是罗马皇帝的头衔，不过“凯撒”的俄语发音在咱们这像个脏话，叫做“Tsar”，汉语译成“沙”，这就是沙皇制度的来源。

反正拜占庭帝国也灭亡了，俄罗斯就自视为罗马的继承人了。

莫斯科郊外还有个修道院，里面出来个修士跟沙皇说，您瞧见没，别的帝国都完蛋了，为什么呀？因为它们信仰不纯。您现在是正统教会的统治者，您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就是第三罗马。

第三罗马是俄罗斯加在自己身上的，非常重要的政治象征。

再解释下，为啥是第三罗马呢？因为前面还有俩。第一罗马是正宗的古罗马帝国，第二罗马是拜占庭帝国，轮到俄罗斯这不就是第三罗马吗。

当然了，西边天主教会是不认这个账的，它认为我们这边才罗马呢，东边一帮斯拉夫人算老几。

你一定见过俄罗斯国徽上的双头鹰标志，那实际上是古罗马帝国的徽章标志。只不过后来谁觉得自己是罗马的继承人，谁就把这个放到自己国徽上，像俄国、德国、奥地利、甚至南斯拉夫，都这么干。

承受苦难、救赎人类的使命

既然俄罗斯帝国都是第三罗马了，那第二罗马的弥赛亚帝国的使命，也得继承下来。

俄罗斯帝国要帮助人类实现最终救赎。咋救赎呢？

看看耶稣基督吧，他通过自己的苦难替人类赎罪，帮人获得救赎；那么俄罗斯作为弥赛亚民族，也得模仿耶稣基督的榜样，承担起全部的苦难，帮助全人类获得救赎。

虽然你一想起俄罗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它给别的民族带来的很多苦难，但俄罗斯却感觉自己一直承受着最深刻的苦难。

苦难首先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而是一种心理体验。

- 对俄罗斯人来说，沙皇时期的农民极度贫困愚昧，多么地苦难；
- 托尔斯泰为代表的贵族阶层，面对这种低层苦难承受着沉重的心灵折磨，多么地苦难；
- 很多有反抗精神的俄国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多么地苦难；
- 甚至沙皇也总是觉得，自己必须经受苦难，才能拯救俄国，拯救欧洲和全人类。

这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上特别典型，读他的日记会发现他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我如何才能经受各种苦难，最终完成对世界的救赎。

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忍受苦难并不是目的，通过苦难的磨炼并战胜苦难，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

苦难在俄罗斯人的眼中被审美化，苦难不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相反，它可能是一种珍贵的礼物。

这样一种精神结构，使我们能看到，俄罗斯在历史上总是能够在绝境中奋起，在绝望中获得胜利。

你以为战斗民族这名头咋来的？就是在这种对于苦难的特殊认知当中来的。无论是跟拿破仑的战争，还是跟希特勒的战争，俄罗斯只要还没有被敌人打到很苦难的状况，潜力似乎就激活不出来。但是一旦它陷入到了深刻的苦难当中，被人打得特别惨，马上小宇宙就能爆发，瞬间崛起，反过来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

刚说到了跟希特勒的战争，那已经是苏联时期打的了。仔细考察一下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会发现它的精神结构跟弥赛亚帝国很像。

布尔什维克也相信苦难对于人类的净化作用，相信人类的救赎寄托在苦难的无产阶级之中。

而列宁提出俄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相信通过俄国的革命，将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使人类获得终极解放，这几乎就是弥赛亚帝国特殊命运的新时代版本。

俄罗斯人对共产主义经常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原因就在这里。

领土扩张的贪婪与不安全感

与苦难相伴生的，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深刻的不安全感。

这个主要是跟地理相关了，俄罗斯地理上一马平川，周围没有任何自然屏障，历史上经常被入侵，这让它有不安全感。

但是不安全这个事儿也得两面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个苦难啊。

从这里面又激活出了俄罗斯的弥赛亚帝国情怀。

这两种情感叠加在一块，促使俄罗斯从16世纪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它一方面要用庞大的战略纵深来克服地理上的不安全感；一方面要通过扩张，实现自己的弥赛亚帝国命运。

这种精神构成了俄国对外战略的深层精神驱动力。

对俄国来说，对外扩张对是一种道德使命，而不是像庸俗的英国人法国人那样，仅仅追求一些商业利益。商业利益是可以讨价还价的，道德使命则不能讨价还价。

所以和西欧国家相比，俄国对占领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当然，从别人的角度来说，就是特殊的贪婪。

俄罗斯对于大清的贪婪，就是它对长城以北的地区都不怀好意。

对东北，俄罗斯打算直接就吞并成为自己的领土了，它给这里的昵称都起好了，叫“黄俄罗斯”，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还能搞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太平洋方向的不冻港。

对蒙古和新疆地区，俄罗斯倒没打算直接吞并，但也不遗余力地想

要把这些地方肢解出来，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它在这些地方除了会遇到大清的反抗，还有几个对手。

在新疆地区，它的主要对手是英国和中亚本土力量，这就是之前我们曾经说到过的中亚的大博弈。

在东北和蒙古地区，主要的对手则是日本，当然，也包括在各处都有贸易利益的英国。

众矢之的——东北

英国作为海洋帝国，并不打算在东北占有土地，但是如果俄国要把它变成黄俄罗斯，这英国人就不干了。因为俄国可能把东北市场向英国关闭，那肯定不如让大清统治东北。

可是在八国联军之后，看起来大清已经没有能力守住东北了，英国需要远东再扶持一个盟友以便抗衡俄国。日本因此抓住了机会，在英国支持下，于1904-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一举打败俄国。

而日本这会儿正极力想要证明自己远比大清更有资格成为东亚领袖，那就必须表明自己更加适合现代国际条约体系，也不能得罪英国，英国希望东北处在大清的统治之下，所以日本并未公开侵吞东北。

大清则意识到了东北越来越危险了，当今之计，只能把尽可能多的列强利益都引入这里，让它们相互制衡，大清才有可能保住龙兴之地。张之洞曾经给朝廷出过这个主意，要让东北遍地开放。

结果东北一下子成为近代历史上中国最开放的地区，这给它奠定了一个基础，让东北在后来好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是中国工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布尔什维克的苦难救赎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沙皇俄国变成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苏联。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自然是属于全人类的，而只有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足够成熟，阶级矛盾矛盾足够激化，才到了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所以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不可能在哪个国家单独实现。

列宁把这理论给调整了一下，认为发达国家的阶级矛盾不如俄国这种半发达国家激烈，所以革命最先会在俄国这种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率先开始。但俄国自己的革命不算革命成功，最终要引起发达国家连锁革命才算成功。

前面说过了，这样一种观念和俄国的弥赛亚帝国观念是同构的，俄国因此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但是，俄国革命后，发达国家并未发生连锁革命。

列宁对此给出了解释，发达国家手上都掌握着庞大的殖民地，它们从这里掠夺巨额财富，收买了本国无产阶级，弱化革命意志，所以发达国家不革命了。

因此，为了让全球革命真正展开，必须让落后地区先发动起来，即便这些地方发动的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仅仅是追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革命，也能让帝国主义国家没法再收买本国无产阶级，让它们内部矛盾激化，最终实现全球革命。

因此，苏联成立了共产国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支持在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发展，中国的20世纪历史也因此受到了深刻影响。

本讲小结

小结一下，俄国的精神特征就是弥赛亚情结，通过承担苦难来救赎全人类，再加上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俄国的非同寻常的扩张性。

它的扩张性和上一讲说的大英帝国不同，近乎一种宗教感情，是不以利益计算为准绳的。

俄国在远东的各种政策，始终面临另一个强国的竞争，尤其到了一战之后更加明显。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也是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37|日本秩序构想下的中国角色

日本一直是以学习者的姿态出现，有很强的精神焦虑。本以为打败中国和俄国，可以摆脱焦虑。巴黎和会上的屈辱让日本举起「大东亚主义」的旗帜，发动了征服中国的战争。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和漫长的历史凝结，日本征服中国的战争注定是失败的。

这一讲来说一下让中国人最为感情复杂的邻国——日本。

日本与前面说过的英国和俄国都不一样，它没有自己强大的原生文明，只能向外部学习。早期是向中国学习，后来又向西方学习。

学习者的位置让日本始终有一种精神焦虑感，因为总得仰视别人，总感觉自己矮人一头。日本想方设法克服要这种焦虑感，寻找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它尝试过两种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为了克服中国对自己的精神压制，日本开始追随西方，要脱亚入欧。但是这样一来又会陷入西方对自己的精神压制。

于是日本又想了第二个办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转回头来寻找大东亚主义，和西方的白人相对抗。

日本的这些努力，都因为国家规模不够大，注定会失败。而在这些努力的过程中，日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如此，咱们还是必须说清楚日本的精神焦虑感究竟是怎么回事，才能真正地知道该如何应对。

在中国的阴影下

先来看看中国给日本带来的精神焦虑，这个焦虑主要停留在中国近代以前。

日本在历史上和中国发生的第一场大的战争，是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当时正是盛唐，大唐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一仗把日本给彻底打服了。日本认定大唐是最高端的文化，随即大规模地派遣遣唐使，到唐朝来学习各种制度和文化，把日本按照唐朝的样子改造一番。

日本对唐朝的模仿达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曾经作为日本首都一千多年的京都，就是仿照大唐的洛阳城建设的。

方方正正的城市，正中间南北向的一条大道叫做朱雀大街，把城市分成两半，西半边叫做长安城，东半边叫做洛阳城。诸侯们到首都朝见天皇，叫做“上洛”，就是上洛阳去。到了现在，京都的门牌上也还写着洛南多少号、洛北多少号，京都的旅游大巴还是叫做洛巴士。

学到这份上，该满足了吧？可是转念一想，日本觉得不行。再怎么像洛阳，那也是个山寨版的，真正的洛阳在中原呢，山寨版的总是低人一等。只有中原那边才是中华，日本这边显然是夷狄，可是又没法把家搬中原去。当时甚至有日本人因为这个事情痛苦万分，以至于痛哭流涕。

明朝灭亡后，满清入关建立新的朝代，日本发现了一个克服中国精神压制的机会。

他们发展起一个说法，叫做“华夷变态论”。什么意思呢？儒家非常讲究中华与夷狄的区别，认为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过去中原帝国一直自称中华，把日本贬低为夷狄。

这回好了，大明被大清替代，中原已经被真正的夷狄所统治。所以不再是中华了，你们变成夷狄了，我们日本这边保留着最精粹的儒家文明，我们才是真正中华。

日本这种华夷变态的说法，在朝鲜和越南也都有，他们国内也都有说法认为自己才是中华，大清这边是夷狄。

但是对日本来说，这套说法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华夷变态论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放大了他们的精神焦虑。

因为华夷变态论仍然是用儒家的秩序观来解释日本和中原的身份，你要真想自称中华，你就得入主中原，天天在海岛上叫嚣华夷变态论，只是纯属意淫。日本也感受到了这个困境，但完全没办法。

摆脱中国的压制

终于，200多年后，西方人的到来，让日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可能性。

西方在把大清和日本都胖揍过几顿之后，看上去像是更高级的文明。何况大清也开始推行洋务，要向西方学习。

日本如果能够比大清更快更好地学习西方，就意味着日本比大清更快更好地踏上了文明之路。那就终于能够俯视中国了，这一千多年来一直仰视中国的日子终于要结束。

众所周知，日本的转型之路比大清顺畅得多。对这件事，不能简单地指责清朝统治者笨蛋，后面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

比如，日本国内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土相对狭小，问题简单，政策容易聚焦。不像大清那样，有汉、满、蒙、回、藏各个族群需要平衡，有各种需要考虑的问题，政策太难聚焦了。原因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最终的结果是，日本转型更快。终于通过甲午战争打败大清，一下子掀翻了一千多年来的东亚秩序。十年后，又一举打败了俄国，正式加入列强的队伍，日本彻底扬眉吐气了。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大量翻译了西方的著作，深入学习西方的思

想、文化和技术。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不得不低下头来，开始向日本学习，并通过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来学习西方。

有大量的现代中文词汇，都是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借用过来的。而这些词汇最初被译成汉字，并不是中国人翻译的，都是日本人的工作。比如像服务、组织、纪律、政治、政府、干部、方针、政策，这些词都是我们从日语里借鉴过来的。

日本成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日本有些思想家骄傲地说，我们曾经从中国汲取文化千年之久，受益甚多，现在也该反过来向中国输出些东西了。

「大东亚主义」兴起

日本终于摆脱了中国对自己的精神压制，但是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它又落入到了西方人的精神压制当中。之所以你能够俯视中国了，就是因为你学习西方比中国学得好。可是你学得再好，还是个山寨的，仍然低人一等。

日本拼命努力，打败俄国加入列强，之后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国，觉得这回终于能够成为完全的文明国家，和西方平起平坐了。没想到，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又被深深地伤害了，也更清晰地体会到西方对于它的精神压制。

和会上讨论要成立一个国际联盟，作为全世界最高的政治机构。日本拿出一个提案，要求把“种族平等”这一条加到国联的章程里。当时日本的这个提案，中国也坚决支持，但是西方列强根本就没理这茬，直接拒绝了。

这下日本就火大了，合着我再怎么向你们学习，渴望加入你们的俱乐部，你们从来就没拿我当回事。

日本从中国身上好不容易刚获得点优越感，一下子又被打得稀碎。看来你们西方人那些口口声声说的自由平等的国际法秩序，只不过就是白人用来压迫有色人种的工具而已。按照你们这套玩法，有色人种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尊严。既然这样，那就必须把你们打倒。

日本就此埋下了要和西方一决高下的野心。但是它也知道，光靠自己肯定是没有戏的，必须动员起更大的资源，这事才有可能。

因此日本就重新定义了和西方人之间的斗争，这将不是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战争，而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终极对决。通过一场战争，来彻底推翻西方白人帝国主义者对世界的统治。

那怎样才能把黄种人动员起来呢？日本必须用一种远超日本本土之上的理念。

于是，一种我们经常在电影里听到的概念就浮现出来了——“大东亚主义”。但是大东亚这个概念太虚了，还得从里面发掘出文化内核，才能把人动员起来。

既然是和西方人对决，那就只能用东方的文化，于是日本人把儒家的理念改造一番用了起来。比如，另外一个咱们经常在电影里听到的概念——“王道乐土”。“王道”，一直是儒家所要追求的最理想统治方式。

实际上，明治维新之后，即使表面上脱亚入欧，日本并未放弃儒家的理念。

甲午战争之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大清在条约中要自称“中国”，日本坚决不同意。认为你本来就是占据了中原的夷狄，现在又被我打成这样，哪有资格自称“中国”。这个事情显示了儒家理念是如何影响着日本的潜意识，它不认为“中国”是个国家的名字，而是一种文明水准的象征。

在“大东亚”的理念下，日本认为这回东亚的儒家秩序该由它来主导了。但从它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纠结就能看出，它的内心仍然潜藏着中原正统性的焦虑。要想真正主导儒家秩序，以及为了有效地把大东亚

整合起来，必须征服中国。

民族主义的双刃剑

日本认为征服中国不会太困难，当年满洲就那么点人，都能征服中原建立大清，日本当时的战斗力是满洲骑兵比不了的，当然能征服中国了。

但是日本忘了，满洲征服中原的时候，不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统治者的血统不是核心问题，是否承受天命才是核心问题。只要能表现得尊儒重道，又富有活力，老百姓就可以默认你是承受天命的。

20世纪是个民族主义的时代，统治者的血统是核心问题，这就意味着日本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因为血统不对。

但是日本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变化，也忘了自己的崛起正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方案完成的。日本的统帅部当时甚至认为，中国不理解日本的雄心，居然还跟英美站在一起抵抗日本人，这是中国最可恨的地方。

依照现代政治的逻辑来看，日本的这种认识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只有理解了大东亚秩序的理念，才能明白，为啥它侵略中国，还要怪中国人的抵抗。

可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在历史上一直是东亚世界的大哥，你日本算老几？就你这样还想整合整个大东亚？我还没说话呢，哪轮得到你？

虽然当时的国力不济，但中华帝国留下了很长的记忆，这让中国不会向日本低头认输。同时，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土，也让中国有资本可以用空间换时间，慢慢拖着日本。

这下日本的麻烦就大了，它的军队只能在侵略中国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根本不可能真正取胜，毕竟人口不够多，没办法真正统治这么大的领土。

刚才说了日本“大东亚”的理念，最终是要和白人大决战。本来日本人是打算征服了中国再决战白人的，可是现在被中国拖住了，资源都不够用了。要想获得资源，就得征服南洋，可南洋是白人殖民地，这就意味着得跟白人彻底撕破脸，而且不撕破脸也撑不下去了。

于是，日本下定决心跟白人撕破脸，反正这也是早晚的事。于是进攻了南洋，又偷袭珍珠港，废掉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蒋介石这边听说日本偷袭了珍珠港，长出一口气，美国被拉下了水，

他确信这回日本必败了。日本国内有一些学者是比较真诚的“大东亚主义”者，他们也长出了一口气。因为过去侵略中国，怎么看都像欺负人，如果一直对中国下手，日本就变成跟白人帝国主义者一样的坏人了。

这一次跟美国人开战，意味着日本跟白人的终极大对决终于展开了。这样一场战争，将使侵略中国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随着对美国人开战，两边全都长出一口气，但所想的事情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的败局在这一刻就确定了，只能等着二战之后再寻找新的道路了。

日本这个国家，从国土面积和人口、经济各方面看，放在欧洲都是个大国。但放在东亚的话，跟中国一比，怎么看都不是大国。这种国家规模，让它一直没法获得精神自主性，长期处在一种焦虑当中。

甚至到了今天，如果中国不能恰当地理解日本的这种焦虑，并在国际制度中给出恰当的制度安排，中日关系仍然没办法真正好转。这是我们在理解日本的时候，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要理解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对中国的一系列深刻影响，也不能脱开这个背景。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日本没有自己强大的原生文明，一直是以学习者的姿态出现，有很强的精神焦虑。先是学习中国，后来学习西方。本以为打败中国和俄国，步入列强之后，可以摆脱焦虑。

然而，巴黎和会上的屈辱让日本举起「大东亚主义」的旗帜，欲与西方的白人一决高下。而决战需要调动更多的资源，于是征服中国成为了日本的首要目标。

在民族主义的时代，征服一个国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况且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和漫长的历史凝结，日本征服中国的战争注定是失败的。

这三讲分别讲了英、俄、日三个国家，也就是中国在近代转型中所要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这是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背景。

从下一讲开始，我们会再回到中国的历史，看看20世纪中国转型当中的跌宕起伏。

现代革命篇





38|民国法统有两个来源

法统是一个国家正当性的最重要基础。民国的法统有着双重来源，从而既把统治的正当性从皇帝的名义转换成了人民的名义，又获得了整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完整国家的正当性。但也正是这个双重法统，又带来了后续的政治动荡。

前面三讲咱们花时间讲了英国、俄国、日本这三个国家，这是中国要进行现代转型时所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这一讲开始，咱们再回到中国。

进入20世纪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与历史变革，就是结束帝制，走向共和。但是帝制结束了，并不代表革命者就可以马上建立一个新制度，走向共和。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推翻帝制之后，共和国的正当性，或者说法统从哪儿来？

什么是法统

先说说什么叫法统，法统可不仅仅是个西方政治学概念。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政治秩序要想稳定，都必须要讲究法统，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比如，《论语》里讨论如何治理国家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正名”，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分不对头，做事情就师出无名，搞不定。

这个正统的名分，其实就是法统，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共

识，让各种政治活动都有了连贯统一的名义，国家秩序才能成立。

在中国古代，法统归皇上，所以政治活动最根本的名义都从皇上而来。到了现代的共和国，就要以人民的名义了。但人民的名义有一个麻烦，你得听听人民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是你不可能真的把几千万、几亿的人民张罗在一起开个会，这事根本没办法操作。所以得有人作为人民的代表，来代表人民的名义。

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有资格代表人民呢？这些代表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又该听谁的呢？所以肯定不能简单地说“以人民的名义”，必须先得找到所有人都认账的共识。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非得要有共识？都已经革命了，把旧制度一把火烧了不就行了，哪有这么复杂。但是，一把火烧掉之后日子还得过，要过日子就得有一定的规则。要让大家对规则都认账，这就是最基本的共识。

那怎么才能建立一个规则让大家全都认账呢？那就是宪法，只要大家都认这个宪法，发生争执的时候，就有公认的解决争议的规则，不至于要掀桌子，用武力解决问题。天天掀桌子的话，日子就没办法过了。

问题还是没解决，宪法要从哪来？没办法让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写宪法，还是得有人代表人民来写。谁有资格来做这个代表呢？怎么判断他是否有这个资格呢？谁来做这个判断呢？他做判断的资格又是怎么获得的呢？

这些问题可以不断地问下去，但到这就打住吧。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对一个国家来说，你的法统和正当性是哪里来的？这个事情能说清，别的都迎刃而解。

民国法统的第一个来源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有了中华民国，那么民国的法统是从哪里来的呢？

民国的法统有两个来源，可以用两个历史文献来代表。分别是1912年3月11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诏书》。

先说第一个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里面一开头就说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是说，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那么人民都包括哪些人呢？《临时约法》里特别说明了，是包括汉、满、蒙、回、藏的所有人。这就是著名的“**五族共和**”的说法。

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是五族共和？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有一句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谁是鞑虏？就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这个主张来自于清末民初的学者章太炎。他在清末鼓吹革命的时候就提出，中国人民应该只包括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

革命后的中国应该包括中原的汉族地区、朝鲜、越南和半个缅甸，因为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至于满、蒙、回、藏，那里的人愿意加入中国也行，不愿意加入就不理他们。这个主张被精简为一句话，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但在当时，还有一派人非常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代表人物叫杨度。他认为中国人民应该就是大清所统治下的所有人。

如果照章太炎的说法，只要一革命，满、蒙、回、藏马上就会被列强所瓜分。东北会被日本分走，蒙古和新疆地区被俄国分走，西藏地区被英国分走。别的列强一看没捞着好处，马上就会过来再瓜分汉族中原地区。

按这个路数，中国就什么都不剩了，章太炎还想要朝鲜、越南，中原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所以中国绝对不等于中原，中国人民也绝不等于汉族，必须以大清帝国的政治现实为基础，来定义中国和中国人民，

别的办法都会带来灾难。

很有意思的是，章太炎的观点，其革命动员的效果远远比杨度的要好。因为杨度认为，政治变革要稳妥起见，不要搞革命，让皇上主动搞君主立宪是最好的。革命者肯定对杨度的路数不耐烦，事情坏就坏在皇帝上，你还想指望他？

所以辛亥革命刚搞起来的时候，口号就是章太炎主张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动员效果极佳。但是等到革命搞起来之后，革命者很快就意识到，杨度的说法有道理。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得要完整地保住大清领土，否则国家真的有可能被列强彻底瓜分掉，革命也就完蛋了。所以武昌起义后，革命者很快就在南京组建了一个临时参议院，制定出《临时约法》。约法中所追求的就是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继承大清领土。

这样，《临时约法》就给中华民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统。这相当于临时参议院代表中国人民，或者说以人民的名义，抛弃了传统，在南京制定宪法，确立了共和的新法统。

临时约法有个严重的先天不足。虽然《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人民是包括汉、满、蒙、回、藏的所有人，但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代表只来自部分省份，并没有召集到来自全国的代表，它的权威很难获得满、蒙、回、藏地区的认可，因为人家本来只认大清皇上。

这样一来，《临时约法》是否真能代表人民的名义就有点含糊了。

民国法统的第二个来源

民国法统还需要有第二个来源，这就是《清帝退位诏书》。

大清皇帝颁布这个《退位诏书》，肯定是出于各种无奈。但从法统的角度来说，皇帝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面给出的一系

列说法。

因为法统要的就是正统的名义，《退位诏书》里的说法刚好给出了这些名义。诏书一方面承认了共和是人心所向，一方面也解决了满、蒙、回、藏的问题。

我们仔细来看看诏书是怎么说的，诏书的原文是文言文，网上能搜到，读出来可能比较难懂，在这就只用白话文讲一下其中的意思。由于当时皇上还是个六岁的小孩，所以诏书是以太后的名义发出的。诏书的前半部分大致是说：

有人在南方起义两个月了，各省响应的很多，南北双方谈判很久了也没谈成。能看出来全国人民的心理，多半都是倾向于共和，而不是帝制，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既然这样，我们家继续赖在这，跟全国人民拧着来，也说不过去。仔细考虑了天下大势和国内民情，我带着皇上，我们娘俩把统治权归给全国，把国家改成一个共和立宪的国体，这样既满足了国内结束动荡的渴望，也符合古人天下为公的大义。

这里说得很明确，我们爱新觉罗家已经看明白了，天命已经不在我们这了，全国人民想要的就是共和，那天命就在共和那边了。

皇上都这么说了，那么民国自然就有正当性了。[诏书用的还是天命这说法，这就相当于一次特殊的禅让](#)。历史上有各种禅让，都是一个皇上禅让给另一个皇上，这回是皇上禅让给人民。民国因此获得了继承大清的资格，获得了正统的名义。

接下来还有诏书的后半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要把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所有领土合在一块，构成一个大中华民国，之后皇上我们娘俩就闲着吧，眼看着太平盛世建成，也是件美事。

这段话非常重要，满、蒙、回、藏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所效忠的是大清皇上，那么就势必要服从皇上的诏命。

皇上现在说了，你们应该跟汉族地区联合在一块，过去你们怎么效忠我，未来就怎么效忠中华民国。就是这段话，让满、蒙、回、藏地区

的独立丧失了正当性，否则你们就是背叛了效忠皇帝的誓言。反过来，大清的领土完整地传承给中华民国，也就有了正统的名义。

前后这两部分内容加一块，大清就既承认了民国的天命所归，也明确了满、蒙、回、藏都应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弥补了《临时约法》的先天不足。

高全喜教授写过一本书，叫《立宪时刻》，专门研究了《清帝退位诏书》的宪法作用，你可以找来看一看。

因此，我们必须说中华民国是有两个法统来源的。满、蒙、回、藏地区不一定认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但是有了《清帝退位诏书》，满、蒙、回、藏即便不认南京政府的账，也必须要承认中华民国。

所以说，有了《清帝退位诏书》，民国才能完整地继承大清的领土、国民和法律身份。

为什么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

解决了中华民国的正统性，那么应该由谁来承接这个正统性呢？

这两个法统来源，又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呢？答案是，通过一个人——袁世凯。

《清帝退位诏书》里还有一句话：委托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的革命党协商南北统一的办法。有了这句话，袁世凯就能接住大清这边的法统。

南京方面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向袁世凯承诺，如果他愿意拥护共和，让清帝退位，那么愿意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有了这个承诺，

袁世凯也能接住南京方面革命党的法统。

这样，两边的法统都落到了袁世凯的身上。

为什么两边都愿意支持袁世凯呢？对于大清来说，实在是没辙。革命党起来了，大清要去镇压，可是能用的兵在哪呢？只能是当年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这些军队一般人根本指挥不动，必须要袁世凯才行，

大清就被袁世凯挟持了。

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没辙。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实在是没钱，国库里一度就只有十块大洋。当时中国南部动荡不已，临时政府也没法迅速地恢复秩序。这就意味着，没法通过征税来充实国库。政府的财政问题怎么解决？只剩一条出路，就是向洋人贷款。

可是贷款也贷不来，因为临时政府能不能活下去还在未定之间，没人肯借钱，临时政府很可能要撑不下去。如果袁世凯愿意支持共和，那么革命党就愿意跟他做交换，支持袁世凯当大总统。

但是大清和革命党的支持还不够，还需要第三个力量的支持，就是英国人。

清帝退位前，其实不光南京方面需要贷款，北京方面的清政府也同样需要贷款，两边都没钱了。要谈到贷款这种事，肯定绕不开英国人，

英国是那个时代全球资本市场的主导者。

可是英国人反过来就得评估一下了，贷款给南京政府靠谱，还是贷款给北京政府靠谱？两边一衡量，都不靠谱。

南京政府里面那帮人，满腔热血，但没啥治国经验，把宝压在他们身上，亏本的概率很大。大清的北京政府，也不靠谱，因为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里。

英国人仔细一分析发现，还是袁世凯最靠谱。他一方面能挟持大

清，另一方面也能跟革命党做交易。这个家伙两边都能摆平，又非常能干，有治国经验。如果支持他，就能把南京、北京两边统一起来。

对英国来说，这样既能保住中国庞大的统一市场，又能确保贷款的安全性。在前面讲英国的时候说到过，这两条是最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支持袁世凯就是英国人的最佳决策。

就这样，在清朝政府、南京政府、英国人，这三方合力的作用下，袁世凯如愿当上了大总统。在英国的主导下，一笔巨大的贷款借给了袁世凯政英府，新生的民国得以支撑下去。

双重法统很重要，但也带来个问题。如果革命党看不惯袁世凯的话，他们可以用《临时约法》这个法统来指责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服，则用从大清那获得的法统，来进行反驳。两边的共识因此又会破碎，这就导致了袁世凯统治没几年，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新革命。

革命党试图推翻袁世凯，重建真正的共和，这就带来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法统是一个国家正当性的最重要基础。民国的法统有着双重来源，既把统治的正当性从皇帝的名义转换成了人民的名义，又获得了整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个完整国家的正当性。但也正是这个双重法统带来了后续的政治动荡。

民国初年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其实并未能够有效地发动一般百姓，中国的现代转型深度仍然很有限。但是过了没几年，在终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一系列遭遇，却动员了一般百姓，中国的现代转型迅速地走向深入化与激进化。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下一讲

的内容。

39|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刺激

巴黎和会对远东两个最重要的国家

中国和日本，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黎和会加速了中国的现代转型，把中国推向了列宁主义；也加深了日本对西方的不信任，发展出“大东亚主义”。

上一讲结尾咱们谈到，民国初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革命，但并未发生社会革命。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但是中国的社会跟传统时代相比没多大变化。

结果就是，新的政治制度没法从社会层面获得支持。可以想象一下，你给一群留着辫子的人讲人民主权，他们能听懂多少，没几个人能听懂的话，新的制度就很难维持下去。

这一讲，我们就来看一下，国际秩序的变迁，如何刺激着中国革命深入到社会层面，让革命真正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词。

从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

先来看看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年的变化，这些变化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

一战一方面让列强关系重新洗了牌，美国和日本都赚了一大票，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全部崩溃。

另一方面也来了国际秩序观的深刻变迁，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理想主义。

一战前的国际秩序观是由欧洲列强主导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秩序以国家实力为前提，不考虑实力对比就别谈理想。

但是单纯从实力出发，各国就会天天死磕，打起来就没头儿了，所以为了保卫和平，必须在列强之间构建力量均衡，大家发现谁也打不倒对方，也就认账了，只能坐下来谈了。

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时候便要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牺牲弱者也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

这套国际秩序理念，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一战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和平，之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调整力量均衡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了。因为现实主义完全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而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过它会打这么久，规模这么大，死伤的人这么多。

过去人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意思是战争是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但是一战打到后来，已经和政治目标没啥关系了，各个国家全都是咬牙硬挺着，只是在比谁死得更晚，而不是比谁获益更多。

这种战争已经很荒唐了，所以，人们都觉得现实主义不靠谱了，需要有新的理念来替换它。

一战末期，出现了理想主义的理念，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并不能保障和平，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保障和平。

这会儿就出现了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一种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另一种是俄国的列宁主义。

威尔逊和列宁都反对现实主义，但是关于啥样的国际秩序才算符合道德，俩人的主张区别很大。

威尔逊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就是大帝国以建立力量均衡为名，到处欺负弱小民族。只要允许弱小民族都独立建国，不再有人挨欺负，大家都平等，就能保障世界和平，这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民族自决”，各个民族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列宁则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了最深刻阶段，统治阶级要向外转移矛盾，就爆发了战争。但是就算战争打完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仍然在，所以还得对外转移矛盾，还会继续爆发大战。

要保障世界和平，唯有各个国家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从此之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就消失了，阶级矛盾也化解了，人类就大同了。列宁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球革命”。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和列宁的全球革命，这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威尔逊主义主导下的巴黎和会

威尔逊主义主导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

在一战前，根本轮不到美国人来指点国际秩序应该是啥样子，那会儿的美国在外交上不值一提，曾经有欧洲国家因为财政紧张想要裁撤驻外使馆，纠结了半天，最后裁撤了驻美使馆，保留了驻土耳其使馆，因为那个时候土耳其在外交上比美国更重要。

但是到了一战后不一样了，欧洲国家全都打得鼻青脸肿，战争中都欠了美国人一屁股债，吃人家的嘴短，巴黎和会上就不得不让美国人来指点江山一把。

但威尔逊主义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根本没法落实。因为英法两个战胜国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它们俩好不容易把德国打败了，正盘

算着怎么瓜分德国留下的那一大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呢，依照现实主义逻辑，殖民地可以随便瓜分，但是依照理想主义，这事儿就不能干。

两国都不敢公开反对威尔逊，毕竟欠人家钱嘛，但是暗地里就是各种拆台。巴黎和会就开成了明面上理想主义，暗地里现实主义的套路。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

这套路让中国特受伤。

本来，中国作为一个弱国，长期处在现实主义的国际环境之中，对自身命运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想法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就行了。但是巴黎和会上理想主义的口号一喊出来，中国一下就把对命运的期望值调得非常高。

这就悲催了。就好比，你去谈判的时候，本来想着能挣回来十块钱就行，实在不行五块也忍了；结果有人给你画了一张大饼，告诉你能挣回来一百块，你一下兴奋了，这下，哪怕是挣回来五十块都觉得亏了大本，如果最终还是只挣回来十块，肯定想要跟人拼命啊。

说实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能挣回来十块钱已经不易了，不仅仅是因为英法跟日本有各种勾兑，还因为中国代表团自个儿就不团结。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和先是袁世凯、后是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派，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来彻底分裂，形成了北京和广州两个自称中央的政府，上一讲说过民国有双重法统来源，这会儿北京和广州就各自主张一个法统。

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是北京政府和?州政府各出了几个人联合组成的，这些人彼此不信任，也说不清谁真正代表中国，对外谈判就处在极为不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还能挣回来十块钱，已经很有本事了。

巴黎和会上的日本

说了中国，再来看看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

日本这会儿也很郁闷，它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想支持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了。

一方面，日本挺想支持现实主义的。英法两国在一战中为了拉拢日本，早就暗中承诺，战后可以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肯定是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下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但依照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这事儿肯定就不能干了。

另一方面，日本也挺想支持威尔逊主义的。因为咱们在前面第33讲说过，它渴望着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平等，否则就会被西方人在精神上死死地压制着，所以日本将“种族平等”作为一个议案专门在和会上提了出来。但是这个主张直接被英法给拒绝了，它们倒不一定是冲日本来的，而是冲着自己的殖民地来的，一旦种族平等了，它们统治殖民地就没有理由了。

为了安抚日本，英法两国答应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但是日本觉得这已经不够了，山东权益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

日本这么想，不仅仅因为英法此前的承诺，更因为日本在一战中给了段祺瑞政府大量贷款，贷款数额差不多等于甲午战争后大清赔给日本的数额了，贷款的抵押品之一就是山东的路权、矿权等等；段祺瑞从来就没打算还钱，认为这钱本来就该是中国的，日本一看收不回贷款，便觉得自己拿走抵押品，也就是在山东的一系列权益，是正当的。

国内舆论的反应

但是中国这边就无法忍受了。

作为一个弱国，中国是不能接受现实主义的，因为这只会让自己挨欺负，好不容易盼来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结果还是换汤不换药，这就不仅仅是丧失山东权益的屈辱了，更有感情被玩弄的愤怒。各种愤怒通过大量新出现的媒体的宣传，严重刺激着国人的情感。

就得说说新出现的媒体了。巴黎和会是1919年召开的，辛亥革命过去快8年了，这几年间中国的舆论环境前所未有地宽松，各种报纸媒体雨后春笋般出现。

尤其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动启蒙。人们对国家事务关注的程度，和辛亥革命刚开始那会儿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今天大概很难想象当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剧烈变化，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陈独秀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但是仅仅十几年前，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陈独秀才第一次知道，中国并不是全世界，在中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陈独秀也不是小孩，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由此可见中国人世界观的变化有多么剧烈。

巴黎会上的各种谈判情况，不断通过媒体传播到国内，国人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从充满希望到满心绝望。不断地刺激下，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大量的学生、工人、商人都上街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向北洋政府、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

五四运动是个标志，中国开始了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再也不是过去的那种样子了，而是开始积极地参与到现实政治当中了。

中国的现代转型迅速地深化了。

巴黎和会对远东秩序的影响

由于五四运动的激烈反对，中国代表团并未在巴黎和会达成的条约上签字，这就相当于远东的战后秩序悬而未决。所以两年后，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来讨论远东问题，中国在这次会上，收回了山东的主要权益。

日本在西方压力下被迫让步，它又火大了，合着你们西方人想扩张就扩张，我想扩张就找我茬，凭什么啊？日本一气之下，就发誓要推翻白人的不正义秩序，于是发展出了前面解释过的“大东亚主义”。

这算是日本的理想主义了，在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终极大决战这个口号下，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获得一种正义感。

但这又是以中国为代价的，中国肯定不能接受，于是还得找到某种理念来解释国际秩序，来动员和组织国民，以对抗日本。中国既不能接受现实主义，也很难再信任威尔逊主义，尤其是列强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咄咄逼人根本就是纵容默许。

于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就吸引了中国人，那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认为要通过全球的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和平，这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动员。

列宁主义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种动员和组织技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让革命全方位成为中国关键词。

革命成为关键词，理解这一点很重要，除了政治逻辑，这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经济逻辑。

咱们曾经说到过，到了晚清，中国由于人口过度膨胀，经济陷入“内卷化”困境。就是说，由于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导致劳动力成本过低，以至于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都不可能出现了，那

么中国就无法内生地出现工业革命，也就无法用工业经济消化过剩人口。

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加入世界经济秩序，以便从外部吸收新技术、新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出工业经济，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变化于此又浮现出来，中国的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碾压任何国家。

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就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比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地之外的乡村的联系。

这是因为中国规模太大了，不像韩国那种规模的小国，靠外部经济拉动，能够把国家给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中国仅仅靠外部拉动的话，仅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拉不动的地方就会和这些被拉动的地方形成深刻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内在的剧烈冲突，乃至于内战。

所以，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只能是先实现政治整合，然后才能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把中国的巨量人口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个步骤不能走反，走反了，就会导致内部撕裂导致内战。

那么，如何才能先实现政治整合呢？

革命几乎就是绕不开的选项了。革命的代价肯定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转型，几乎没法避免。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讲的核心内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从观念上出现了从现实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变迁，但在实践中则还是现实主义的主导。这里面的矛盾刺激了中国的革命深入到社会层面，也使得列宁主义进入到中国历史当中。

列宁主义在中国不仅支持追求普世主义的共产党，也支持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这两个党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路径，却有大不相同的效果。

这会是我们在后面两讲的核心内容。

40|民族主义带来国民政府困局

国民党引入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让自己获得了的力量，推翻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试图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整合中国，结果遭遇困境，对内无法有效解决边疆问题，对外无法有效处理外交问题。

上一讲说到了列宁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到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推动者，无论是追求普世主义的共产党，还是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都吸收了列宁主义的深刻影响。

这一讲，我们先来说一说国民党。我们知道国民党最终失败了，它失败有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很多原因，这一讲我们先来说政治上的、也是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它格局太小。因为它尝试用民族主义的路径来整合中国，但是中国是一个内在多元的超大规模的国家，这种国家用民族主义是搞不定的。

所以这一讲我们来看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方案，是如何在内政和外交上遇到困境的。

列宁主义促成国共合作

先解释下，为什么苏联不仅仅会支持共产党，还会支持国民党。

前面讲俄国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列宁认为，在俄国革命之后，之所以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发生连锁革命，就是因为它们手上掌握着庞大殖民地，可以从这里掠夺财富收买本国无产阶级，于是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就弱化了。

而苏联的使命是要带来世界革命，所以苏联要推动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哪怕这些地方发动的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仅仅是追求本国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革命，也能让帝国主义国家没法再收买本国无产阶级，让它们内部矛盾激化，从而实现世界革命。

所以，苏联在中国既会支持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也会支持共产党，它认为这些都是属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于是就有了咱们在历史书上学过的1924年初开始的国民党改组，孙中山采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怎么联共呢？在苏联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干嘛呢？扶助农工。国民党内部成立了一系列的部门，像什么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等等，承担了国民承人党向工人、农民等社会基层人群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把革命理念灌输到这些群体头脑中去。

国民党又成立了黄埔军校，要打造一支服从国民党领导、有革命信念的现代军队，孙中山从此摆脱了依赖军阀支持，反过来又受制于军阀的困境。

所有这些做法，在今天可能觉得并不新鲜了，但在当时，莫说是在中国、就算是在世界上都是绝对的新事物。[列宁主义不仅是一套意识形态，还是一套史上前所未见的、超级有效率的组织模式](#)。列宁把意识形态和这套组织模式结合起来，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政党集体，既有效率、又有信念，在俄国所向披靡，几乎是白手起家建立了苏联。

国民党并未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接受了它的组织模式来改造自己，便脱胎换骨。过去国民党面对北洋军阀的蛮横总是有心无力，这回就像练完了独孤九剑的令狐冲再去对付田伯光。改组后仅仅两年多，从广州起步发动北伐，摧枯拉朽，横扫了各种北洋军阀，迅速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要不是日本人在中间插一杠子，就直接打到北京甚至东北了。

“格局”不同终至分裂

但是，就在北伐的过程中，曾经紧密合作的国共双方却在1927年分裂了。

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呢？这就得解释一下国共双方的共性与区别了。两者都是高度革命化的政党，都以列宁主义的方式设计自己的组织机制，但是两者对于革命目标的设定有着很大不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的，认为自己只要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不会关注国外的太多事情。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则是普世主义的，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光靠中国革命远远不够，必须通过世界革命才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不过严格说来，两党的革命目标初看上去有差异，但实际上其核心都是救亡，所以差异并不体现在这个核心目标上，而体现在思考问题的格局上。

格局会有差异，是因为，国民党没有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则接受了。于是，国民党眼光向内，认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就以中国为单位来思考就行了。共产党则眼光向外，认为中华民族的救亡也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格局之下才能真正实现。

但共产党在这会儿对于革命的理解还极为机械，认为应该严格按照苏联模式来搞，于是就弄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并不符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政策出来，国民党就与它分裂了。

共产党的革命策略在此后有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这也伴随着共产党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的深化过程；搞清楚这个，对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内容到后面再展开，这一讲只说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的政策发展及其内在蕴含的问题。

国民党眼光向内，要把国民全都整合起来，就直接从西方借用了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内在多元、高度复杂的超大](#)

规模国家，用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实际上是搞不定的。民族主义的狭隘格局，让国民政府的统治对内面对边疆、对外面对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全都搞得很成问题，焦头烂额。我们分别展开来说一下。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无法整合中国

先说边疆少数民族问题。

咱们在前面讲辛亥革命的时候谈到过，民国的基本原则是“五族共和”，就是说汉满蒙回藏（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加在一块构成一个“大中华民族”。

问题是，究竟啥是“大中华民族”呢？它仅仅是汉族的延伸，还是一个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更大的民族呢？

如果仅仅是汉族的延伸的话，那就应该说“五族共和”了，直接就说大中华民族等于大汉族不就得了？可是这样大中华民族就没有道理统治满蒙回藏这些地区了，因为这些地方在当时都是少数民族为主的。

所以“大中华民族”应该是个超越于汉族之上的更大的民族，那么这个更大的民族究竟是什么呢？这得说清楚，把道理说通，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才会愿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

非常麻烦的是，民族主义里面有一种理论预设，要求所谓的“民族”得是一个内在无差异的群体，也就是说，大中华民族应该是内在无差异的；可是汉满蒙回藏是有差异的，谁都看得到啊，那要怎么来解释大中华民族的概念呢？

国民政府要用民族主义来整合中国，在这就遇到了困境，这个困境在历史上导向了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是，由于解释不清那些差异，索性把中华民族说成是汉族

的延伸，认为少数民族的历史命运就是汉化，这样就会在未来消除掉差异。

但这很难让少数民族接受，于是又会导出第二个结果，少数民族索性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要求分离出去。

当然了，这不代表少数民族地区就一定能够分离出去，但是一定意味着国民政府在那里的统治会不稳定，如果刚好此时还有不怀好意的外国在这里捣鬼，那么国民政府就有可能对这种地区失去实质性的统治。

在抗战时期，这个事情变得特别紧迫。当时日本搞了一个战略叫做“泛阿尔泰主义”，就是说满蒙回藏这些族群都是阿尔泰语系的，你们跟汉族本来就不是一家的，被汉族欺负了，我来帮你们独立出去，形成一个泛阿尔泰语系的国家群。

日本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好心呢？因为我也是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啊，咱们泛阿尔泰语系是一家！实际上日语到底是不是阿尔泰语系的，这在语言学上争论很大，有说是的也有说不是的，但日本肯定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说法。日本就按照这个战略在努力肢解中国的边疆地区，一旦成功，就可以从海上一直到中亚大陆，对中原地区形成一个战略大包围，困死国民政府，那么大东亚的战略就成功了。

日本的这套打法，不仅仅从军事上，更从理论上要彻底瓦解掉中国，这就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更强地激活了。所以当时不仅国民政府在努力反击日本，学界也在从理论上反击，有几个重要的学者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中华民族是一个”，但这些学者也没有足够好地解释清楚，超越于汉满蒙回藏之上的大中华民族是什么。

之所以有这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主义的理念是没法真正用来整合内在多元的中国的。

国民党外交上的视野和格局

再说与大国关系的问题。民族主义的格局，会让中国这种超大规模国家没法恰当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小例子来看看，国民政府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视野和格局。

从1937年开始，中国独自对抗日本好几年的时间，终于坚持到1941年底日本人跟英美撕破脸了，蒋介石松了一口气。他就安排在1942年初访问印度，试图调解印度的民族主义领袖尼赫鲁、甘地等人与英国殖民当局的矛盾，以便让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日本。

但英国不愿意中国过多掺和到印度的事情当中，怕中国人会跟印度人联手把英国人赶走，所以虽然对蒋介石在印度的行程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在会见尼赫鲁和甘地这件事情上设了不少障碍。

蒋介石知道英国人的小心思，但这却刺激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再联想起此前英国的一些作为，就觉得英国人尽管不像日本人那么危险，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接下来就发生了一系列外交上的赌气行为。

比如，1942年底宋美龄访问美国，希望美国人支持中国的抗战，在国会演讲之后又在全国发表巡回演讲，极受美国民众欢迎，大获成功。英国国王于是发出邀请，希望宋美龄访英，但是宋美龄给拒绝了。

不仅如此，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好在美国，宋美龄也拒绝见丘吉尔，反倒公开发表声明，要求英国释放被软禁了的印度领袖尼赫鲁。

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看着宋美龄的这些做法极为无奈。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非常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他曾是中国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和会上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曾说过一句轰动西方的话，“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顾维钧深知，英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拒绝英王、冷落丘吉尔，这种赌气行为看上去很痛快，大长民族主义的志气，但是对于中国

的国家利益会有深远伤害，因为中国有着比向英国人撒气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不能让一时的赌气破坏了大事。

他在无奈之中只能再提醒宋美龄，既然已经都这么做了，也没办法了，但是既然不去访问英国，那就千万别去访问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否则对英国人的侮辱就太大了。宋美龄根本不听，偏偏就到加拿大转了一圈。

宋美龄这种级别的人物，具体的活动安排肯定不是由着自己个人的性子，而是国民政府内部的决策。

这一系列糟糕的决策，反映出的是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最高统治者难以获得足够的视野与格局，作为一个弱国，在急需国际盟友最广泛支持的情况下，居然会赌气行事，完全无意义地得罪英国，意味着国民政府无能力真正地理解中国现实和国际大格局。

1943年底召开的开罗会议，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极力主张下，正式把中国拉入与美国、英国、苏联相伴并列的地位，说这四个国家在战后将是世界四大警察，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并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战区都划归中国来统筹。

多少年来一直受尽屈辱的中国获得了近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地位，这毕竟是在国民政府艰苦卓绝的战争努力下获得的，所以国民政府在国内的正当性也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水准。但是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格局太小，并没法理解这个事情的意义，不知道孰重孰轻，之后又与英国、苏联、甚至于美国发生了一些没多大实际意义的争执，以至于这个机会被它浪费了，没能把自己由此获得的超级正当性转化为在国内整合各种力量、在国际争取更多支持的契机，因此也导致了国民政府后来的败局。

本讲小节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国民党引入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让自己获得了的力量，推翻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国民政府试图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整合中国，结果遭遇困境，对内无法有效解决边疆问题，对外无法有效处理外交问题。

民族主义带来的这一系列困境还仅仅是政治层面的，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一些经济层面的困境，这些问题都给国民政府的统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日本的侵略只是使这些危机变得更尖锐了而已。我们下一讲就来看看，经济层面的困境是什么。

41|国共的两场货币战争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没法被外部世界整体性地把经济拉动起来，结果就导致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二元撕裂。这一撕裂状况刚好对应于国民党、共产党这两种革命路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党进行的两种不同的货币战争。

上一讲谈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在政治层面上所面临的内外一系列困境，这一讲咱们再来看看那段时期中国在经济层面面对怎样的困境。

当然说起困境，一开始还是有一段不错的时期，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抗战前“黄金十年”，当时国内有一系列的经济努力，包括民族资本家的奋斗，以及国民政府的一些经济建设政策，但是黄金十年不仅跟国内的努力有关，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变迁也紧密相关。

这一讲就着重说说国际经济秩序如何影响当时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应对困局，打了两场非常重要的货币战争。

西方经济危机下中国的“黄金十年”

先来说一下黄金十年和全球经济秩序变迁的关系。黄金十年是指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的1927年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这十年间，除了个别时期之外，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还是不错。

但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过，这会儿的国际经济，正是著名的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的时期，从1929年底开始，西方国家陷入了近现代历史上

最可怕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让西方国家的生产平均下跌了三分之一还要多，各区间贸易总额下降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平均有超过30%的失业率，西方世界经济损失的规模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损失。

危机促成了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化，英美法等国也一度风雨飘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陆续转入战时经济体制，人们才摆脱了经济大危机的威胁。

为何世界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反倒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光从政治原因上说，国民政府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但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需要找到经济原因来解释。而经济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货币秩序。

前面讲大明和大清的时候，都曾经谈到过，世界货币秩序的变迁会影响到中国的国运。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中国比过去更深地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货币秩序变化的影响就更大了。

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从19世纪中期以来都实行金本位，也就是说，货币的发行是以黄金做储备的，纸币可以自由兑换黄金。大危机发生之后，人们到银行去挤兑黄金，这让西方国家很紧张，它们为了保住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纷纷暂停了黄金对纸币的可兑换性。

这就引发了恐慌，谁知道这纸币接下来会不会彻底就变成废纸啊？于是人们就开始想法囤积黄金，黄金价格便迅速上涨。

金价上涨，导致白银的相对价格下跌。当时世界上主要国家里面，唯有中国的货币是采用银本位制的；银价下跌，就意味着中国的货币相对于西方货币贬值了，中国的商品就变得便宜了，刺激了出口，又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过程正好和国民政府推动建设的政策阶段相重合，于是就有了“黄金十年”。

国民党的“法币改革”

但是黄金十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倒不是说日本在其中捣乱，而是国际货币秩序在这十年中还在发生变化，其中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变化是美国带来的。

美国中西部有好几个州是以白银生产作为重要产业的，银价下跌肯定让它们很难受，于是就找到中西部另外几个农业州，互相交换了下利益，联合起来到国会里面游说，要求联邦政府干预白银价格。

白银大量外流到美国，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经济急剧萧条化。

南京国民政府这下头就大了，只好去与美国交涉，但根本没办法改变美国政策。不得已，国民政府从美国争取到了财政扶持，在1935年底推动了法币改革，所谓“法币”，就是“法定货币”的简称。

法币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通过法币改革，中国的货币逻辑就此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迁，从以贵金属储备为担保的本位货币，历史上第一次转化成了不以贵金属储备为担保，而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信用货币。也就是说政府担保你拿着这些纸，出去就能买东西回来。

本位货币和信用货币这两种货币机制的政治效应不一样，这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本位货币以贵金属储备作担保，贵金属有相当大部分不在政府手里，而是在社会手里，所以本位货币经常是由私人银行发行而不是政府发行的；信用货币由于是以政府信用作担保，所以只能是政府发行，说准确点，是由政府设置的中央银行来发行，这就导致社会与政府的博弈能力大不相同。

本位货币的发行数量不能脱离贵金属储备太远，因此不容易出现通

货膨胀，货币价值比较稳定；信用货币的发行数量不受贵金属储备的限制，就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货币价值稳定性差。现代经济当中，政府会故意地搞一些温和通货膨胀出来，以便刺激经济发展，但是政府在财政压力过大的时候，有可能会为了筹款而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还比如，如果你手里拿的是本位货币，即便是纸币，那也和拿着贵金属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因为你随时可以兑换成贵金属，所以人们可以无问题地接受这种纸币。

但是如果你手里拿的是信用货币，就不一样了。人们是否信任这个货币，全在于人们是否相信这个政府能够坚持下去，如果人们觉得政府坚持不下去了，那就没人愿意接受这个货币，它也就成废纸了。

说了这些，你大致就能理解法币改革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了。它使得中国政治运作的逻辑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

通过法币改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了相对于地方军阀的不对称财政优势，进一步消除了地方势力的自主性。这算是某种意义上中央对地方的货币战争了。

但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法币改革的时机不好，改革后不到两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结束后又继续打了四年的内战。这些都让国民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只能滥发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信用和政府信用是连带关系，货币破产了，政府的信用也就跟着破产了。

南京国民政府后来失去了对大陆的统治权，这是根本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货币让中央政府获得一些统治上的好处，但也让它变得更加脆弱，因为信用货币对国家能力的要求，远远高过本位货币。

抗战时期共产党的“货币战争”

说完了国民党被迫面对的货币战争，再来看看共产党这边的货币战争。注意，这里说的不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而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

抗战时期，日本只能控制占领地区的城市和交通线，下面的乡村什么的根本没有能力去控制，毕竟日军人数不足以控制如此大的领土，这些地方的国民党统治多数瓦解了，而共产党则有办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这里面的具体原因下一讲会展开讲。位于山东半岛的胶东抗日根据地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可以看到共产党的货币战争是怎么玩的。

共产党在这块根据地成立了一个银行叫做北海银行，它所发行的货币就被叫做北海币。根据地政权没有办法让人们相信它会永远存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发行信用货币，因为人们不会接受的；它只能发行本位货币，可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作担保，那要以什么作为货币的信用基础呢？

北海银行很有创造性，它以农业物资储备作为担保，来发行北海币，只要你拿着北海币，随时就可以用它兑换根据地政权所储备的农业物资，只要这种兑付承诺是真实的，人们就可以接受这种货币。



北海币

北海银行进一步根据农业周期来调整货币发行数量，并且依据物价涨跌的情况，安排根据地的工商局吞吐储备物资，来回笼货币或者投放货币，调整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稳定。

这一系列做法非常成功，北海币在其流通领域中的信用远远好过法币和汪精卫政权发行的伪币，成为强势货币。根据地的经济官员还因此总结出了关于北海币的“物资本位”理论，摸索出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等，打起货币战争来得心应手。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胶东根据地居然能够赢得货币战争，国民政府却不行呢？

这就涉及到中国经济的二元性问题了。咱们在前面曾经说过，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是没法被外部世界整体性地拉动起来的，只能被局部地拉动起来，于是会造成中国经济严重的二元撕裂，口岸城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乡村地区则仍然在传统经济当中挣扎。

所谓的“黄金十年”时期，就是这个状况，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发展成为远东顶级大都市，但是它们与内地乡村的经济联系就很弱。

而在这个时期，城市的秩序由国民党主导，乡村的秩序由共产党主导。原因在于，国民党改组后，苏联推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进去，并主导了国民党新成立的农民部工人部等等，做基层宣传和组织的工作。等到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就欠缺了向社会基层辐射影响力的渠道，在这之后，国民党的力量基础主要在城市，共产党的力量基础主要在乡村。

中国现代革命的两种路径，也就形成了一种差异化竞争的格局，两种货币战争的不同结局，根源也埋藏在这里。

北海银行的实践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之一是其物资储备来自农村自产，而农村的传统经济受外部世界货币经济影响较小，法币的恶性通胀在这里带来的冲击也小得多；北海币的货币机制与农村的传统经济相匹配，再加上是在根据地这种小区域当中运营经济，环境相对简单，物资与货币容易形成匹配关系。

这样一种货币机制也几乎可以无缝对接入计划经济，共产党在建国后的很多经济政策，在抗战时就已经有了一些相应的经济实践。

但是国民党的法币机制是应用于市场经济的货币，并要在全国大区域当中运营经济，而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国民党的货币机制显得过于超前了，一方面，没法深入影响农村传统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城市，恰好是受到恶性通货膨胀冲击最严重的地方。

这样，国民党既无法主导农村，又丢掉了城市的扶持，最终就只能接受统治失败的苦果。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有着复杂的联动关系，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是没法被外部世界整体性地把经济拉动起来的，结果就导致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的二元撕裂。

这一撕裂状况刚好对应于国民党、共产党这两种革命路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两个党进行的两种不同的货币战争。

两场货币战争的结局，从经济的角度也说明了，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才能让自己以真正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释放出自己的优势。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方案，由于无法真正完成政治整合，于是处理经济问题上同样无法找到合适的着力点。

那么，共产党的路径就获得了历史性的机会。这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42|中国：普世主义与海陆中介

共产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组织机制，也带来了全新的视野格局，它为中国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得中国在面对少数民族和国际秩序问题的时候，都有了全新的处理办法。

前面两讲主要讲的是国民党，它尝试以民族主义进行救亡的努力失败了，对内无法整合边疆，对外无法理解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这一讲我们来看看，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区别，为什么它能够突破民族主义的狭隘格局，对中国进行政治整合，进一步解释，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如何从脱离中国的实际，发展为内在于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又是如何解决边疆问题，以及如何逐渐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世界地位的。

所有这些，都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关联，它打开了一种超级宏大的视野格局，打开了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内部控制”的组织机制

先来看看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是如何发展为内在于中国历史的。前面说过，国民党仅仅吸收了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共产党则把列宁主义的组织技术和意识形态全都吸收了。但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还很机械，试图把苏联的革命经验不加改造地移植到中国来，结果就失败了，与国民党分裂，后来又丢掉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

之后没多久，抗战就爆发了，日本人打过来，占领了城市和交通

线，下面农村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多半都瓦解了，共产党却因为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组织能力，有办法把沦陷区的敌后农村变成抗日根据地。

为什么国共两党在沦陷区的表现会有这么大差别呢？因为它们的组织机制完全不同。一个组织要想能够存活和发展，有两个重要需求，一是组织目标的统一性，没有统一性，各个部分各自为战，很快就散架了；二是执行层面的效率性，没有效率性，在竞争当中很快也就输光了。

要达成这两个要求，就需要有组织内部的一整套控制机制，以确保组织成员的行动不会偏离统一的目标，并不断提升执行效率。在抗战时期可以看到，国民党跟共产党的组织控制机制很不一样。国民党走的主要是外部控制路线，共产党走的主要是内部控制路线；面对组织任务，国民党员的反应是“要我做”，共产党员的反应是“我要做”。

国民党的外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着重于控制组织成员的外部行为，通过建立一套现代的官僚体系，依照行政规则，来监督具体官僚的行为，以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和执行的效率性，对官员来说就是“要我做”。

官僚制是治理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工具，但它想有效运转，有一个要求，就是各个层级彼此之间要有顺畅的信息传递，一旦信息传递被切断了，官僚体系马上就会瘫痪瓦解掉。日本人打过来，使得沦陷区与重庆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国民党在这些地方的官僚秩序很快就瓦解了。

共产党的内部控制路线，是指它用一套理想信念由内及外地刷新组织成员的精神世界，让每一个微观的组织成员都对宏观的事业有一种信仰和忠诚。

只要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组织目标就会深深刻在每个成员的内心，就算各个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够顺畅，就算各个基层组织都是各自为战，但是共同的信念基础也能确保组织目标的统一性。并且，由于理想信念的内在驱使，每个组织成员对事业都有着巨大热情，不是“要

我做”而是“我要做”，从而确保执行的效率性。

由于前述差别，我们就能看到，沦陷区农村的国民党统治都瓦解了，但是只要派几个共产党员过去，就算他们跟延安的信息沟通不畅，也能很快就搞起一大摊事，并且都不会偏离组织目标。所以，日本人打到哪里，它后方的基层社会很快就都会变成共产党人的抗日根据地。

到了这时，共产主义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它与中国的现实需求之间经常是错位的，但是现在，它与国家救亡极为深刻地嵌合在了一起，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发展为内在于中国历史。这也为后来共产党打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

用共产主义格局处理民族问题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为共产党提供了强大的组织效率，还给它提供了一种超级宏大的视野。让共产党在面对少数民族问题和国际秩序问题的时候，都有了国民党根本打不开的脑洞，有了全新的处理办法。

先说少数民族问题。说到这还得简单解释一下“民族”这个概念，汉语里讨论这个概念的时候特别麻烦，因为我们把两个意思完全不一样的英文词都给译成了“民族”，这俩词分别是ethnic和nation，我们在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经常会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间不自觉地穿越，带来一系列问题。

ethnic的意思是，人们因为文化、传统乃至语言、人种的差异，可能会形成一些族群差异，这些差异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并不会影响不同族群和谐共处的关系，所以这种族群差异也不会导向政治独立的要求。

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多族群共处的现象，中国的汉满蒙回藏这些民族，有着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因此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

就是ethnic意义上的民族。

nation意义上的民族，各民族彼此间的差别并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而是现代人为建构出来的，有时候它还会把自然形成的差异给忽略掉，人为建构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并因此要求建国。

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中学的时候咱们都学过法国小说《最后一课》，那里面的主人公是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地区的小学生。法国战败，要把阿尔萨斯割让给德国，学生们从此不许再学法语了，只能学德语，人们痛苦不已。

实际上，阿尔萨斯本来就是说德语方言的地区，但由于历史原因，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却是法国人，认为从政治身份上自己应该是法兰西nation的成员。

这就是我所说的，建构nation的时候，历史自然形成的差异，会被忽略掉，人为建构出一些原本不存在的差异。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想象的共同体》，专门就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推荐你找来看看。

nation理念发展出的政治要求，就是通常说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把民族主义的建构属性给挑明了，进一步提出，人们的第一身份是阶级身份，其他所有身份都是从属性的。切换到中国语境下就是，从ethnic族群的角度讲，汉满蒙回藏当然有差异，但是从阶级的角度讲，不仅仅满蒙回藏的概念没有意义，汉族的概念也没有意义，汉满蒙回藏的被压迫阶级都是一家人，要共同反抗各族群尤其是汉族的压迫阶级。

共产党因此就对少数民族问题给出了一种复合结构的解决方案，既承认了汉满蒙回藏的差异性，又在阶级政治的基础上论证了它们的统一性。而国民党为了确保统一性，就只能否认差异性。两相比较，自然共产党的方案更能获得少数民族接受。

用共产主义视野理解世界秩序

再来看共产党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更是展开了一种国民党无法想象的大开大阖的世界主义格局。

当然，共产党的国际秩序观也有一个逐渐演化、慢慢摸索的过程，从想象大于现实，到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是无论是在演化的哪个阶段，都有着超级宏大的视野和格局。

我们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这个演化过程。早期的就不说了，从抗战结束说起。

1946年夏天，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提出战后的世界基本秩序是美国领导的反动阵营和苏联领导的进步阵营之间的对抗关系。

美苏两国之外，包括欧洲、日本、澳洲、亚非拉等等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属于“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的国家没有自主性，或者归属于美国阵营或者归属于苏联阵营。中国毫无疑问也属于中间地带，而且应该归属于进步的苏联阵营。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是从善恶二元大对决的角度理解世界秩序，并在这个大背景下寻找中国的位置，这种思考的格局跟蒋介石明显就不一样。

美苏两强对立的格局，也可以理解为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对立的格局，这继承了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海洋帝国和俄国大陆帝国对抗的格局。毛泽东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很明确地表明中国要属于大陆秩序。

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用最硬的方式表达了中国加入大陆秩序的意志。这场战争让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国内的政治正当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了充分的政治资源，用以完成对于国内的政治整合。整合过程付出了很多代价，但中国在内政上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性。

在这之后，毛泽东还在各种谈话中多次谈到“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延续着1946年的意思。但是到1962年，毛泽东的说法变了，他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欧洲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是一个，亚非拉等不

发达国家是一个。

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新说法，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闹翻了，中国同时与美苏两大强国成为敌人，这让中国的外交格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当中。

此时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外交基本盘，否则在国际上彻底没得玩了。而欧洲日本澳洲等发达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外交基本盘，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想清楚该怎么重新理解世界秩序，所以姑且用了个含混的说法，把中间地带分成两个。

紧跟着我们可以再问一句，中国和美国苏联都闹翻了，那么中国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当中，到底是处在什么地位呢？

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定位此时模模糊糊地浮现出来了，那就是中国可能是处在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之外的第三大力量，作为一种海陆中介性的力量存在，而对于世界来说，三足鼎立的格局也是比二元对抗更加稳定的。

到了6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海陆中介性在共产党的意识当中越来越清楚了。比如美国打越南战争的时候，中国跟美国形成了一系列默契，中美两国在越南都有一系列军事动作，但都不会去触碰对方的底线，这跟朝鲜战争完全不一样了。

通过这样一种相互试探与摸索，美国与中国都重新理解了对方。到了1971年、72年，基辛格、尼克松陆续来访华，开始构筑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国终于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海陆两大帝国之外第三力量的地位。

这种地位也在毛泽东在1974年全新阐述的“三个世界”的说法中获得了完整表达，美苏是第一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是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中美苏各有自己的外交基本盘。

由于中国作为海陆之外第三力量的存在，不管中国在如何表达自己

对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它都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因为全球的力量博弈格局决定了这一点。

中国在60年代的时候一度外交局面极为危险，在各个方向全都是敌人，到了70年代却一下子成为全球所有大国当中战略灵活度最高的一个国家。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终于想清楚了自己的国际定位，终于知道了自己既不从属于海洋秩序，也不从属于大陆秩序，而是独立于它们的第三存在。

这种格局，带着民族主义的眼镜，是不可能打开的，正是通过共产主义 这种普世主义的观念结构，才能够把这种格局撑开。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超级格局，不仅仅是在领导人的头脑中，也贯穿在一般国民的日常话语中。

即便是穷乡僻壤的地方，农民在田间耕地，田头的大喇叭也在讲着古巴的事情、坦桑尼亚的事情，这些农民可能一辈子连大山都没出去过，但是却会讨论另一个半球的事情。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但对外部世界的这种关注度却是中国前所未有的。

中国人再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是打开了一种超级想象力。

我们在这几十讲里反复在强调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种规模性意味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因此，不从世界格局的角度出发，中国根本没法恰当理解自己。而要从世界格局出发，中国第一步就是需要有一种超级的视野，即便这种视野并未给出真实的认知，但是它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就像古代有很多人尝试要让人飞上天，他们给出的办法都不灵，很多人都摔死了；但是如果这种想要飞翔的想象力存在，倒的确不会有那些尝试者摔死，但人类也永远不会有机会飞上天空了。

共产主义就是帮助中国人打开这样一种想象力，打开一种全新的空间感、格局感的钥匙。它对世界给出的解释可能并不准确，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正是通过它，中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毛泽东时代所打开的一系列空间感，到了邓小平时代终于转化 为中国向海洋世界全面开放的一个现实。中国与美国建交，随即又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以一种很硬的方式，表达了加入海洋秩序，也就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决心。但此时的中国，已经完成了自我政治整合，不会再因为加入全球经济体系而被内在撕裂了。

可以说，朝鲜战争是中国加入大陆秩序的宣言书，对越自卫反击战则是中国加入海洋秩序的宣言书。

但是严格说来，中国的本质是一个作为海陆中介或者说海陆枢纽的国家，这种国家要想把自己的世界使命真正承担起来，必须先以大陆国家的方式完成自我政治整合，再以海洋国家的方式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才能真正承担应有的使命。

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同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中国通过这两个阶段，完成了自己先大陆后海洋的身份确认，并真正打开了中国参与现代世界秩序构造的大门。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内容：共产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组织机制，也带来了全新的视野格局，它为中国打开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使得中国在面对少数民族

和国际秩序问题的时候，都有国民党打不开的脑洞，也就有了全新的处理办法。

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投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后，中国作为超大规

模国家的竞争优势终于充分释放，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过去人们常说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这个解释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有效的。

但是进入21世纪，要素价格高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减速，这用要素价格就解释不通了，必须找到新的解释框架，才能让我们理解中国的经济逻辑，并对下一步的走向做出判断。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中国崛起篇





43|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

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中国的自主决策在其中有一定作用，却并非决定性的关键。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更多地是一种时间性的耦合，而中国，顺势而为。

前面几讲，我们讲了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在政治上进行自我整合的过程。

在这之后，中国终于释放了超大规模人又带来的竞争优势，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开始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直到2013-14年的时候，除个别年份的波动，中国经济基本上始终保持着8%到10%的快速增长速度。这就被称为“中国的经济奇迹”。

人们过去对这种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要素价格便宜。这个解释对于80年代也许是有效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80年代高多了，发展速度却并没有下降，甚至制造业发展的速度比80年代还要更快了，而中国正是在21世纪之初，才成为“世界工厂”的。这就没法用要素价格来解释了。

有学者提出，这是因为地方领导为了晋升而竞相推动经济发展，带来了经济奇迹。但这个解释也不够。因为，并不是所有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最终成功。

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西方向世界进入到创新经济时代，带来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外包；

另一个变化是中国土地财政的改变——中国用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承接外包的能力，而且这个承接能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水平。

崛起能力：完善的供应链网络

第一个变化，是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其制造业将生产流程大规模向西转移。

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之前，人类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大部分人还处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阶段。

“基本需求”不仅仅是指你有吃有穿，也包括随着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过去不存在的需求也会被纳入到基本需求。

比如，在过去，人们对移动电话没有需求，但今天它毫无疑问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之一。

在基本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能最有效占据市场的产品，一定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均质化、廉价、非常实用耐用的大众化产品。哪个企业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它就能成为王者。

但是等到了创新经济时代，人们的需求变了，制造业的生产形态也跟着变了。过去二十年来手机行业的发展，就能看到这种变化。

在大众化产品的时代，诺基亚在流水线生产的效率上，比西门子、摩托罗拉都要做的好，就成了王者。

但是诺基亚没有想到，它在满足基本需求上做得越好，就越快地走

向了终点。当你把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都满足了，你的产品又廉价又耐用，功能简单易懂，根本不会坏，人们更新换代的需求就很低，产品就无法再卖出去了。

到了这会儿，手机要还想卖得出去的话，就必须有新的、有趣的、能带来新体验的功能。

也就是说，手机领域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谁能够创新才能继续，在这个市场上更好地活下去。诺基亚也发布了智能手机，但还是在短短几年后轰然倒塌。

我曾问过诺基亚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他告诉我，在智能手机刚刚出现在之际，诺基亚是所有手机厂商中，唯一一个有自己完整生产线的厂商。这就意味着诺基亚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

因为生产线是按照之前产品的需求设计的，想创新的话，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诺基亚也就跟不上创新经济的步伐了。

而勇敢闯入创新经济领域的公司，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把生产流程的新转型的成本全部甩给别人，这样才有可能创新。

苹果公司就是创新经济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企业。它自己完全不生产，只负责创新、负责品牌和渠道的维护，生产流程全部外包出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承包方呢？

承包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

它的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没效率根本接不到活儿。

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一旦高度专业化，就会锁定在特定产品上，一旦承包方的风险非常大，发包方的创意一变，承包方马上就会死掉。

所以又有第二个要求，就是承包方的生产过程必须有弹性，以便

有能力迅速转型。

但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但如果不能专业，生产的效率就不够高，可能根本就拿不到订单。

所以，弹性与效率是彼此矛盾的，但又必须同时达成。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就是因为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弹性和效率的统一。

中国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主要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要求放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处理。

具体说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单个企业的，中具专业化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比如，我见过一些生产拉杆天线的厂家，一个厂只生产其中的一节，这就专业化到极致了。

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之间互相配套，而且这种配套关系会不断地重组。

上游的第一个发包任务来了，供应链网络会自动地运动起来，小企业互为配套把任务完成；如果上游创意变了，第二个发包任务来了，网络会再次运动起来，自动形成新的配套关系，再把它完成。

高度专业化的单个小企业，确保了生产效率；而这些小企业组成的在不断动态重组的网络，又确保了弹性。弹性与效率两个条件就同时满足了。

因此，供应链网络，是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

这种供应链网络要发展起来，一开始一定要有足够的、分工足够细的小企业，在同一时间成长起来，形成一个联动的网络。

如果一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企业，自己先建起来了，等二十年，其

他配套企业才逐渐成长起来，那第一家企业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样的建设节奏，是无法组合成一个供应链网络的。

如果这么多企业必须要在同一时期建起来，那么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许多建设得非常好的、规模很大工业开发区已经建设起来，但是里面又没有相应的工业能力进驻。

换句话说，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着有企业进驻。否则，供应链网络会因为基础设施不配套，物流成本过高，根本长不起来。

开发区的建设也算是广义的城市化了。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发展起来的前提是，城市化必须要先于工业化。

然而看一下经济史会发现，通常的历史节奏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而不能反过来。

因为，城市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远高于乡村，所以城市对于财政的需求远高于乡村，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发展起来，城市便支撑不了相应的财政能力，提供不了所需的公共服务。**所以，通常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

但是，中国偏偏就把这历史节奏给反过来了。因为**1994**年进行的财政制度改革，引发了土地财政，使中国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先发展起来了。

崛起机遇：财税改革遇上世界订单

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二个关键改变，恰恰就来自于中国的土地财政改革。

1994年的财政改革被称作分税制改革，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财政制度叫做包干制。财政包干制的基本逻辑是，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中央上

交一定额度的财政，除了上交的部分，地方政府还能收多少钱、花多少钱，都是自己的事，中央不管。

这套财政制度对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因为它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层面推动改革有阻力的时候，地方上会有各种制度创新，让中国从旧体制当中迅速突破出来。

但是中央完全没有想到，地方活力能释放得如此之大，发达地区的财政上涨如此之快，以至于从198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1993年，中央收入只占全国收入的大约20%。于是，中央说话发达地区不大愿意听，而中央想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手上也没钱。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了艰难的谈判，终于在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把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有的税种是中央税，有的税种是地方税。

这个改革立竿见影，第二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就从约20%上升到差不多60%。中央从地方又袋里把钱拿走，地方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央再向下拨付，以此来确保中央对于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

对地方官员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变化。过去钱就在地方政府又袋里，现在得等着中央拨下来。官员晋升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各种投资来实现。

可是投资的决策权力，已经被中央收走了，这就刺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

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

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土发地财政在21世纪初初见成效。

于是，中国就走出了和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早于工业化。

但光有城市化，光有开发区，没有足够的企业进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会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在只有几个县在搞土地财政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招来工业能力进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几百个上千个县都在搞土地财政，基本上不可能有足够的企业来进驻。

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

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

于是，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来。

这时候进驻开发区的大的制造类企业，如富士康之类，对外承接上游企业的发包任务；在富士康的下游，有一批与其配套地自发成长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极为专业化地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

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极其灵活，基于供应链的需求，分布式地成长，分布式地决策，获得一种爆炸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这个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起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

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本讲小结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带来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外包的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有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才有能力承接外包。

中国的土地财政的发展，刚好使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了，使得供应链网络获得成长空间。土地财政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时间上刚好重合了，中国经济于是发生了令人目眩的成长。

通过这一讲，我们能看到，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

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内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的转型，是同一个过程。

我们无法脱离开世界经济秩序来讨论中国问题；同样，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现实，我们也无法脱离开中国的影响力来讨论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世界经济秩序一个极为深刻的转型，这个转型为未来打开了极为深远的想象空间，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精选留言

鸿69889587

土地财政和西方的产业转移使得我们的城市发展迅速，但现在的高房价压力下土地财政还可持续吗？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升级压力。像中西部一些3-4线的城市在土地财政下城市规模疯狂扩张，但产业发展跟不上存在类似的鬼城。这些城市未来该如何发展？

作者回复

西方来的制造业外包、中国的土地财政，这是刚好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彼此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同时发生，却形成共振出现了意料外的效果，促成了中国经济难以想象的速度。不过，也正因为这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并不是说中国这边有了土地财政开发的地方，就能够形成制造业的大发展，实际上这些发展也主要是集中在东南沿海，以及有能力向中部地区溢出，向西部的溢出，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来看，很难，因为那就超出供应链网络的有效半径了。西部的资源和生态约束条件与东部不一样，所以对于发展的理解，也应该和东部不一样，不应该追求经济意义上的发展，而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这个意义上的发展，给中国保留更多的心灵净土，这个本身在未来就会成为东部所愿意为之付费的东西。同时，西部渴望追求东部式发展的人，可以移民到东部，通过这种人的自由流动，来消化掉问题。但这就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匹配了。

44|中国崛起导致的世界经贸双循环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这种产业格局是终局性的，很难被取代。这种产业格局，也让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也产生以中国为枢纽的“双循环”经贸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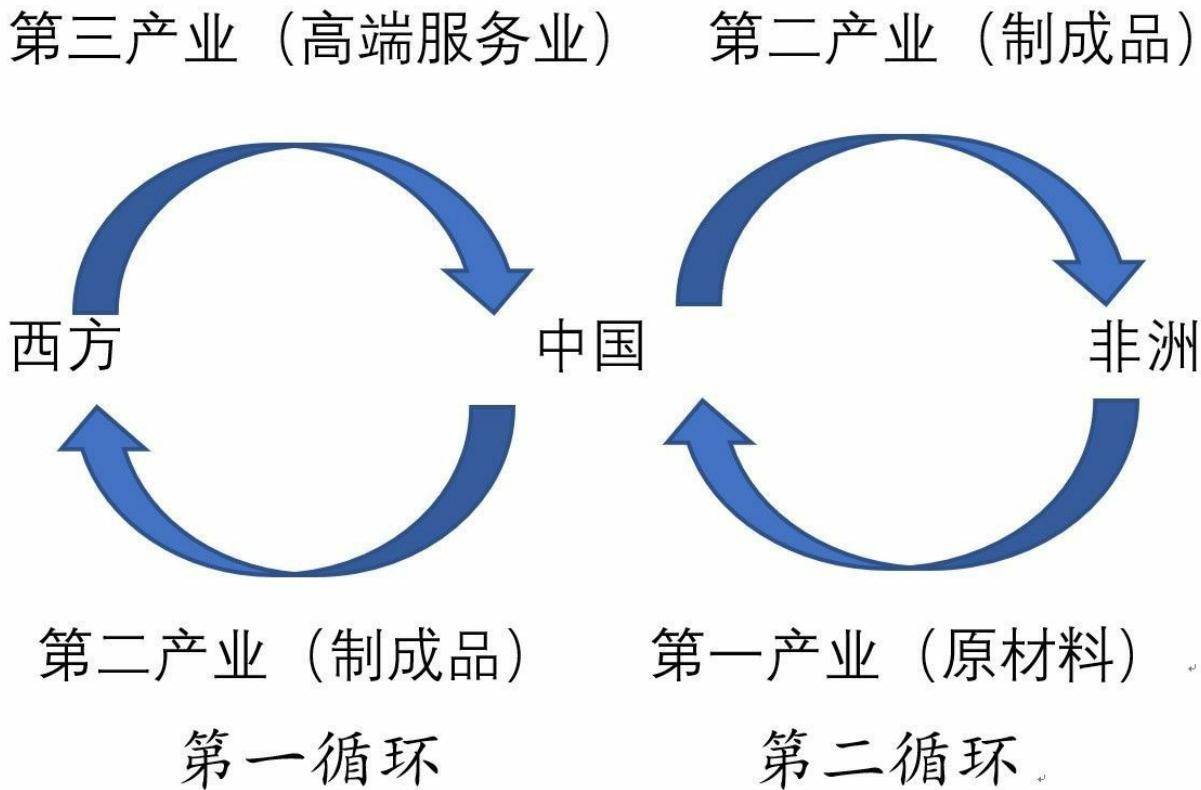
上一讲我们讲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西方进入创新经济、中国的土地财政，这两个事情正好在同一时期发生，让中国的供应链网络成长起来了，于是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但近些年，部分制造业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这带了一种新的担忧，就是中国会不会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讲，我们就会展开来讲，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这种产业格局是终局性的。也就是说，很难会有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来取代东亚聚集区的位置。

这种产业格局，也让世界经济秩序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前，世界经济秩序是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是一个“中心到外围”的结构。而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中国这样一个副中心，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双循环结构。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不可能出现

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中国经济在崛起之后，会不会陷入拉美国家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上一讲我们说了，中国的崛起，主要是形成了一个制造业的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是由无数家中小企业组成的。

其中，单个小企业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作为微观个体，它们确保了生产的效率。

这些小企业之间又互为配套，不断动态组合，形成一个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确保了生产的弹性。

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越大，意味着其中的小企业越多，专业化分工的

程度就越深，生产的效率也越高；同时，互为配套的组合可能性也就越多，弹性越好。

要论规模，中国具有绝对的优势。

当下的中国有着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超级发达的物流能力，超级完备的产业链，超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有着强烈的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欲望。

这就带来了超大规模的发展动力。

在外贸领域，由于中国所承接的需求都是面向全球销售的，因此下游的承包方也是面向全球市场生产的。

在内贸领域，网络平台、电商的出现，再加上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使得任何看似需求极低、很少有人会买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市场，充分体现了“长尾理论”效应。

这就催生了大量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分工，让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和弹性继续放大，分工深度和弹性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你用的iPhone手机就是个很好的说明：“iPhone生产所需的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三小时就行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意要想落地，所需要的制造业的整体生态，都在中国。

王煜全先生在“得到”的订阅专栏里面也讲过，现在的投资人要考察一种创新是否有能力落地，甭管你是哪里发展起来的创新，都要看你在深圳是否有办公室。这都是最直接的例子。

近些年，这个供应链网络的范围已经超出中国，以整个环中国海地区的东亚为单位。

中国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零部件、半成品，在中国完成总体组装，再向全世界出口，整个东亚被整合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业集聚区。

“世界工厂”这名头应该属于整个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几年前人们一直在讲中国对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每年有比如两千多亿美元。

但实际上，这两千多亿美元顺差的背后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一千几百亿美元的逆差，我们是代表着整个制造业集聚区形成了对美国的顺差。

在供应链网络扩大到整个东亚的过程里，也有部分制造业开始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这就带来了我们开头说的问题，人们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也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拉美、东南亚等一系列国家的发展过程的总结。

之所以会有这么个陷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每个国家自己搞一摊，各国的成本结构都是一样的。

一旦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它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了，土地价格一定也会上涨，总成本就会上涨。

而其他国家还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总成本仍然比较低，制造业就会转向，移到那些地方，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

但实际上，中国目前出现的制造业部分转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移走，而是整个供应链网络在东亚内部进行重构。

焦点不再是国家经济，而是微观层面的企业，以及超国家层面的供

应链网络。然有些企业在搬家在转移，但它们只是在改变自己在供应链当中的位置以及地理布局，但整个供应链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会受到本质影响。

中国压倒性的规模以及完整的产业结构，使得这个供应链网络的中心始终在中国。

传统经济学当中，认为经济的成本包含三个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制度经济学又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变量。

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又重构了交易成本的内涵。因为供应链网络是极其庞大、复杂的，假如不能有效地管理供应链的话，就没法有效控制成本。

因此，劳动力和土地的价格已经不是制造业成本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了，供应链的管理能力，成为一个新的要素，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所以，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幅上升了，但制造业却仍然能快速地发展。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大胆假想，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东亚制造业集聚区的出现，使得生产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集聚区内各个国家之间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半成品贸易，而这个集聚区形成的前提，是西方的创新经济。

因此，从创意、到生产、再到分销等等各个环节，都进入到了跨国分工、乃至全球分工，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所以说，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已经被取消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网络，会不会被其他地区取代。

由于供应链的规模效应，在可预见未来，除非出现某种今天完全无法想象的新技术，否则没有什么新的制造业集聚区能够崛起，与东亚进行全面竞争。

中低端制造业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集聚区的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是终局性的，进得来出不去。

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胆的预言呢？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现有东亚集聚区的制造能力，已经能轻易满足全球的需求，新崛起的地方很难与东亚就制造业进行竞争；

另一方面，其他地方若想重复中国崛起的历程，大规模承接外包需求，它也必须有大量已经建好的，但又几乎空白的开发区，否则供应链体系无法成长起来；但上一讲我们也解释了，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开发区建设，在中国以外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当然了，也不是说任何类型的制造业都不能转走，那种对供应链要求不高，并且对于远距离物流成本敏感的制造业，就能转走。

一种产品对物流成本是否敏感，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单位重量的产品售价。

如果售价比较高，就不敏感，比如手机；如果售价比较低就敏感，比如玻璃、低标号水泥、粗陶瓷之类的。

像玻璃、水泥这样的产品适合就近生产，不适合在距离销售市场很远的地方生产，这样物流成本太高，不划算。所以这样的产业能够被转走，也应该转移走，这符合经济规律。前一阵福耀玻璃向美国转移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要注意啦，福耀玻璃转走的是面向美洲市场的生产线，面向亚洲市场的生产则不会转走，因为它要就近生产。

至于部分工厂从中国向东南亚的转移，这是东亚制造业集聚区在内

部进行的结构性调整。

比如在2012年之前，中国是耐克鞋的最大出又国，之后则成为了越南。这并不是说耐克鞋的整个生产流程都在越南完成，只是最终工序在越南完成。

越南在这个产品的生产工序上，是依靠整个东亚集聚区来完成生产的，这样才能使耐克鞋的生产效率最大化。

所以，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就相当于这个供应链网络的半径扩大了，但仍然是是中国为中心的。

所以可以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是终局性的，它很难被取代。

这就带来了世界经贸秩序的一个深刻变化，从以前的“中心-外围”的单以深结构，变成了双循环结构。

中国成为“双循环”经贸结构枢纽

“中心-外围”结构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提出的一个概念。

他认为，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中心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外围地区。

中心国家主导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技术等等各种秩序；外围国家只能成为中心国家的市场和原材料殖民地。

由于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它们能在国际贸易当中获得更高比例的收益，外围国家则没法完成足够的资本积累，也就没办法摆脱悲惨的地位。

一直到20世纪末的经济史，基本都符合这个“中心到外围”的结构。

合但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以无法想象的方式崛起了。

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了，导致全球贸易结构开始变化，开始形成一个双循环结构。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一个循环：中国向西方国家输出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贸易，这个过程可以看作第一循环。

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构成另一个循环：中国向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输出制成品，这是第二循环。

这两个循环都通过中国而联系起来：在“中心-外围”结构下，西方国家直接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

但是随着创新经济和制造业外包，西方国家逐渐开始去工业化，主打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不需要原材料的，只有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才需要原材料。

而亚非拉这些外围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就是原材料。因此，西方国家就不再直接和这些原材料国家发生经贸联系了。原材料国家只能和东亚集聚区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进行贸易了。

中国因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中的枢纽，脱离开中国这一环，全球经济就没法完整运转起来了。

前面说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但那会儿还主要是政治上的中介性力量。今天，中国的中介地位已经扩展到了世界经济领域。

我们可以说，“中心-外围”结构下的“中心”，发生了裂变。

制造业秩序是中心国家必不可少的功能，过去是西方主导，现在变成中国主导了。

但全球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仍然来自西方，中国的制造业大发展也是西方创新经济的拉动，所以西方还是主中心，但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副中心。

这两个中心，彼此之间不大对付，经常处在一种竞争关系当中。

在之，两两于是，沃勒斯坦说的外围地区，获得了一种突破的可能性：中国与西方国家都会从外围地区争取盟友。拉盟友肯定得给好处嘛，但这个好处不是简单的援助，而是一系列的国际贸易谈判进程，以及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安排，这些新的贸易规则，会让外围国家在贸易中获得更多红利，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这样，中国的崛起就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了，而是对整个外围国家都有拉动作用。

本讲小结

回顾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是终局性的，是很难被取代的。

这进一步带来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中心-外围”结构，转成“双循环”结构，中国是双循环当中的连接枢纽。

中国与西方的博弈关系，又使得过去的外围国家获得了新的发展可能性，中国崛起因此而具有了更加伟大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拉动，同样体现在发达国家上；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层面，同样体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

2008年以来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和金融困局，与中国崛起也有着深层的关联，反过来对中国的内政外交环境又形成了一系列连锁影响。

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45|冷战和后冷战里的中国利益

冷战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的第三力量。在后冷战时代，海洋与大陆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陆世界陷入到混乱中。而中国作为海陆枢纽，对失序的大陆世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一讲我们讲到，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全球经贸出现了一个新结构，就是双循环结构。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副中心。

与此差不多同时代，全球政治秩序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冷战的结束。

在后冷战时代，海洋与大陆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陆世界陷入到混乱中。而中国作为海陆枢纽，将对失序的大陆世界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讲咱们就来讨论下这个问题。

冷战：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世界就进入了冷战秩序。

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两大政治集团开始对峙，也就是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对峙。

两大集团虽然对立，但是它们在各自的地盘内都维持了一个很强大很稳定的秩序。像今天索马里那样的局面，在那会儿都是没有的。

这两大集团，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延伸到了经济领域。

因为，盟主要把自己这个庞大的政治集团维系住，肯定要向小兄弟

那边投放大量的财政资源。

比如，美国苏联都要向自己的兄弟们提供核保护伞，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扩自己阵营的地盘，发现阵营内哪个兄弟有可能撑不住的时候，就得去帮助它摆平国内国外的各种问题。

类如，美国会帮助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去打击它们内部的左翼游击队，苏联会出兵镇压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反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有时在热点地区还得找到代理人打局部战争，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什么的。

所有这些事情，花钱都少不了，所以盟主需要跟集团内部的国家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这样才能把投放的财政资源，通过贸易方式收回来，整个事情才可持续。

如果不能形成经济循环，盟主往外投放资源就变成纯烧钱了，撑不了几天。

所以，一个持续的政治集团，前提必须是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因此，冷战时期，美国跟苏联的经济模式能扩张到哪儿，它们的势力，范围也就相应地能扩张到哪儿。

美国的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海洋贸易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所以美国的盟友基本上都是能够顺利通达大海的国家。

苏联的经济模式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以政治控制为基础，因为政治上控制不了，就没法计划；而要形成政治控制，就不能离开苏联太远，以至于它控制不了，所以苏联的盟友基本上都是它周边的陆地国家。

对美国来说，大陆深处的贸易成本太高，本来它也不大容易与那些地方形成正向经济循环；对苏联来说，海上远方的国家，政治控制成本太高，也没法跟它形成一体的计划经济关系。

所以它们的扩展范围也就划定了一种边界，形成了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对峙。

当然了，这里的说法都是一般原则，也存在反例，比如古巴，那就是离苏联十万八千里的岛国，但这毕竟是个别情况，苏联只要豁出去了也还能够支撑得起。

前面几讲谈到过，中国在这个时候处在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支力量。

中国的存在，能对海陆**两大**秩序构成均衡，在事实上成为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第三世界就是中国的铁杆哥们儿，所以当时中国也向这些地方有大量的财政资源投放，最有名的就是坦赞铁路了。

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处在半隔绝状态，导致中国没法通过贸易过程再把投出去的钱收回来，于是就成了个纯烧钱的事情。

这过程里中国当然有着很大的政治收获，但是这种收获却不容易持续，因为欠缺经济基础。

后冷战：中国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投放者

后冷战时代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苏联在1991年底瓦解了。

大陆世界的秩序主导者不在了，很多地方开始陷入失序状态。有些地方是彻底秩序崩溃了，比如非洲的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秩序很脆弱，比如中亚和中东的一些地方。

按理说，苏联崩溃了，美国就应该把自己的秩序扩展到这些失序的地方。问题是，这些地方跟美国都没有正向的经济循环，美国就算想进

入，也难以持续。

比如，美国出兵推翻了萨达姆和塔利班的统治，以及后来打击卡扎菲等国家，它期待着在推翻旧的统治者之后，这些国家的人民就能建立起更好的政治制度。

但是美国明显没有考虑到，这些新政权社会根基不牢，生存都成问题，非常依赖美国输血。

美国和这些地方都很难建立起经济循环，长期输血肯定输不起；所以搞了几年之后，美国不得不琢磨撤军了，结果当地就再陷入到动荡之中。

也许你会说伊拉克有石油，美国为什么和它没有经济循环呢？但查看公开资料就能发现，战后伊拉克石油有一半都出口到中国，中国公司所掌握的伊拉克石油储量也是最多的，要远高于美国。

所以在美国社会有一种舆论是，伊拉克战争的成本都是美国支付的，但是最受益的国家却是中国，美国相当于替中国打仗了。

而美国在这些地方打掉了老的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新的秩序，这让它要推行的价值观受到大陆世界的质疑，让美国自己也感觉丧气，还不如当初冷战的时候理直气壮呢。

苏联没了，美国才发现，大陆世界并不是自己能搞定的。

这里的大陆世界首先不是一种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国际政治范畴，这些大陆世界的国家无法和西方建立密切的经贸联系，从而获得西方秩序。

那么，美国能不能不管大陆世界呢？眼不见心不烦不就行了？可现实中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人类的秩序是相互联系的，大陆世界秩序混乱的话，其他地方的日子也甭想能过得多么好。最近几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是一个很明白

的例证，中东乱成一锅粥，欧洲就甭想能清静。

因此，失序的大陆世界，必须重建一套秩序，这不仅仅是为了大陆世界，同样是为了人类的普遍秩序。

但大陆世界的秩序靠它们自己是搞不定的，如果能搞定，当初也不至于陷入混乱。

而海洋世界也没法帮助当地建立秩序，因为欠缺紧密的经济联系，政治方案便没法落地。

因此，只有和大陆世界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才有能力持续地向这些地方投放秩序。

答案，就是中国。

失序的大陆国家，多一半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就是原材料国家。而在中国崛起后，在新的世界经济结构下，原材料最大的需求方，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

20世纪最后十年，西方经济不错，但西方此时对原材料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也就没法拉动大陆世界的经济了，因此大陆世界变得混乱不堪。

21世纪，很多原材料国家又开始获得不错的经济表现，正是因为中国的庞大需求到来了。

此时就可以看到，在后冷战时代，中国几乎是唯一能向大陆世界投放财政资源、从而投放秩序的国家。因为中国可以通过贸易过程，再回收这些投放的财政资源，整件事情便是可持续的。

回收的途径很多，简单地说，通过向当地投放资源，使当地获得稳定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稳定的原材料价格，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从而，援助这些动荡地区，便不能简单地看到我们花出去了多少钱，还要看到从中带来了多大的潜在收益。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向大陆世界投放秩序，不仅仅是一种大国的责任，同时也高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在与发达国家，也就是海洋世界的第一循环中，获得了贸易红利；再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红利在第二循环中投放到大陆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

超大国家的外交姿态：普遍主义

双循环结构，到了这就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意义：中国作为海陆枢纽，也不再仅仅是和平的保卫者，更是全球形成联动发展的必须枢纽。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为中介，西方与大陆世界也有可能间接地去形成经贸循环。

中国向大陆世界做投资和援助，必须要让当地社会获得财富的普遍分享，形成普惠性的效应。否则，不仅不能带来秩序，反倒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当地的秩序。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普惠性效应呢？

这需要对各种地方性的传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能知道该如何设计具体的方案安排。

但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很不足，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积累。恰好，西方世界的国际组织、NGO、公司、研究机构等等，都在这方面有大量的知识储备。

所以，中国和这些西方机构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可以向它

们购买咨询服务，甚至是联合行动。

这个过程便是中国、西方、失序的大陆世界，多方共赢的过程。

但这种多方共赢的状态，目前都还仅仅是处在一种潜在状态，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

它要真的变为现实，需要有各方对于过去的世界秩序观念的深刻调
。

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恢复自己在几十年前曾经有过的那种气势磅礴的普遍主义视野，不要让自己陷入到民族主义当中去。

因为，中国是超大规模国家。对这种国家来说，它的国家利益绝不来源于民族主义，去对外攫取利益；超大国家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是一种向外给予的姿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国家利益比喻成在商场里做生意。民族主义就像摆小摊，普遍主义就像开商场。

对中小国家来说，它们相当于在商场里租了一个铺面，它的国家利益就是流水的增加。民族主义就是想各种办法拼命增加流水，这只会带来不同铺面的流水的重新分配，不至于对商场本身造成什么影响。

而对于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它不仅仅是在商场里面有一个铺面，同时还是商场的打股东。作为大股东，最大的利益绝不来源于铺面流水的增加，而来源于从所有铺面收租，你自己的铺面得到一个平均利润率就可以了，从别人那收租才是更大的利益。

中小国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大股东，只能租铺面，那么人家凭什么愿意到你这租铺面呢？

一定是你提供了好的公共品，比如说你所提供的物业服务，你对

商场的基本管理规则制定与执行等等，都是足够有竞争力的，才能吸引来租户。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股东对商场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必须是对所有的铺面，包括自己的铺面，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就是普遍主义。

假如管理规则只用来约束别人，所有的中小铺面都得围绕大股东的利益旋转，那么当不了大股东的国家，就会跑到别的商场做生意了。

因为其他商场的大股东是愿意接受规则约束的。

可能别的商场的大股东也会搞点小动作，但是如果中小铺面拿着商场的规则指责它，大股东是认账的。

所以，这样的大股东的行为是可预期的，中小铺面也就愿意在这样的商场做生意。

否则，中小铺面的收益都不可预期，肯定得跑。

因此，超大规模国家的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就不能只盯着眼前利益，必须放弃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而以普遍主义的方式，以全球为单位，来思考自己的外交战略。

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否则，依照民族主义的路数，越是拼命地想要争夺眼前利益，就是损害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

本讲小结

现在来回顾一下这里讲的内容。

冷战时代，美苏各自撑起了海洋和大陆的秩序，中国则作为第三方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后冷战时代，海洋秩序还在，大陆秩序瓦解了，外部世界必须向大陆世界投放新的秩序，人类秩序才能稳定下来。

这个新秩序的投放者只能是中国。

因为作为秩序的投放者，必须与大陆世界有紧密的经贸往来。而在这个时期，西方与大陆世界的经贸联系变得很微弱了，只有中国与大陆世界和西方世界都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

因此，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成为输出秩序的必要枢纽。

这种枢纽位置，符合中国真正长远的国家利益，同时，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来源于普遍主义。

全球政治秩序的变迁，必须在对双循环结构的理解当中，才能理清其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国崛起对于双循环里面两个循环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咱们会用几讲来展开几个案例，看看中国具体都是怎么影响这两个循环的，以及中国在此过程中又可以做一些什么。

从这里，可以发掘出中国外交的一些深层逻辑。

46|为何中国必须购买美国国债

最新一轮的创新，拉动出的新产业不在西方本土而在中国，导致了西方世界如今的危机。西方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对冲经济困境，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会带来新的问题，也伤害自己和中国的利益。

在前面几讲，讲了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崛起其实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西方创新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正是西方世界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世界温水煮青蛙一般地慢慢陷入到危机当中。

近些年，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争论，说中国的贫困地区还很多，为什么还要一直借钱给西方国家。

实际上，中国借钱给西方国家也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经济崛起。但这个过程反过来导致了西方的经济危机，并且带来了最近一两年来西方政治的保守化趋势，川普上台就是这种保守化趋势的一个基本反映。

西方遇到的一系列困境，中国也不能置之事外，会伤害到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一讲咱们就来说一下这背后的机理。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讨论，也就是对于双循环结构当中第一循环的讨论。

当然，这里要强调一下，接下来这一讲都是我个人在学术研究中，所形成的一些理论认识，不能代表官方战略。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个认识，能对你理解中国、理解世界秩序有所帮助。

用经济手段解决困境

西方国家在最近几年遭遇到的这一系列困境，都是技术变迁所导致的，这个过程还间接促成了中国的崛起。

回顾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历史上都出现过多次技术变迁所导致的秩序失衡，以至于引发一系列的危机。但这次西方世界的失衡和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和以往都不一样。

先来看看此前西方世界的失衡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么解决的。这个搞清楚了，就很容易理解这一次危机是哪里不一样了。

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技术变迁肯定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都是传统经济，财富的增长很缓慢。工业革命让财富像井喷一样涌了出来，这是此前人类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海量财富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如何分配财富就成了个严峻的问题。如果分配不当，有可能引发剧烈的冲突。

想象一下，你突然中了五百万大奖，很快你就会发现冒出来一大帮你平时不怎么联系、甚至没怎么听过的亲戚。大家都想分一杯羹，结果就引发了一大堆家庭矛盾，闹得厉害了，家庭散伙都有可能。

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比中彩票的情况复杂得多。因为此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那会儿的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但是富人的财产上都附着了很多的社会义务，比如救助穷人、修筑道路等公共设施，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因为贫富差别产生撕裂。

工业社会建立起来之后，新涌现的财富上并不附着什么社会义务。经过几次政治革命，旧有财富上的义务基本也没了，穷人没法再分享财富的好处，社会于是开始产生阶级对立。

这种对立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这就是19世纪前期出现各种社会主义理念的原因，人们开始琢磨怎样设计一种更好的制度，来解决分配问题。

西方的这种分配问题，在19世纪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解决的，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的。

随着技术不断创新，工业革命不断向前迭代发展，西方的经济发展效率变得更高，对外征服的能力也变得更强。这让西方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可供内部分配。

穷人能够更多地分享到新出现的财富，主要途径也不是政府的二次分配。而是通过技术革命拉动出新的产业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便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

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蒸汽机的发明是核心，拉动了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这又拉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了远洋贸易的发展等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内燃机的发明是核心，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同时拉动了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公路建设的发展，拉动了更加复杂的金融业发展等等。

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原子能、航天技术和电子技术等，仍然能够拉动出大量过去并不存在的新行业出来，并且让早就存在的老行业也都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机会。

这样一来，创新部门在此过程中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其他被拉动起来的部门至少也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西方社会滚滚而来的新财富分配问题因此而获得解决。

打个比方，你中了五百万之后，来了一堆眼红的亲戚。但你不是跟他们吵架，而是给每人分了一笔钱，作为初始投资，让亲戚们去开个买卖。之后，亲戚们发展起来了，你的投资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时你的财富已经远远多于五百万了，但是亲戚们也比过去过得好多了，于是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但是进入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

西方世界进入到了又一轮的创新周期。前面说过，这一轮创新的结果是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出现。

这就让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对着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最新这一轮的创新经济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西方本土，而是在中国。

中国踩上了这个风口，成为世界工厂。而在美国这边，创新经济虽然带来巨额财富，但传统行业大量衰落，于是出现了中部地区著名的锈带，也就是生锈的地带。这一带在过去是美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钢铁、化工、汽车等等产业都是世界级的，但是现在出现严重地衰败和失业现象。

于是，美国内部一种很严重的不均衡就浮现出来了。它的创新部门仍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整个国家的经济宏观数据看上去很漂亮，但是仔细看内部的分配结构的话，却发现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拉大。

美国的草根阶层很难参与到新财富的分配当中去，传统工业经济的萎缩，甚至让草根们不断地有受损感。

有经济学家把美国90年代以来的强劲复苏叫做“失业型复苏”，就是说通过大规模创新的拉动，经济确实复苏了，但却仍然伴随着大量失业。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这新一轮创新经济当中，却成了一个现实。

政治手段对冲经济困境

既然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就会被提上台面，以对冲掉经济过程所带来的问题。

这一轮政治对冲有个复杂的过程，先是政府的主动行为，结果导致了西方的经济危机。之后又有民间的反弹，导致了近期西方世界的保

守化。

以美国为例，来看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一轮创新经济的影响逐渐显露，中国开始接受西方的制造业大规模外包，西方的传统工业也逐渐开始萎缩，很多人失业，没失业的人也大多收入下降。

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为了让本国低收入者的处境看起来不那么糟糕，努力推动“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大家都能住上满意的房子，能够进行各种借贷消费，就觉得日子还不错。平民们满意，总统也就能够获得更多选票。

可是低收入者的信用资质不好，不容易贷款，“居者有其屋”怎样才能实现呢？

这两届美国政府想起来，早在30年代大危机时期成立过两个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就是用来帮助穷人获得低息住房贷款的。

给穷人的贷款风险性都比较高，但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把这些高风险贷款和低风险贷款给打包在一块儿，变成证券之后出售给其他投资者。这些证券背后有着联邦政府隐性的政治担保，于是又多了一层低风险外衣，所以这种证券就变得很好卖。

美国不仅仅有大量的这种住房贷款，还有大量的日常消费的贷款。这些融资需求都被投行变成了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转化为一系列债券售出。

欧洲国家的做法也差不太多，**通过政府的担保行为，来提供大量低息贷款，这就扭曲了资本市场**。高风险的人群本来是无法获得低息贷款的，但是政府担保让利息降下来了，相当于用政治干预经济，这是第一轮的政治手段对冲经济。

为什么当权者要这么做呢？他们试图用这个来确保选票。

中国是依托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而获得经济崛起的，这种经济逻辑意味着中国必须是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这就需要外部世界有发达的消费能力。这样，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才有用武之地，否则根本没法出口。

过去也有很多别的新兴经济体像亚洲四小龙之类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其经济成长也是依赖于西方世界的市场需求，但这些经济体规模较小，其出口容易被外部世界所吸收，不会引起严重的经济失衡。

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它的出口导向必定意味着外部世界会遭遇严重的经济失衡。这就意味着外部世界就没有消费能力了，这样中国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

为此，中国不得不将自己通过出口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用来购买西方国家的债券，为其融资，以便让它们始终能买得起中国的东西。

但是这个过程对西方也不是好事，因为从中国来的大量贷款，维持着西方的低利率，人们总觉得借钱很划算，愿意大肆消费。

西方世界的“失业型复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那些贷款的穷人，只是借新债还旧债，风险就越积累越大，终于到2008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一来，西方的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出口马上遭遇困。于是就有了最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艰难状况。

不要以为仅仅是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这么简单，是因为世界市场的需求下降了。而这种下降是因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导致了西方国家严重的内在失衡，于是西方世界的消费能力大幅下降。

中国在不断努力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来缓冲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是内需的扩大根本抵消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需求下降，所以中国仍然在艰难度日。

西方就更郁闷了，过去还有“失业型复苏”，现在只是失业了，民怨

越来越大，就会要求政府采取本国优先的政治立场。排除掉移民的竞争，排除掉外国商品的竞争，保障本国人的福利，等等。

在选票的压力下，西方政府近年逐渐地开始保守化转向，这就是第二轮的政治手段对冲经济。包括川普上台，英国退欧，欧洲若干个国家保守政党上台，乃至于最近看到的西方国家发生的文革一般的社会冲突，都是第二轮政治对冲经济的表现。

可是，前面几讲说过世界经济结构变迁的逻辑，这个逻辑决定了保守化转向不可能帮助西方国家真正解决问题。

中国在西方的这一轮转向过程中，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今天已经是全球性的，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是在非常深刻的意义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西方的保守化一定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和空间。

过往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崛起之后的世界，因此需要中国与西方进行贸易谈判，用一种新的国际治理秩序来调整世界的失衡。但是这种谈判注定是艰难的，甚至到了今天，双方关于问题的理解，关于谈判的意愿上仍然有巨大的差异。

为了弥合这种差异，中国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都需要深刻地调整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对于自己的理解，打开更为广阔的视野，才有可能找到更加深层的利益交汇点，谈判才能形成建设性的成果。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历史上，西方的创新都会带来社会的失衡。但通过经济的发展，拉动新的产业，可以消化掉这种失衡。

最新一轮的创新，新拉动出的产业却不在西方本土而在中 国，这导致了西方世界如今的危机。

西方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对冲经济困境，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会带来新的问题，也伤害自己和中国的利益。

西方的失衡没办法通过自己来消化，必须在与中国的互动过程中，在一个更大的国际治理框架之下，找到消化的办法。这需要中国与 西方都要在观念层面发生深刻的变化，才能突破当下的困境。

然而，失衡是在双循环的结构里面普遍发生的，视野只局限在第一循环里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接下来两讲，会以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作为案例，看看第二循环里面都有些什么能打开脑洞的可能性。

47|伊斯兰世界的困境

如今的伊斯兰世界为何如此动荡？伊斯兰世界在现代化的路上，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面对着民主制与世俗制的矛盾，面对着资源匮乏的困境。伊斯兰教义当中教人决不妥协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再叠加上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于是恐怖主义就成了严重问题。

前面几讲，我们讨论了现今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国处在一个双循环结构的枢纽位置。

这种新的世界格局，让第一循环里面的发达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产生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以及政治上的保守化。

接下来，我们会重点聊聊第二循环。

第二循环里面的国家很多，其需求的差别也非常大，没法统一地讨论，所以就挑两个有代表性的地区。一个是从中亚一直横贯到北非的伊斯兰地区，一个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

今天这一讲就先讲讲伊斯兰地区，这片地区最近几年动荡不已，我们来看看这种动荡的原因。

我们前面谈到过，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经济富饶，文明极度开放、包容。当时，伊斯兰的思想家甚至启蒙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到了今天，伊斯兰地区在现代世界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

这些话题与中国并不远，因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越来越密切，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

教义的两面性

说到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可能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伊斯兰国（ISIS）。

这个组织应该是这些年来的恐怖主义组织里面最有钱有枪有地盘的了，当年的本·拉登跟它都不算什么。奇葩的是，伊斯兰国里面有很多恐怖分子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跑来的穆斯林青年。

这帮家伙在西方的日子过得好好的，跑到这来干什么？

网上能看到有些人在指责，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天然就是个暴力的宗教，于是会有这种事情。这种指责是完全不靠谱的。

伊斯兰教的教义里同时并存着两面，一面是教人友善、热爱和平、尊老爱幼的；另一面是教人决不妥协，要勇敢反抗不正义的。这两面都是伊斯兰教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是这两面在信徒的生活和行动中不一定全都表现出来。

所以应该问的是，什么时候会是热爱和平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什么时候会是决不妥协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伊斯兰世界的动荡非常重要。

伊斯兰教信徒究竟呈现出来哪一面，根本上取决于信徒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社会结构里。

如果信徒是生活在传统共同体里，比如抬头低头都是熟人的村子，或者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小城，那么教人友善、热爱和平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在很多地方的穆斯林村镇，你都能体会到，当地人真诚、友爱、善良，跟他们打起交道来很舒服。

如果信徒生活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大城市里，又恰好这位信徒的技能一般，找不到理想的工作，生活比较困窘，遭受各种歧视。那么教

人决不妥协的一面就会呈现出来，它会告诉信徒，即使全世界都抛弃了你，安拉仍然和你在一起。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的神实际上是同一个神，只不过他们对这个神的理解不一样。安拉就是阿拉伯语“神”这个词的音译。

对城里的那个倒霉家伙来说，安拉都没有抛弃我，世界却抛弃了我，那说明什么呢？安拉不可能错，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世界错了。既然如此，就得把错误的世界改成正确的世界，因此就会走上特别暴力的反抗之路。

因为受教育水平低，他也说不清楚究竟要反抗的是什么，只是直观地感觉现代大城市里的家伙们都很坏，就是那帮家伙总在歧视我，所以笼统地反抗整个现代世界。

这样，你大致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在西方长大的穆斯林要跑到中东去参加伊斯兰国了。

不过，还得再多说一句，这种决不妥协坚决反抗的精神，并不是只有伊斯兰教才有，它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共享的。

只不过在当今的现实世界里，犹太教和基督教处在优势地位，于是比较自信、宽容，那种坚决反抗的一面就淡化了。

在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才是最自信、最宽容的宗教，因为那会儿的阿拉伯帝国极为繁荣富裕发达。基督教世界则是极为落后愚昧的地方，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是非常狭隘的。但是到了近代，发展水准反过来了，人们的心态也反过来了。

民主化和世俗化的矛盾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不仅仅是针对西方世界的，同时也是针对伊斯兰世界自己的。

伊斯兰国的地盘主要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死在伊斯兰国手里的什么人最多？当然不是西方人，而是当地的穆斯林。在穆斯林地区之外的伊斯兰世界，也经常发生各种恐怖袭击，比西方所遭遇到的要多得多。

为什么穆斯林要打穆斯林呢？这就又得解释下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困境了。

现代国家有两个基本原则，民主制和世俗制，但这两个原则在穆斯林国家却很难并存。

只要推行民主选举，那么上台的往往是宗教性政党，世俗化原则就会遇到挑战。如果坚持世俗化，往往都是以军队为后盾的强人政治，跟民主就没什么关系了。

中东和北非的国家，如果不是由封建王公统治，基本上都是强人政治，这些强人都是压制宗教势力的。

穆斯林国家的历史多半都很短，大多数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大国博弈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们的政治深受西方大国的影响。

对西方大国来说，如果世俗化和民主化这两个原则没法兼得，那还是世俗化看着更舒服一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比如土耳其在二战后曾经有过好几次循环。民主选举上台的就是宗教政党，于是军队发动政变推翻这个合法政府。过渡几年之后还政于民，再次大选，没多久上来的又是宗教政党，于是军队再政变。

其他穆斯林国家也发生过不少类似的事情。一般来说，西方国家不会承认政变建立起来的政府有正当性，但是对于这些穆斯林国家的世俗

政变，西方都默认了。

这就有点尴尬了，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大力推动民主化，却拒绝接受穆斯林国家民主化的选举结果。在穆斯林看来，这证明了西方的虚伪。

当然，咱们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可以说，西方也不是虚伪，但肯定是天真。它们没有考虑到，民主化、世俗化这种现代政治原则，需要一些社会条件才能成立，试图用这原则直接就要求穆斯林国家，只能搞出来个尴尬的结果。

更尴尬的是，政治强人的统治，不仅在西方的标准看来是有问题的，在伊斯兰教的标准看来同样大有问题。

也许和你通常认知的不一样，伊斯兰教非常重视平等，可是强人的统治肯定就不讲究平等了。伊斯兰教也非常重视民主。

当然，伊斯兰教所说的民主和现代政治的民主不是一个概念。现代政治的民主是一种选择的民主，就是说究竟谁上台，得选民说了算。

伊斯兰教重视的民主可以称之为认可的民主，就是谁上台我未必说了算，可能有另外一套规则来决定，但不管什么规则，按规则上了台的人应该获得我的认可，比如通过对他的欢呼。可是强人政治不仅推翻了选择上民主的结果，跟这种认可的民主也基本不沾边。

所以，恐怖主义者认为这些政治强人都是坏人，他们掌握的政权也是邪恶的，推翻他们，才能带来正义。

可是怎么推翻这帮坏人啊？明火执仗地打又打不过，那就只好用恐怖袭击了。

结果是，恐怖主义最多的地方，并不是西方，而是伊斯兰世界。只不过我们平时在新闻里更注意西方的消息，对于穆斯林国家发生恐袭炸死一堆人的事情不大注意罢了。

世界经济下行和资源匮乏

既然伊斯兰世界有这么多内在的困境，为什么最近才冒出来伊斯兰国这种奇葩呢？早先为什么没有呢？这就又跟全球经济秩序的变迁有关了。

穆斯林国家的那些强人统治者也知道，不能指望老百姓在政治上真正地认可自己，但如果能在经济上搞出个不错的成绩单，老百姓应该也能够默许。

巧的是，中东和中亚的穆斯林国家，很多都是石油天然气储量丰富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的上行时期，能源价格高涨，有油田就像有印钞机一样，能够让百姓日子过得不错。

北非没有多少石油的国家，像突尼斯、埃及等，旅游资源超级丰富，是欧洲人的后花园。当地人靠旅游经济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所以这些国家都还有能力让社会稳定。

问题是，谁也没法确保经济一直处在上行曲线，有起有伏是正常状态。要是经济下行的话，这些强人统治者就遇到麻烦了。

穆斯林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起伏太敏感了，一旦外部世界经济打喷嚏，穆斯林国家就有可能感冒，一旦外部感冒了，穆斯林国家可能就休克。

在一讲刚刚说过，随着中国崛起，西方世界遭遇到了内部的失衡。政客们为了选票考虑，就出台各种政策，鼓励人们借贷消费。但实体经济萎缩了，借贷有还不上的那一天。

终于，这种经济逻辑导致了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感冒了，欧洲人没钱到北非去玩了，世界能源价格也大幅下跌，穆斯林国家就出现危机。

大的格局走到这一步，小人物也能撬动大历史。

2010年底，突尼斯一个失业的小贩自焚，抗议警察粗暴执法，引起了大半个伊斯兰世界的连锁政治动荡。从北非到中东，一个接一个长期执政的政权倒了下去，有几个国家到今天仍然在惨烈内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亚和中东的伊斯兰世界，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当地多半都是沙漠、戈壁地区，人们主要是住在绿洲。

绿洲地区的生态环境很脆弱，尤其水资源很匮乏。在很多绿洲中的农村，每一户的用水都有严格的限制，具体什么时候可以用水，要由村里统一分配。在特别匮乏的地方，放水的时间分到每户的头上甚至是以秒来计算的。

水资源的匮乏是个最大的短板，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生活资源的匮乏。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我们就不能把资源丰沛地区的社会观念套用到当地。在资源丰沛的地区，人们可以突破各种传统的限制，尽情挥霍资源，这几乎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但绿洲地区的资源根本就挥霍不起。绿洲地区有数千年来留下的一系列本的古老的传统和智慧，这些传统经常是给人们的行为划定一些很奇怪的禁忌，这些禁忌在外部世界的人看来可能不大容易理解。正是这些禁忌易的界忌，才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能让绿洲世界绵延几千年一直活下来。

现代经济和现代观念对于这些传统的冲击，使得那些禁忌被抛弃了。这样既打破了前面说的那种传统共同体，又威胁着绿洲地区脆弱的生态资源，从而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地方的恐怖主义威胁。

归结下来一句话，对于中亚、中东这些伊斯兰地区，它们的首要需求很可能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反恐。

经济发展有可能会有助于反恐，因为如果经济上彻底崩溃，那就别指望能安定了。但是经济发展也有可能加剧恐怖主义的威胁，因为不考虑绿洲地区的各种传统智慧，以及各种生态资源的约束，经济发展有可

能让人们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从而把更多没有出路的人推到恐怖主义那一边去。

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世界最近这些年的动荡，是各种内因和外因联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活动也是外因里面的一个要素。

在这些动荡的地区，必须要重建秩序，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不仅仅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还因为恐怖主义同样会威胁中国的安全。

由于双循环结构的存在，中国会是重建秩序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角色，但这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一个角色。

因为要在这些地区重建秩序，所用的办法和经验，与中国所习惯的办法和经验有着巨大差异。什么样的经济和政策才是最合适的，需要对于当地的传统和问题进行仔细研究，否则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伊斯兰世界在现代化的路上，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面对着民主制与世俗制的矛盾，面对着资源匮乏的困境。

这些困境，有可能刺激伊斯兰教当中教人决不妥协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再叠加上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于是恐怖主义就成了严重的问题。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方，首要的需求并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反恐。

外部世界要参与当地的活动，首先要理解前面说的这些矛盾，以及理解当地的历史传统。中国在与伊斯兰世界发生经贸关系以及进行投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以上所有的问题，才不会恶化恐怖主义的局面，才有可能带来建设性成果，否则很有可能好心办坏事。通过最近这几讲，

你肯定也能体会到了，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得我们的国家利益必定是世界性的。所以中国必须从全球视野，而不能从民族主义视野思考问题。必须打开眼界，从全球着眼，才配得上这个国家。

下一讲，我们再来看看双循环的第二循环中另外一种类型的地区——非洲。在那里，中国可以发展出一些特别有建设性、有创造力的方案，比《战狼2》里面所描述的非洲情景要有意思得多。

48|在非洲发现中国

非洲已经不再是固有印象中战乱、贫瘠的大陆了。经济发展才是现今非洲的主旋律。由于中国经济独特的拉动效应，使得很多非洲国家获得了特殊的发展机会，中国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深度合作的空间。而且还能反过来使得中国国内很多不容易化解的困境，获得新的解决空间。

这一讲咱们来聊聊非洲。

你可能对非洲有一些刻板印象，认为非洲饥饿、贫穷。我会用我自己的一系列亲身经历，告诉你并不是这样的。

近些年，中国在非洲也进行了一些援助项目。我会具体以坦桑尼亚为案例，跟你聊聊中国与非洲可能的合作战略。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和非洲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值得探索。

对非洲的误解

提及非洲，可能你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块饥饿的大陆、贫穷的大陆、动荡的大陆等等。这些多是要被扫除的错误印象。

首先，非洲不是饥饿的大陆。

根据过去的印象，你可能会觉得非洲粮食一定很短缺，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大饥荒。然而，学者们早就研究清楚了，非洲饥荒年份的收成往往并不差，出现饥荒的原因不是粮食短缺，而是粮食的流通和分配机制有严重的问题。

更进一步，我们所听说过的那些饥荒都是发生在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国家，而在撒哈拉以南的热带非洲则从来没有出现过饥荒。

热带非洲的自然条件太好了，老百姓靠天养活就饿不着。香蕉树、芒果树、木薯等等，长得漫山遍野，稍稍动动手就可以吃饱，然后就可以唱歌跳舞，享受生活了。我去过非洲多个国家，在那里见到了世界上最开心的一群人。

那些地方的水果太好吃了，我第一次到非洲，在进到酒店房间后感觉香气四溢，找来找去发现是床头柜上摆着的几颗桃子。我大吃一惊，从没想到桃子能这么香。

所以，热带非洲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饥荒，而是贫困。

我们依照温带的习惯，会觉得贫困不就是没饭吃吗？热带非洲根本没这事，普通老百姓从来就不愁吃饭问题，愁的只是没钱消费一般日用品，生活水准很低下。

其次，要说非洲是贫穷的大陆，这种认识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的。

非洲社会贫富高度分化，穷人虽然吃饭没问题，但基本没啥消费能力。富人的生活水准则非常高，而且这个群体比咱们通常想象的要大。

在非洲有水准极高、非常奢华的酒店，我去过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面，住过的最好的酒店就是非洲的。奢华程度远超同级别的欧洲酒店，服务水准也无可挑剔。

不过，酒店里面超级奢华，酒店外面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从一个角度可以反映出非洲富人的生活水准以及贫富分化的程度。

要是从发展潜力的角度说，非洲更是富有极了。

这里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矿藏，比如，我去参观过刚果（金）的一个露天铜矿。中国这边的露天矿，1%的铜含量就是很好的富矿了，在刚果低于20%铜含量的基本就不叫矿，开往铜矿路上的铺路石都是绿油油

的，放在中国就顶级矿石了，在那就只能用来铺路。

非洲的农业资源、林业资源、水利资源、旅游资源等等，都是极为丰富的。在非洲国家驱车跑着，总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各种资源的富饶。但是也能感受到，这些富饶的资源大多都处在半沉睡状态，没有获得有效开发。因为非洲国家欠缺资金、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有效的管理。

这些东西的欠缺，确实可以归结到非洲的动荡上去，但咱们也不能去上的欠笼统地说非洲是块动荡的大陆。

你可能看过《战狼2》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加深国人对于非洲的误解，因为电影里夸张了非洲战乱的程度。实际上，非洲的战乱主要是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进入21世纪，人们都打得筋疲力尽，非洲的绝大部分动荡都平息下来了，开始琢磨发展经济的事情了。

现在电视上偶尔还能看到个别非洲国家发生内战，但非洲有五十四个国家，内战只是五十四分之一的事情。而且说实话，非洲内战的那个规模，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说就是打群架，皮卡什么的就算重型装备了，电影里演的那么多坦克可用，太夸张了。

到了非洲，你不大有机会碰到什么战乱，却会碰到无所不在的中国商品和中国商人。我碰到过很多已经在当地生活或经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中国人，都很喜欢当地。

坦桑尼亚的战略可能性

中国的经济崛起速度太快，给世界格局带来了新格局，也就是双循环结构，仅仅十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在非洲的各种活动，还没有来得及顺应这个新格局调整，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些战略可能性浮现出来了。

接下来我就讲讲自己在坦桑尼亚的研究，以这里为案例，看看一些开脑洞的战略可能性。不过得再澄清一下，这里讲的只是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国家战略没有关系。

坦桑尼亚是东非的核心国家，和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

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援外项目——坦赞铁路，就是贯穿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这两个国家的，也是坦桑尼亚仅有的两条铁路之一。坦桑尼亚的军队直接就是中国帮助装备和训练的。坦桑尼亚的政治稳定性也非常好，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内战或者军事政变，这在非洲国家很少见。

坦桑尼亚的农业资源非常丰富。国土面积94万多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10，但是可耕地面积大约达到了中国的一半，约为9亿亩。问题是，这其中只有不到20%是获得有效开发的，剩下80%都荒着。

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基础设施问题，运输能力不行，那些土地就算耕种了农产品也运不出来。

坦桑尼亚在2010年前后制定了“南方粮食走廊计划”，旨在把这些荒废的土地开发出来。该计划覆盖的正好就是坦赞铁路途径的地区，有成的铁路，运输能力咋还不行呢？

原因有二，一是铁路的运营能力太差，二是配套的港口跟不上。

坦赞铁路目前每个礼拜只能开行两三趟车，开起来也是晃晃悠悠、速度慢得很。

我去坦赞铁路的终点站看过，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用料特别实在，质量特别好。站台上的砖用了四十多年没怎么换过，看上去跟咱们人行道上用了两三年的砖差不多。

但是，坦桑尼亚人和赞比亚人对于铁路的管理、调度和养护能力都不到位，导致铁路运营成准植物人状态。

从经济角度来说，这铁路肯定破产了，但两国政府每当看到铁路公

司要撑不下去了，就拨点钱，让它剩口气儿，继续撑着。因为两国都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人会回来的。

果然，2014年下半年，中坦两国政府首脑会见，中国承诺要激活坦赞铁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展开。但中国人只要想做，激活坦赞铁路很容易，现在中国运营铁路的事情太在行了。

还有个麻烦，就算中国人把运营能力恢复了，这条铁路也还是不容易活下去。因为坦赞铁路沿线除了终点站之外没啥城市，没法以客运为主，客源太少，只能是以货运为主。

货运的话，就需要有配套的港口，否则铁路就和断头路差不多。现在的港口是李嘉诚在1995年前后修建的，就是把多年前的老港口扩了扩。但它是建在河口里，这里的海岸结构，也只能建个河港了。

河港意味着它的扩展性相对有限，如果货运吞吐量的需求上来了，就很麻烦。港口扩容的话，如果港口的堆栈扩大一倍，对配套交通系统的压力就上升不止一倍。

这港口就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几乎市中心的位置。达市现在堵车已经一塌糊涂了，绝不比北京差。如果河港扩容，意味着城市交通将彻底瘫痪，那就得迁都。这事儿完全不靠谱，还不如在别处再建个港口。

果然，2013年上半年，中国和坦桑签订条约，要在达市北面大概六十多公里有个叫Bagamoyo的地方修建一个新的海港。这个海港的规划吞吐量约等于现在非洲东部海岸所有其他港口的总和。

重要的是，从坦赞铁路修一条几十公里的支线，就能和Bagamoyo港口连起来。你肯定已经听明白了，这个港口，将使得坦赞铁路真的有可能被激活。



坦赞铁路示意图

修港口、复活铁路，这两个项目都还在路上，离见成效还有段时间。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已经可以推想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可能性出来了。

首先，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得坦桑政府的“南方粮食走廊计划”能够真正发展起来，闲置的土地能够被有效耕种。

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好的玉米产地，玉米是做饲料最重要的原料。反观中国这边，这些年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吃肉越来越多了，那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饲料用地。

中国耕地有18亿亩的红线，看2016年的数据，其中大约5.5亿亩是种玉米的，这里面相当部分是做饲料用。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些饲料用地转到坦桑尼亚去，这并不会影响到中国人的粮食安全，最多影响饲料的安全，可是中国这边就有可能

腾出来几亿亩的土地。几亿亩能转化成多么巨大的经济资源。

中国很多现在解不开的经济困境，一下子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我们前面反复说过，中国问题必须在世界格局下才能找到出路，这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

再说坦桑尼亚这边，有双循环结构做经济前提，中国市场的巨大吸纳力，可以让坦桑尼亚的玉米之类的农产品产多少就能销多少。

一种市场化导向的农业经济就能发展起来，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非常好的财富分享效应。老百姓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对于日用品的消费能力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的制成品将获得更大规模的市场，一种良性循环就发展起来了。

当然，不是说修了港口和铁路，市场化导向的农业就能发展起来。

这两大设施只相当于大动脉，真正健康的循环，光有大动脉肯定不行，还需要有大量的毛细血管，需要大量的乡村土路、农村水利电力、乡村卫生防疫部门、农业供销社等等，一系列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可能也得个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做这种工程项目，中国称第二，世界上没人敢称第一，于是这里又有了大量工程建设能力输出的机会。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就已经可以为当地非洲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财富分享的过程就可以展开了。

以前中国在非洲也有很多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和援建了不少工厂，但这些建设都有个问题，就是没法拉动当地的产业演化。

产业不能演化，意味着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只能是那个厂的工作岗位，拉动不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无法带来投资的乘数效应。

为什么过去的建设没法拉动产业演化呢？因为当时没有意识到，非洲在国际贸易上的比较优势根本就不可能是工业。我们投资的工业园，在里面建立工厂，以及为工厂服务的基础设施，就都是孤立的存在，没

法发展为一个产业网络，这种援助和投资的效率就不高。

具体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才能适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才能拉动产业演化，更具财富的分享效应呢？这需要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才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远远不够。

我在非洲考察时见过世界银行以及很多NGO组织在当地的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恰好可以弥补中国的短板。

于是，前几讲里我曾经提到过的，中国与西方在非洲的合作，就有了空间。

中国完全可以和世界银行或者相关的NGO组织进行合作，联合设计，然后由我们来执行和施工，在当地建设起基础设施，从而拉动产业演化，催生财富分享效应。这样一来，这几年西方一直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西的这种合作，也可以对这些指责构成有力的反击。

非洲不发展第二产业，是否就没机会现代化了呢？肯定不是。

一方面，由于双循环结构的现实，非洲想发展第二产业也没机会。另一方面，有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没有多少第二产业，主要就是靠卖羊毛、买牛肉、卖铁矿，就获得了大量财富，然后绕过第二产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照样是发达国家。

非洲也有同样的案例，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也是类似的发展模式，发展得非常好。对于非洲来说，完全有可能发展出发达的第一产业，然后直接跨入有本土特色的第三产业，照样能获得现代化。

具体到坦桑的案例，市场化导向的农业发展起来，会拉动出大量专门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这就是有本土特色的第三产业，这种发展的财富分享效应就非常好。

当然，坦桑更有特色的本土服务业是旅游业。比如在《动物世界》里经常能看到的东非动物大迁徙，主要就是发生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

大草原。我去看过几次，野性的动物和纯粹的自然所能带给人的震撼，草原深处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奢华至极的酒店所带来的体验，真是超出了语言描述的范围，不到现场完全感受不到。这种独一无二的第三产业，将与发达的第一产业共同促成当地的另一种样式的现代化。

本讲小结

这讲的内容比较细碎，咱们简单如下总结一下：

双循环结构当中，由于中国经济独特的拉动效应，使得第二循环里面的国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发展机会，中国与西方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着深度合作的空间。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还能反过来使得中国国内很多不容易化解的困境，获得新的解决空间。

这几讲分别讲了双循环结构当中的第一、第二循环，但是还有一些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是超越两个循环的，比如气候变暖、碳减排问题等等。中国在这里也有着非常有意思的政治和经济战略展开的可能性，咱们下一讲就来讲下这个话题。

49|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怎么赢

碳排放问题对所有国家都有普遍影响。欧洲作为减排的主要推动者，

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气候谈判，但始终没有实质性成果。原因在于谈判的议程设置和谈判各方的实力结构并不匹配。真正具备碳实力的只有中美两国，而中国替全世界生产，也就替全世界排放，进而能替全世界减排。

我们在前面几讲讨论了在双循环结构下，中国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但国际政治和经济中有些事情，是超出双循环结构循的，比如全球变暖问题。

理论上来说，这个问题对所有国家都有同样的影响，中国、美国和坦桑尼亚，谁都没法置身事外。

现在，一般认为是人类过度排放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导致了全球变暖，所以国际上对于碳减排的事情吵得很厉害，咱们就简称为碳问题吧。

这讲就以碳问题作为案例，看看中国的超大规模特征，让中国在这里有着什么样的机会和责任。

碳问题的由来

咱们先得说说碳问题的由来。

1990年，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评估报告，确认了

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这之后，各国不断谈判，达成了几个且无关于碳减排的国际公约。

1998年的《京都议定书》进一步确定了一个原则，叫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是说，所有人都得面临碳排放导致的后果，所以各国就都有减排的责任。

工业是排碳最多的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工业革命有两百年了，发展中国家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发展工业，二氧化碳一半多都是发达国家排放的。现在要所有人统一减排，这不合理。

所以，发达国家要马上开始减排，发展中国家不着急，晚一点再开始减排。发达国家还有义务出钱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2009年，各国在丹麦哥本哈根又开了个大会，打算讨论个新的协定出来，进一步明确各个国家的责任，并取代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然而哥本哈根会议开得一地鸡毛，唯一的成果就是确定了下次在哪开会继续讨论。后面的几次会议，每次的成果也都是确定下一次的会址。到现在，什么可行的新协议都没达成。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方面，学界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各国在这方面的利益诉求差异太大，没法达成共识。

先说学界的争论。有人提出，人类的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他们的理由是，要讨论气候问题，就不能光看最近这几十年的气候变化，得看长线。一旦看长线，就会发现地球上是有气候变化周期的，冰河时期和温暖时期是交替到来的。

一万多年前还是冰河时代，猛犸象还在到处跑，然后气候就变暖

了，猛犸象就灭亡了。你能说这是山顶洞人烧柴闹的吗？

再往远了看，恐龙时代比现在还热呢，该找谁算账去？大的气候周期跟天文学上的一系列变化有关，现在正处在温暖周期的上坡道。人类排碳就算有点影响，但根本不是气温上升的主要因素。

这个反驳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主流学界并不认，认为提出这说法的人是有利益关联的。

是什么人在主张这种说法呢？主要是俄罗斯科学家，这确实有些嫌疑。因为俄罗斯的财政高度依赖于能源出口，如果大家都减排，石油使用减少了，能源就不好卖了。而且俄罗斯冰天雪地的气候也

不大在乎全球变暖，变暖点也许还更好。

不过利益关联这种指责是没法验证的，这种讨论一旦开始追究动机的话，就没法聊下去了。

谁能保证欧美的学界就没有利益关联呢？尤其是欧洲国家，极力主张减排，而欧洲的减排技术非常发达。难道不是因为欧洲人想要卖减排技术吗？并且欧美也有学者赞同气候周期的说法，俄罗斯也有支持减排的学者，他们又都是拿了谁的钱呢？

学术问题必须就学术论学术，只看对方的证据是否扎实，逻辑是否自洽。如果从阴谋论出发，任何认真的讨论都没法进行了。

我说了这么一通，只是想说，目前学界并未对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这一说法达成共识，只不过主流学界是认可这一说法的。但是非主流学界的存在，就能让各国在政治谈判的时候，有自己的理论基础。

各国在谈判时候的主张确实是有利益相关的。[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不一样，必须考察利益相关性](#)。因为任何可行的制度安排，都离不开对于利益的平衡。只从理想状态出发，跟利益不搭边的话，就没人有兴趣支持这种制度，它就肯定运行不下去。

既然政治问题都是利益相关的，那么各国的主张都是啥样的呢？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

一种是能源出口国家，它们多半都主张，碳问题就是个耸人听闻的伪命题。

一种是欧洲、日本这种国家，它们是气候谈判的主要推动者。因为它们已经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减排技术又非常发达，大力主张减排。

一种是小岛国，它们眼看着海平面上升，自己的国土越来越小，急得不得了，强烈要求减排。马尔代夫还曾经搞过行为艺术，全体内阁跑到水底下开了次会，证明本国就快淹完了，外部世界不能见死不救。

一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很多非洲国家。它们觉得自己没啥工业，反正碳排放的配额也用不完，所以对减排没意见，甚至还能从通过减排而获得出售配额的好处。一种是中国、印度等这种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它们想要证明自己愿意承担国际责任，所以同意减排。

但是认为欧美国家排了两百多年了，现在突然非要让我们减排，一方面觉得很不公平，另一方面觉得你们这就是想要压制我们的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些国家虽然承认共同的责任，但更强调有区别的一面，让西方多承担责任。

还有一种就是美国，美国在2006年之前是世界头号排放大国，之后被中国超过，但是人均排放量仍远远高于中国，所以美国对减排这事并不积极。

因为这将影响到美国人习惯的大手大脚的生活方式，以至于美国政府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国会并未批准，后来美国干脆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各有打算，又都能找到理论支持，同时各国之间要博弈的问题很多，减排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必须与其他问题多

多相平衡。这种情况下，气候谈判得不出结论是正常的，能得出结论反倒不正常了。

如何建立新的碳排放秩序

主流学界的主张，也就是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看上去还是有更扎实的证据，所以国际主流也认为，人类确实需要一种关于碳排放的秩序安排。

但气候谈判一无所得，那么这个秩序怎样才能建立起来？

这就涉及到政治学上的一个基本逻辑了。一个能有效运行的秩序安排，一定是和实力结构相匹配的。

实力结构最根本的是伤害别人的能力，只有“我有能力伤害你，我却选择不伤害你”，才能有效谈判。如果你没能力伤害别人，那就不能指望别人愿意跟你谈。

换句话说，彼此都有能力互相伤害的人，就都会意识到靠暴力没法实现诉求。谈判才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会坐下谈出个秩序来，这样谈出来的秩序才是能有效运转的。因为各方都知道，对方是能伤害自己的，违约的成本会远远大于收益，于是大家就愿意守约。

说完这个基本逻辑，再切换回碳问题上。我们可以知道，气候谈判要想谈出成果，除非是有碳实力的国家愿意主动谈判、主动合作，否则什么也搞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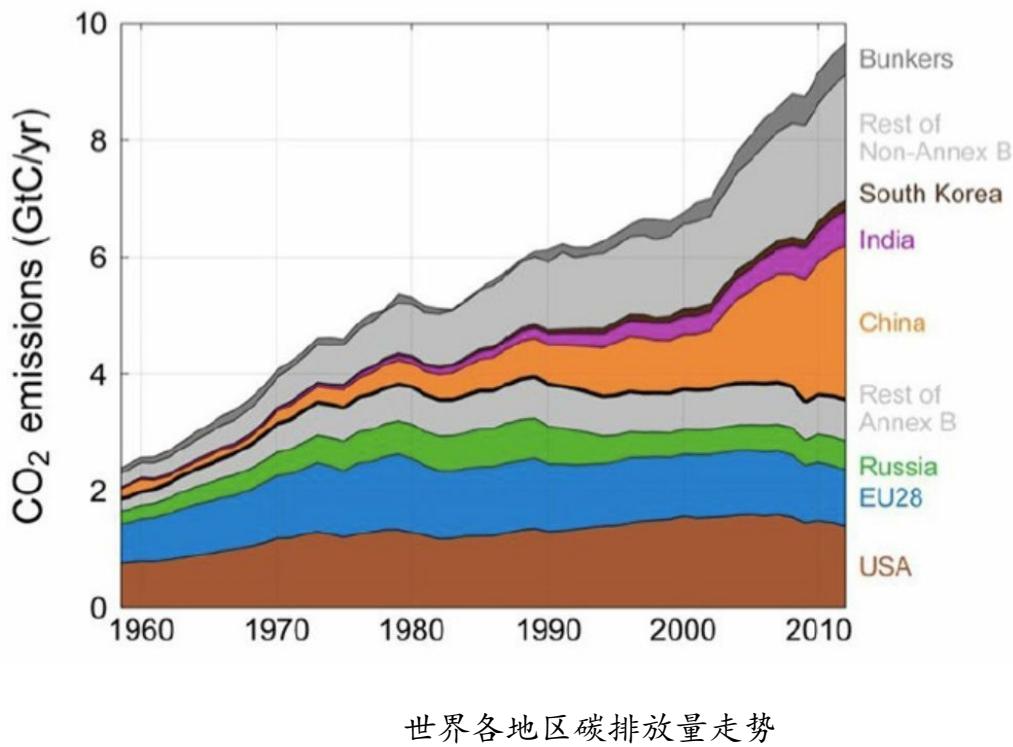
实力的基础包含两条：一，我有能力伤害你；二，我却选择不伤害你。于是谈判的空间才打开。

所以碳实力的核心要素就是：第一，我必须得特别能排，这就是伤害别人的能力；第二，我又必须有能力减排，这就是选择不伤害别

人。!不这两个要素哪怕欠缺一条，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碳实力。光能排不能减，人家跟你谈也没用；光能减不能排，人家凭什么要坐下来跟你谈。

那么世界上究竟谁有碳实力呢？

中国碳排放占全球的比例，在2000年之后迅速上升。因为2000年之后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开始了，中国迅速工业化，当然中国的排放量就会迅猛上升了。



世界各地区碳排放量走势

根据2013年的数据，各国的当年排放量，中国占全球的29%，美国占15%，欧盟占10%印度占7.1%，其他国家都是在5%以下。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已经超过欧洲，但还不到美国人均排放量的40%。

根据进一步的测算，中国到2016年已经成为历史上累计碳排量最高的国家。不过近年来中国的年度排放量已经开始下降，也量就是减排开始见效了。而印度的年度排放量却在上升，上升的量比中国减排的量还大。

一个大致的碳实力结构关系已经可以勾勒出来了。

中国和美国都有强大的碳实力，特别能排，技术水准到位，所以也都很能减。

欧洲就不行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人均排放量很低，所以是能减不能排。印度正好反过来，工业化还将持续很长时间，是能排不能减。至于其他国家，排放量太小，能排还是能减都不重要了。

所以真正拥有完整碳实力的就只有中美两国。如果中美两国不配合，气候谈判多少轮都没用。虽然欧洲在气候问题上占着道德高地，但没多大用处。碳问题要想真正获得解决，必须是中美两国有主动的动作。

中美两国对现在的气候谈判不愿配合，原因是什么呢？

对美国来说，主要是美国人不愿放弃自己大手大脚的生活方式。如果承诺减排，民间会有较大反对声音，国会那关就不大容易过得去。

对中国来说，有更复杂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得很晚，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里，中国更重视自己获得区别对待，欧洲则更强调中国的共同责任。因为中国现在太能排了，这问题上双方就谈不拢。

往更深层去挖的话，会发现双循环结构又回来了。

双循环结构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几乎是在为全世界生产，

当然也就是为全世界在排放。西方国家的生产都转移到中国了，当然排放就少了，回过头来再指责中国太能排，这事就不对了。

制造业大规模外包也使得生产已经完全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运行了。但是气候谈判中争吵最激烈的内容之一就是碳排放的配额，每个国家每年可以免费排放的数量，却是以国家为单位来分配。超出配额的部分就得向其他配额用不完的国家来购买。

生产和排放并不以国家为单位，但是配额却以国家为单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这个角度上可以说，中国并不是不愿参与气候谈判，中国近年来做的减排工作也颇有成效。主要是现有的议程设定对中国来说很成问题。

中国有足够的碳实力，甚至是最强的碳实力，也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可以发起一种新的谈判议程，让其更有创造性并且更能体现中国的国际责任。中国的立足点应该是什么呢？肯定得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就是我是最能排的。那么为什么我能排呢？因为我在替全世界生产，从而是替全世界在排放。反过来看，我减排，就相当于是在替全世界在减排。这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所在，中国也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超大规模效应，意味着减排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也是有规模效应的，技术应用的效率会远远大于制造业分散在各国，以至于减排技术也只能分散应用的情况。人类的减排大业，将因为中国的减排，而获得更大的成效，这就是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担当。

可以再往前推想一下谈判过程。

比如欧洲人会说碳减排不仅仅是经济事务，同时还是有道德责任的。中国正在做这个事情，而且比谁做得都好，这对全人类都很重要。

欧洲的减排技术，是不是得便宜点卖给我们啊？欧洲人肯定不愿意。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你们的技术好，所以它对人类来说更加重要，而我们的减排对于全人类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你们应该更便宜地卖给我们，这是为人类负责任的表现。

从这个演绎里，可以看到网上常见的另一个玩笑的解读。经常有人调侃说，“在国际上，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

实际上，光是流氓，只能放一半心，只有它能流氓却不流氓，转而以实力为基础与人谈判的时候，才真能放心。因为这样才会导向新的秩序建设，并真地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落实中国的国际责任。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碳问题是超越了双循环结构的，对所有国家都有普遍影响的事情。

欧洲作为主要推动者，在国际上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气候谈判，但始终没有实质性成果。原因在于，谈判的议程设置和谈判各方的实力结构，并不匹配。

碳实力包含两个要素，首先必须能排，其次必须能减，两个要素都具备的只有中美两国。

中国替全世界生产，也就替全世界排放，进而能替全世界减排。以此为基础，气候谈判会展开大为不同的议程，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所在。

经过这么几十讲，我们把「中国历史」这个话题，从商周之变一直讲述到当下，甚至对未来还有某种构想。从这里能看到一个连贯的线索，就是我们始终要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中国是谁，它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

下一讲将是最后一讲，会把所有这些讲的内容做个总结，对那个贯穿始终的问题，梳理出一个简洁而清晰的答案。

50|完结篇：中国，世界枢纽

中国因加入了世界秩序而获得崛起。由于超大规模性，中国的崛起将会深刻地改变、乃至重新定义世界秩序，而新的世界秩序也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中国。究竟中国是谁，世界是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互动过程中，持久地生成着、演化着。

这一讲，就是大结局了。

前面的四十多讲，我带你一起还原了中国历史的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时间，中国历史发生过四次重要的转型。从商周之变，经过周秦之变、唐宋之变，最终走到了从清末开始的古今之变。

另外一个维度是空间，中国历史一直是一个多元体系，包含了中原、草原、海洋，还有西域和高原。这几个空间在历史上互相依赖、上互相塑造，加在一起才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

到了近代，这种空间进入更宏大的格局，中国开始和世界发生深刻的相互塑造过程。

到了最后一讲，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回答一个终极问题了。那就是——究竟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因为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国的内涵在不断地演化和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加入了世界秩序中，中国内涵的演化速度大大加快了。

今天，你去问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都是不大一样的。

究竟什么是“中国”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呢？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来讲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几年前，我在欧洲旅游，坐火车时偶遇一位十几年前偷渡到意大利的中国人。他发展得还不错，在意大利已经有了自己的小服装厂。我本想打趣他一下，就问：“你有自己的品牌吗？”结果他的答案让我大吃一惊。

这位浙江兄弟告诉我，他根本不用有品牌。因为他的小工厂只负责做剪裁，布料有别的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公司向他提供，等他剪裁完了再由当地别的中国小工厂收走，专门负责缝制。最后还有当地其他的中国人公司来完成面向全欧洲的分销。

各个环节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环节都是由在欧洲的中国人完成的。

这些中国人所做的都是中低端的服装，意大利人在这个层次上完全没法与他们竞争。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这群中国人是把中国国内的供应链移植到了欧洲，能够同时确保效率与弹性。整个生产流程跟意大利人讲究传统手工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这些中国人生产的衣服都标成 **Made in Italy**，这也没有骗人，

确实在意大利生产的，但一般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背后具体的生产过程。欧洲的中低端服装业，就以这种匿名的方式被中国人垄断了。

这些中国人的经济活动会计入意大利的GDP，但他们的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会通过各种途径回到中国。

那次回国之后，我碰巧看到了一部纪录片，是日本NHK电视台在2011年制作的，片名叫做《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在时尚之都经商的华

人》。

讲的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老牌纺织工业城市Prato，刚好就是我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个中国人所在的城市。片中讲到，2000年之后，Prato的中国人开始激增，到2010年前后已经达到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

就是这些中国人，完成了我前面说的服装生产和销售工作。他们的产品，你不能说不是意大利货，但和通常所理解的意大利货又不大一样。纪录片里管这个现象叫做“欧盟关税区下面的中国”。

我在非洲、东南亚也都见到了非常类似的情况。[中国人以这样一种低调的方式实现了向全世界的经济扩张，这种扩张不再简单地向世界各国出口了，而是嵌入到了各国的经济内部](#)。这种情况肯定会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因为很多就业机会都被中国人用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方式抢走了。

于是问题来了，对于这些海外的中国人，他们的利益，中国要不要保护呢？其中很多人的身份很暧昧，做的事又离中国太远，他们的利益和中国利益的关系似乎有些含糊。

但看微观的经济过程，会发现，这些海外中国人，跟国内的亲人通常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挣的钱可能相当大部分都回到了国内，拉动了家乡消费，拉动了中国GDP。那么，他们的各种活动究竟该被理解为中国的经济还是外国的经济？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边界。有紧跟着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些都是中国应该保护的利益，那么又该怎么保护呢？由于各种活动的边界不清晰，也就没法“虽远必诛”了。因为不管你“诛”谁，都有可能会伤到自己人。

转过头再来看看欧洲当地人的不满，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毕竟他们的工作机会被一群中国人抢走很多，于是当地人抗议、游行。当地中国人做出的一些应对，则是意味深长的。

NHK那个纪录片里，就有一位在Prato颇有成就的华人，他为了缓

和当地意大利人与华人的矛盾，转过头来帮助意大利商人寻找中国的渠道。将Prato的一些虽然高端，但在中国还不知名的品牌引入中国，这种努力很有意义。

当地的意大利人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就是因为他们在低端产品上竞争不过中国人。在高端产品上他们有优势，却没渠道，没法打开更大的市场。当地的中国人，刚好能帮助他们进入到中国这个广大市场。

于是，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占领了意大利的低端市场。然后他们再来牵线，帮助意大利人获得在中国的高端市场。这样的分工格局，各自发挥优势，商品的流动性更强，也意味着国界在经济层面上进一步消除了。

从这个案例你能看到，中国跟世界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国家的意义已经发生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重新理解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世界。只有重新理解这些问题，才能避免各种不必要的麻烦。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简单地回答，那就是——[世界枢纽](#)。

在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总体秩序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枢纽，把海洋与大陆这两种秩序联系起来。

中国在宏观和微观的各种层面上，都表现着这种枢纽性质。前面说的那些海外中国人和当地经济、中国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是这种枢纽位置的微观案例。前面几讲说过的双循环结构，则是宏观呈现。

为什么中国是枢纽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枢纽，离不开中国的两大特征：一个是它的多元成分，另一个是它的超大规模性。

这种多元的超大规模性，并不是在今天，或者近代以后才突然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说到这，你大概也就明白了，我们这门课为什么要从几千年前的中国历史开始讲起。

在古代历史中，中国就是个多元体系，这个体系包含着草原、中原、海洋、绿洲、高原等多种区域。其中任何一个区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在这些区域之间，会通过各种战争的方式或和平的方式，进行长期的互动。

各个区域相互塑造，深刻地嵌入到彼此的历史当中，每一个区域在这个过程中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也因此都获得了独特的历史记忆。这些独特的记忆又都没法独立存在，因为各个区域都无法独立存在，所以各种记忆又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共享历史记忆。

我们讨论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呈现，就是在叙述所有这些区域共享的历史记忆。

当中国历史走到清末，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多元体系，开始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古老帝国开始了现代化转型。在现代化进程里，中国人历尽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苦难和牺牲，但也收获了一种宏大的普世主义视野，并在21世纪成为世界经济秩序当中绕不开的枢纽。

在时间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超大规模的多元体系，中国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今天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枢纽，也是得益于中国的多元性。

中国内部有海洋，有大陆，还有海陆中介，这三大部分。

中国的海洋区域就是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有着庞大的资本和世界级的制造业能力。

中国的大陆区域就是西部地区，这里自然环境艰难，秩序脆弱，宗教气氛浓厚，像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等都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的中介区域就是庞大的中原地区，这里有庞大的人口资源和市

场资源，可以作为连接性力量。

这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东部海洋地区生产出来巨大的财富，中原拥有庞大人口与市场，可以作为中介，把东部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向西部大陆地区投放的秩序。

中国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又各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作为向外的接口。

这两个接口分别是香港和新疆，作为纽带，它们让中国更紧密地跟世界的海洋区域和大陆区域相联系。

香港是中国境内唯一施行普通法（又称英美习惯法）的地区，与普通法体系相对的就是大陆法体系，欧洲的大陆国家、中国等等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

普通法和大陆法对经济的影响很不一样，普通法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要好过大陆法。我们以金融市场为例，在普通法地区，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间接融资市场，大陆法地区正好反过来。

直接融资市场就是股市、债市、期货市场等等，中小投资者个人直接买卖股票、债券、期货，进行投资理财。间接融资市场就是银行，中小投资者把钱存在银行，或者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再代替中小投资者个人来进行投资理财。正是由于这个差别，英国、美国这些普通法地区的中小投资者，就更愿意自己去冒险。而大陆法地区的中小投资者，则更愿意抱大腿，通过银行来理财，因为银行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更强。

我们能看到，世界上最重要的股市，都在普通法地区，比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最重要的期货市场也在普通法地区。所以，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市场深度更大，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

不同国家的商人之间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如果各自的法律规定有冲突，双方也经常约定采用普通法，来保障合同的执行。几乎可以

说，普通法体系就是规范整个海洋世界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逻辑。

因此，香港就具有一种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中国这个大陆法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个海洋世界分享着同样的普通法秩序。

中国通过香港，就有了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连接的接口。中国可以通过香港，来影响国际资本市场，反过来也可以通过香港，从国反来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

再来看看新疆，新疆同样具有二元特征。它一方面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一方面又与欧亚世界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也就是中国以西、欧洲以东的世界，包括中亚和一部分中东地区。

站在中原看新疆的时候，会觉得那是中国西部的尽头。但是，一旦你转换视角就会发现，新疆实际上是中国继续向欧亚世界投射影响力起点，也是欧亚世界的影响力进入中国的起点。

视角的变化直接影响你对世界的理解。

大航海时代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郊外有个海角，叫做罗卡角。在古代历史上，欧洲人认为那是大陆的尽头，再向远走是海神波塞冬的阴暗世界，没有人去了那里还能活着回来。但是到了大航海时代，罗卡角一下子成为人们去往大海的起点，成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这前后 180° 的大转变，并不是罗卡角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人们看待罗卡角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以及人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所以罗卡角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句话“大陆到此终止，大海由此开始”。

对于新疆，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东亚到此终止，欧亚由此开始”。

新疆是联系中国与欧亚世界的关键纽带，也正是因为新疆的存在，

中国获得了与大陆世界无缝连接的接口，才能真正成就自己作为海陆枢纽的地位。

有了这种视角转换，我们也会意识到，中国在大陆区域的历史方向，并不是要发展出跟东南沿海一样发达的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而且这也也不可能做到，还会对大陆区域的生态造成灾难性后果。

中国大陆区域的历史方向是，类似于西藏、新疆这样自然资源匮乏、精神资源丰富的地区，应该对自然资源丰富、精神资源匮乏的中国海洋区域起到平衡作用。让正在高速现代化，经常遭遇精神与物质失衡的中国，实现再均衡。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成为了世界的枢纽。但中国的现代转型还没有结束，未来仍然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赋予了我们新的责任，所以我们要通过对历史的回望，真正理解这部漫长而又宏大的历史，去发现中国这个庞大体系的精神内涵，而不是念念不忘过去的悲情。

如果我们理解不了中国的内涵，我们也永远没法恰当地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将浪费这百年来的苦难。一个国家能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浪费，就是对于自身苦难的浪费。

中国近年来的崛起，又间接导致了世界原有秩序的失衡。

世界的再均衡，需要中国的积极主动的作为，这就需要中国进一步打开自己的视野，从全球性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世界责任。可以回想一下那个偷渡客的小故事，对外打开视野，与对内转换视角，是同一个过程；所以，世界的再均衡与中国的再均衡，也是同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总结为一段话：

中国因为加入了世界秩序而获得崛起。由于超大规模性，中国的崛起将会深刻地改变，乃至重新定义世界秩序，而新的世界秩序也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中国。究竟中国是谁？

世界是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互动过程中，持久地生成着、演化着。

中国作为世界枢纽，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要素，只有在一个宏大的格局当中，才真正地能够实现自身。

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传承，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也只有让自己的视野和精神格局，上升到世界的高度，才配得上它的精神内涵。所谓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切尽在这里。

到这里，这门《中国史纲》也将结束。感谢你的陪伴，希望你有所收获，期待着我们能在未来的课程中再见！

精选留言

Haory's World

香港和新疆的地位，被老师一下点明！这不正是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嘛！一国两制，简直就是中国发明的海洋和大陆之间平衡之道！而边疆的民族自制制度，也是对待多民族多宗教的平衡之道！

齐齐

施展老师，您的课真的让我脑洞大开，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大规模是中国经济的特征，那么作为同样人口规模的印度，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期望能得到您的回答，谢谢！

作者回复

1、从市场吸纳能力来说，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力口上溢出到东南亚）的制造业能力已经穷尽了世界市场的消费能力，世界市场无法容纳两个这么大的国家，所以印度不会有形成制造业上的崛起。2、从制造业发展的前提来说，还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超级供应链网络是制造业发展的前提，超级供应链又依赖于超级基础设施，这方面印度也没有机会。印度目前发展得好的，都是对供应链需求很低的如制药业、软件业、服务外包业。3、从国民发展欲望角度来说，印度人的信仰使得他们的内心比较恬淡，发展欲望上不如中国人。4、从国民的精神世界来说，印度的种姓制带

来一个效应，就是他们同时拥有世界顶级精英，也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穷人口。印度的顶级精英，在融入世界这方面的水准比中国高不少，今天硅谷很多大公司的管理者都是印度人或者印度裔，很多国际机构的高级雇员也是印度人甚至巴基斯坦人，比中国人要多不少；但是印度的一般国民却并不能跟上这种步伐。但作为一个国家来讨论，必须看到它的整体性，结果就是，作为整体性的国家，毕竟印度的规模在那里，是个必须重视的国家，但要说有可能超越中国的地方（近年热炒的龙象之争），主要是在个体层面或者小的精英群体层面，在整体层面上，印度没多大机会。



附
录

必读|为你呈上《中国史纲50讲》学习手册

1月1日-7日，施展老师会驻场一周，每天挑选几个最有价值、最有意思的问题，和你展开聊聊。同时，在你正式开始学习这个课程前，为你呈上这份课程使用手册，希望对你提升学习效率和效果有所帮助。

你好，欢迎来到《中国史纲》50讲。

我想你现在应该已经通览了这门课，对50讲的内容心里有了数。这门课，虽然叫《中国史纲50讲》，但其实，我要回答的终极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有没有前途？

所以，我会带着你3000年前的中国历史开始，去解答这个终极问题。

按照我对历史的理解，我认为历史不仅仅是时间维度的变化，还有空间维度上的变化。所以，在我的这50讲内容里，除了在时间线索，我会给你展现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大的变化；在空间线索上，在中原之外，我还会带你看到草原、海洋、高原和西域这五大空间上的变化，以及五大空间相互塑造的关系。

为了让你更好地发现这种线索，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个知识结构图。你可以在这个知识结构图里，对这门课50讲的内容有一个更直观的把握，感受到时间和空间这两条线索在共同发挥作用。

这50讲内容现在已经全部交付给你了。除了让你听完这些内容，我更期待的是，你能在听完每一讲内容后，写下你的想法，或者是留下你 的问题。你的反馈，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奖赏。

为了陪伴你接下来50讲的学习，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活动。我会在这门课程内驻场一周，每天挑选一到两个我认为最有价值、最有

意义的问题来跟你聊聊。所以，除了学习这门课，也别忘了关注后面我每天跟你聊的问题。期待你来和我共同打造这门课！

攻略1：写下你的观点，与施展交流

点击每篇文稿下方的「写留言」，留下你希望施展回答的问题或者你的看法和洞察；有趣的问题会实时收到施展的回复，其中特别有价值的问题，施展会在1月1日至1月7日的「驻场问答」中做系统的回答；

用户的留言是精选的内容，有每日内容的总结、有独特的见解、有真实的经历、有和施展的交锋；如果你觉得留言精彩，可以点击右上方按钮「点赞」。

多反馈和互动，让课程为你提供帮助，真正发挥课程在你学习和成长中的价值。

攻略2：使用倍速听，让学习效率更高

如果你想在更短的时间内听到知识密度更高的内容，你可以打开「音频播放器」-点击「更多」-「倍速播放」选择你想要的倍速。我们为你提供0.7倍语速、1.25倍语速、1.5倍语速、2.0倍语速、3.0倍语速，你可以根据你的信息接收需要，用更少的时间听到更多的内容，节省学习时间。

攻略3：内容就是社交，帮朋友解决问题

看到干货文字，长按文稿，以卡片形式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当然，

如果你希望更多人也能了解大师课内容，点击文稿右下角的「分享」，直接把课程安利给朋友。《中国史纲50讲》是高效的社交工具，对历史的深度解读，你可以随时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同事、伙伴，在分享中学习和交流，你会有更大的进步。

攻略4：参照知识结构图，发现课程内在逻辑

知识结构图左侧栏代表时间线，顶部横栏代表空间坐标，分别为：海洋、中原、草原、西域和高原。利用这张图，你可以找到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的相互作用关系。

1. 结构图的表格中，所有括号内的数字，皆对应于目录中的课程序号；
2. 各讲之间有交叉联系、相互贯通，同一讲的序号会出现在不止一个单元格中；
3. 单元格的形状变形，代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性。

———— 精选留言 ————

梁超杰

太惊喜啦！一下子放出来完了，终于不用每天等晚八点了！谢谢！

激萌帅狗

在我看来什么电视剧电影都不如施展老师的课程精彩。谢谢施展老师。

作者回复

谢谢你，看到大家这样的兴趣，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新

在刚开始听第一讲时，我就在想，怎么能把四个时间变化和五大空间变化做成图表，看时，一目了然，方便理解，没想到施老师这样就放送了！这个课比我所学的历史内容更广阔，站的起点更高，从新的角度重新解说中国历史，思维逻辑独树一帜，耳目一新。期待后面的课程更精彩。

朱珍

突然看到一下子全更新完了，说不上来什么感觉，有开心，自己什么时候想听都可以一下子听完，这样可能更过瘾，但一想着就这样结束更新了，以后的留言区得到的小伙伴还会每天回复吗，同学们学的都是按照自己的安排，那老师怎么看同学们的留言，好乱的感觉。

作者回复

你好，我会在1月1日到7号，连续驻场一周，专门回复留言，并且每天精选一条留言，用音频+图文的形式展开回答你们的问题。1月7号之后我也会持续关注、回复留言，并且不定期返场哦

et:

真是跨年的节奏，50讲全部放出，多谢施展老师，多谢得到了。

锋驰李：

全新的解读中国历史的角度，大开眼界，特别是那种结构图，最好能保存打印！

葱油饼：

居然一下都更完了 正好假期研读

楚门：

这是第一次在得道上付费学习，真心很赞！默默的问句施老师，这50讲和枢纽这本书是同一个知识体系吗？

作者回复

这50讲就是从《枢纽》那本书里提炼出来的。书里的内容更加体系化，适合深入阅读；50讲的内容更加凝练化，适合迅速把握全貌。

Andy:

老师，新年好！你的历史课，让我爱上了历史；所有的不感兴趣，都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老师。最后这张知识结构图，太棒了，果断收藏打印出来！

驻场答疑之一|地理对历史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理解政治、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甚至理解经济，都离不开对于资源约束条件的基础性分析。而你要分析这些基础性的约束条件，前提是首先理解地理和气候生态。

你好，今天是我驻场的第一天。

接下来的一周，我会每天都挑选一个我认为最有价值、有意思的问题，来跟你展开聊聊。希望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能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留下你自己的问题。我会第一时间关注你的每一个好问题。可以说，你提出的问题，就是这门课内容的一部分，期待你来和我一起打造这门课！

这门课是否是地理决定论？

今天我来回答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少我的用户在留言问我，这门课的解释框架是否是地理决定论。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地理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但它是一个约束性的要素。什么叫决定性要素？就是说只要有了这个条件，那么它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算是决定性的要素。什么叫约束性要素？就是说没有这个条件，某些后果就一定不会出现，这叫约束性要素。比如，我们在前面谈到过草原上不可能像中原一样，按照儒家的那种方式来生活，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前提是定居。

但是这只能说明草原上儒家的生活方式没法持续，不代表草原上只能是特定的某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所说的，它是约束要素，而不是决定要素。儒家的生活方式，在草原上没法持续，但草原上仍然可以有

多种多样的其他生活方式。所以这门课里的一些基本方法，是在讨论各种秩序的约束条件是什么，而不是在讨论一种地理决定论的说法。

地理和气候是最大的约束条件

但是说回来，地理问题从来都是讨论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一个基础。

比如，所谓政治是什么呢？政治就是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之下，要形成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大家都感觉舒服的一种秩序安排。那么要注意了，在给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之下，你不考虑资源约束，这肯定是不行的。而最大的资源约束来源于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来源于地理和气候。

所以我们讨论政治、讨论历史的时候，当然要讨论地理。脱离开对于地理的关注，那么我们对于政治、对于历史的讨论都是很空洞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典时代所有那些讨论政治问题的书籍、著作全都会讨论地理的。反倒是到了现代的讨论当中，我们往往忘了这点，只是从一些抽象的理念和观念出发，而忽视了这些理念和观念要想落实为现实的制度安排，一定得以特定的资源条件为前提。

而这些资源条件依赖于什么呢？当然是依赖于地理了。所以现代的讨论当中，把地理要素给屏蔽在对于政治和历史的讨论之外，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说到这我就想起一个例子，经济学理论有一个基本的说法，认为产

权的边界越清晰、越往个人或者家庭的方向收敛，那么交易的成本就越低，于是经济的效率就越高。比如内地的农业，1958年到1978年的人民公社，产权就不再是以个人或者是以家庭为单位了，而是变成了以整个人民公社的集体。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开始偷懒。所以它就导致农业生产的效率就比较低。

于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重新界定在以户为单位的小农名下。这回干多、干少，收益和损失直接跟个人相关了，于是就极大地刺激了经济效益，中国的农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

你听到人民公社这个例子，会觉得产权理论这个逻辑解释得很顺畅。但是我去伊犁考察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例。但在这要声明一下，以下是我去伊犁考察时基于与当地人的讨论，所获得的一些启发。未必十分准确，但是大的逻辑是没问题的。

伊犁有什么不一样呢？伊犁是地属新疆的北疆，那是哈萨克牧民的游牧地区。当地人给我讲，哈萨克的部落在他们的当地的语言里面叫做“阿吾勒”。对于游牧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草场。那么草场的单位是怎么划分呢？在1949年以前，草场的单位是以“阿吾勒”为单位来划分，也就是说草场不是划分在个人名下或者说家庭名下，而是划分在整个部落名下的。而到了人民公社改造的时候，就把这些哈萨克牧民的“阿吾勒”直接改成了人民公社，草场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这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对于哈萨克牧民来说，草场的划分单位事实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不过换了一个名，从“阿吾勒”换成了人民公社而已。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游牧地区，效率并没有因为这样一种制度变化而发生变化，效率不受影响。

游牧经济下的产权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开始把土地划分到小农的名下了，发现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于是就想，假如把这个政策也推广到游牧地区的话，是不是也能够促进这些地方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呢？

于是在哈萨克这些地方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把草场划分到了以户为单位的名下。一开始看上去确实是效率更高了，但是没有几年就出现了负面的效应，什么效应呢？草场开始严重退化，草场退化意味着生产效率开始受到严重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呢？原因就在于在草原上的羊不能只吃一种草，只吃一种草，它的营养不均衡，它必须得吃多种草。而在小面积的草场上，是没办法同时长多种草的，必须得是足够大面积的草场才能长多种草。那么足够大面积的草场，那是以什么为单位的草场呢？至少得是以“阿吾勒”为单位的草场。而如果你把草场的划分转化为以户为单位，就意味着每一户只能有比较小的草场。而这种小草场上所长的草的种类不全，对羊来说营养不够。营养不够怎么办？只能加餐让它多吃。多吃的结果就是草场退化，从而导致整体上来说生态的破坏以及生产效率的下降。

伊犁的考察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刺激，第一次让我开始反思产权理论。过去我们都认为，产权划分的边界越清晰，越往个人或者往家庭的方向来收敛，那么经济的效率就越高。

可是游牧经济给了我当头一棒，让我意识到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多少地狭隘。它让我重新反思到，产权单位的划分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首先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经济类型。

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它们的经济类型有着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最有效率的产权单位是不一样的。

地理条件的重要性

那么紧跟着要问了，为什么那个地方是游牧经济，这个地方是农耕经济，另一个地方又是工业经济。它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呢？答案是地理。

所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在讨论历史的时候，一定要讨论地理了。因为地理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使我们习以为常的大量概念、理论都可能会遭遇到它的适用性边界。超过适用性边界，这个理论本身是要被反思的，甚至是要作废的。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部分理论，都是在资源丰沛的地区，在能够发展农业和工业经济的地区发展起来的。那么这些理论就不会去考虑游牧地区、沙漠地区的人，他所需要的产权结构，他所需要的法律形式，以及他所需要的一系列要素。

但是我们要对历史、对政治有一个完整理解的话，就必须得能够看到这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也能够理解到理论的适用性边界，不能把理论无条件地、广泛地推广开去。

今日要点

现在你应该知道，地理对历史究竟有多大作用了。理解政治、理解社会、理解历史，甚至理解经济，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于资源约束条件的基础性分析。而你要分析这些基础性的约束条件，前提是理解地理和气候生态。

明天我会继续选择一个问题来跟你进行深刻的讨论，明天见！

精选留言

心飞未来

这个问题的解答很及时，对本人学习消化50讲前几讲的内容，特别对理解中原和草原两大地域政治、文化特点、相互关系、影响，以及相关之间的融合非常有帮助。确实，我们过去认识、讨论分析许

多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就是事论事多，一般推理多，挖掘内在联系少，尤其寻找自然地理、气候带给的影响少，以致于解释问题说服力不强。施展老师新年第一个驻场问题的解答很要有助于本人在今后几十讲学习中对课程的理解。订购您样的历史课学习太值了！我甚至在想，等施展老师这次中国历史课讲完之后，下半年能否在得到给我们再开“欧洲文明史”课，好期待。

砌书匠

在老师讲草场案例中出现问题时，我脑海中第一个反应推测居然是——公地悲剧，这是多么严重的思维边界啊，因为认知中根本就没有羊吃草也要营养均衡这个概念，而这就是中国国情的复杂性，那么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想要一刀切或者照搬哪些国家的现成制度，不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就是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人。

Rock-Rocke

很受启发。我想到，我们一般在解数学或物理问题时，通常都要先了解背景参数

(1) *boundary condition* (边界条件) 和 (2) *initial condition* (初始条件)，并且还要理解时间，空间的演化参数对背景参数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问题本身。而用在社会科学上的理论，似乎更受到地理和气候这些背景参数的影响，对于历史和政治这样的“方程式”也许我们无法获得精确的动态解，但我们能确实理解到边界的极限在哪里，以这样的基础来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尝试，如此一来，国家的发展才能比较踏实。

拾贝壳的87902822

学习到了：地理是历史的约束性条件。很多好的一些制度，是有它存在的条件。公地也并非全是悲剧。那施老师，那像云南，广西（这些也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集聚地为什么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较小？这些地区除了在宋朝之前还有机会出现统一的帝国，之后再无机会了？

崔小震

草场案例让我想起了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的观点；一个好的理论是自洽而完备的，应该能同时解释正反两种现象，理论是同一的，但随着局限条件的不同，因而呈现了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种现象，所以经济解释的核心是挖掘经济现象的局限条件（约束性条件），科斯的产权理论是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出类的，其基

本假设是普适性的“理性人假设”（约束条件下人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之所以在草场中出现了看似矛盾的情况，恰恰在于外部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

驻场答疑之二|历史是由英雄推动的吗？

英雄就像河水中的巨浪，汹涌澎湃，但是多一半都变成泡沫。只有少数运气好的才能掀起滔天大浪；而人民就像河床，看上去极其沉默、被动，但是却决定着巨浪到底能不能成事。

你好，欢迎收听中国史纲，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二天。有一个问题是这门课的用户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历史究竟由英雄推动，还是由人民推动？

这里首先涉及到对英雄的理解。我会把一个人能否成为英雄，给出四个判断要素。

一是历史大势；二是超级的勇气；三是非凡的直觉力；四是非凡的心理素质。

但即便有了这些，这个人多半还会失败，要想能够成功，还得加上非常重要的一点，运气。

历史大势

一个人即便是有成为英雄的素质，也必须要赶上历史大势，他的素质才能转化为翻江倒海的事业。所谓历史大势，就是大变革的时代。

咱们看历史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英雄都是扎堆来的。但这只不过是因为在大变革的时代，才给了他们风云际会的机会。平常的时代，没有那种机会，这些人的一生也就平淡地过去了。

比如，咱们就用俩人来举例子。元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有两个超级

枭雄，一个是朱元璋，一个是陈友谅。朱元璋能够成事，他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元朝政府，元朝那会儿已经非常风雨飘摇了。朱元璋最大的敌人就是陈友谅，这两位谁能在竞争中获胜，谁就有非常大的概率能够夺取天下。

但是，如果不是赶上元末天下大乱，那么陈友谅也就是当一辈子渔民，朱元璋也就当一辈子和尚了。刚好碰上天下大乱，这两位就能趁机而起。

超级的勇气

但是重要的是，即便在大变革的时代，具体的人究竟是否是英雄，当时也是看不出来的，都是事后的评价。

那么，在当时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能看到的就是，一些胆大妄为，不走寻常路的人，开始搞事。做事情需要想象力，需要胆略，绝大部分人是不具备的。

这些要搞事的人，绝大部分都失败了，于是就成了令后人嘲笑的妄人。只有极少数成功了，于是成了英雄。陈友谅和朱元璋毫无疑问都是足够胆大妄为的，但是陈友谅成了妄人，朱元璋就成了英雄。

但要还原到真实的历史中的话，也不一定是朱元璋比陈友谅更伟大，而只不过朱元璋运气更好。当年他们两人的鄱阳湖大战，朱元璋能够获胜是很靠运气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胆大妄为的人，搞事要想成功，却需要把大部分人能够动员起来，如果动员不起来，事情是肯定搞不成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元璋确实比陈友谅还是做得好一些。如果把他们要去动员的这大部分人称作人民的话，可以说，有胆略的人在发动着一些事情，但是人民决定着事情能不能搞得成。

要把大部分人动员起来，就需要能够抓住人们的普遍诉求。

普遍诉求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取决于社会的普遍观念，现实可用的物质条件，外部的国际环境等等这一切东西。

现实历史当中，没有谁能够真正地深刻把握住这一切，别看我们在课程里可以把这些分析得头头是道，那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还原到真实的历史情境当中，谁也没法完整把握住这一切的。

非凡的直觉

那么，真实历史中是什么样的呢？真实历史中，那些胆大妄为的人要想能够成事，还需要一些非常重要的素质。

首先，他们必须有非凡的直觉力，因为在很多时候，要做决断是极为困难的，根本不是我们像事后诸葛亮这样，可以把各种要素都看清楚了再说。在真实的历史中，电光石火之间就必须决断，此时所依靠的不是基于理性的分析，而是基于直觉和勇气来做出的。

比如朱元璋在与陈友谅的大战中，就敢于依照自己的直觉，做出手下的将军和谋士们都不赞同的决策，最终这个决策成功了。

超凡的意志力

另一方面，这些人物也需要有超凡的意志力，无论局面是多么糟糕，都仍然能够极其坚定，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这种坚信往往没有理由，就是心理强大。它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很多时候也超出一般人想象。只要有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哪怕是失败过多次，仍然身边会聚拢一批人跟着他一起努力。

看历史上的那些大英雄，无不具有这些特性，例子简直太多了。刘邦曾经多次被打得落荒而逃，刘备也是一样，成吉思汗几次被打得身边就剩十几个人，朱元璋也是一样遭遇过不少失败。

甚至包括咱们现在所听说的很多大企业家，也都是九死一生熬过来的，很多都曾经资产几次被清零；但是他们仍然坚定地相信自己肯定能成功。这就和理性没有关系了，根本上是强大的意志力。

英雄和时代的共振

说了所有这些之后，便可以看出，英雄的成功有多么困难，失败的概率有多么大。甚至可以说，很多时候成功是凭运气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战略规划，但规划多半都会在现实当中扭曲变形，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真正的高手就在于，面对变化，能够依凭直觉，迅速地抓住重点，并且依凭超强的意志力，丝毫不被变化影响心境。剩下的，就看运气了。

运气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刚好，他的非凡的直觉，与人们的普遍诉求之间能够形成共振。

能够形成共振，各种天时地利人和加在一块，就能成功，于是成为英雄。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法形成共振，于是失败了，成为被人笑话的妄人。

人民在这个过程中，看上去像是纯粹被动性的存在，只能等着英雄来召唤。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在前面谈过的各种约束条件，不管是社会结构、财政基础、经济的类型、军事力量的来源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大量普通人所支撑的。

他们构成了英雄人物的事业能否成功的根本约束条件，脱离开这种

环境，英雄什么也干不成。就像拿破仑，他再怎么英雄，也没法脱离开他的军队，而他要想能够养活自己的军队，前面说过的一系列财政、经济、社会等等的逻辑，都是摆脱不了的。

今日要点

所以，可以说英雄和人民，在共同创造历史。英雄就像河水中的巨浪，汹涌澎湃，但是多一半都变成泡沫。只有少数运气好的才能掀起滔天大浪。

人民就像河床，看上去极其沉默、被动，但是却决定着巨浪到底能不能成事。

精选留言

崔小震

引述之前施展老师回复一位听众的留言：“少数有胆略的人在搞事，多数没胆略的人，却成了要搞的事情能否成功的条件。如果搞事的人理解了那个条件，因势利导，成功了，就成了伟人；如果没有理解那个条件，失败了，就成了妄人。”我做消费金融行业的，实在是不能同意更多。

驻场答疑之三|金朝会如何理解岳飞？

岳飞的事迹，能很好地体现出中原和草原的互动关系。岳飞也同样塑造着所有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而形成超越于单个区域之上的认同感。

你好，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三天。

我在后台留言里看到了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拿出来讲一讲。那就是，如果说中原史和草原史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那么金朝会怎么理解岳飞？也会认为他是英雄吗？

之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讲，是因为这和我在课程中一直强调的中原、草原等等各种亚区域，彼此之间深刻的互相构造性，有着很重要的关联。

从这个问题里面可以看出，中原和草原的互动关系，又是如何塑造着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从而形成超越于单个区域之上的认同感。

先说我的结论，金朝对岳飞会怎么理解呢？

金朝既会把他作为最凶恶的敌人，又会高度地敬重他，甚至赞颂他，因为金朝会是在两种意义框架中来评价岳飞的。

岳飞象征的道德意义

在具体解释这两种意义框架之前，先从当代人的角度来解释一个问题，就是，有着像岳飞一样战功的名将，历史上有很多。为什么岳飞会

特别吸引人们的情感呢？

原因在于岳飞的冤死。为什么冤死会让人们如此触动？就在于正是冤死，让这场死亡升华成为一场伟大的牺牲。死亡是个物理现象，牺牲是个道德现象。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否能够让一场死亡获得伟大的意义。如果找不到意义，死了就是死了，瞬间就会被人忘记。如果能找到意义，死亡才会上升为牺牲，深刻地烙在人们的共同记忆当中，让人们体验到道德感。

所以，我们在讨论岳飞的时候，实际上讨论的不是岳飞本人，而是岳飞所象征的那种道德意义，正是这种道德意义才让我们感动。

而所谓死亡的意义，又是从哪来的呢？它来自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意义框架，或者说，就来自我们在本课程导论当中所说的那个蓝图。

打个比方，具体的死亡只是砖头而已，是蓝图赋予了它以意义，让它能够升华，能够令人激动、令人落泪。所以，要问金朝人到底怎么理解岳飞，首先要问的是，他们到底会在怎样的一种蓝图之下来理解他。

时代蓝图和永恒蓝图

这就进入到前面说的两种意义框架了，或者说两种蓝图。具体到对任何人、任何事的评价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实际上有着两重蓝图。

一重蓝图，是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的蓝图，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时代蓝图。比如金朝人要站在宋金战争这个具体情境，来理解或评价岳飞。

再一重蓝图，是超越于具体时空的蓝图，就是它对人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称之为永恒蓝图。金朝人同样也会有这样一种评价标

准。

具体解释岳飞，在时代蓝图当中，也就是在宋金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他肯定是大金朝的敌人。虽然我们今天认为宋朝历史和金朝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放在时代蓝图里，对金朝来说，岳飞是必须要除掉的凶恶敌人。

但是放到永恒蓝图里，这个意义就变了。[永恒蓝图所关注的，是人性当中超越于时空的永恒部分](#)。忠诚肯定属于这种会被永恒推崇的部分了。

岳飞的忠诚，在永恒蓝图里，就不仅仅会被大宋所赞赏，同样会被大金所赞赏。因为，大金也希望自己的臣民拥有同样的忠诚。尤其是，岳飞并不会因为自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他的忠诚就发生什么变化。这就更深刻地表达出一种道德感。

什么才是真正道德感呢？就是，我之所以选择这么做，不是因为这么做有好处，而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

就像孟子所说的，“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我认准了什么是对的，就根本不在乎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冤死，才真正成就了岳飞的伟大，因为这更深刻地呈现出岳飞的道德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大概率会有好结果的情况下，你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这并不困难，因为丝毫不考验人性。外人也不知道你是在遵从自己的内心，还是因为看到了好处。于是外人从这里面不会收获任何感动。

但是在大概率有坏结果的情况下，你仍然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这个很困难，很考验人性，从而才更深刻地表达出道德感，才能够让别人感动。

如果岳飞是因为战功获得了田宅美女，得以善终，这对他个人来说，当然不错。但是他绝不会获得身后那么大的名声，因为这样的话，

他的行为并不会让我们特别感动。

民族共享记忆

我们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岳飞能得善终。不过说实话，如果他真是个得善终的人，我们未必会记住有这么一位名将，也就谈不到希望他的命运会怎样了。

比如，南宋的中兴四将，除了岳飞，另外三位都没有冤死。我让你马上说出他们的名字，你能说出来哪一位？正因为岳飞冤死，我们才能记得住他，赞颂他，并且成为民族共同记忆当中极为深刻的一个部分。

所以，从民族共同记忆这个角度来说，岳飞没得善终，反倒是他真正的意义所在。岳飞的冤死，反倒让他所表达的忠诚感，具有了远远超越于他自己之上、超越于时间之上的象征性意义，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当中，成为各族人民的普遍信念。

即便是金国，也会赞颂岳飞的忠诚感。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明朝末年的抗清名将史可法，在扬州城外与清军苦战，最后殉国，这本来是大清的敌人。但是到大清的统治稳定了之后，大清反倒为史可法立了祠堂，表彰他的忠诚。

因为这样一种忠诚是超越于时间与空间的，是你的敌人也愿意尊重的，甚至会融入你的敌人的道德意识当中，为他们所接受，这就形成了永恒蓝图的构成部分。

在这个永恒蓝图下，岳飞、史可法的意义都超越了本族群，成为所有族群共享的历史记忆。

我并不是说让人冤死这个事情很好，我是在讲述人性当中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岳飞的冤死表达为他所承受的一种苦难。

那么可以说，正是苦难，才带来道德感，并且可以感染更多的人，成为人们的共同历史记忆，并且让人们在更大的意义上形成认同感。岳飞的个人命运当然很悲惨，但是让我们感动的，恰恰正是这种悲惨中所呈现出的道德感。

更进一步地，人性当中还有个更奇妙的东西。岳飞如果光是悲惨，也未必让我们这么感动，他立下了伟大的军功，还下场悲惨，这才让我们感动。

可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敌人，岳飞的军功还会显得那么伟大吗？岳飞曾经成功打败过一些农民暴动，但这根本不会让我们感觉他有多伟大。但是打金朝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打败的是一个超级强大的敌人，你的胜利才真正称得上伟大。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大金朝的强大，才成就了岳飞的伟大。没有大金朝，同样也不会有伟大的岳飞。

那么，我们可以说，金朝也同样参与到了岳飞这样一种中华民族道德符号的塑造过程当中，金朝的强大和岳飞的伟大，是一种共生关系。

它们共同地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形成当中，参与到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塑造当中。

更不用说，大金朝这边也有一系列名将，比如金朝末年有一个抗击蒙古大军的名将叫做完颜陈和尚，这名字不大庄重，但他是个真正的好汉。

完颜陈和尚极为曲折的命运，有些像岳飞。完颜陈和尚的英雄行为，在永恒蓝图这个背景下，同样也会让大宋这边感动，并且看历史记录，他确实让蒙古一方也感动了。

他所经受的这样一种苦难，本来也会进入今天中国人普遍的历史记忆，构成我们的历史认同的一部分的，只不过我们的主流历史叙述中很少出现他们的名字和事迹罢了。

今日要点

从岳飞这个问题也能看到，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的深刻的道德感，它有着多么复杂又多样的来源。

中原、草原等等各个区域的互相塑造，不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同样是在精神意义上。

明天我会继续驻场来回答一个问题，明天见！

———— 精选留言 ————

衡山老鹿

项羽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司马懿，金兀术、秦桧之于岳飞，朱元璋之于陈友谅，正是棋分对手，互相成就。成功者成为伟人，失败者成为悲情英雄，成功者建立秩序，失败者构筑精神，共同完成历史的塑造。

一缕茶香

小时候听评书的时候特别恨大辽如果没有他们岳飞就不死听老师这么一讲强大的大辽和岳飞是互相成全的关系心里莫名的舒服感大辽让我们深深的记住了岳飞谢谢老师的解读

作者回复

兄弟，你把大辽和大金搞串了，不串的话，心里会更舒服

砌书匠

想起了相反的洪承畴，为大清立下了不世功勋，最后被清朝写进了《贰臣传》

鲈鱼

施老师，您的中原草原海洋内陆互动的大视角，让我深深震撼。我想问的是，这种大视角是人为建构的，当事人是看不到的。那么这样的历史观的现实价值何在？我们不可能时光穿梭到未来，再回来指定政策。很不成熟的想法，请老师批评。

申申如也

完颜陈和尚的历史很有意思，为何被主流历史叙事所忘却了？在塑造中华民族过程中有多少这样的满蒙藏回的完颜陈和尚被忘，应该多得不胜数。汉中心，汉主体是中国历史叙事的主流，而只有打开胸襟，站在互动互塑的平等关系的视角上去审视历史，才会暮然发现完颜陈和尚这样的英雄是民族的共同记忆，是民族融合铸造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发掘与充实这部分应是学界要竭力为历史补短板，使非主流也可成为主流时，我们民族的多样性与互塑性才会得到全面的接受。

Kevin526908

谢谢施展老师的回答。以前一直认为历史不过是胜利者书写的叙事，但从这篇文章中，让我体会到我们在“败者”的身上，获得地更多，感受地更深刻。

驻场答疑之四|学习文史哲，到底有什么用？

成长的标志之一，就是你有能力不断地调整、重画头脑中的文化蓝图，从而让自己对于世界能够获得更深刻、更立体的理解。而各种不同的蓝图，以及画蓝图的技术，正是存在于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这些学科，以及各种经典著作当中。

你好，欢迎收听中国史纲，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四天。

今天我选出来的是后台很多人在问，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这些学科，到底有什么用？或者说有什么实践性的意义？

这话题很有意思，咱们就不从“眼前的苟且与诗和远方”的角度出发了，咱们就从到底有什么用的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

到最后，你就能看到，原来“诗和远方”不仅仅是让人有更丰富的内心，它居然也有那么大的用。

看到和看见

我先来讲一个故事，这是个真事。有一本书叫做《火星的人类学家》，这书非常有意思，作者是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讲了他所遇到过的很多病例，其中有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这个病例是一位一岁左右就失明的盲人，这几乎相当于先天失明了，这位盲人遇到这个医生的时候，已经五十来岁了，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早就适应了依靠触觉和听觉的生活方式。

结果，医生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的眼睛事实上各方面都挺好，就是有一个小问题导致失明，用一个简单的小手术就能够让他再看见。之后的手术很成功，这位盲人果然复明了，但是后续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能“看到”，但却无法“看见”。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部世界的各种色彩都能进到他的眼睛里了，但是他却无法辨认出任何东西。

咱们正常人看世界，实际上看的是进入到眼中的各种光线、色彩，然后我们的大脑懂得如何去把这些混杂、交织在一起的光线和色彩整理出秩序，区分出前景和背景，于是我们就能辨认出来外部世界的各种东西，这就算我们能够“看见”了。

但是对这位复明的人来说，进到他眼睛里的，只是混杂在一块的各种杂乱无章的色彩而已，从中无法感到任何秩序、任何意义，他的大脑不知道该如何整理这些涌入眼中的色彩，于是，他就能“看到”，却无法“看见”。

曾经有人把他领到一个车床前面，告诉他这是一个车床，都是干嘛用的。说了半天，他瞪大了眼睛，还是啥也看不见。直到他闭着眼睛，上前把整个车床摸了一遍，再退后回来，说，“嗯，这回我能看见车床了。”

因为他摸了一遍之后，脑子里就已经把各种触觉整合出一个完整的形状了，也就是，有了个蓝图了，然后再用这个蓝图来对应着整合进入到眼睛里的各种色彩。

虽然很可能不大顺畅，但好歹也算有整合的办法了，这之后他才能够理解这些视觉刺激，才能“看见”。

什么是预置蓝图

好，听完这个故事，你一定已经意识到了，原来，世界并不是直接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我们以为自己是直接在看世界。实际上，我们永远是在通过大脑中一些预置的蓝图在看世界。

进入到大脑当中的，甭管是视觉信号，还是触觉或者听觉信号，都只不过是咱们经常比喻的那种砖头而已。如果没有那些预置的蓝图，它们根本就无法呈现出任何意义，我们根本就无法理解它们。而这些预置的蓝图，你如果不反思一下，甚至根本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那么，这些预置的蓝图，又是从哪来的呢？

预置蓝图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比如大脑里整合视觉信号或者触觉信号的能力，只要是正常人类，在这个方面都有同样的预置蓝图。

动物也同样有这种预置蓝图，比如大马哈鱼总是要洄游，它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洄游，但就是要这么做，这就是它的头脑里被预置的蓝图。

另一种是文化意义上的预置蓝图，比如咱们现在都以瘦为美，但是唐朝的时候就是以胖为美。今天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汤加，那里的人也是以胖为美，到那一看，遍地都是大胖子。那到底瘦美还是胖美呢？根本就没有客观的答案，那都是取决于你的文化。

如果你还是固执地认为，肯定是瘦比胖美，那只不过是因为你在坚持自己的文化才是唯一正确的文化而已。

打破你的预置蓝图

但是，如果你坚持自己的文化才是唯一正确的文化，会有什么问题呢？你一定会陷入到某种偏见当中，无法自拔。

这会让你对于世界的理解遭遇到各种遮蔽，没法去理解更广大的世界。你见识得再多，也什么用都没有，就像那个复明的盲人一样，所有进入你大脑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混乱，你能看到，但什么也看不见。

你所属的文化，就是随着你的成长，通过教育、通过与身边人的互动，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而逐渐被预置在你头脑中的一种蓝图。

人要成长，肯定要先接受这样一种预置的文化蓝图，才能开始获得对于世界的理解。但是，随着你继续长大，这个预置蓝图却会开始构成你进一步理解世界的障碍，因为它会让你无法理解其他的东西。

人要继续长大，而继续长大的标志之一，就是你有能力不断地调整、重画自己头脑中的文化蓝图，从而让自己对于世界能够获得更深刻、更立体的理解。

那么，到哪里去学习重画蓝图的技术呢？

那就得先问问这些蓝图是哪里来的。答案很简单，各种不同的蓝图，以及画蓝图的技术，正是存在于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这些学科，以及各种经典著作当中。

今日要点

现在你应该知道文学、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学的实践性意义在哪里了。

它们不仅仅是给你提供“诗和远方”所带来的那种纯粹的心灵愉悦，它们同样能让你摆脱文化上的睁眼瞎状态。

它们看似无用，实际上真正有大用。

崔小震

今天老师说的蓝图概念，恰好呼应了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张蓝图是需要不断被审视和修正的，以确保我们能看到更多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事物，否则这些就会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或者视而不见，其实康德的“先天认识形式”某种意义上也在表达类似的意思。另外，人类一直存在两种进化，一种是几十亿年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由自然选择决定，通过基因来实现；一种是文明意义上的进化，在群体范围内通过文的传承来进行，这是一种“非自然选择”，人类文明进化的成果非常璀璨，但由于文明无法通过基因遗传，所以个体在这种集体进化的过程中，一直很难和整体文明的成就建立起直接联系，而要通过漫长的教育等方式，而蓝图正是这种文明进化的成果，这是需要每一个人通过努力来实现的，并非由基因自动编辑来完成。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思考，我认为，就是为了在此生中尽可能追上当今人类业已完成的文明进化，限制动物性，凸显人性，否则尽管我们每天拿着iPhone，坐着飞机，但心中的蓝图很可能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甚至更早。

似虹54614306

只可惜我在学校时学习文科的姿势不对，硬是把这些经世的大学问，给学成了死记硬背的知识点，只见砖头，不见蓝图。这次跟着施展老师一起重塑史观，用历史第一性原理去重新理解中国的过去，这种思维方法就已逐渐内化为我的预制蓝图，使得我可以用新形成的这套蓝图去观察现在和展望未来。

何杨80215738

《枢纽》收到了，比想象的厚，也比想象的轻，赞一个

金龙鱼

技能或者科学知识，应该就像是一座座孤岛，但总有资源耗尽，需要跟外界连通，互相依赖的时候，到达了边界，不得不向外拓展。人文科学就是蓝图，就是航海图，就是路线图，或者说是线，把一颗颗珍珠，串了起来，就形成了宝贵的财富，创造了更大的价值！理论上是这样，但是觉得操作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应该还是要在理工科和人文学科间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吧，从小培养一些人文学科的素养。比如，学习研究物理，也同时要研究一下物理的发展史，伟大的牛顿，最后偏向于神学，是痴迷还是不得已

maji

复明的盲人，眼睛能看到的是一种新的感觉模式，但是缺乏对应模式，因此看不见。他需要连接到触觉所建立的抽象模式上才能和正常人一样增强理解“机床”。这个抽象模式用文字记录和描述，现在也可以用图像，音频，视频保存，以后还可以VR，MR记录。诗和远方是一种想象能力，如果你能理解字和过去。

驻场答疑之五|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有什么区别？

普通法和大陆法这两种法律体系，对于国家的对外扩张模式、帝国统治模式、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模式等等，影响都非常不同。这些差异，在历史上都形成了极为深远的后果。所谓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区别，可以一直追溯到这里来。

你好，欢迎来到《中国史纲50讲》。

今天我要回答的问题是，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问题很重要。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的区别，在我的音频课第35讲和36讲，分别讲英国和俄国的部分，曾经初步谈到过，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回过头来再去听一下。

不过在那两讲里面，有个重要问题我没有时间展开，那就是在第50讲里面也谈到过的普通法，又叫英美习惯法，这非常值得拿出来讲一讲，因为这是理解今天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

整个现代海洋世界的秩序，都是在普通法的逻辑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这也是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关键。

普通法和大陆法的区别

可能你早就听说过世界上有英美习惯法与大陆成文法这两种法律体系，后面咱们就简单地说普通法和大陆法。

但是你未必知道这里面的深层差异。尤其中国是属于大陆法系的，不熟悉普通法的思维，对于普通法就更难以理解。

这两种法律体系的深层差异在哪呢？简单地一句话来概括，对普通法来说，法律是被发现出来的，对大陆法来说，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

发现和发明，这区别可就大了。发现的意思是，这东西早就在那，等着你去把它找到而已；发明的意思是，这东西本来不存在，等着你把它给创造出来。

大陆法是发明出来的，这个相对容易理解，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立法嘛。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依照它认为恰当的理由，来制定法律，用这个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像德国、法国、俄国、中国、日本等等，都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

议会拥有立法权，这个事情是从欧洲开始，向外传播的。但是你知道吗？议会拥有立法权，这实际上也是出现得非常晚的事情，是到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欧洲国家，比如最典型的法国，立法权属于国王。但是国王拥有立法权这个事情也出现得比较晚，是到了17世纪才出现的。

那么在欧洲，更早的时候，法律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就是发现出来的，可以说，在16、17世纪之前的中世纪时期，欧洲各个地方的法律都属于某种普通法，都是发现出来的。

直到16、17世纪，英国和欧陆走上了分岔。英国那边、以及作为它的后继者美国那边，法律仍然是发现出来的，保持着普通法的状态；但是欧陆这边法律就变成发明出来的了，走上了大陆法的状态。

于是有俩问题就需要解释了，第一，为什么近代以前的欧洲国家，法律都是发现出来的？又是怎么发现出来的呢？第二，为什么到了近代，英国和欧陆又走上分岔了呢？

普通法的“发现”过程

先来解释第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看看近代以前的欧洲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今天咱们所说的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什么的这些国家，在那会儿根本还不存在，法兰西、德意志，都是个地理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就像咱们今天说亚洲一样。

那会儿的整个欧洲，到处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就像中国的周朝一样。天子下面有一堆诸侯，谁都不听天子的。你可以把今天所能想到的每一个欧洲国家都理解成是当时的周朝，国王只是一个大号的诸侯而已，从力量的层面而言，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大诸侯。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想强制去做一些什么事儿，根本做不了，因为你力量到不了那个份上。但是反过来，贵族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强迫国王，或者强迫其他贵族，这事儿基本也做不到。因为贵族之间彼此力量相差也不太多，他们之间是一个很复杂的彼此互动博弈的关系。

每次互动博弈出来的结果，都会被记录下来，被人给提炼成某种法律化的表达，并且过去的博弈结果，会构成未来人们的参照标准，这个东西就形成了传统。

说到这你就明白了，普通法实际上是通过博弈的过程逐渐磨合出来的，谁也没法说了算。哪怕你是国王，也没法制定个法律就要求大家遵守。

反倒是大家共同博弈出来的结果，大家都会认账。因为博弈的结果，一定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均衡的结果，谁要是不服这个结果，大家有办法强迫他服从。

由于法律是博弈出来的结果，国王在这里面，只是参与博弈的一方而已，根本没法站在法律之上，所以，普通法逻辑中，一定是“王在法下”，就是国王是低于法律的。

咱们经常能看到“王在法下”的说法，其底层的根基在这里，之所以国王低于法律，不是因为国王愿意遵守法律，这种意愿是不牢靠的，而

是因为国王没能力挑战法律。

在普通法的逻辑下，后来，各种博弈有很多就到法庭上进行了，因为大家都对彼此的力量对比心里有数，也就犯不着非得打一架了，找个公正的第三方来评理就行了。

对于法院来说，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打官司，这是好事，因为法庭可以从里面收费。[法院也就会想法把案件审判得符合人们对于公正的普遍认知，并且会对以前的案例有各种参照，前后要努力形成连贯的判断标准](#)。这样也就能够让人对判案结果有个较为稳定的预期，就更愿意到法庭上来。

于是，普通法就这样通过案例的累计，逐渐成长起来了。而究竟未来都会冒出来什么样的案例，事先谁也不知道，只能等着它们冒出来才知道，新冒出来的案例，就会参与到法律的形成过程当中。

所以，普通法就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的发现过程，就是由法院的司法过程所主导的，这和后来我们所熟知的，由议会的立法过程所主导的成文法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到了后来，英国的议会力量变大了，想要主导来立法，但是英国人早就形成习惯，就是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只应该是对司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成文普通法惯例，进行某种成文表达，而不能是跟普通法对着来。

如果跟普通法不一致，那么议会的立法就应该被判定无效。谁来判断立法和普通法一致不一致呢？也是由普通法的最高法院来做这工作，因为普通法的形成过程就是在最高法院那里汇总的。

英国和欧陆国家的区别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为啥在近代早期，英国和欧陆走上了分

岔，英国仍然保留着普通法传统，欧陆却没有了呢？

一个经常被我们忽略的要素就牵扯进来了，地理要素。因为英国是岛国，不用面临任何陆地上的威胁，因此不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于是国王就没有办法灭掉贵族，而且英国民间自治的力量一直非常强大，君主政府始终没有力量去压制下面跟它博弈的这些自治体和利益群体。

君主没有办法去约束他们，但法律可以。因为英国普通法就是在这些民间自治团体不断参与下，逐渐被发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而欧陆国家，因为经常会面对周边国家的威胁，或者相反，想要去征服更多的新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陆军归谁使用？国王。这样一来，国王的力量就会强大得多，因此慢慢就脱离了其他贵族力量的束缚。

结果是什么呢？过去依靠博弈形成的习惯法，就保不住了，因为没人能再约束国王了。国王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全新地立法，把过去的那些习惯法都给抛弃了。于是欧陆这边就形成了“王在法上”的新局面，它的法律逻辑也就从尊重传统的普通法或习惯法，转化为大陆的成文法。

紧跟着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欧陆的国王搞不定那些贵族，建不起强大的陆军。到了近代早期就能建设起来，灭掉贵族呢？

听了我们这门音频课的用户大概已经能猜到了，是因为出现了技术变迁，带来了新的经济资源，于是打破了原有的博弈均衡，国王就能够干掉原来干不掉的贵族了。

这个技术变迁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

过去，人们的财富基础都在土地上，你的财富规模就是和你占有的土地规模成正比的。国王并不比手下贵族的土地规模更大，就搞不定他们。

远洋贸易使得这些商人一寸土地也不占有，却能够拥有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就可以被国王用贷款的方式借来，国王有能力用这笔钱去瑞士雇一帮雇佣兵来帮自己打仗，最后就能灭掉贵族。

对有钱的商人来说，钱可以借给国王也可以借给贵族，优先考虑的就是借给谁的风险更小一些。国王毕竟正统性更强嘛，风险就更小一些。

于是国王就借着这个过程崛起了，欧陆与英国也就此走上了分岔的道路。

今日小结

普通法和大陆法这两种法律体系，对于国家的对外扩张模式、帝国统治模式、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模式等等，影响都非常不同。

这些差异，在历史上都形成了极为深远的后果。

比如，在近代历史上，整个世界贸易的法律秩序，实际上是由普通法所主导的，而全球贸易秩序是理解现代秩序的基础；

比如，近代历史上，只有普通法国家才建成了全球帝国，所有的大陆法国家都只建成了区域性的帝国；

又比如，普通法国家的直接融资市场如股市、债市，远远好过间接融资市场如银行。但是在大陆法国家，则正好相反，这带来了两种国家不同的创新效率；

还比如，在非殖民化运动之后，普通法宗主国的前殖民地，发展程度普遍好过大陆法宗主国的前殖民地。

普通法和大陆法带来的影响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举例解释了。可以

说，这两种法律体系是现代世界秩序重要的底层逻辑。

因此，所谓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的区别，可以一直追溯到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差别上来。

今天我的回答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精选留言

枫林晚

以前只知道英美法系是判例法，大陆法系是成文法，今天听施展老师的课程，才知道法律形成的渊源，而这些又受地理位置、技术变革等因素的影响。施展老师看问题的格局之大、各种因素综合理解之强，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期待施展老师能尽快开世界史课程

驻场答疑六|中原和边疆的深层互动，是怎样构建的？

各个亚区域之间，有一种“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同时兼具旁边两个亚区域的特征，同时理解两边的逻辑。多元的亚区域，就是通过“过渡地带”而被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中国的复合性。

你好，欢迎收听《中国史纲50讲》，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六天。

今天我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原和边疆之间，确实有相互塑造关系。但是在具体的历史中，它们能够理解到这种关系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涉到，该如何理解那个远远超越于中原之上的中国的历史。

中原和中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中原只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是包含着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多个亚区域的多元复合体系。

但是，这个多元复合体系究竟是怎么复合起来的呢？各个亚区域彼此之间是否能理解到呢？

过渡地带的作用

各个亚区域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那就是，在各个亚区域之间，有一种“过渡地带”。“过渡地带”同时兼具旁边两个亚区域的特征，同时理解两边的逻辑。比如我在第八讲说到草原征服王朝，都是来自东北或者长城沿线，这就是“过渡地带”。

多元的亚区域，就是通过“过渡地带”而被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中国的复合性的。要说各个亚区域是否能彼此理解，关键也在“过渡地带”，它能够让各个方向获得相互理解。

最近我看到《中国民族报》几篇文章，内容非常好。这系列文章用了另一个概念，“走廊地带”，实际上跟“过渡地带”是一个意思。这系列文章通过对几个“走廊地带”的讨论，让我们在更具体的层面上看到，中国的多元复合性是如何实现的。

今天我就引用其中的两篇文章来回答前面的问题。一篇是讲“长城-天山走廊”的，但这篇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中原与草原的相互塑造了，更是帝国的东部、西部是如何相互塑造的。读完很开脑洞，这篇的作者是陕西师范大学的黄达远教授。

另一篇是讲“苗疆走廊”的，这是与中原地区与大西南的相互塑造有关的，作者是贵州大学的杨志强教授。

通过我对这两篇文章的讲解，你可以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才是定义这个国家的基础。

大清的长城-天山走廊

先看看“长城-天山走廊”。这条走廊首先是衔接中原与草原，中原和草原这个话题我在第八讲中已经比较仔细地解释过，这里不再展开。今天主要来讲讲它是怎么衔接大清帝国的东部与西部的。

这条走廊是在清朝中期形成的。差不多从大清建立开始，准噶尔汗国就与大清之间发生着不间断的战争，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如果你看电视剧《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就会发现大清总是在和准噶尔打仗。直到乾隆年间，终于彻底平定了准噶尔汗国，将西域完整纳入帝国的统治之中。

还在康熙年间与准噶尔汗国打仗的时候，俄国人的影子就已经出现了，他们给准噶尔汗国的大汗噶尔丹提供军火，这让康熙很头疼。所以来康熙在东北与俄国人打雅克萨之战后，虽然获胜了，但还是做出了一定让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做这个让步就是为了把俄国人和准噶尔的关系给拆开。

在大清收复西域之后，整个北部和西部边疆变得更加漫长，就更有了防止俄国人南下的必要。

在收复西域之前，今天的河西走廊一带就是帝国的边疆了，大清帝国屯重兵在这一带，防备各种敌人。

收复河西走廊之后，帝国的边疆向前延伸了数千里，深入到中亚腹地。中国从一个东亚帝国，变成了一个亚洲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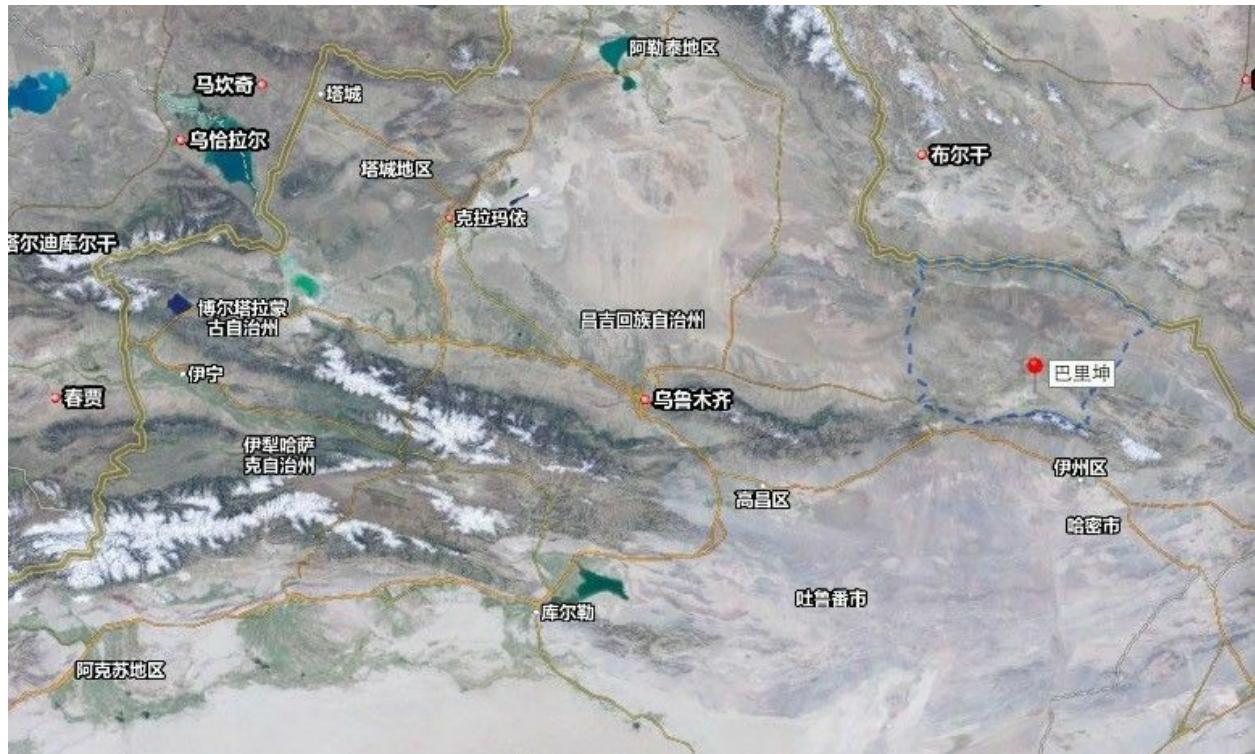
这意味着帝国的国防安排会遭遇巨大挑战。别以为开疆拓土这个事情很简单，实际上打过去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打过去之后如何守住。为了能守住，首先必须要收服当地人心，让老百姓愿意接受你的统治。

但在此之外，帝国必须有一个庞大的、系统性的国防驻军安排；同样攸关生死的是，还必须建立起庞大、有效率的后勤补给，使得驻军能够维持下去。

大清为了巩固庞大的边疆地区，统合了中原、草原和绿洲的力量，构筑起从天山南北、经长城一线和蒙古草原，一直到东北地区，规模巨大的国防体系。“长城-天山走廊”的重要性，就是在这里显现出来。

由于西域绿洲地区的地理破碎性，驻军从当地汲取的人力和财政资源都不能自给自足，所以大清不得不从东北以及内地调动庞大的军力、人力、财力、物力资源。

大清在天山北麓建立了三个重镇：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从东北和内地调来的驻军，主力就驻扎在这里。



大清三大重镇，伊犁位于西边，乌鲁木齐居中，巴里坤位于东边

这三个地方非常重要，在俄国趁着大清忙于镇压太平天国、无暇他顾，从而在西北割走了四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前，伊犁是整个新疆的核心，最重要的军队和统御全疆的最高长官都在这里。

伊犁作为帝国的战略前沿区，防备俄国南下，同时控制中亚的游牧部落，可以保障南疆与北疆的安全。我曾经去伊犁将军府参观过，看完真是震撼，强烈建议你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但是，你再看看地图会发现，伊犁离帝国核心区太远了，因此还要有一个战略支援区，这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作为伊犁的后方支援地存在，也是东部来的各种物资向伊犁继续转运的重要中转站。

从这再往东，还有个战略接应区，就是巴里坤，在今天的哈密北边一点，今天这是个小地方了，当年这可是新疆三大重镇之一，这里是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青海草原三大游牧区的汇合点，对于帝国安全至关重要。

有了这三个军镇的安排，便需要庞大的后勤补给体系。大清组织人力沿着天山北麓开发出连绵数千里的农业地带，打通了从天山北麓、河西走廊到陕西关中平原的农业地带。这里的农产品与北方的蒙古、哈萨克等草原游牧力量贸易，刺激他们用皮毛、牲畜来交换粮食。

沿着长城-天山一线，作为游牧、农耕与绿洲的交汇地区，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市场网络。这里面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贸易重镇，像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新疆的奇台，等等。这个庞大的商业市场甚至还吸引了国际商业力量如俄罗斯商人与中亚商人的加入。

如此形成的“长城-天山”大走廊，是关系国家命脉的走廊。

在这条大走廊里可以看到，从东北到西北、从中原到塞外、从江南到北国，来自游牧、绿洲、农耕区域的人群，随着国家军事和市场力量的扩散运动，而发生的变迁、流动、分散和凝聚，这是中国的帝国建构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历程之一。

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现代经济和现代技术的冲击，长城-天山大走廊的重要性逐渐衰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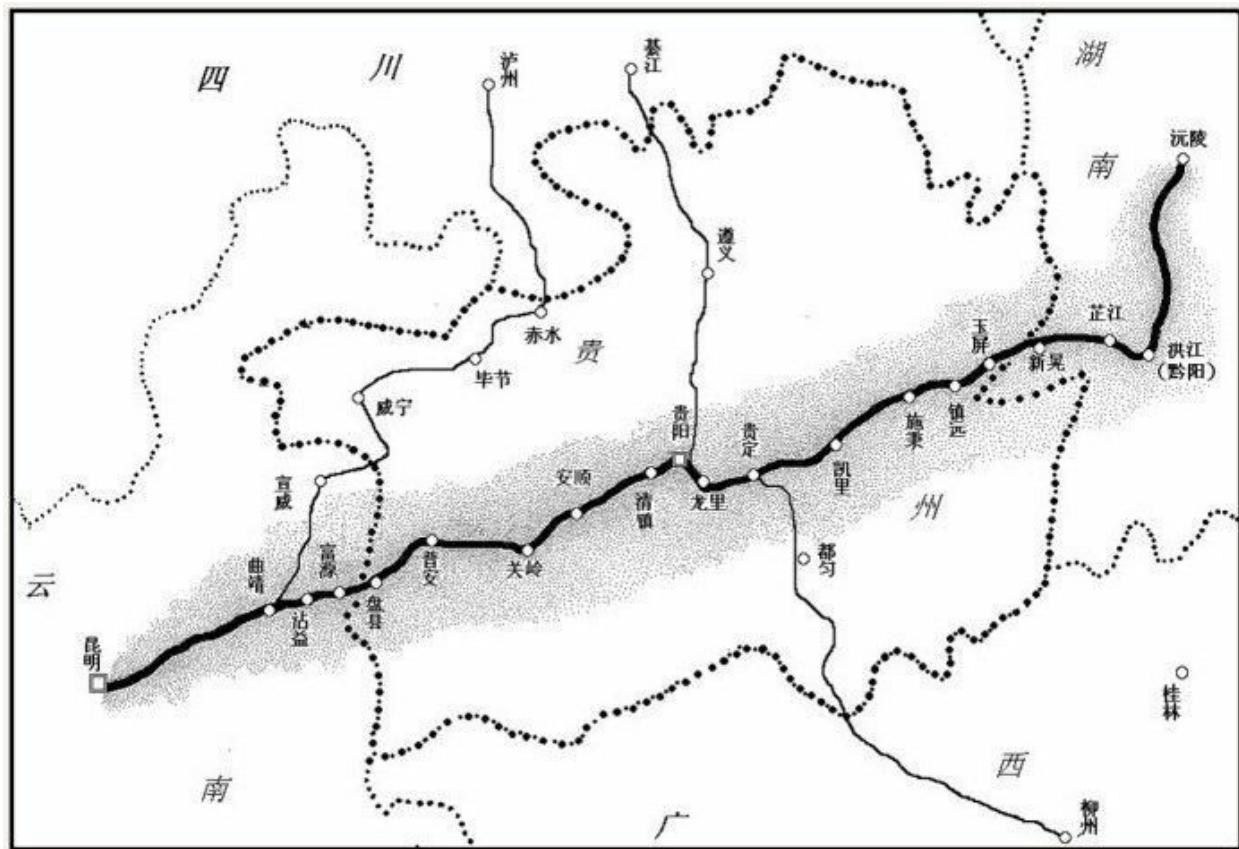
但是它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遗产，比如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这一线的众多城镇、多民族聚居区等。

理解这条大走廊的历史重要性，是我们理解中国形成史、中华民族形成史，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

明朝的苗疆走廊

再来说说第二条走廊，“苗疆走廊”。

苗疆走廊是从今天的湖南西部向西贯通到云南昆明的一条走廊，横贯整个贵州。



古苗疆走廊示意图

贵州这个地方，在古代有三句话形容它，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就是说，气候连绵多雨，几乎没有一点平原，到处都是山，交通极为困难，因此人民也非常穷困。

这样的地方，在古代肯定是帝国统治的噩梦。当地民风极为彪悍，完全不服管。由于交通极为困难，帝国要派兵进驻统治，成本奇高，当地又太穷了，也征不来什么税收，完全得不偿失。

所以，贵州在历史上一直是个很奇特的地方。从元朝开始，帝国有效统治的地区就把它给围在了中间，周边有湖南、四川、云南、广西。从地理上来说贵州是内地，但是帝国却把它给定义成为边疆，因为帝国没法有效统治这里。

但就是这个地方，却逐渐构成了帝国联系和统治云南的一个重要走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云南和中原内地之间，也是隔着各种大山，

路很难走，反倒由于各种大河的联系，云南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经常比和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

所以，古代的中华帝国为了经略东南亚，就必须经略云南，否则帝国就只能龟缩在中原地区。云南对帝国的意义，类似于西域的意义一样，你要想成为一个亚洲帝国，就必须以云南作为一个战略区。

可是从中原怎么到云南去呢？元朝的时候，主要是从四川走的，那边尽管山也很多，还是比贵州好走一些，贵州这边也有一条路，但是重要性很低。到了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四川这边人又损失极大，四川入云南的这条道路的重要性急剧下降，于是明朝治理云南就着重于贵州这边的道路了。

朱元璋的时候就花费了巨大人力，更大规模地修建了贵州这边的驿道，重兵布防。后来，到了永乐大帝的时候，为了管理这条驿道，索性在贵州建立了一个省。为了一条交通线而建立一个省级机构，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条通道，就是我们所说的苗疆走廊。

为了建立和管理这条通道，明朝推动了汉人的大规模移民，许多士兵携带着家属，迁徙到这里。

苗疆走廊相当于是依靠国家力量开辟出来的汉人移民走廊，儒家文化和沿线的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出现了各种融合的现象。沿线的苗人文化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而移过来的汉人，其文化和社会结构跟过去也不一样了。这让中国的文化变得比过去更加丰富多彩。

苗疆走廊在明朝和清朝成为帝国赖以控制西南边疆的首选的、甚至一度是唯一的通道。不仅如此，“苗疆走廊”后来逐渐又发展成为一条贯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连通周边多个省份的经济走廊带。

这一路上逐渐发展得城镇密集、人口集中、民族众多。如果没有这条走廊，中国的南方很可能会形成彼此割裂的几块，四川、云南、两广、两湖，有可能就是割裂开的，但是由于这条走廊的存在，南方完全

被联系为一体。

在明清时期，这对于中国在更庞大的东南亚区域的地缘政治战略，对于南部经济格局的重组以及民族的交融共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功能和意义早已超出线路本身，一直延续到今天。

今日要点

通过这两个例子，你可以看出，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意义。

正是它们，把帝国内部多个亚区域，给联系成为一体，使中国从中原地区的政治体，而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庞大的亚洲帝国，为今天的疆域打下了根本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绝对可以说，正是走廊地带，在定义着“何谓中国”。

也因此，走廊地带绝不是后人的附会，它是历史性地形成的，是中华帝国、中华民族在自我成长、自我发展过程当中，伟大而又深刻的智慧的体现。

今天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了，明天我会再选择一个问题来回答，明天见！

精选留言

李建华777864

为什么今天的河西走廊重要性下降了，老师能深入讲一下吗？还有哪些历史上很重要今天却不太重要的地方，港口，重镇，当年是什么重要，又为什么衰退的，比如明朝的泉州，春秋的临淄，唐朝的扬州根据这些地方的兴衰我们是不是能够预测地区的发展走势，比如一带一路上的新疆必定会迎来大发展，其他靠近边境的省份比

如云南也会如此

作者回复

我在考虑再开一轮课，专门讲讲走廊地带如何从物质力量和精神格局两个层面上，从根本上定义着中华帝国，让古代中国突破狭隘的中原观，而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亚洲帝国。河西走廊届时肯定是绕不开的一个环节了。理解了这些，才是真正地理解中国，否则，只能有个狭隘、残缺的中国观，这种狭隘理解，真正地愧对祖宗，配不上我们的历史。正好在这里做个调查吧，看看有多少人感兴趣。大家有兴趣，就点赞顶上去，并在后台留言告诉我吧。

香皂（大蜜蜂）

《中国史纲》完结后，施展老师接下来会继续讲解世界史吗？感觉听“大师”讲课，如醍醐灌顶，这才将以前散乱的碎片化史料串联起来，很过瘾！

浩瀚无垠

一定要再开一轮课，讲啥都行，随便讲！！！

作者回复

这么没有原则，必须赞一个

张凌零

常来巴里坤避暑！

作者回复

曾经去巴里坤考察过东天山考古现场，疑似大月氏王庭的遗址。看完之后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息，大好河山！大好河山啊！！！

佛祖门徒

《枢纽》一书读了一个星期，手不释卷，但划重点、做笔记、细琢磨，读的很慢，因为很多思考和阐述都值得细细品味。希望老师继续开课深入讲解世界史。

杨振宇293

谢谢先生的解答，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让我更加自信。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倍感荣耀，被先祖们的胸襟和韬略所折服，为我们的未来充满期待。曾几何时，我也有过自卑，认为中华文明的辉煌已经过去。但我现在明白了，我的先辈们即使是在最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放弃，倾尽全力，为自己也为后世子孙拼搏奋斗，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感谢先生点醒我这木鱼脑子。焚香祭祖，深感我辈任重而道远。

大可影画

太好了，支持再讲一轮，长城天山走廊我在拍丝绸之路时，沿途烽燧和巴里坤伊犁帕米尔高原瓦罕走廊等拍摄了大量航拍素材，届时可以根据老师所讲，专门剪一集纪录片

作者回复

太棒了！

小甜甜100

提起苗疆有一件事挺有趣的，1955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上，突然向周恩来总理问起青龙洞（镇远），周总理感到有些愕然，他的先辈来中国时经过镇远，青龙洞的建筑特色给他们祖先留下很深的印象

作者回复

太棒啦，大家再多讲讲类似的故事啊

LDW

听施展老师讲，各个走廊地带就像中医里面讲的经络一样，主全身的运化。了解中国而不识走廊地带，是不是就像学中医而不学经络一样捏？请老师指正。

作者回复

这比喻很妙，后台支持再讲一轮的朋友很多啊，感谢大家

吴孟晟

历史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看似边疆的走廊，事实上同时在塑造着

中原内路，并且促进了文化的融合。

驻场答疑之七|世界上都有哪些超大规模国家？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各个领域都具有构成性地位或说主导性地位，所以世界秩序是在若干个超大规模国家彼此博弈的过程中，逐渐达成一种均衡状态，而演化出来的。

你好，欢迎来到《中国史纲50讲》，今天是我驻场回答问题的第七天。

今天咱们来说两个事，第一个事是，我会继续回答一个问题。第二个事情是，我还会就近期与订阅用户的互动中产生的一个想法，向你征求意见。

国家的超大规模性

今天我选出来的问题是，是否还有其他国家也有超大规模性？

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秩序的一个基础，理解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一个关键

先说结论，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也有超大规模性，但与中国不是在一个领域中。

世界秩序的构成，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很多种领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各个领域全都具有构成性地位或说主导性地位。

所以，世界秩序是在若干个超大规模国家彼此博弈的过程中，逐渐达成一种均衡状态而演化出来的。

就历史上来说，每段历史当中都会有几个超大规模国家，就当下来讲美国、中国，当然是超大规模国家，俄国算是半个超大规模国家吧，其他国家都不足以支撑起超大规模的实力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来界定呢？这就涉及到对于超大规模国家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世界秩序当中有人们普遍都认可的行为规则，各个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也都会遵守这些规则，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国家可能会违规行动。判断标准就来了，就是，是否有人能够真正地约束住你？

如果有人能约束你，那你就不是超大规模国家，你仍然是被别人所规定的；如果没人能约束住你，那你就是超大规模国家，你是有能力参与到底层秩序博弈当中的超级玩家。

所以，如果就当今世界秩序而言，你会发现，美国、中国、俄国，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约束住它们的。当然，它们不是在所有领域中都有这个能力，只是在特定的领域中有这种能力。

具体点说，美国的超大规模性体现在它对于世界资本秩序的掌控力、对于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掌控力，对于海洋秩序的垄断性掌控力，以及对于国际价值观的掌控力，最后这一点在国际政治领域当中通常又被称作软实力。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由经济规模又可以转化出一系列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层面的影响力，这些对于世界秩序都有着构成性的地位。

后台还有很多用户在问，印度的人口规模也是巨大的，未来会否取代中国的地位，我的答案是，不会，后面会展开回答。

还有俄国，它拥有美国之外最大的核武器库，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然资源储备，再加上它庞大的领土，以及战斗民族那种脾性，这些本来都会构成它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力，奈何俄国的经济实在是提不起来，所以就只能算是半个超大规模国家了。

其他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搞事情，也就都不是超大规模国家了。

超大规模国家的博弈

就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它们可以参与到世界的底层秩序的博弈当中。

这就得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底层秩序的博弈。

要说清楚这个，得先看看和底层秩序相对应的表层秩序。刚刚咱们也说到了，世界秩序当中有一些人们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有很多都是已经成文的，表现为各种国际条约、国际法，等等。

这些就是表层秩序，它们规范着各个国家的一般行为。但问来了，是什么让表层秩序有约束力呢？是各个国家都很有道德，愿意认可这些行为规则吗？

并不是。遵守规则这种事情，在根本上并不能指望人们对规则的认可，而只能指望人们发现违规会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损失远远大于收益，于是就愿意遵守规则了。

这是内在于人性的，博弈论当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把这逻辑表达得很清晰了。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一本书，阿克塞尔罗德写的《合作的进化》，把这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

所以，让表层秩序获得约束力的，并不是人们愿意守规则，而是有人有能力来执行规则。就像让交通规则获得约束力的，本质上并不是人们守规矩，而是警察会罚款。

那么，就国际秩序来说，是谁有能力去执行规则呢？就是超大规模国家，它们的力量对其他国家有压倒性优势，就像警察对乱加塞的人有

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一样，所以这些国家就能够执行规则。

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力量太大了，它们要是违规的话，谁来执行规则？答案是，没人能做到。这也是我在前面给出的超大规模国家的判断标准。

那么，和一般的国家不一样，超级大国就会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博弈。

一个层面是，它们彼此之间会激烈竞争，这些竞争经常是不受那些表层规则约束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底层秩序的博弈。

这种博弈或竞争，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卡位，在表层规则执人这个事情上，卡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因为这种执行人的身份，在国际政治上是有大量好处的。当年的美苏争霸，比如今天的中美在很多贸易问题上的争执，都是这种底层秩序的竞争。

还有一个层面是，超级大国在一般情况下也会接受表层秩序的规则约束，因为这样对其他国家来说才有权威，更容易让它们支持自己来作为规则执行人，从而在底层秩序的博弈上会更有优势。

但是，一旦涉及到根本性的问题，超大规模国家是不会去理会那些表层规则的约束的，并且它们搞起事情来，也没有谁能够真地约束住它。

举几个例子，比如，美国在2003年打伊拉克，在国际法的程序上是有严重问题的，但是它就是打了，别的国家也只能默许了。打伊拉克这对美国来说关乎到根本问题，它会不管不顾，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一般事情上，还是愿意守规矩的。

再比如，2014年乌克兰发生大动荡之后，俄罗斯直接就吞并了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因为这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到根本问题，西方世界一片哗然，纷纷制裁俄罗斯，但最后这些制裁也都无疾而终。

这些都是超级大国进行底层秩序博弈的例子。但是在不关乎根本问

题的事情上，美国俄国也都还是愿意遵守表层秩序的规则的因为这让自己在国际上更好看，也就更容易拉到盟友，从而更利于在底层博弈上借力打力。

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国际秩序当中，表层秩序是成文规则，底层秩序是力量博弈。

超级大国的力量博弈，使得表层的成文规则获得生命力，超级大国遵守表层规则，经常会更有利它在底层的力量博弈。

所以，国际秩序是分层次的，超级大国层次，和一般国家层次，这两个层次所依从的是不一样的行为逻辑，不能混在一块来理解。

如果你试图用瑞典的行为规则来规范美国，那是天真；试图用俄国的行为规则来理解日本，那同样也是天真。

超大规模国家的嵌入性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今天的超大规模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历史上超大规模国家的对抗，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经济上相互深刻的内在嵌入性。

美苏对抗，发生在经济上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一战的对抗，发生在仅仅是外贸上彼此依赖的国家。而今天的中美两个超大规模国家，是在工序意义上的相互依赖，美国现在所有的新科技，要想能够落地，都必须和中国的生产能力相结合。

这个意义上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完全不是历史上那种依赖可比。历史上的依赖，总还是外部性的依赖，程度或多或少而已。

今天的依赖，完全是内部依赖，脱离开对方，自己运转不了。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用历史不足以类比。

这个情况是全新的，人性却是永恒的。超级大国彼此间的对抗还是会继续，但不大可能表现为战争，更有可能表现在国际道义的争夺上，也就是对盟友阵营的打造上。打造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格局，让自己在底层博弈上更能玩得转。

至于打造得不利的那一方，如果想开了，实际上问题也不大，不会有什真实危险，因为历史情境已经变了。

但这种对抗模式的转型，不是因为超级大国开始讲道义了，而是因为这是今天更加可行的对抗途径。

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中国

还有很多人也在问，印度的人口也是超大规模的，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取代中国的地位？

我提炼为几点，来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从市场吸纳能力来说，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中国（再加上溢出到东南亚）的制造业能力已经穷尽了世界市场的消费能力世界市场无法容纳两个这么大的国家，所以印度不会有形成制造业上的崛起。

第二，从制造业发展的前提来说，仍然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超级供应链网络是制造业发展的前提，超级供应链又依赖于超级基础设施，这方面印度也没有机会。印度目前发展得好的，都是对供应链需求很低的如制药业、软件业、服务外包业。

第三，从国民发展欲望角度来说，印度人的信仰使得他们的内心比较恬淡，发展欲望上不如中国人。

第四，从国民的精神世界来说，印度的种姓制带来一个效应，就是

他们同时拥有世界顶级精英，也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

印度的顶级精英，在融入世界这方面的水准比中国高出不少，今天硅谷很多大公司的管理者都是印度人或者印度裔，很多国际机构的高级雇员也是印度人甚至巴基斯坦人，比中国人要多不少。但是印度的一般国民却并不能跟上这种步伐。

作为一个国家来讨论的时候，必须看到它的整体性。作为整体性的国家，毕竟印度的规模在那里，是个必须重视的国家但要说有可能超越中国的地方，主要还是在个体层面或者小的精英群体层面。在整体层面上，印度的机会不大。

向你征求意见

这段时间，和你们在后台的互动，让我非常感动！

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我所提出的一种对于中国的新的理解框架，是如何有可能获得你的接受和支持，并且帮助我继续加深思考得到用户的高品质，确实名不虚传，这让我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

并且，我也因此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想法，考虑专门讲讲走廊地带是如何从物质力量和精神格局这两个层面上，从根本上定义着古代的中华帝国，让古代中国突破狭隘的中原观，而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亚洲帝国的。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切入点，在于，走廊地带是理解古代中国秩序的一个最锐利的角度，把握住它的历史意义，就把握住了理解中华帝国的核心密码。理解了这些，才是真正地理解了中国。

我们不能仅仅陶醉在所谓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说法之中，而要在真正意义上理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构造一个真正伟大的帝国的。

真正伟大的帝国，它是对正义的承诺，它是对秩序的担当，它是对人性与生命的真正悲悯与敬畏。

如果视野局限在中原地区，反倒看不到这些。而从走廊地带，能同时看到中原与边疆这两边，看到它们如何在相互塑造的过程当中，演化出帝国的力量与精神的融合，这种深刻性才能在我们的眼前展开。

理解了这些，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华民族要在未来担当的伟大而又深远的世界历史使命。

如果你对走廊地带这个想法感兴趣，请告诉我你希望听到的内容，提出你更好的建议。我希望在与你的讨论中，共同把内容打造出来。

期待看到你更多的支持，也期待有机会在未来与你再见！

精选留言

陈艳

施展老师您好，听了您的“中国史纲”，也正看您的《枢纽》，视野一下子开阔了很多，对以前学过的一些知识，好像又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一个云南人，很想听老师讲一讲：1，云南这个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和中华帝国在演进中的关系。清代以前感觉上和“中国”好像是“若即若离”；民国的时候，也曾风起云涌；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这30多年，一直很平淡。2，云南的资源和位置，在您“枢纽”的这个概念下，未来会有什么发展？很希望得到老师的回答，谢谢！

蔡晓利

我想听听元朝统治时期中国大陆与中亚、欧洲之间商路贸易的历史。那应该是一条超长走廊吧？从北京到张家口、河西走廊新疆中亚西亚欧洲？

不动峰

施展老师，我老家就在走廊地带，我是河西走廊张掖的，站在祁连山上，能看到对面的蒙古高原，而身后就是雪域高原，藏族人常常到我们县城来购买东西！而我们这的汉族人也习惯喝藏族人的酥油茶，这种经济乃至生活的互相交融，塑造了不同的民风民贸！

佛祖门徒

老师好！今天是您史纲课的最后一讲，很是不舍。今天在公众号中读了一长城一天山走廊”上的国家记忆乙一文，感受很深，对中国历史的演变脉络和一带一路战略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希望您能围绕这个话题开新课全面的梳理这段历史，让历史这门真正的未来学更好地带领我们看清趋势。

徐慧杰

对于一个80后，虽然完成了大学本科教育，但我们读书的时候从学校里学习到草原，西域，高原的演变历史实在是太少了。站得高，望得远。想得深，才能做的好。施老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使我们的眼界开阔了。用学术成果做大众教育，更新人们的史观。利在当代，功在后世。中国太需要有担当的学者，如果你们活得有尊严，人民才能更有尊严。

直播回顾（上）|理性和想象力，谁更重要？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化，过去我们经常解释为理性战胜了信仰。但如果你仔细读科学史就会发现，所谓的科学革命并不是理性战胜了信仰，而是信仰战胜了理性，再把自己发展成为新的理性。

1月4日晚上，罗胖和我进行了一场联袂直播。我们谈到了我在做《枢纽》一系列研究时打开的脑洞。其中，我谈到了一个关于理性和想象?的案例，正好趁周末分享给你。

《枢纽》这本书，以及《中国史纲50讲》这门课，并不是仅仅在探讨历史事实，而是要重构史观。重构史观，相当于我们要重建一个全新的观念系统，用来理解世界。

所谓重建观念系统，并不是对更多事实的发现，而是更多脑洞的打开。

通过打开一个全新的脑洞，过去完全同样的事实可以呈现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甚至可以说，想象力并不是事实，但是它在定义事实。

科学革命的真相

说到这里，我用一个更加开脑洞的故事来解释一下。我用你熟知的科学革命作为例子，科学革命的起点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就是从过去的地心说转向了日心说这样一种全新的宇宙观。

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化，过去我们经常说这是理性战胜了信仰，

科学战胜了愚昧，因此人类终于突破过去的困境，进入到一个科学理性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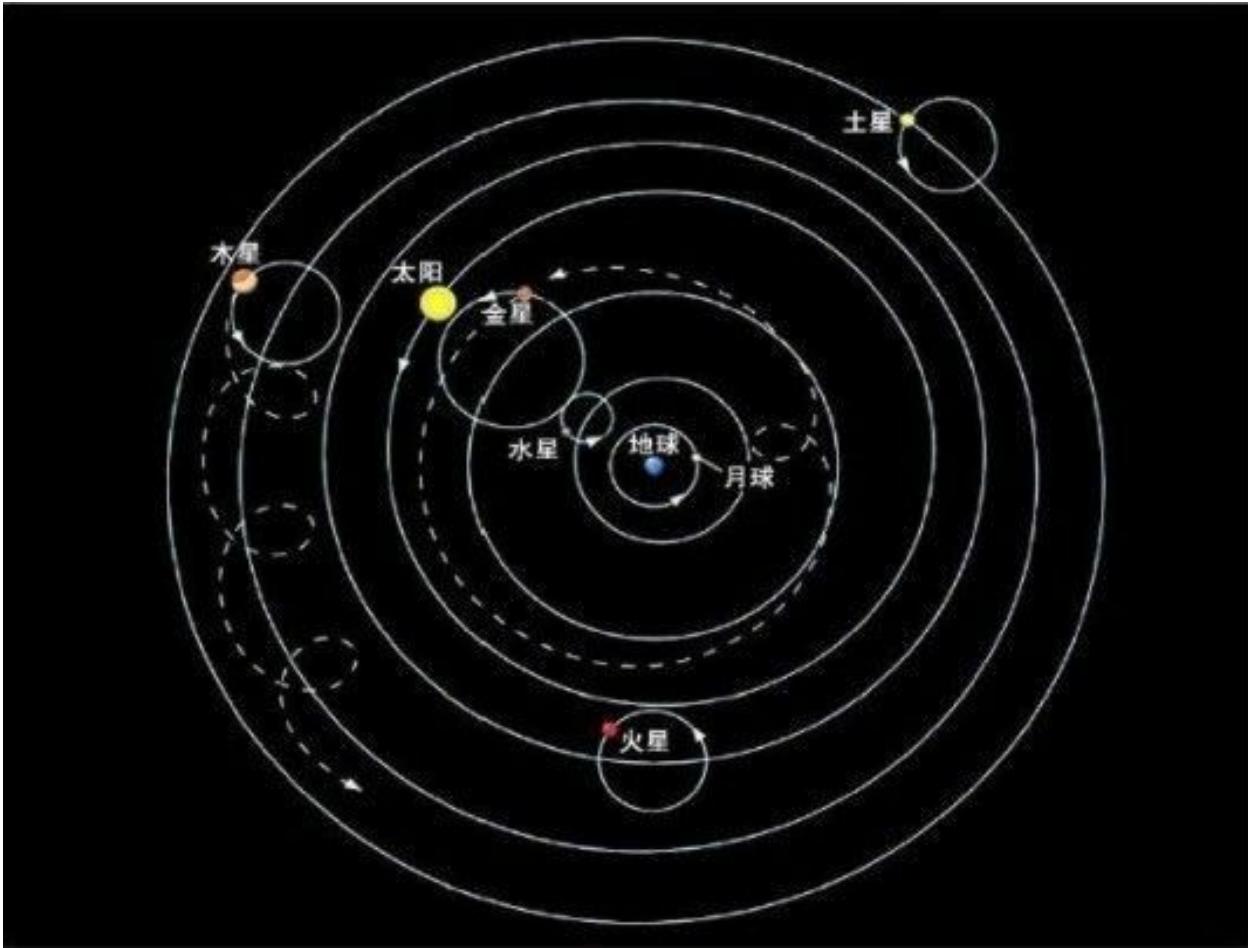
但是，假如你仔细读一下科学史的话，你会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历史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所谓的科学革命并不是理性战胜了信仰，科学战胜了蒙昧，而是信仰战胜了理性，再把自己发展成为新的理性。

地心说和日心说

在哥白尼之前，人们普遍接受的宇宙结构图是地心说。

你在下面的图片可以看到，中间的小圆点是地球，外围是地球、太阳、月亮、行星，最外层是恒星。这个理论是由天文学家托勒密发展完善的。



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

而当时哥白尼勾勒的新宇宙结构图中，太阳在中间，外围的几大行星相对位置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样子。

你可以再回到托勒密的图，地心并不是纯粹拍脑袋想出来的，他是有一整套很复杂的理论体系作支撑。

哥白尼和托勒密把宇宙画成了两种不同的结构。但是，他们是怎么画出这两种结构的呢？

实际上他们俩都是站在地球上观测天上各种星星运行的位置，然后会发现星星的位置关系经常变换，于是就在地球上想象，宇宙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基于这个想象，他们把天上星星运行地位置画出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可以表现为某种数学公式，然后用这个数学公式来计算这个 星星未来会运转到什么位置，基于这个不断调整各种轨道参数。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哥白尼和托勒密这两位，他们的观测资料几乎是相同的。基于基本相同的观测资料，他们俩分别在想象宇宙是什么样，一个认为太阳在中心，一个认为地球在中心。

地心说是高度科学化的体系

而在当时看来，托勒密的解释确实要比哥白尼“科学”多了。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托勒密对很多理论解释的负载没有那么重。假如你从来没有学过任何天文学的话，你会本能认为地球就是宇宙中心。

其二，假如哥白尼的说法正确的话，地球绕着太阳高速运转，那么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你必须得解释。就是如此之高速运动的地球，为什么不会把人甩出去？这些都是需要解释的。

而托勒密不需要解释这些东西。所以哥白尼的体系并没有托勒密的体系看上去那么符合常识。

另外，托勒密体系是一个高度科学化的体系。

在那个时代，人们有占星的实际需求，需要预测天体运行位置。因为那时的国王出门之前都要看星座，他需要看星座来确保这次出去打仗是吉是凶。

看星座实际上就是在看天上几大行星，和十二星座的相对位置关系，从而判断吉凶。那么，谁能更有效地预测这些行星和黄道十二星座的位置关系，谁就可以获得国王的认可。

今天我们知道，太阳系结构轨道上的相对位置关系，所以你从地球上看到一些行星的时候，会发现它的位置不稳定，不是匀速直线运动，它会忽前忽后。如果用哥白尼体系，这个现象很容易解释，轨道相对位置关系、运转周期不一样，所以你观察位置的时候会出现进动。

但是在托勒密体系下有点烦，如何解释呢？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托勒密体系的这个图。

比如看火星，上面这个大圆圈本身并不是火星，上面还有一个小黑点，小黑点才是火星。

大圆圈是什么呢？火星是绕着大圆圈旋转，这个大圆圈在托勒密体系里面叫做本轮。本轮的圆心再绕着外围的大轨道旋转，这个大轨道叫做均轮。

也就是说火星是绕着本轮往前运动，本轮的圆心又绕着均轮行动。只要你是这样一种轨道结构，自然在地球上看起来就会出现进动状况。

光定性解释不够，你还预测不了，必须定量解释。接下来就来调整本轮的直径、均轮的直径，使得你调整各种参数之后对于行星运行的位置有一个更准确的预测，这是托勒密体系要做的至关重要的事情。

问题是设置了一个本轮又设置了均轮之后，虽然解释了进动，但仍然预测不准。那怎么办？

托勒密这个学派的学者又开了一个脑洞，就是在本轮上面要再加一个二阶本轮，火星绕着二阶本轮旋转，二阶本轮绕着三阶本轮旋转，对于进动问题的解释就更加清晰了。可是加了二阶本轮之后有可能还是不准，于是再加三阶本轮。

到哥白尼时代，最猛的一颗行星被加到27阶本轮。好处是预测非常准确，代价是这个结构太复杂了。复杂到你来不及算完，国王已经出去办事回来了，那就不可能从国王那获取任何资助了。

哥白尼的强大信念

你可以发现，在哥白尼时代，实际上托勒密的体系已经高度科学化了，而且预测非常准确。

但是哥?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上帝一定是按照最简洁、最完美的方式创造宇宙的。哥白尼就是坚信这两点，你没有办法用理性来说服他。

于是哥?尼就认为，托勒密体系如此复杂，但是上帝一定 不会这么创造宇宙，所以他就重新想象宇宙的结构。

想象来想象去，根据那些参数进行各种计算，再进一步去观测验证等等。做了很多的工作之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哥白尼体系日心说。

只要在这样一个宇宙前提下，进动位置可以获得有效的解释，而且非常简洁，不再有任何复杂的本轮、均轮。

哥白尼解决了简洁性的问题。但还有另一个问题，他坚信上帝一定是按最完美的方式创造宇宙的，只有正圆的轨道才最完美。因为从圆心到圆周的任何一个点都是等距离的，这种是最完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哥白尼体系里面，行星轨道的确是最严格的正圆。今天咱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正圆，而是椭圆，太阳位于焦点上。

而哥白尼坚信轨道是正圆，这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哥白尼对于这些行星位置的预测跟托勒密体系相比，根本不准。

从信念转化为理性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哥白尼同时代的人，把托勒密体系跟哥白尼体系并列一块，你是一个足够健全理性的人，会选择相信谁？

托勒密体系可以完美地被观测证实，但哥白尼体系用来观测的时候，你会发现预测不准，有严重的问题。

此时你是一个健全理性的人，你一定会相信托勒密，会觉得人家才是科学。而哥白尼没有任何道理。

直到在哥白尼之后又出现另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他经过了三十几年的计算和微调，才解决了哥白尼体系之前的问题。

后来又经过了伽利略和牛顿，终于使得哥白尼体系的所有困境都被解决了。到了这一步，哥白尼体系，从最初基于内在的一个信念，到了牛顿时代，终于被呈现为新的理性。

我们可以再追问一下。哥白尼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尝试重新解释宇宙的结构？

因为那也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在哥白尼时代，地理大发现开始有一段时间了，大量全新的东西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时，人们过去熟悉的那个秩序、那个世界已经彻底崩溃坍塌了。依靠过去的体系观念已经不奏效了，你必须寻找到新的观念体系，才有可能努力尝试解释新的世界，去把握住未来。

可是这个新的东西、新的观念体系框架靠什么呢？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你意义，新的观念体系和观念，依靠的就是想象力。

所以，面对这种大的变革时代，想象力是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世界、重新理解事实的一个重要起点。

今日要点

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应该重塑史观。

史观相当程度上，就是要给你提供更多脑洞，帮你刺激出更大的想象力，使得你可以发现过去你所熟视无睹，从来没有意识到的新事实。于是你对于世界的理解也会出现全新的变化。

我们当下毫无疑问正处在一个大变个时代，在这种大变革时代，你也需要一个全新的历史观。

通过这种新的历史观，才能够帮助你突破在观念上、思想上、精神上的边界，使得你在遭遇到瓶颈的时候，对于未来充满焦虑的时候，仍然可以做到海阔天空。

注：本期内容来自施展直播内容，不包含音频。本课程内其他内容均包含施展亲述音频。

精选留言

遇歌生词

想象力绝不是漫无边际，它首先需要一对翅膀——知识经验和逻辑思维，在此基础上的创造才是想象力翱翔的天空。

吕可达02015223344

地心说有严密复杂的理论推导，而哥白尼坚信简洁才是真理，于是推出日心说，但当时日心说也有许多解释不了的事情，但哥白尼坚信自己，后来经过多位科学家努力，证实了日心说。哥白尼靠信念成就了日心说。事实本身不能告诉你意义，新的观念体系和观念靠的就是想象力。面对大变革时代，想象力是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世界，理解事实的重要起点。这么说有些科学。理性其实是偶然因素导致的结果。就像有些人坚信一些事情，并永不放弃地做，成功了，后来把他叫英雄，失败了，叫妄人。但在当时他们都是不合时宜的，都是被大多数人反对的，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能完全解释，只是凭着坚定信念来赌而已，赌一个千秋万世，赌一个万古流芳。就像一群蚂蚁，在一个迷宫里，谁都不知道路，大家乱走，上帝在看着，有一个蚂蚁碰巧出来了，大家认他当英雄，其他人当陪衬。一将功成万骨枯。

朱永超57391338

感觉施老师讲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观！还有蕴含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哲学！赞！

ascent2

从更高纬度来看，我们现在的科学理论，有很多就是错误的。现在的理性，无非就是想象力固化之后的东西，所以在理性面前，永远不要限制你的想象力。

老羊

托勒密跟哥白尼的交锋，确实很开脑洞。

直播回顾（下）|美国如何从孤立主义走向世界？

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向普世主义的过程，体现了一个大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你必须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

在1月4日晚上的联袂直播中，罗胖和我谈起了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世界秩序的过程。

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孤立主义。他们对外界的纷争和争端完全不感兴趣。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最终是在二战结束后，在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彻底走出了孤立主义，主动融入到世界的大秩序中。

我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也很有意思，一起趁周末分享给你。关于二战之后，美国如何走向世界的历史。这里有两个故事跟你分享一下。

美国国民精神的一体两面

美国在二战之前的孤立主义，跟美国在二战之后的普世主义，其实是美国国民精神当中一体两面的体现。

因为美国的国民精神是基于清教传统的，而清教徒有一个内在信念，就是我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世界未来的希望所在。

所以，在早期美国很弱小的时候，它的清教传统给它带来的效应就是：我们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了，世界上就剩我们是比较干净的了。老欧洲已经太肮脏了，千万不要被你们给污染了。所以我要跟你们离得远远的，我要孤立主义。这种信念一直延续下来。

那么，到了二战之后美国为什么又能转成普世主义呢？

当然这里有一系列的因素来促进这个转变，但是你要看到，清教里面本身也是有普世主义的一面的，就在于我们已经如此干净了，因此我对于这个肮脏的世界负有巨大的责任。

因此美国的国民精神，也促进了美国开始转向普世主义。

凯恩斯的脑洞

除了罗斯福的领导，美国转向普世主义的过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发生过重要的作用，就是经济学家凯恩斯。

在二战之后，凯恩斯就曾经开过一个巨大的脑洞。他当初打开的这个脑洞其实是有避免二战的可能的。

在凡尔赛会议上，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代表去凡尔赛和谈，他发现整个和谈条约签订的方向会有很大的问题，一定会出事。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极力想要往死压榨德国。对法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把德国彻底肢解成无数个小国，但是美国和英国不允许这样，因为会影响欧陆的均衡。

而法国国民非常直持法国总理。凯恩斯看到这个状况极为忧虑，最终愤而回国，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和约的经济后果》。凯恩斯在这本小册子上，分析了和约的一系列缺陷，并提出了补救办法。

凯恩斯认为，凡尔塞和约试图以一种高度民族主义的方案，如此之深刻地压迫德国，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在把整个欧洲置于死地。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德国为中心，整个欧洲的工业布局、经济布局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是一个遍及整个欧洲的分工体系。

因此凯恩斯说，假如你们通过赔款把德国弄死，事实上也是把欧洲弄死。因为整个欧洲的经济运作跟德国是联系在一块的。

凯恩斯说，法国非要置德国于死地，但是，法国是否有能力在把德国弄死之后，承接起德国的位置呢？它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法国把欧洲拖入这个深渊当中，这个行为极其不负责任。

德国大规模的出口，挤占的是谁的市场？就是这些战胜国的市场。这意味着德国越有赔款能力，你们战胜国的经济能力将受到越大的冲击。

所以等到德国赔款还清之日，就是你们这些战胜国灭顶之时。而且凡尔塞和约在条款里写出如此之多的赔款要求，这是对这个民族巨大的羞辱。

既然你们无法彻底灭掉这个民族，你还要如此深刻地羞辱这个强大的民族，这意味着什么？一定意味着未来更加可怕的战争。世界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因此你们对和约如此设定，极其不负责任，你们将把整个人类带入更加可怕的前景。

但是凯恩斯也说，我也理解法国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在于法国假如不从德国那里大量榨取赔款的话，他就没有能力偿还从英国美国借的债。

为了能够赔得起，他不得不压榨德国，可是也将整个欧洲带入更可怕的危机。

凯恩斯提出，为了避免可怕的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美国英国放弃对法国的还款要求。

从商业角度来说，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凯恩斯认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债就不能从商业角度考虑，只能从政治角度考虑。毫无疑问 这是美国英国必须做出的牺牲，通过这个牺牲才有可能确保未来的

利益得以保障，这是其一。

其二，为了确保战后的利益保护，必须建立超越单个国家之上的普遍贸易机制。为了防止革命国家的货币崩溃，我们得组建一个大的基金组织，帮助遭遇困境的国家稳定它的货币。

如果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的困境，我们还需要成立一个国际银行。用这个国际银行给遭遇到困境的国家发放贷款，很有可能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帮助他恢复经济，从而拉动世界的经济恢复。

说到这里，你应该能猜到了。凯恩斯说的这三个方案是什么？一个是国际贸易组织，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是世界银行。

也就是说今天主导世界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其实在一战之后，凯恩斯已经全提出来了。但是当时没人听，为什么？

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全都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狂热当中。大家忽略了各个国家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你没有办法脱离邻居独立存在。

一战后没有人听凯恩斯的，所有国家在民族主义的激情当中热情澎湃，最终一步步走向了自己亲自挖的坑，走向深渊。

直到二战结束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我们应该避免二战之后再带来三次大战。这时候人们重新想起来，当初凯恩斯曾经提过这一系列办法。

凯恩斯有可能用一种远远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普世主义的方案，来解决我们在所有的战争当中，以及所有国家深度依存当中，所面临的一个两难困境。

普世民族主义方案

但是光有普世主义无法带来动员力，而凯恩斯提出的，恰恰是一个普世民族主义的方案。

凯恩斯的方案里面，民族主义的东西体现在哪呢？

就是他提出，美国英国虽然放弃还款的要求，但是要换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英国以及美国在这之后成立起来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当中，应该拥有主导地位，这是英美放弃所有偿债要求的前提。

这个要求毫无疑问是一个国家利益的体现。但它的基础前提是什么？它必须在一种普世主义的方案当中，才有可能真正收获民族主义的利益。

假如你直接就试图用民族主义的方案攫取所有利益的话，最后什么也得不到。

今日要点

从美国转向普世主义的这个历史过程中，你可以发现，作为美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你即便想要从自私的角度获取国家利益。唯一的办法也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这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责任。作为以个崛起的大国，你必须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

这同样也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精选留言

践无敌

站的高度不一样，脑洞开的程度也就不一样。努力提升自己的视野，大开脑洞，深入思考，不断践行，才能成长。读完专栏后，现

在自己脑中各种历史现象再融汇深化，也让自己体会到了历史的魅力，纠正了自己对亚非拉的错误或者是偏见性认识，让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也比之前更深入了。谢谢，施老师。